“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2014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 菁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2014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 菁 编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图志. 24，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 张宪文主编；武菁编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474—1479—8

Ⅰ.①日… Ⅱ.①张… ②武… Ⅲ.①日本—侵华—史料—图集
Ⅳ.①K265.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298号

日本侵华图志　张宪文 主编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　菁 编著

责任编辑　王一诺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钧
封底篆刻　管树强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210毫米×285毫米
20印张　724幅图　81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合作项目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日本侵华图志》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副主编

关　捷　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井晓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赵继敏　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执行副主编

曹大臣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小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委　员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郭铁椿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杨惠萍　大连大学教授
张　瑾　重庆大学教授
陈丽菲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武　菁　安徽大学教授
高晓燕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何天义　河北省社科院抗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田苏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邓　平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任银睦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研究员
齐红深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
杨克林　香港新大陆出版社编审
吴先斌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研究员
曹　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馆员
唐润明　重庆市档案局研究馆员
夏　蓓　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戚厚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关　伟　大连民族学院副教授
柳　宾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李　鑫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陆　军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潘　涛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审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委　员

史全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臧运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廖大伟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兴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　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继锋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小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各卷主要编著者、审校者名单

第 1 卷　《战争动员》　曹大臣 / 编著　洪小夏 / 审校
第 2 卷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　关　捷　关　伟 / 编著　史全生 / 审校
第 3 卷　《侵占台湾五十年》（1895—1945）　洪小夏　殷占堂 / 编著　傅光中 / 审校

第 4 卷　《侵占大连四十年》（1905—1945）　郭铁椿　关　伟等 / 编著　王卫星 / 审校
第 5 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　任银睦　柳　宾等 / 编著　徐　畅 / 审校
第 6 卷　《九一八事变与侵占东北》（1928—1932）　刘长江 / 编著　曹大臣 / 审校
第 7 卷　《建立伪满洲国与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32—1945）　赵继敏 / 编著　曹大臣 / 审校
第 8 卷　《侵占华北地区》（1932—1945）　罗存康　曹　艺　李　鑫 / 编著　赵兴胜 / 审校
第 9 卷　《侵占华东地区》（1932—1945）　王卫星 / 编著　赵兴胜 / 审校
第 10 卷　《侵占华中地区》（1938—1945）　马振犊　陆　军　潘　涛 / 编著　李继锋 / 审校
第 11 卷　《侵占华南地区》（1938—1945）　马振犊等 / 编著　李继锋 / 审校
第 12 卷　《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1941—1945）　杨克林 / 编著　廖大伟 / 审校
第 13 卷　《情报与间谍活动》　马振犊　戚厚杰等 / 编著　张宪文 / 审校
第 14 卷　《无差别轰炸》　张　瑾　唐润明　邓　平 / 编著　臧运祜 / 审校
第 15 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 / 编著　徐　畅 / 审校
第 16 卷　《南京大屠杀》　曹必宏等 / 编著　李继锋 / 审校
第 17 卷　《“三光作战”与“无人区”》　田苏苏 / 编著　江　沛 / 审校
第 18 卷　《毁坏城镇》　夏　蓓 / 编著　齐春风 / 审校
第 19 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 / 编著　王卫星 / 审校
第 20 卷　《虐杀战俘与奴役劳工》　何天义等 / 编著　江　沛 / 审校
第 21 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 / 编著　史全生 / 审校
第 22 卷　《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齐红深 / 编著　郭铁椿 / 审校
第 23 卷　《扶植伪政权》　经盛鸿等 / 编著　臧运祜 / 审校
第 24 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　菁 / 编著　廖大伟 / 审校
第 25 卷　《投降与受审》　姜良芹 / 编著　臧运祜 / 审校

部分图片提供者

殷占堂　杨克林　吴先斌　杨莲福　姜良芹　邱明轩　刘启安　李晓方　张　蓉　刘新勇

项目策划　殷占堂　尹奎友　傅光中
项目统筹　傅光中　赵祥斌
设计统筹　王　芳
编印统筹　李新宇　许　诺
印务专员　甄西苏　刘奎山
发行统筹　王莹伟　祝东江
营销专员　张桐欣
编　　务　郑丽慧　桑葆琳　李忠秋
方　言　付　坤　莫　超
于　东　张广成

总　序

张宪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其间，无论是日本遣唐使来华，或者是中国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十分密切，对两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868 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政治变革，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它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大发展的道路。由此，日本从幕府制封建王朝迈向天皇制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前首相山县有朋等人，于 19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侵略有理”的理论，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主张，将周边各国视为其利益所在，必须加以控制。以此理论为指导，日本逐步形成了其吞并朝鲜、侵占满蒙、独霸中国，进而将侵略势力扩展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1928 年，由田中义一首相主导召开的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形成了以军部为代表的军事政治体制，组成了包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等军事机构在内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军事力量迅速向朝鲜、中国展开侵略行动。

日本不仅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了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参与了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且独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摧毁了清王朝新兴的海军力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历时 14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日本以战争手段，侵占了中国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大片国土，毁坏了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破坏了大面积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从东北到中原内地，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产品被日本掠夺，占为己有。战争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流动。许

多沿海工厂企业和大中专院校，被迫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教学研究工作。而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占领者则以种种手段加强压迫和控制，致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

日本在以军事行动占领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譬如，在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和“万人坑”。它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在中国各地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尤其残忍的是，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30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人间悲剧。上述惨案或行为，均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原则。

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面前，中国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严格依照国际法规，坚持维护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对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70年，日本在美国政府的长期包庇、纵容下，不仅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拒绝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甚至美化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由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加之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众多的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的欺骗和蒙蔽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模糊、是非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包括日本民众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他们认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维护并加强中日友好。

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当今中外历史学者都开始重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有关学者采集并掌握了日本侵华历史图片约25000幅。这些十分珍贵的原始图片，来自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博机构，以及中外私人收藏。我们按照“重要性、稀缺性、高清晰”的原则，强调图片的来源出处和准确解读，努力向读者或研究者提供可靠而且有价值的图片史料。为此，我们按照日本侵华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相关专题，整理编辑为《日本侵华图志》共计25卷。

可以说，这套25卷本《日本侵华图志》的内容，客观、全面、直接地揭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日本自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的侵华历史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各种暴行。它们是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有了上述大量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图像“立此存照”，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侵华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参加这套大型图志编著工作的，有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

济南、青岛、石家庄、合肥、重庆、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史志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抗战纪念馆、博物院以及其他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历史学、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造诣。本书编委会对他们为书稿编纂工作付出的巨大艰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十分关心、支持本《图志》的编辑出版。在此，我谨代表《图志》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承担了本图志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有关社领导、编辑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编委会向出版社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 年 12 月 16 日

凡　例

《日本侵华图志》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卷本图书出版工程。全书共25卷，每卷平均约8万字、1000幅图，共计约200万字、25000幅图。该项目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为了充分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编纂过程中，各卷遵循了如下体例及规范。

一、关于书名。本书总名为《日本侵华图志》，按照时间顺序和不同专题分为25卷，每卷1册，各卷序号列入卷名，如《日本侵华图志（1）·战争动员》《日本侵华图志（2）·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日本侵华图志（16）·南京大屠杀》等。

二、各卷内容构成。本书各卷由以下内容构成：总序、凡例、目录、综述、正文、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三、正文层次结构。多数分卷正文分为两个层次，少数分卷分为三个层次；与之相适应，正文设置两级或三级标题。每级标题以序号加题名的形式呈现：一级标题形式为“第一章　ＸＸＸＸＸＸ”“第二章　ＸＸＸＸＸＸ”，二级标题形式为“一、ＸＸＸＸＸＸ”“二、ＸＸＸＸＸＸ”，三级标题形式为“（一）ＸＸＸＸＸＸ”“（二）ＸＸＸＸＸＸ”。一二两级标题进目录，三级标题不进目录。章题下有1000字左右的概述，节题下有200字左右的简述，每幅图片附带包括图片出处在内的100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文字。因特殊情况，有的分卷如《情报与间谍活动》《“慰安妇”与性暴行》等，编纂体例有所不同。

四、图片辑录原则。作为图志，本书各卷图片资料的辑录，遵循“重要性、稀缺性和高清晰”三原则，力争以清晰的画质呈现历史现场和事实真相。

五、图片编排顺序。本书按不同专题分卷编纂，所选图片资料，一般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进行串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排列组合。每页图片及其文字说明均重新编码。

六、语言文字规范。书中语言文字表述，坚持事实第一、理性至上之原则，淡化主观感情色彩，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不用蔑称或溢美之词。如涉及侵华日军，一般不用“日本鬼子”“日寇”“强盗”“恶魔”等字眼。日文史料中日方对其侵华行为的自我标榜和溢美之词，以及对中方的污蔑不敬文字，引用时加注说明或用引号处理。历史地名一般使用当时称谓，其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名称，如“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涉及台港澳、西藏、新疆、蒙古的用语，以及伪政权的国号、年号、官职等称谓，一律遵从我国的有关规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一律使用全称，比如“朝鲜族”“蒙古族”，不能简称为“鲜族”“蒙族”等。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用语，避免出现“满清”“蒙元”等称呼，而应直接表述为“清朝”“元朝”。1949 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不能用“中华民国”纪年。

七、引文注释规则。行文中的引文需要注释的，一律采用页下注，注释序号用六角括号加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如〔1〕〔2〕〔3〕），每页重新编码。引文注释规则与本“凡例”第十条“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相同，其中为出版物的，要在末尾加注引文所在页码。

八、图片说明及出处著录规则。图片说明文字，以交代图片包含的历史信息为主，主要说明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说明文字之后，在六角括号“〔〕”之内，注明图片来源或出处。凡是作者具名的照片、绘画或图表，一律载明作者姓名；无法查明作者姓名的，视情况注明提供者或收藏者。未刊档案，注明馆藏地及案宗号；已刊登或出版的，注明著作权人和书刊名称、出版年月、页码。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所选图片资料中人名、地名的错字、别字以及不规范用词，均按原样直录，然后加括号注明正字。出处采用外文（主要是日文）的，按原外文书刊著录完整规范的外文，著作权人前不加国别，如“〔《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3）・日中戦争（1）》，每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六月二十五日版，第 16 頁〕”“〔千葉光則：《秘蔵写真で知る近代日本の戦歴（3）・満州事変》，フットワーク出版株式会社 1991 年 12 月 6 日版，第 78 頁〕”；外文中译本著作，以现代汉语著录，原著作权人前加小括号“（）”注明国别，如“〔（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本书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第 190 页〕”。图片出处文字句末不带句号。

九、“大事记”格式。以时系事，或一日一事，或一日几事，每事一条，每条一记。年份单独占一行，日期及事件另起行。日期后空一字格。行文追求要言不烦、言简意赅。

十、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各卷参考使用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图文资料，均在书后以“主要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重要的相关信息。参考文献分类编纂，各类中又按时间先后排序。著录规则主要有：

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版别。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保留。引用翻译著作时，原责任者前以六角括号“〔〕”加注国别，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出版者名称容易造成混淆或

产生歧义以及有必要的，出版者名称前加小括号“（）”标注地名。如：“高添强等编著：《香港日占时期》，（香港）三联书店 1995 年 7 月版。”“〔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璧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

著作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版别。如：“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8 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期刊名及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如：“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60 年第 10 期。”

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篇名 / 报纸名称与出版年月日 / 版次。如“万居：《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申报》1938 年 12 月 15 日，第 4 版。”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的，可标志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标题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如：“支那研究会編：《山東の富源：附・膠州湾の価値》，（東京）活人社大正三年（1914）版，青岛市档案馆藏，A10180。”

电子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 / 获取和访问路径 / 引用日期。如：“Robin Waldman. AGAS.8. 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05/21/Identification-in-world-war-ii-china-friend-or-foe/agas-8/, 2014 年 12 月 22 日。”“韩练成捐赠：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交出的海军军刀，http://www.jb.mil.cn/cp/wwjs/yjww/201007/t20100709_13917_17.html，2014 年 12 月 22 日。”

本书各卷所引日文文献较多，所引文献没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按原文献用日文进行完整规范的著录；为便于阅读和查找，也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著录，但不得混用中日两种文字著录同一文献。

十一、数字用法。本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 15835—2011）之规定。特别注意事项如下：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准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在进行时间记数时，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使用阿拉伯数字，如“20 世纪 30 年代”“1937 年 12 月 13 日”“15 时 40 分（下午 3 时 40 分）”；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1949 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日本的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数字，并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八月十五中秋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昭和十三年（1938）”。

军队序列、部队番号，按照中日历史文献的习惯用法，一律采用汉字数字：一位数的用一个汉字，如“第六师团”；两位数的带“十”字，如“第二十四军”；三位数（含三位数）以上的，用汉字数字排列表示，如“第八八九团”“第一一一六连”。

目　录

综述 …… 1

第一章　破坏自然生态 …… 7

一、破坏林业资源 …… 9

二、破坏交通设施 …… 13

三、破坏乡村面貌 …… 28

第二章　破坏社会文化生态 …… 55

一、打破平民生活常态 …… 57

二、广立碑塔 …… 85

三、广建神社 …… 96

第三章　强化社会统治机构 …… 111

一、设立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和伪军警武装 …… 113

二、组建宪兵部队 …… 160

三、广设特务机关 …… 189

第四章　基层渗透 …… 203

一、组织“维持会” …… 207

二、成立“自治会” …… 212

三、举办“宣抚班” …… 217

四、成立“新民会” …… 224

第五章 社会控制 …… 227
一、奴化教育 …… 229
二、奴化训练 …… 234
三、控制宗教 …… 258
四、制颁“良民证” …… 273
五、制颁身份证、通行证 …… 282

大事记 …… 293
主要参考文献 …… 299
索引 …… 302
后记 …… 304

综　述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摧毁了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社会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战争期间，日本采取军事占领、集体屠杀、烧杀奸淫、资源掠夺、利用军警宪特进行恐吓威慑、摧毁国民政府各级政权、建立伪政权和基层统治机构等手段将其统治力量渗透到社会基层，通过欺骗宣传、奴化教育、奴化训练、宗教信仰，以及发放所谓“良民证”、通行证、实行保甲连坐等人身控制手段，进行社会控制，企图以战争摧毁中国人的肉体，用控制削弱中国人的意志，靠宗教扭曲中国人的灵魂，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人民，达到其统治中国的险恶目的。

日本侵华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轨迹，表现出革故鼎新的社会文化特色。在全国行政区划内，虽不乏地区差异，但是，整体上的社会变迁，体现出独立又融合的和谐发展趋势。究其缘由，自然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惯性影响、求新应变的时代精神，成就了中国近代社会生态的发展脉络。然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一）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演，中华大地狼烟四起，战火遍地，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对中国的农业、工业、矿业等进行疯狂掠夺，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 1000 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亿美元。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日军侵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日军铁蹄蹂躏之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破坏。

日军在中国四处砍伐和掠夺林木资源，将这些木材用作军事设施、兵舍修建材料或者运往日本，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除了掠夺性砍伐，日军的军事行动

也对森林及植被等自然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战事所及，森林被毁，绿地化为焦土，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

日军军事行动对中国的交通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日军的炮击和飞机轰炸下，许多交通设施被摧毁，铁路和公路干线中断，水路航运亦陷入停顿。以上海为例，淞沪抗战期间，闸北火车站成为日军重要军事目标，经过80余日的狂轰烂炸，闸北成为一片废墟。此外，日军还抢占各种交通设施，扰乱原有的交通秩序。交通破坏，给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与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

日军在乡村进行军事行动，肆意毁坏农田、焚烧房屋、辗压桥梁，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的损毁。日军在乡村开展大规模“扫荡”和“清乡”，制造“无人区”，掠夺农产品和毁坏村庄。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日军还滥施淫威，以焚烧村落和屠杀居民为乐。日军在乡村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农田房舍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日军所到之处，强掳劳工，强拉牲口，为避免日军袭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原有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秩序难以恢复，乡村满目疮痍。

（二）

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侵略者长达14年的军事镇压及精神压迫，使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日军通过发动战争，占领城镇，控制交通要道和经济设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同时，为日军掠夺战争资源提供便利条件。日军所到之处，立塔树碑，广建神社，进行精神压制。

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于1941年春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非治安区的方针是：以“扫荡”为主，采取“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还伴以散布细菌、施放毒气，企图使解放区人畜不留，从根本上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日伪实施“清乡”活动。1941年5月，日伪在南京马台街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并开展“清乡”活动。1941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需要在中国敌占区建立一个较为稳固的后方。为此，日本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一面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进行“扫荡”，在治安区实行“清乡”。1941年5月，汪精卫去日本东京访问，乞得五亿元“清乡费”，随即在南京成立由他任委员长的“清乡委员会”，企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特务等各种力量摧毁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伪化统治。自1941年7月1日开始，日伪先后在苏南、苏中、浙东等地进行“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军事清乡”是日伪军以梳篦、拉网等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同时增设据点，四处“搜剿”抗战党政人员，并在边缘区沿公路、河川设重兵驻守的封锁线。“政治清乡”是加强地方伪政权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拆屋并村，推行连坐法、自首政策，建立特务网，组织“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

日军制造冀东“无人区”。1942年8月，日军集中四万六千余兵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把冀东分割成二十余块，进行分区“清剿”。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七百余里，南北宽八十余里的“无人区”。在“无人区”内，日军实行“集家并村”，选择公路附近较大的村庄，驱赶周围十多里的村民归并进来，成为“部落”。周围用二丈高的土墙围绕，村民住在窝棚里，人畜杂居，吃糠咽菜，衣不蔽体，病疫流行。“部落”外大批田园荒芜，打下的少量粮食统统交给“谷物组合”，三日一捐，五日一献。每个“部落”设有部落长，下设保长、甲长、牌长，还胁迫群众参加“武装自卫团”“协和会”“道德会”等伪组织，加强控制。“部落”五里以外，就是“无住地带”，群众进入“无住地带”，就以“通匪”被杀害。凡是拒绝迁进“部落”的村庄，都遭到日军的血洗和烧光。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所积累的财富丧失大半，直接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作为“中国现代化缩影”的上海，在30年代“以人口380万，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而百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通讯社多达百余家，而成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远东独步之商港，我国工商业、金融、文化之重心”。近百年来，上海虽也经历过大小不等的多次战乱，却没有哪次能与此次战争对上海的打击度和损害度相比。可以说，经“八一三”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租界，上海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基本停滞，甚至倒退。

日本侵略上海时，完全不顾国际公法，对非战区、平民区狂轰滥炸，导致平民死伤惨重。1937年10月25日，850架日本海军飞机对上海华界轮番轰炸，除军用设施外，主要是平民区。上海北火车站附近商店、民居几成灰烬。连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亚纳尔将军，也认为日本严重越轨，“我很痛心地看到上海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他认为，战争是有规则的，这一规则“必须遵守”，而如今这一规则正在受到日本破坏。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上海即已开始了这场屠杀的预演。据《侵沪日军暴行》一书所载，市区暂且不谈，仅据宝山、金山、奉贤、南汇等郊县部分乡镇统计，日军在上述地区即焚烧房屋达137834间，屠杀无辜百姓14826人，蹂躏妇女达2114人。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者达2267人。现宝山县罗泾乡，在当年日军登陆杀人的池塘边矗立“永志不忘”石碑一块，上载：“‘八一三’日寇于此登陆后，在不到100天时间里，仅罗泾公社范围内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就有2244人，烧毁民房10908间。”

残暴的日军，在上海大肆奸淫妇女。1932年“一·二八”期间，日军即在上海设立“慰安所”17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一家“慰安所”就设于杨树浦沈家宅。宋美龄在《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揭露道，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甚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据苏智良教授考证，上海不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这一制度维持时间最长、最为稳定的城市。

日本侵略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瞬间成为人间地狱。淞沪战役后，日本针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屠杀，其血腥程度，更是令人发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日军疯狂屠杀南京平民，奸杀妇女，杀戮儿童，30万同胞血溅金陵。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大屠杀，使中

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

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造成沦陷区大量战争流民和难民。工厂、学校被迫内迁，民众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日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征发民众修铁路挖战壕，到处掠取粮食等物资，将民众纳入其战争机器当中。通过发放“良民证”、通行证、实行保甲连坐等人身控制手段，进行社会控制，民众在其残酷统治下艰难生存。

随着侵略战争的推进，日本逐渐在海外广泛建立本土神道教的日本神社。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到1945年，日本共建设了海外神社1600余座。其中在中国的台湾、东北等地建设了约550处日本神社。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是神道教的基本信念。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人员紧随其后。宗教完全屈从于侵略意志，这也是近代历史所罕见的。神道教与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结合，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特点。

（三）

日军在占领区，采取军事打击和严酷镇压的措施，实行殖民统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从1937年8月起，日军在实施军事占领的同时，建立社会统治机构，以维护其占领区的所谓“社会治安”，妄图通过社会控制，实现其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战争长期化的要求，重新调整对华方针，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政策，建立伪政权，军事上大力整顿汉奸军队，进行所谓“整肃（沦陷区）治安”，为日军提供军事支援和后勤保障。1939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治安肃正要纲》中强调：“为了恢复治安，首要的政策是恢复警察、保卫团和自卫团等组织的自卫力……”在此方针指导下，先后在各地成立了警备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对统治区的中国民众实施军事镇压和社会控制。

（四）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通过建立各种基层社会组织，不断向基层渗透其政治统治力量。日军每攻一地，即建立各种统治政权和奴化机关，采用军警镇压、机关管控、欺骗宣传等措施，实施“以华治华”统治政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县或县以上政权机构瘫痪，县政府官员有的随中央政府西撤，有的则转移到农村。当时县一级行政机构极其混乱，一县常有几个县长对立：有原国民政府的县长，有国民党军队新委任的县长，也有未经委任而自行由地方绅士推举的县长。

1938年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所谓“法规”规定，各县公署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以及秘书处，各科设置科长及科员2

至4人。负责本县之户口调查、保甲编制、财政整理以及战后建设、教育复兴等各项行政事务。另外县公署还要负责本县的禁烟、自卫等事宜。县公署之外还成立县政咨询会，由县知事延聘地方公正人士6至12人组成。县政咨询会为议事机构，议决的事项包括县单行规则、县预算决算、县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等。有关法规还规定凡未设地方法院或县司法处之各县，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1938年8月，“维新政府”又命令一部分县知事兼任县警察所所长。伪县知事似乎总揽一县的行政、司法、财政、治安等诸多大权。事实上，“维新政府”时期，尽管华中、华东地区的日军并不像它在东北那样，大小机构都有日本人做副职，但其对各县行政事务插手较多，甚至在日伪政权成立后长时间内日本顾问与县知事同室办公。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取代“维新政府”。为取得其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地位，汪伪政府宣称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1940年6月，汪伪政权改省长制为省主席制。8月，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政府下设第一、二、三科和秘书处。各县直属机构设有区公所、卫生事务所、县立医院、县警察大队、自卫团总部、县金库、警察局、教育局、财政局，仿效战前国民政府科局并行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县政府的科是县公署的一个下属单位，县知事掌握科长的任免权，并全权管理一县之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的局，虽然隶属于县政府，但各局的人事权控制在省政府相应的主管各厅，各局局长大多由省政府主管各厅指派。实际上一省之内的建设、财政、民政、教育等各部门均各自为政，如关于教育政策是由省政府的教育厅制定，下达至县府的教育局执行，县长对此无权过问。沦陷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制度已中断实行，汪伪政府将财政科、教育科改为财政局、教育局，各局长多由主管各厅指派，自成系统，下则径发局令，对上则径报本厅。各局之间，亦只有个别发展之企图，缺乏统一意志，致一县工作中心，无从确定。汪伪此举旨在渗透基层，收回事权，控制税收。

然而，此时的县府各局对伪省府各厅的依赖程度，远逊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伪县府各局之于省府各厅不再唯命是从。为改变省县之间这种不相统属的关系，日伪在华东、华中地区频繁发动“清乡”，扫除基层渗透的障碍。[1]

除了军事镇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进行欺骗与愚弄，鼓噪“中日亲善”“互相提携”，通过维持会、自治会、新民会、宣抚班等各种组织活动，极力向基层渗透。对日本占领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以便取得各种资源。而农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权保持稳定。日伪在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在农村建立各级行政组织，全面向基层渗透。

（五）

如果说建立各种社会基层组织是日本实施基层渗透的“硬功夫”，那么，推行

〔1〕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奴化教育、编练伪军、组织集会、推行日本化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等，即成为日本进行社会控制的“新手段”。除了欺骗宣传，蛊惑人心，日本还着重针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改造，妄图割裂中国儿童与祖国的感情联系，为日本培养臣服天皇和日军的“归化顺民”。

日本广泛推行奴化教育，通过宣传“传统文化”，利用社会名流的影响力，进行欺骗宣传，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强行在学校推行日语教学，消灭进步人士，教导日本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妄图通过奴化教育，实现其征服中国之目的。

1942年9月10日，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孔庙举行秋祭孔子演礼。企图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训练，妄图通过奴化训练，使中国民众成为为其侵略活动服务的工具。并且，通过训练伪军、体育活动、奴化集会、“友谊活动”等方式，对民众进行集体洗脑，消灭其反抗精神与自主意志。

日本企图以战争摧毁中国人的肉体，用控制压制中国人的意志，靠宗教麻痹人的精神，扭曲人的灵魂，最终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人民，达到其统治中国的险恶用心。

战争初期，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吠中，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和大中城市。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日本战线越拉越长，其在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为进一步掠夺战争物资，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迫切需要在其占领区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为切实控制地域广袤的中国区域，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军事占领与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

残酷的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中华民族的血肉之躯；严密的社会控制，压制了中国人的行动自由，扭曲了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然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支撑我们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走出阴霾，浴火重生。

第一章

破坏自然生态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大屠杀，对中国的农业、工业、矿产等进行疯狂的掠夺。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 1000 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日军侵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中华大地满目疮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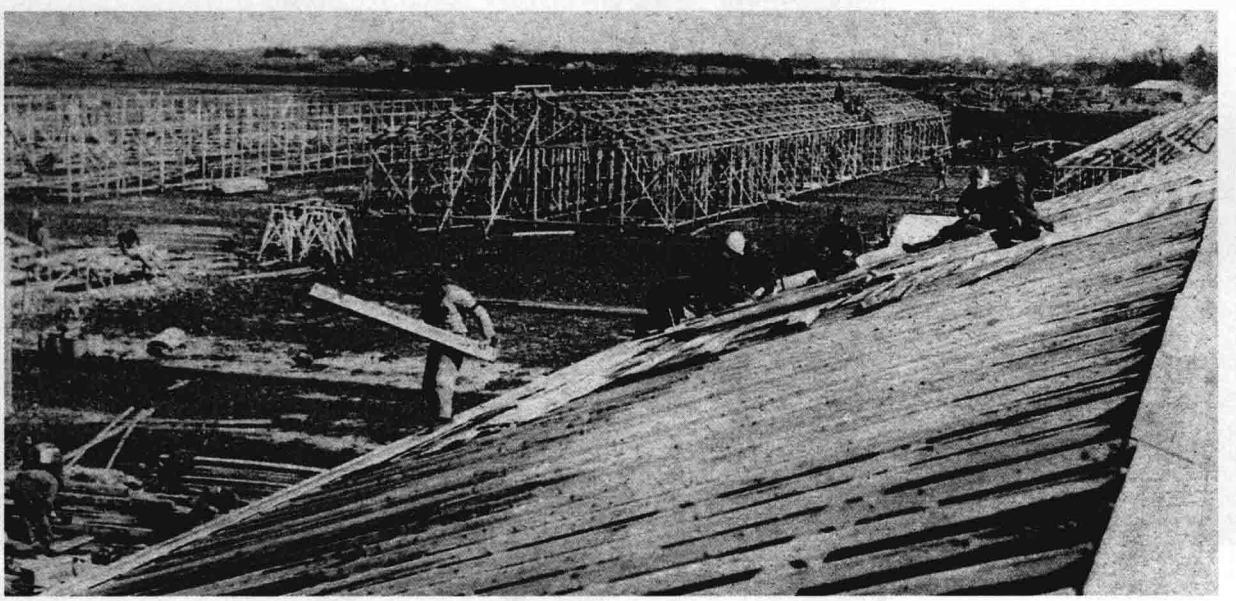
日军在中国四处砍伐和掠夺林木资源，将这些木材用作军事设施、兵舍修建或者运往日本，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除了掠夺性砍伐，日军的军事行动也对森林及植被等自然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战事所及，森林被毁，绿地化为焦土，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

日军军事行动对中国的交通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日军的炮击和飞机轰炸下，许多交通设施被摧毁，铁路和公路干线被中断，水路航运亦陷入停顿。以上海为例，淞沪抗战期间，闸北火车站成为日军重点军事目标，经过 80 余日的狂轰滥炸，闸北成一片废墟。此外，日军还抢占各种交通设施，扰乱了原有的交通秩序。交通破坏，给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与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

日军在乡村进行军事行动，肆意毁坏农田、焚烧房屋、碾压桥梁，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的损毁。日军在乡村开展大规模扫荡，制造“无人区”，掠夺农产品和毁坏村庄。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日军还滥施淫威，以焚烧村落和屠杀居民为乐。在乡村，视野往往比较开阔，大规模的炮击多在乡村进行，农田房舍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为避免日军袭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原有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秩序难以恢复。

一、破坏林业资源

日军侵华期间，竭力掠夺中国林业资源。日军在东北以及中国大量盗伐森林，或用于军事或输往日本。除了掠夺性砍伐之外，日军的军事行动也对森林资源造成一定破坏。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38年1月，上海小野崎部队正在江湾附近建设日本兵舍。兵舍仅仅构建了轮廓，但用的木材却不计其数。〔《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2月11日发行，第28页〕

1　1938年1月，上海吴淞炮台栈桥，饭岛部队正在搬运物资。图中被砍伐的树木数量巨大。〔《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8页〕

2　1938年1月，上海小野崎部队正在江湾附近使用大量木材建设日本兵舍。〔《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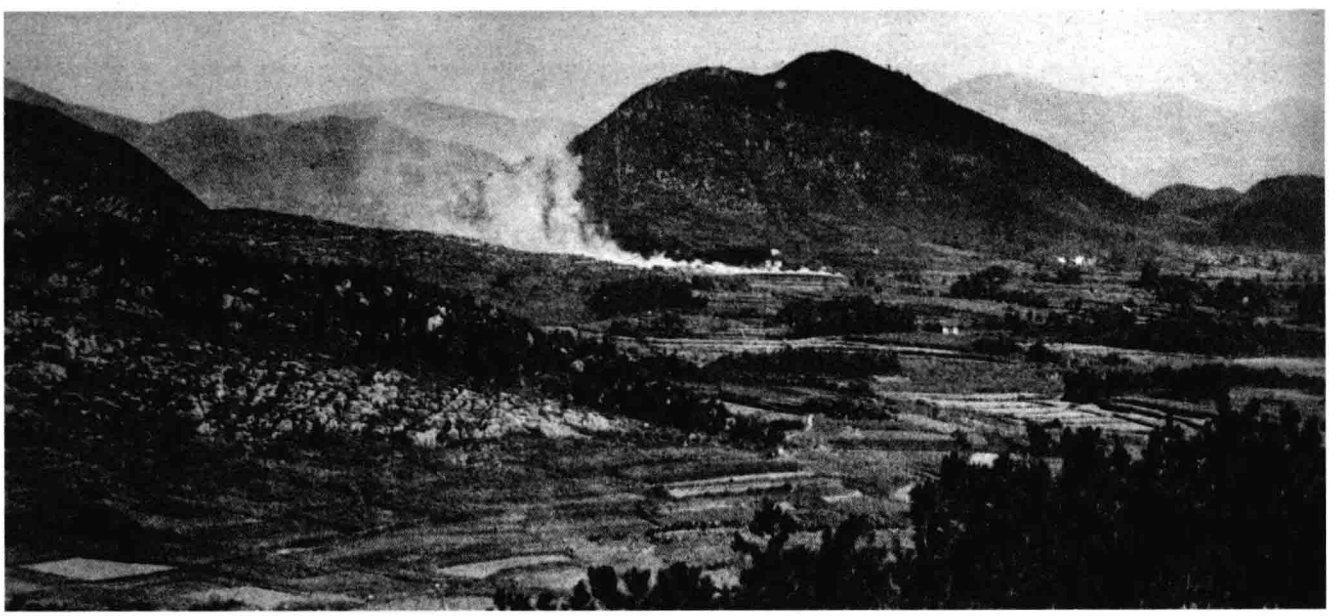
3　1938年1月，上海小野崎部队正在江湾附近建设日本兵舍。〔《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8页〕

1

2

3

1



2

1 1938年4月，杭州冷水桥附近的日军正在进行“扫荡”，大面积的森林已经被焚烧。〔《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15页〕

2 1938年10月，江南战线阳新攻略站中，凤凰山麓三溪口中国军队所在地已经燃起熊熊大火，不远处的森林被焚毁。〔《支那事变画报》第44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11月1日发行，第24页〕

■1 在中国领土上三个日本兵正在切割木材。〔《支那战线写真》第32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7年12月22日发行，第4页〕

■2 两个日军在森林中休息，另外两个日军在搬运砍下的木材。〔《支那战线写真》第32报，第4页〕

1

2

二、破坏交通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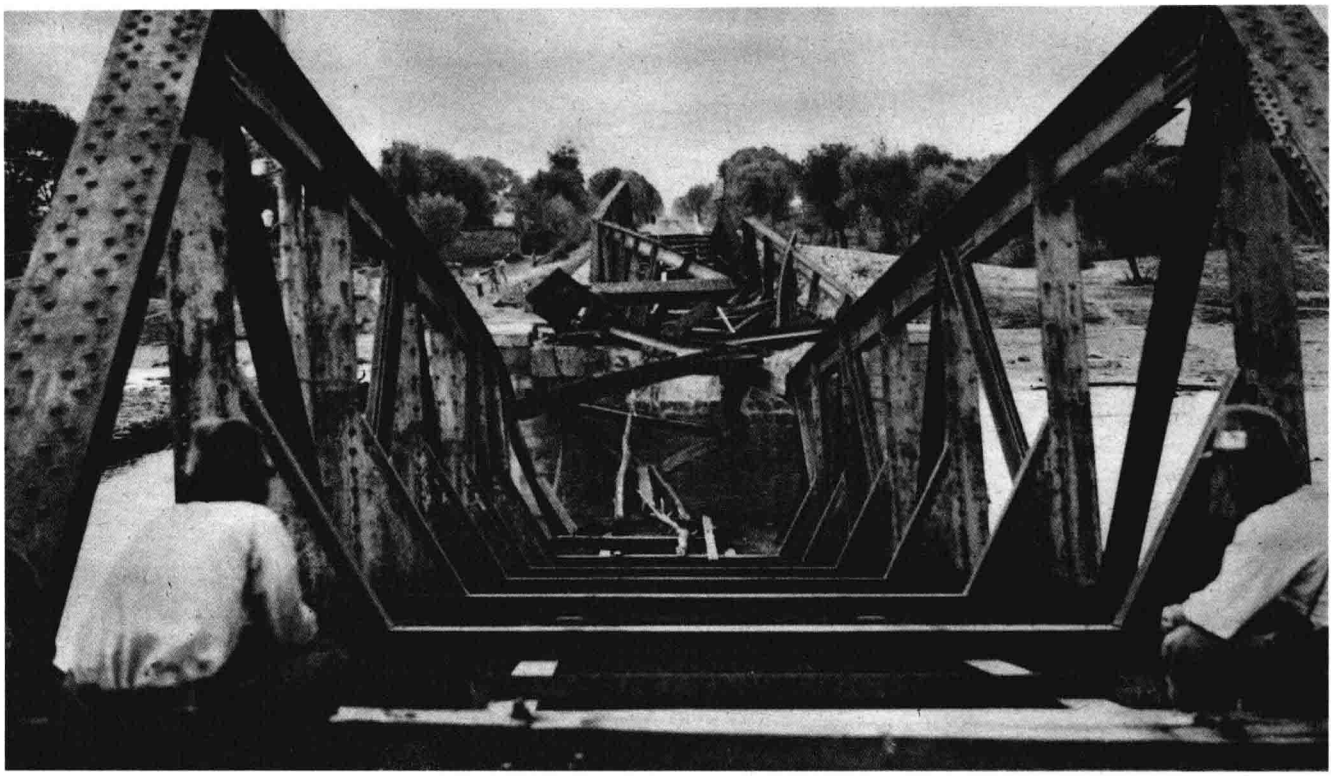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面抗战。

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

7月底，攻陷平、津后，日军紧接着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沿津浦路进攻，为的是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侵犯；沿平汉路南下，为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长江；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对日寇的三路进犯，在平绥路方面，国民政府组织了著名的南口战役。该战役虽然以日方胜利告终，但是延缓了日本进攻华北、夺取山西的进程。

为阻止中国军队的军事抵抗，日军攻城掠地，占领车站、驿站，炸毁桥梁、铁轨、公路，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交通设施，给民众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困扰。

1937年9月，上海的一座桥被日军炸毁，在这座断桥上，日军临时修建了一座简易桥，一辆坦克正在通过这座简易桥。〔《支那事变画报》第6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0月11日发行，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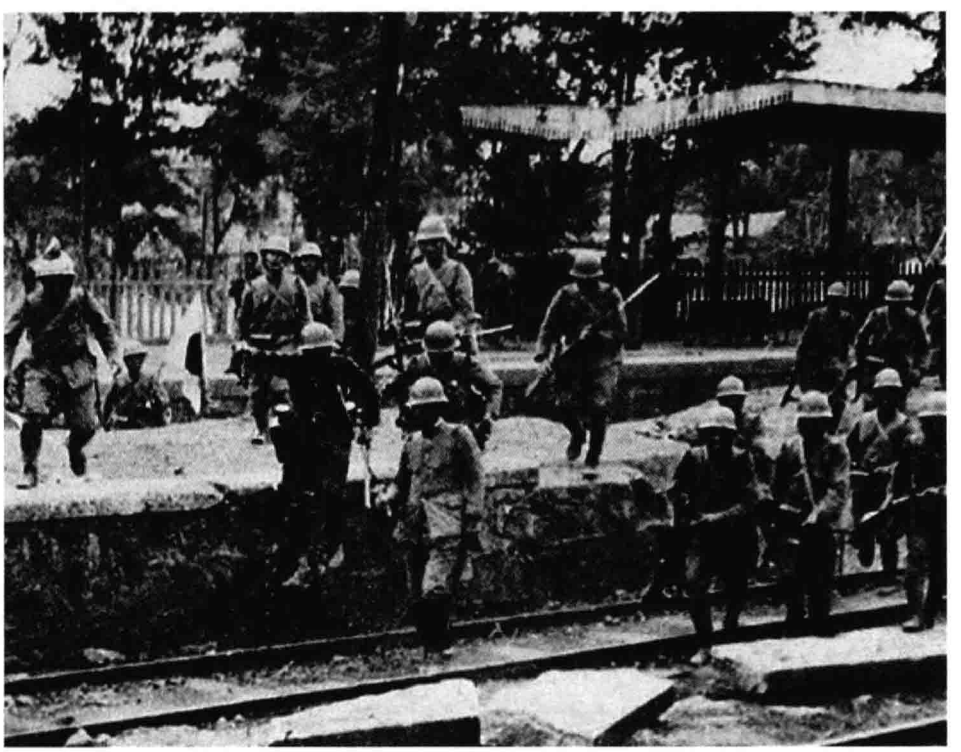
1

2

1 1937年秋，日军破坏平汉线铁路木道沟铁桥，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行军。〔《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1月1日发行，第3页〕

2 1937年9月，上海虬江桥附近被炸毁，日军为行军方便正在补修。〔《支那事变画报》第6辑，第28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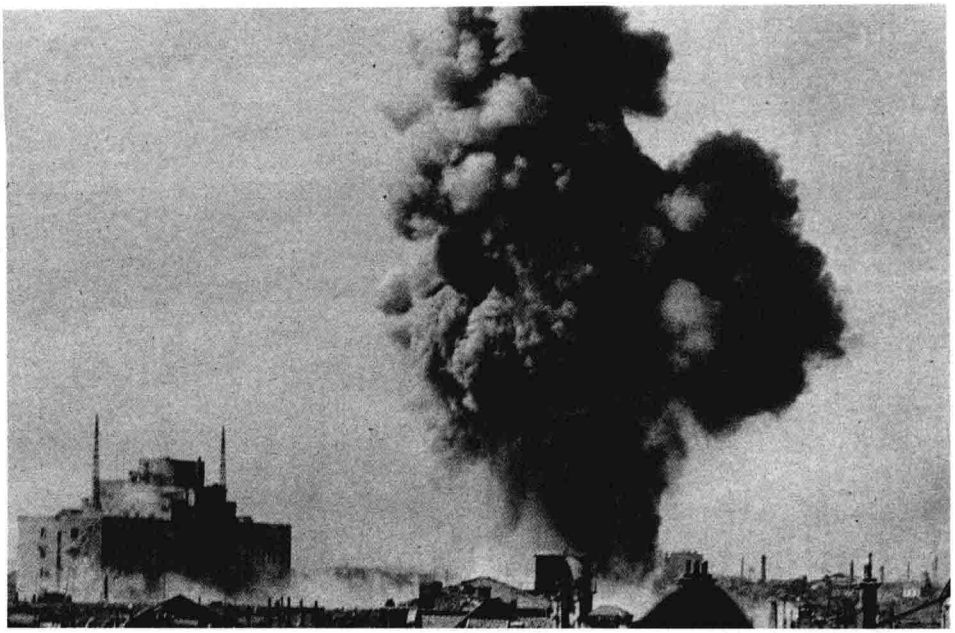
1 1937年秋，华北的日军神田部队正在通过沙河铁路桥，图中可见桥基已经受损。〔《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第2页〕

2 1937年10月，河北石家庄的一个铁路驿站被日军森田先头部队占领。〔《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第14页〕

1 1937年10月，上海北站停车场被日军击中，顿时浓烟滚滚。〔《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1月21日发行，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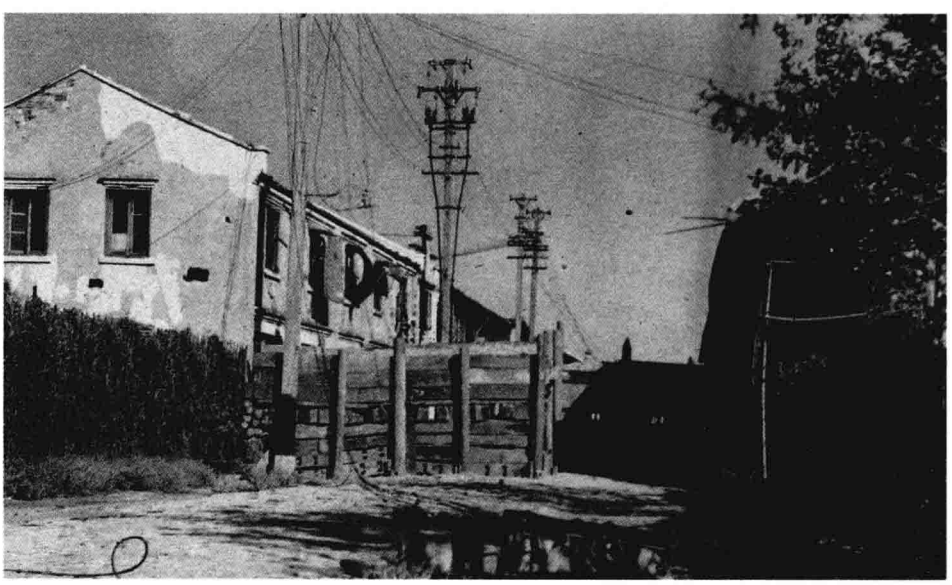
2 1937年10月，上海闸北区北站一带火势凶猛。〔《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15页〕

3 1937年10月，上海江湾镇出入口被日军封锁。〔《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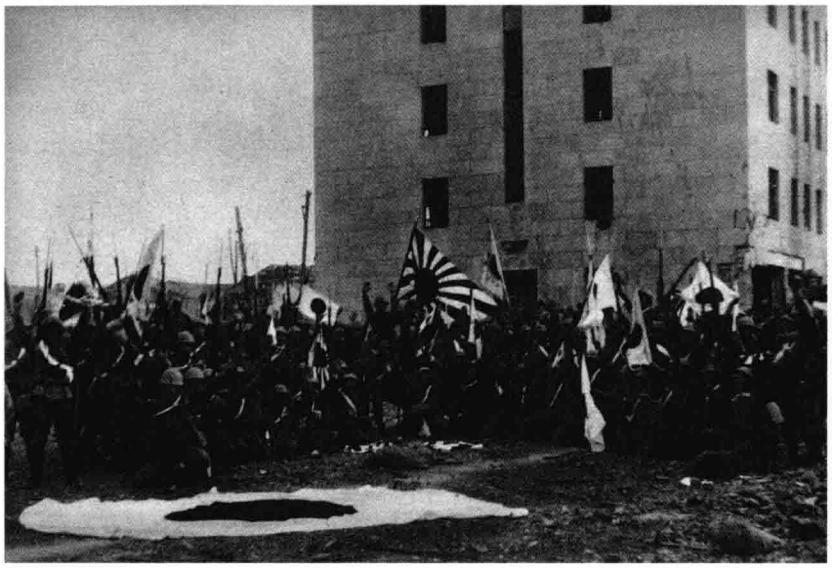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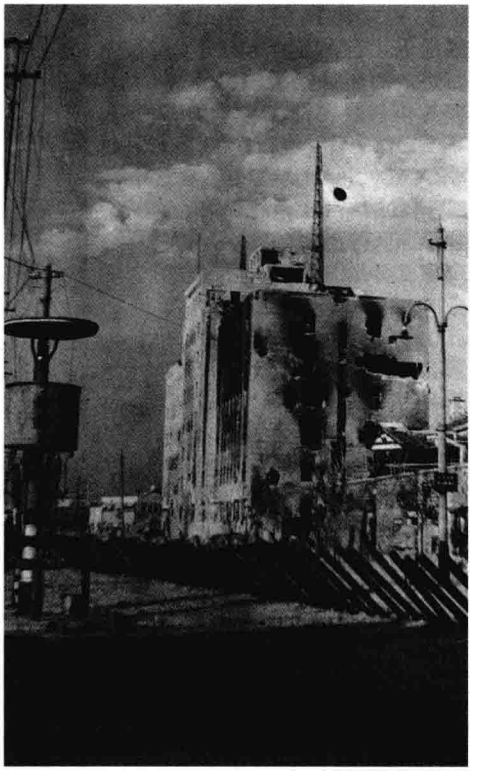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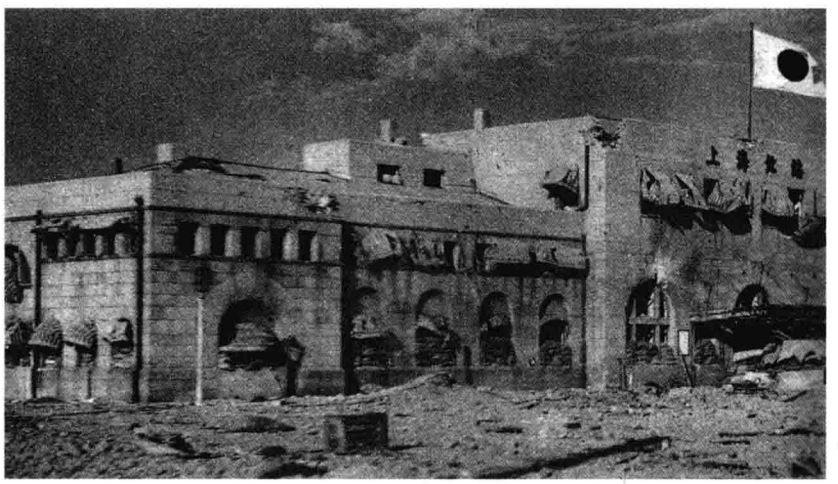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1937 年 10 月 27 日，上海铁路管理局前日军海陆两军正在欢庆。〔《支那事变画报》第 9 辑，第 18 页〕

2 1937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军队根据地、上海铁路管理局被日军占领，楼顶已经悬挂起日本国旗。〔《支那事变画报》第 9 辑，第 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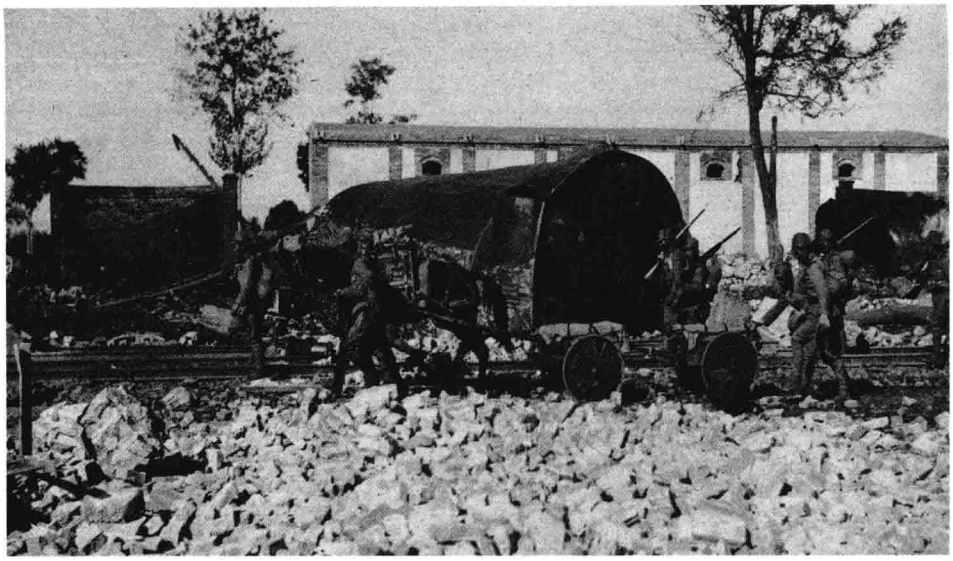
3 1937 年 10 月 27 日，上海北站已经被日军炸成废墟，日本国旗已经插在上海北站楼顶上。〔《支那事变画报》第 9 辑，第 18—19 页〕

4 1937 年 10 月 27 日，上海北站已经被日军陆战队竹谷部队占据。〔《支那事变画报》第 9 辑，第 18—19 页〕

1　1937 年 10 月，河北邯郸的远山部队正在京汉战线西进。图中铁路沿线已经被轰炸得破烂不堪。〔《支那事变画报》第 9 辑，第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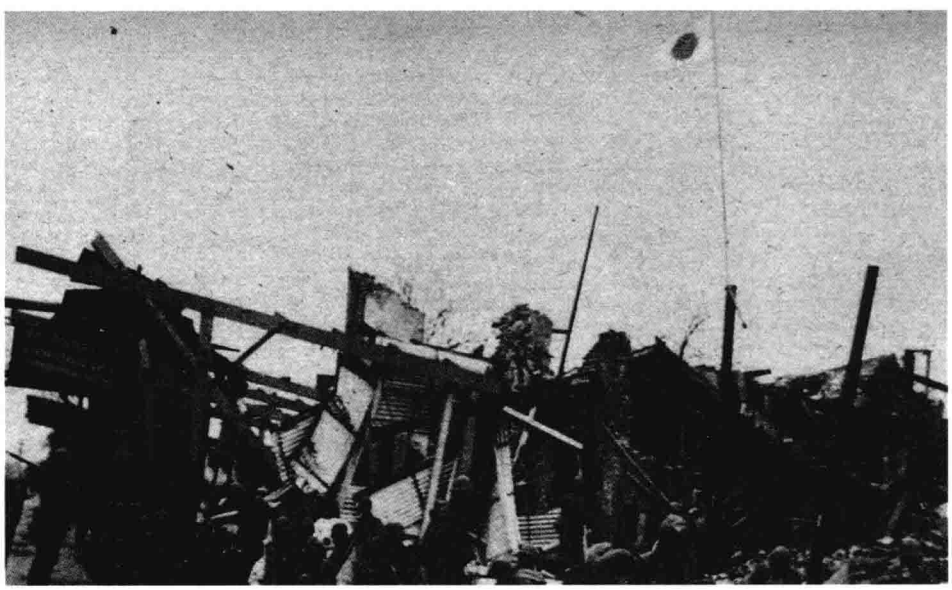
2　1937 年 11 月，日军古井泽部队等占领嘉兴。〔《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7 年 12 月 11 日发行，第 25 页〕

3　1937 年 11 月，日本空军轰炸嘉兴驿。〔《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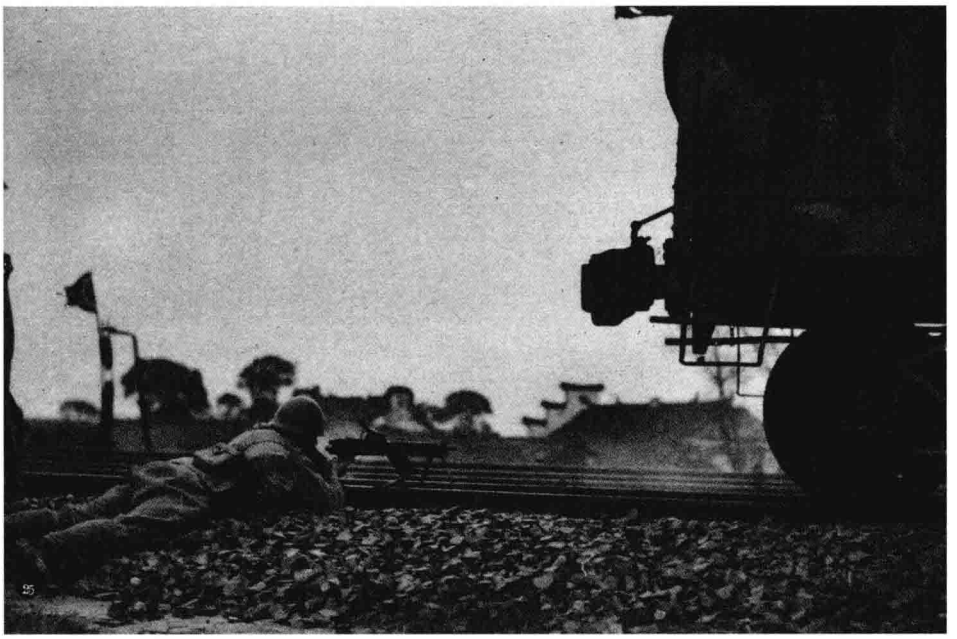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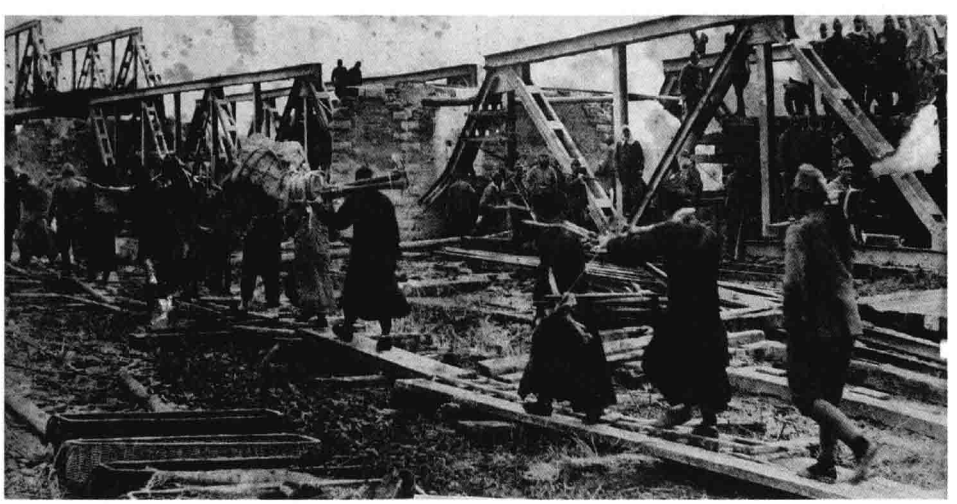


1

■1 1937 年 11 月，嘉兴日军正在进攻中国军队。〔《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5 页〕

2

■2 1937 年 11 月，嘉兴驿被日军占领，日本国旗随风飘扬，火车车厢已经脱离轨道。〔《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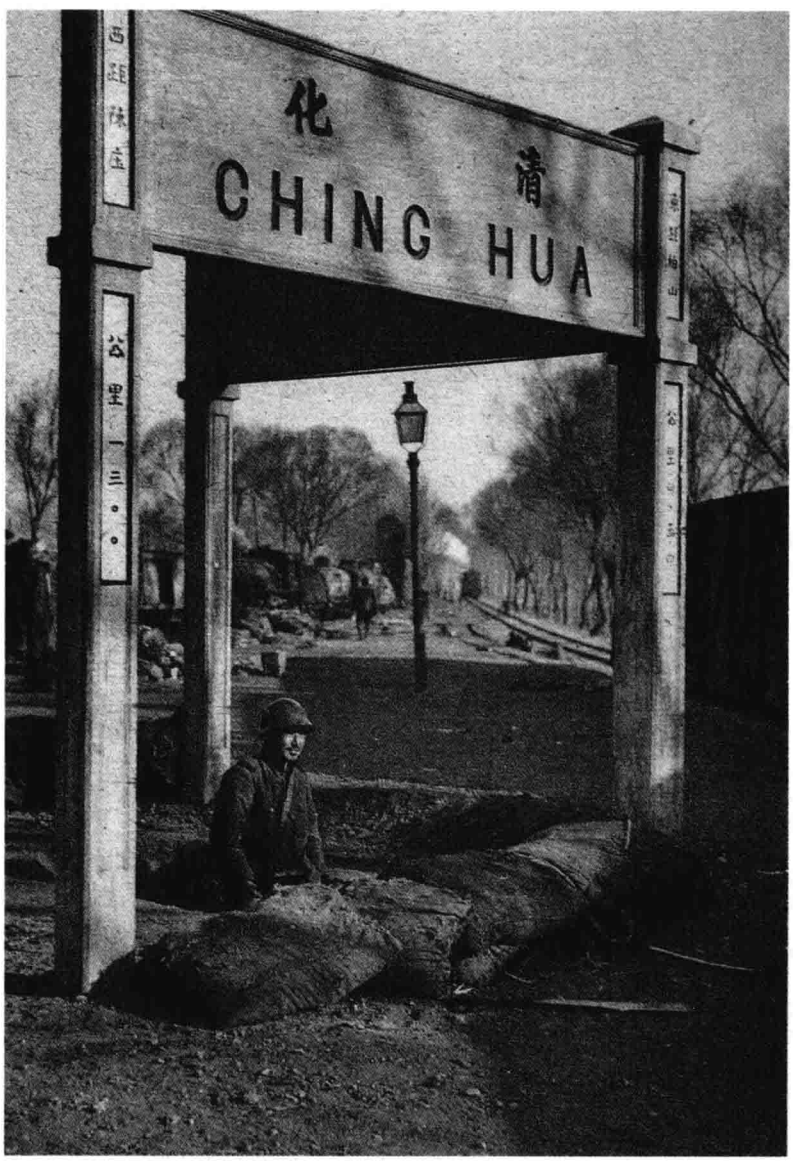
3

■3 1937 年 11 月，山东的日军在徒骇河附近强迫中国民众修筑铁桥。〔《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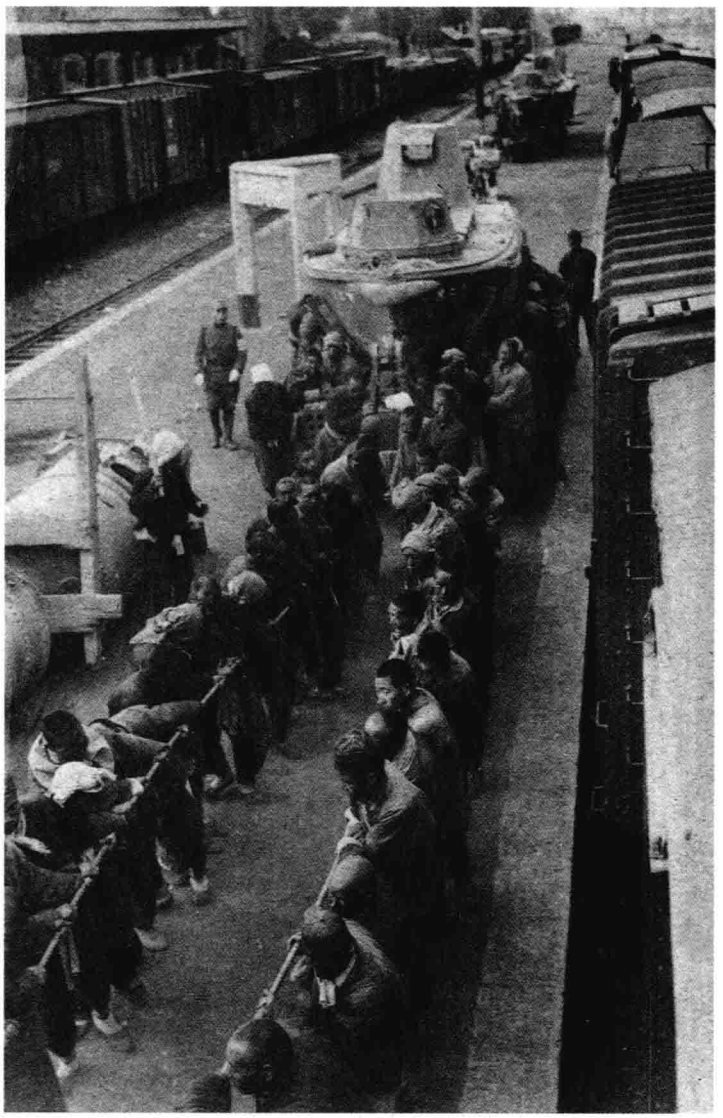
1　1938年3月，京汉铁路线新乡驿附近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土丘上写着“死守”两字。〔《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4月11日发行，第17页〕

2　1938年3月，道清铁道终点清化驿的日本士兵正在对该铁路线进行控制。〔《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18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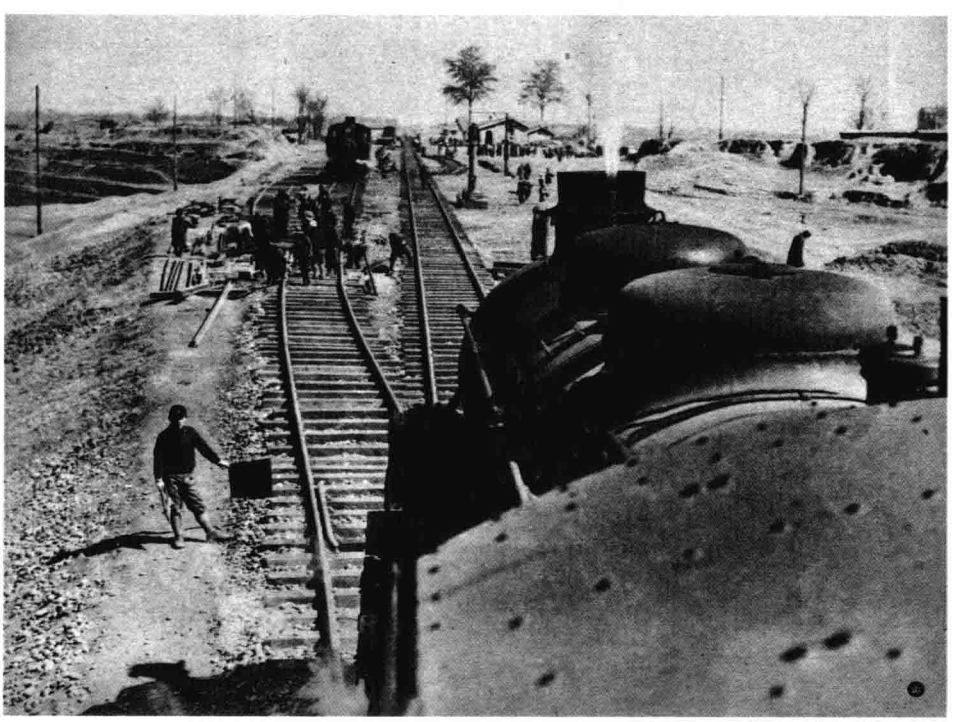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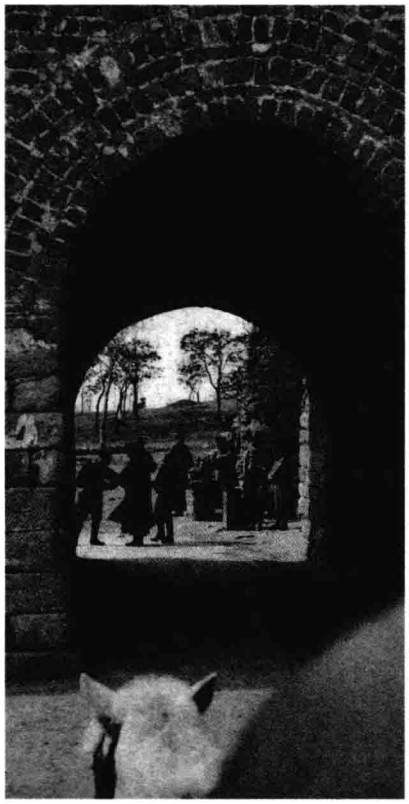
1

1 1938 年 4 月，河南新乡驿附近，日军正在奴役中国苦力。〔《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9 页〕



2

2 1938 年 3 月，河南境内的京汉铁路线，日军军用列车正在行进。〔《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0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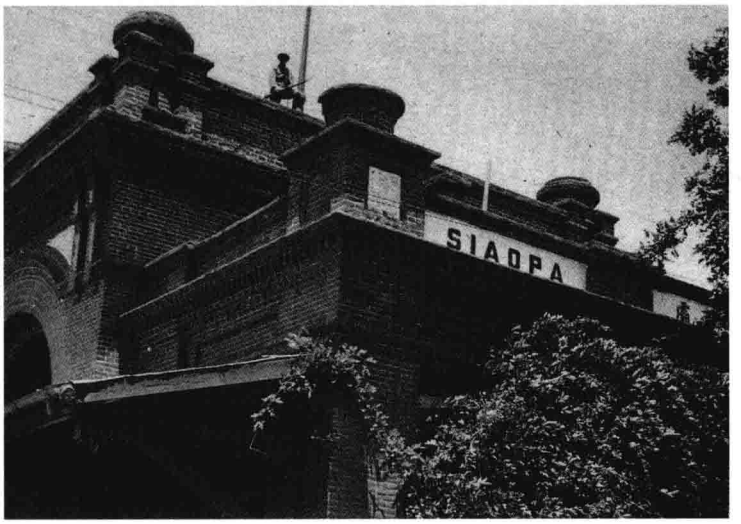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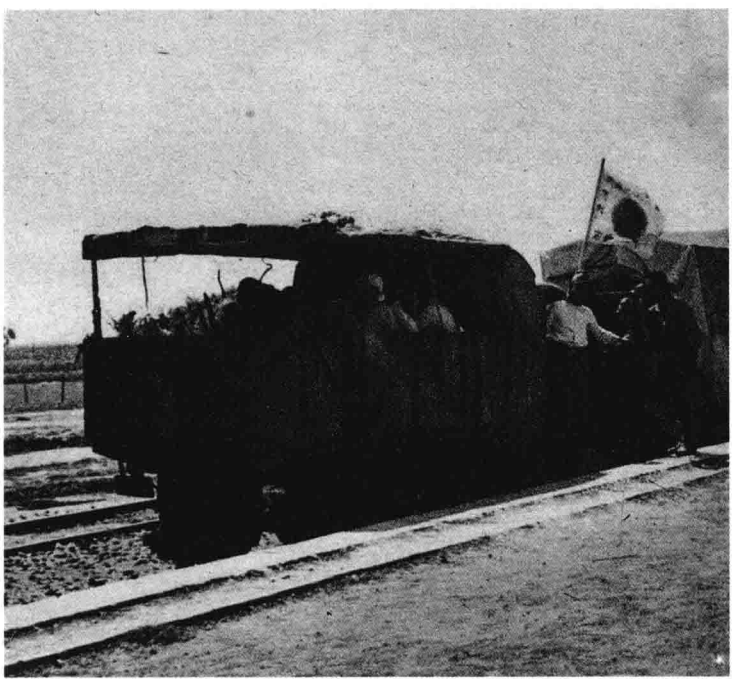
1　1938 年 4 月，威海城南门的出入者正在接受日军的检查。〔《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8 年 5 月 21 日发行，第 8 页〕

2　1938 年 4 月，杭州余杭西北高地的一个关门被日军占领。〔《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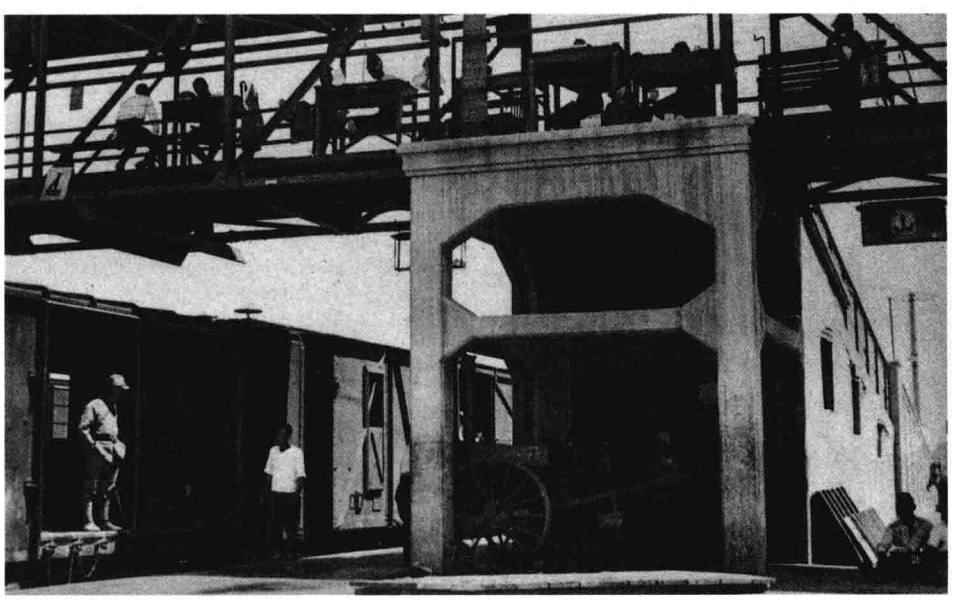
3　1938 年 4 月，安徽怀远淮河涂山的日军正在准备渡河材料，这些渡河材料大部分取自淮河渔民的木船。〔《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27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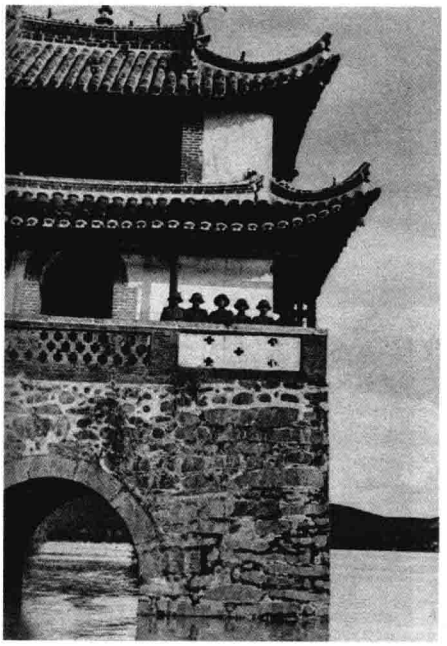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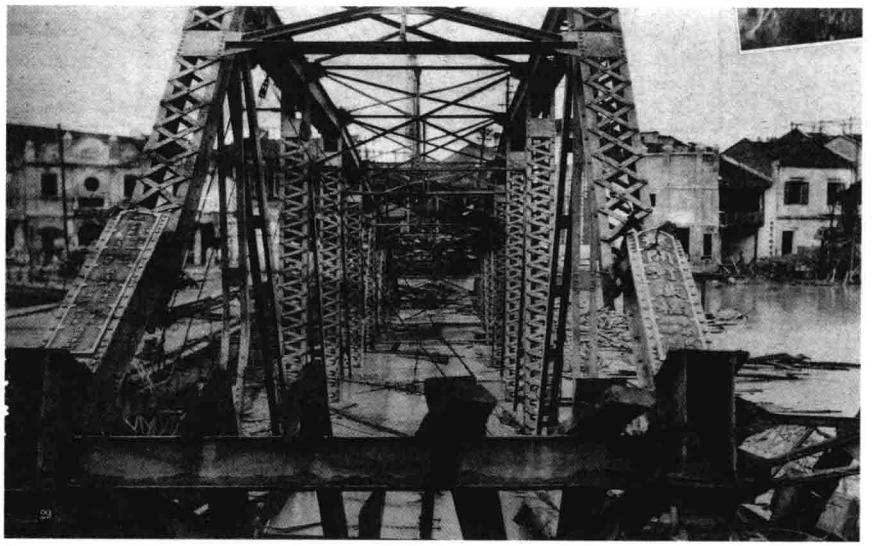
1 1938年7月，陇海线上的一个小站被日军占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屋顶放哨。〔《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8月1日发行，第26页〕

2 1938年7月，陇海线上运送战争物资的日军列车。〔《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第27页〕

3 1938年7月，陇海线上，日军已经控制了徐州的铁路交通。〔《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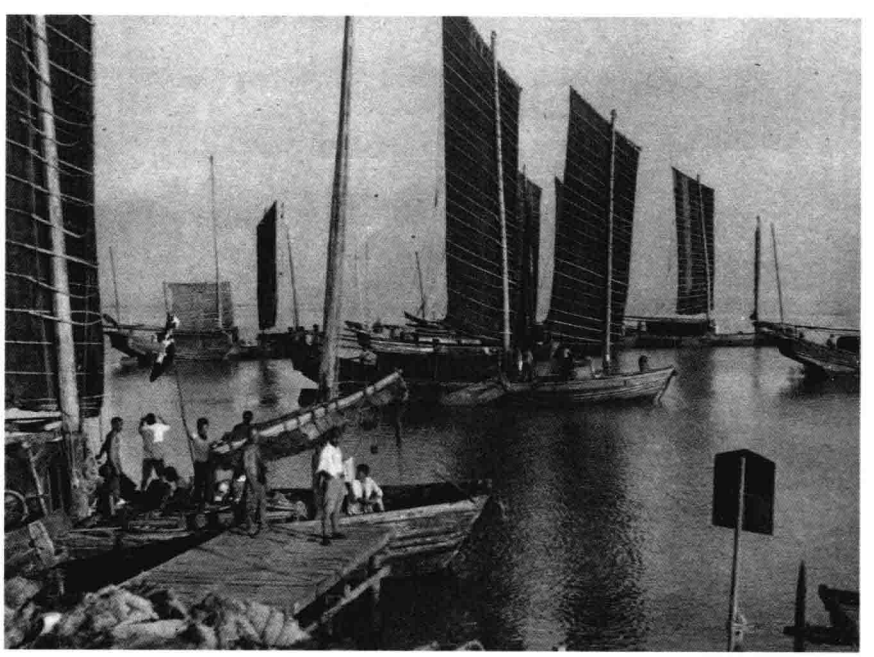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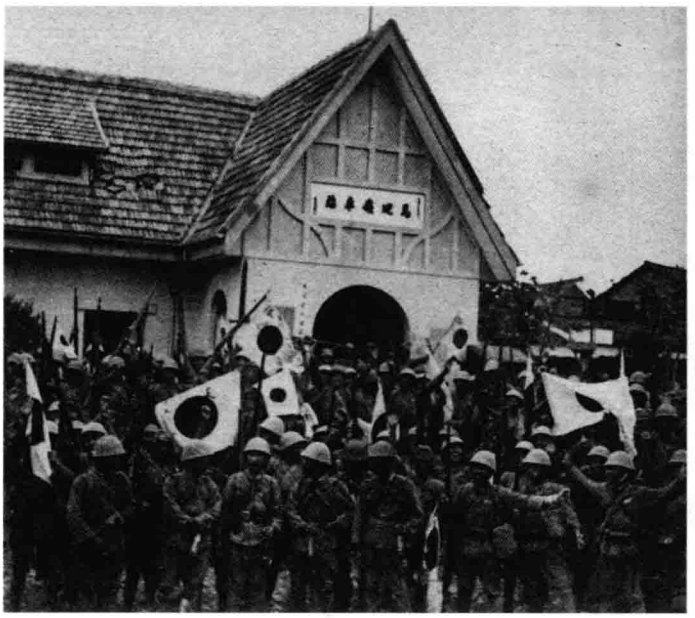
4

1 1938年8月，怀远的日军正在站岗放哨。〔《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9月1日发行，第3页〕

2 1938年夏，日军攻占九江，九江铁桥被严重破坏。〔《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8月21日发行，第29页〕

3 1938年夏，河上日军的运输船队正行驶在蚌埠、怀远一带。〔《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6页〕

4 1938年八九月间，日军控制下龙宫湖上戎克船大集合。〔《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9月11日发行，第14页〕



1

2

3

1 1938年9月3日，江南战线马回岭车站被日军占领。〔《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8页〕

2 1938年9月3日，江南战线马回岭车站被日军占领。〔《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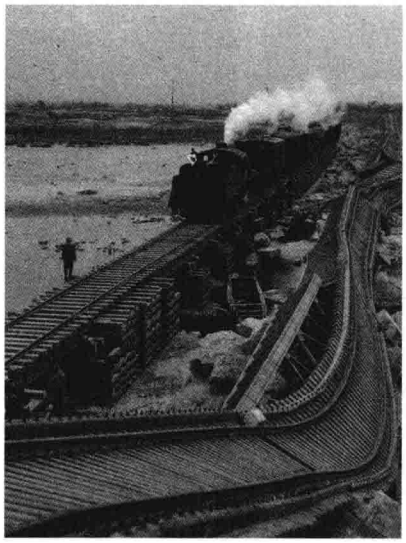
3 1938年10月12日，江北站线，京汉铁路附近日军部队正在守护铁路。两个大木桩已经盖住了双轨，许多稻草同样也掩盖住了铁路。铁路已经被日军破坏，无法正常使用。〔《支那事变画报》第44辑，第14页〕

1 1938年年底，京汉铁路徐河铁桥上，日军的一列火车正在行进。虽然新铁路为日军所修，但是之前被日军破坏的铁路仍然清晰可见。〔《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22页〕

2 1939年3月，南昌陷落，南昌的日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占领南昌飞机场。〔《支那事变画报》第5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9年4月20日发行，第22页〕

3 1939年3月，南昌陷落，南昌港口被日军占领。〔《支那事变画报》第57辑，第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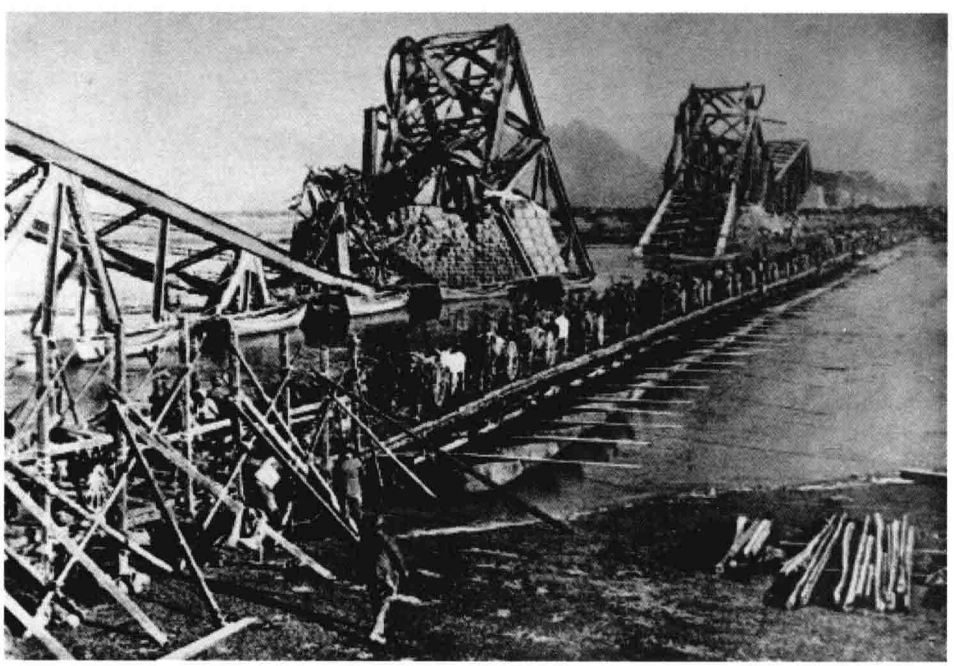
4 日军在被毁坏的济南泺口黄河大铁桥边搭建浮桥。〔《支那战线写真》第26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1月19日发行，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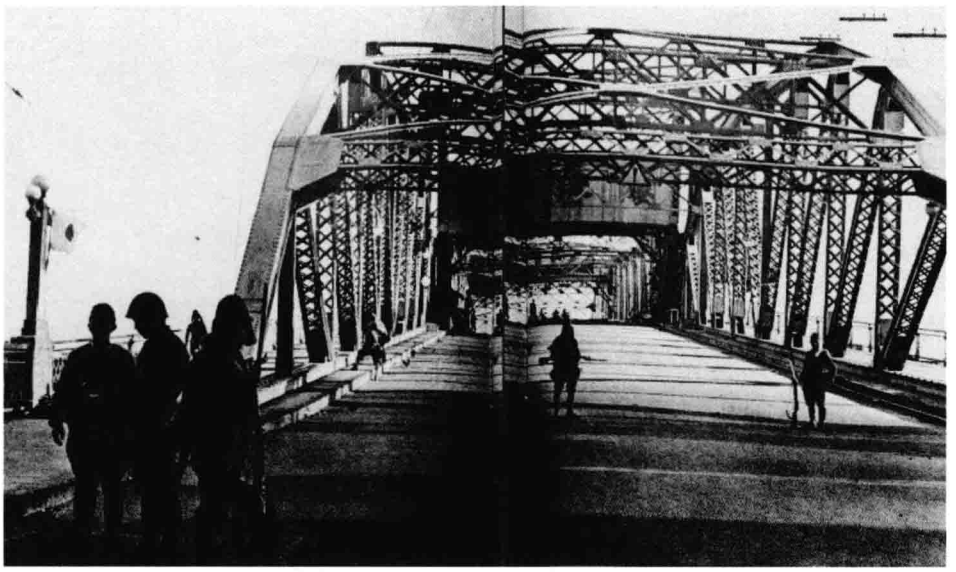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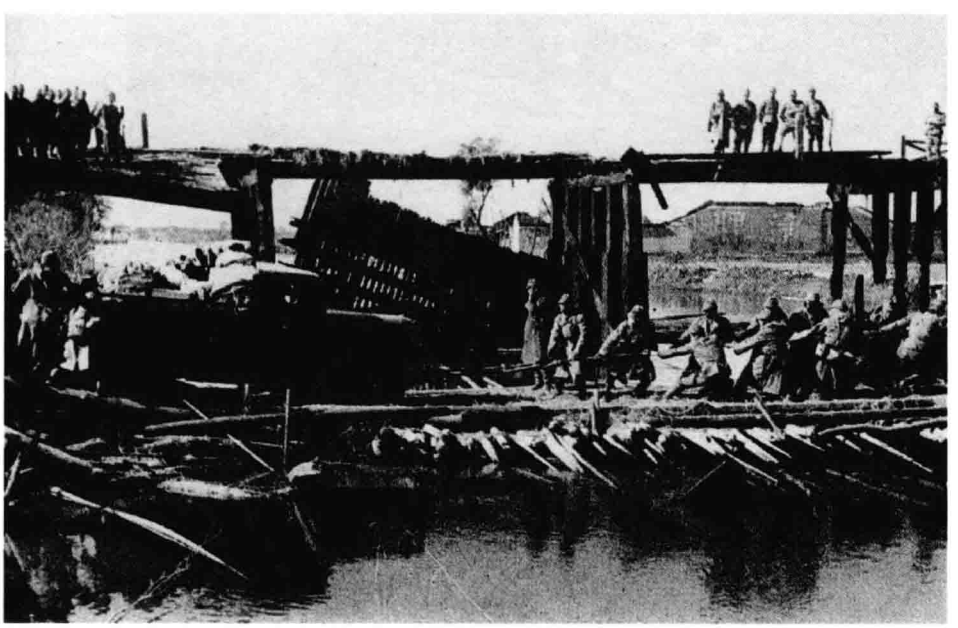


4



1

2



3

1 日军占据下的广州海珠桥。〔《支那战线写真》第68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11月9日发行，第20—21页〕

2 1937年8月10日，良乡长辛店，日军正在守备铁路。〔《特刊北支战线写真》第6报，1937年9月1日发行，第2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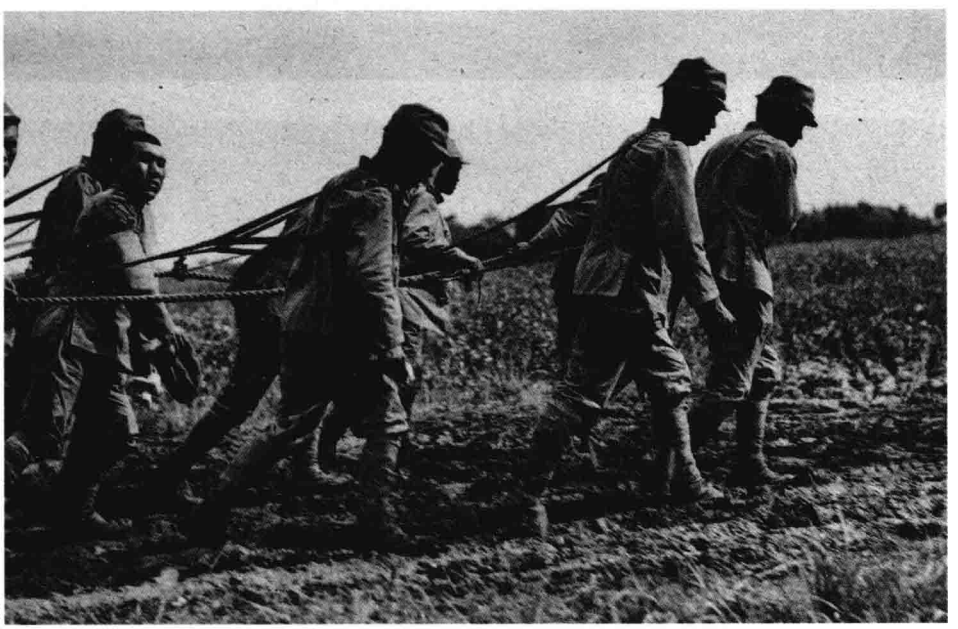
3 1937年11月28日的湖州，原本河上有座桥，但已经被炸毁，日军又在原桥的下面修了一座简易桥。图为日军正在拉一辆军车通过此桥。〔《支那战线写真》第12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7年12月22日发行，第8页〕

三、破坏乡村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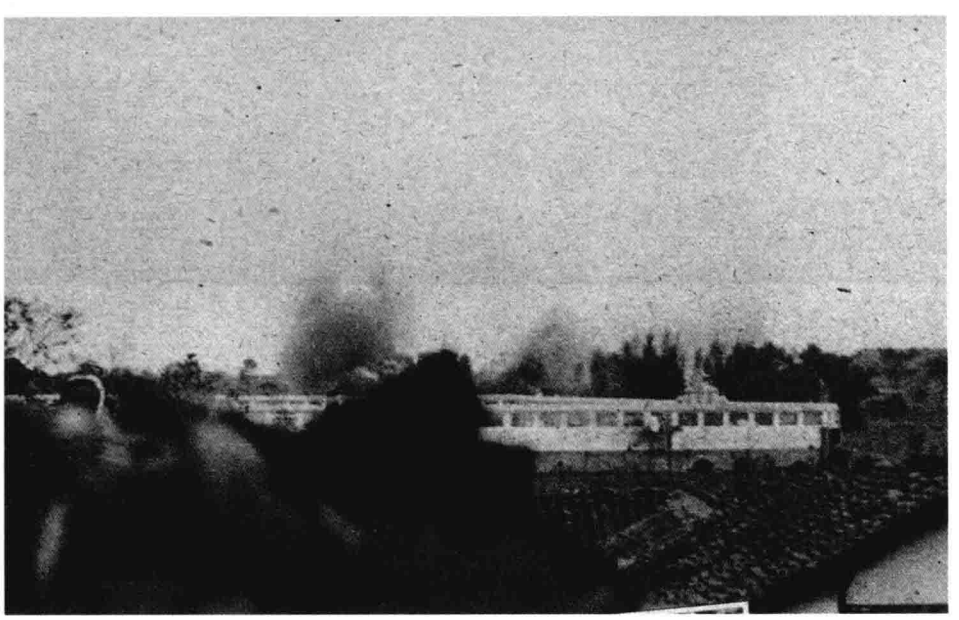
日军在乡村进行军事行动，动辄毁坏农田、房屋、桥梁等设施。日军在乡村开展大规模扫荡，掠夺农产品，毁坏村庄，制造“无人区”。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滥施淫威，以焚烧村落和屠杀居民为乐。乡村视野比较开阔，炮击多在乡村进行，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原有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

1937年9月，津浦战线天津唐官屯附近的沼泽地中，日军炮兵正在进行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6辑，第5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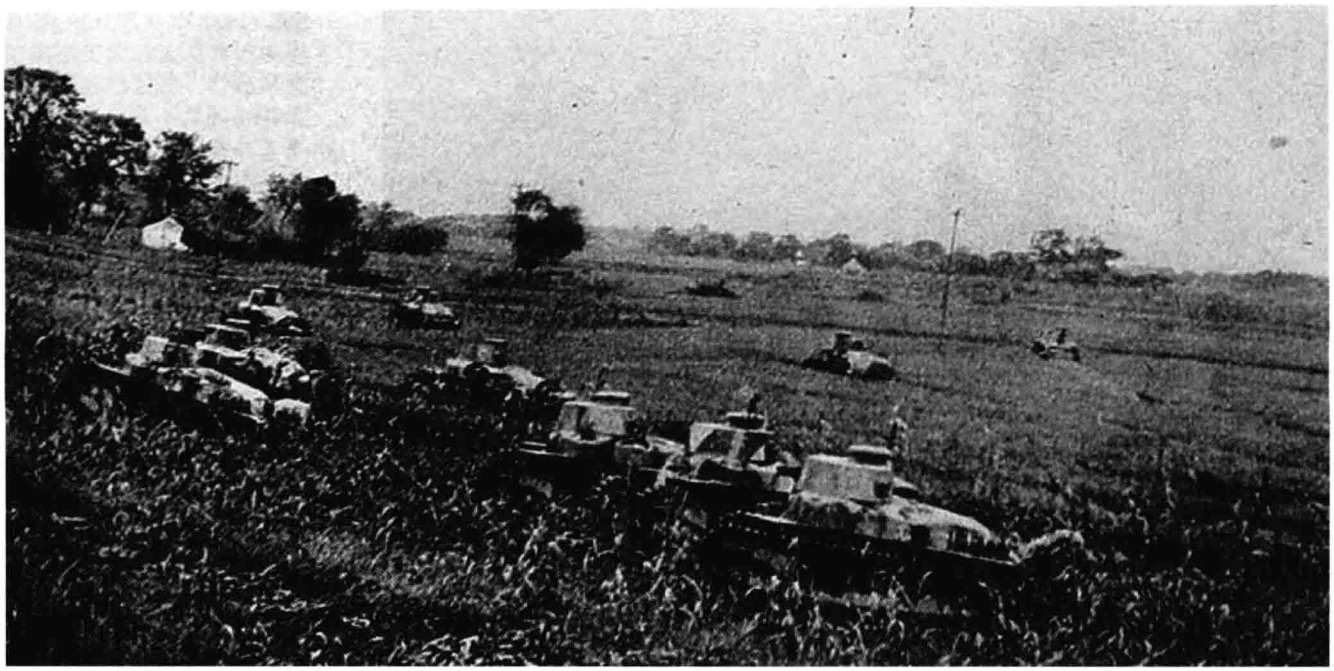


3

1 1937年9月，上海日军山田部队正在大王宅屋顶观察敌情，房屋已经被日军轰炸得破烂不堪。〔《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发行，第4页〕

2 1937年9月18日，上海朱家宅附近日军炮兵队正拉着装备在田间行进。〔《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6页〕

3 1937年9月，上海的日军炮兵队集中火力射击中国民居，致使民居损坏严重。〔《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8页〕



1

2

1 1937年9月的一天午后，上海的日军坦克和突击决死队在广袤的农田间急速行军。〔《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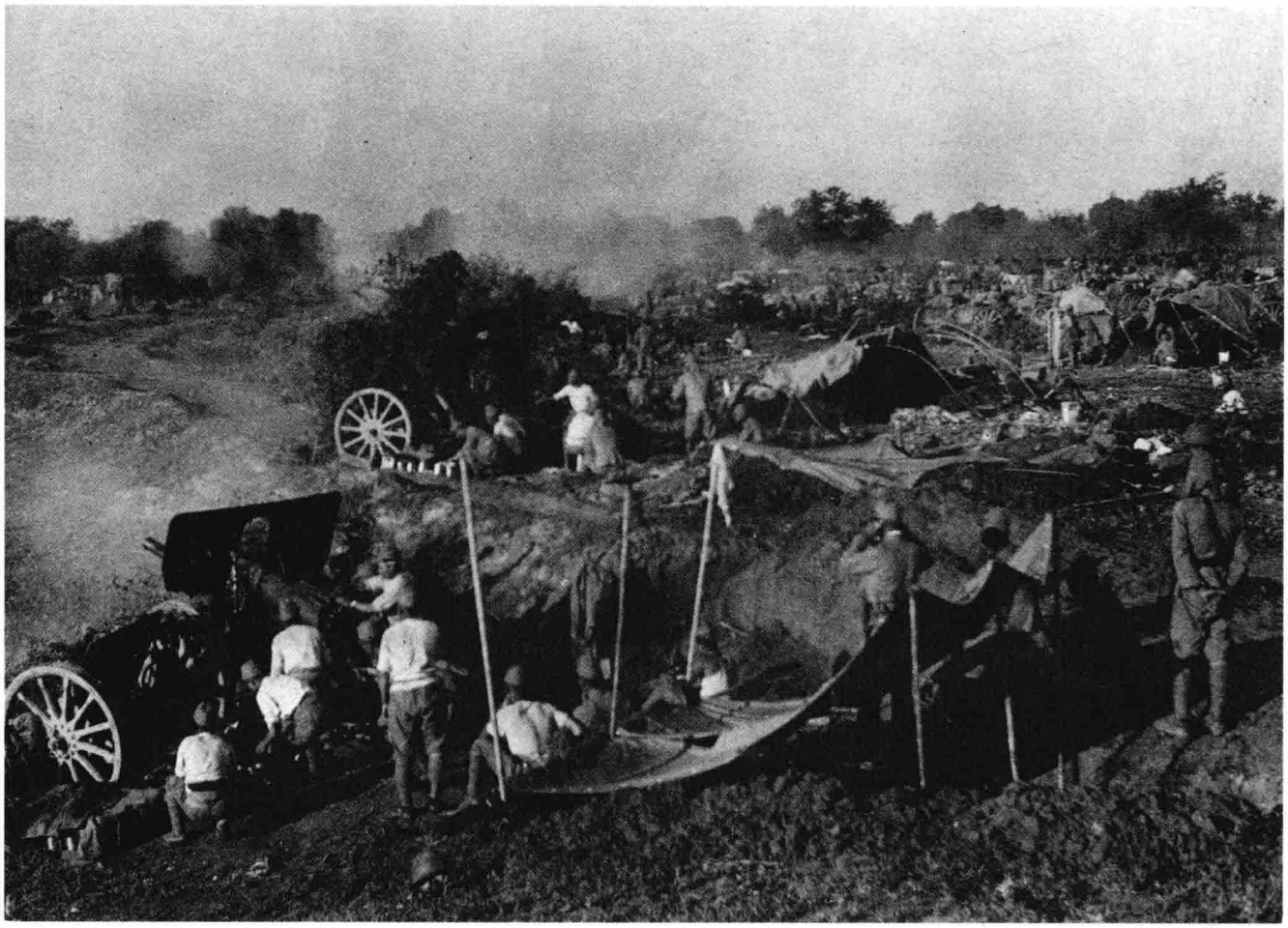
2 1937年9月，上海乡村的一座中国兵营被日军爆破，房屋已经破损严重。〔《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9页〕

1

2

1 1937年9月的一天午后，上海的一户农家已经被日军占领，几个日军突击队员正在准备进攻。〔《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9页〕

2 1937年9月的一天午后，上海的日军山本决死队正在烟幕中突击。〔《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9页〕



1

2

1　1937年9月，沧州的日军重田炮兵队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24—25页〕

2　1937年9月，上海刘家行攻略战，日军炮兵队正在准备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12页〕

1

1 1937年9月，绥远战线，日军炮兵构筑工事。〔《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27页〕

2

2 1937年11月13日，周家干镇日军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支那事变画报》第12辑，第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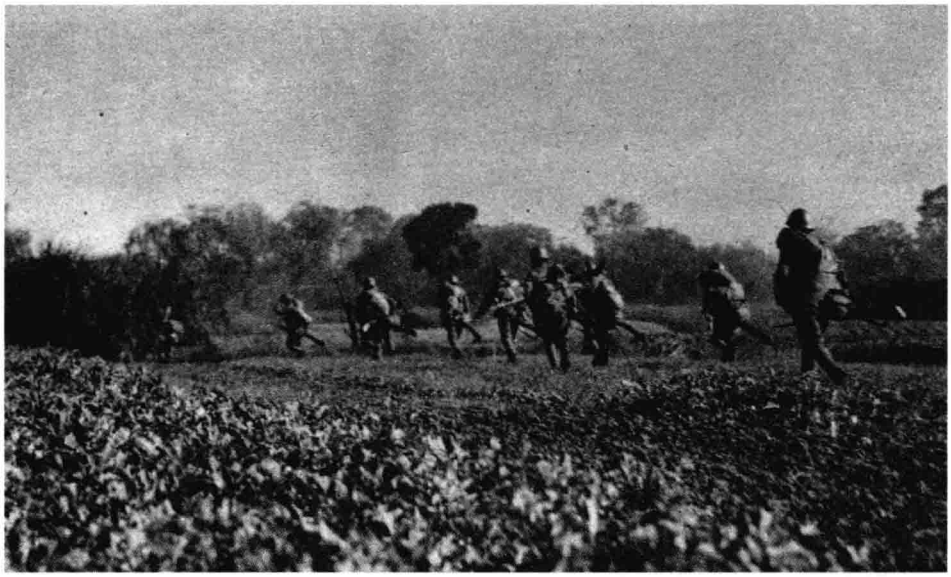
3

3 1937年11月13日，周家干镇日军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支那事变画报》第12辑，第7页〕

1　1937 年 11 月 15 日，日本军队践踏农田，向常熟进攻。〔《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18 页〕

2　1937 年 11 月，嘉兴的日军正在农田架炮射击。〔《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5 页〕

3　1938 年 2 月，安徽定远附近日军新村部队一部在农田间休息。〔《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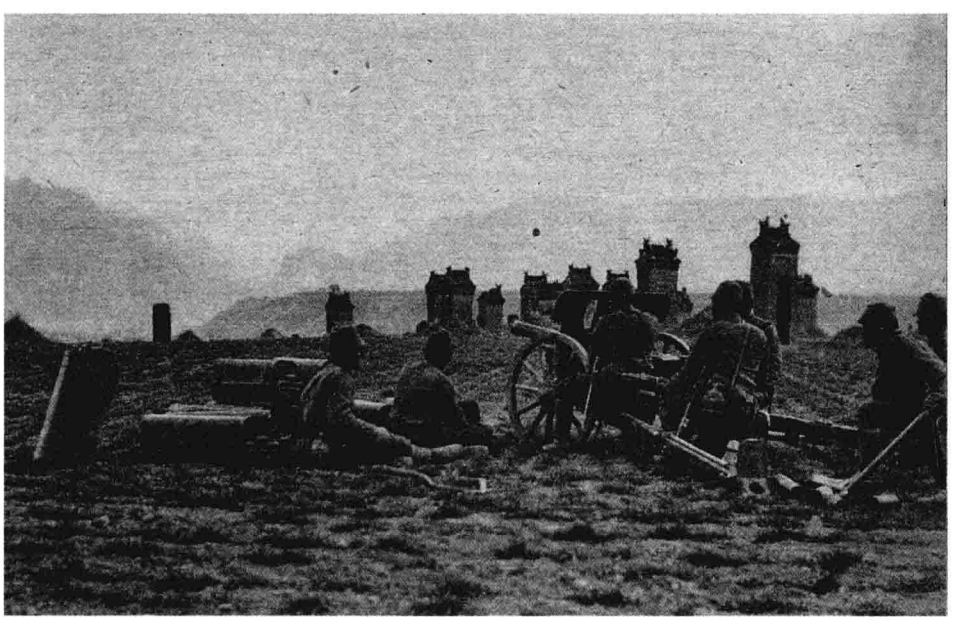
1

2

3

1

2



3

1 1938年2月，黄河南岸日本重炮队正在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3月21日发行，第3页〕

2 1938年2月，辉县县城外的日军辎重部队正在列队集结。〔《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5页〕

3 1938年3月，陕西省西洋村附近，日军对中国军队进行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23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4月1日发行，第10页〕

■1　1938年3月18日，崇明县城外的谷川部队正在集结。〔《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9页〕

■2　1938年3月，河南温县一带的冈本炮兵队正在进行马上射击训练。〔《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18—19页〕

■3　1938年3月，京汉战线黄河北岸垣曲县附近的日军正在猛烈炮击中国守军。〔《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24页〕

1

2

3

1

2

3

1 1938年3月，垣曲县黄河对岸日军炮兵队正在实施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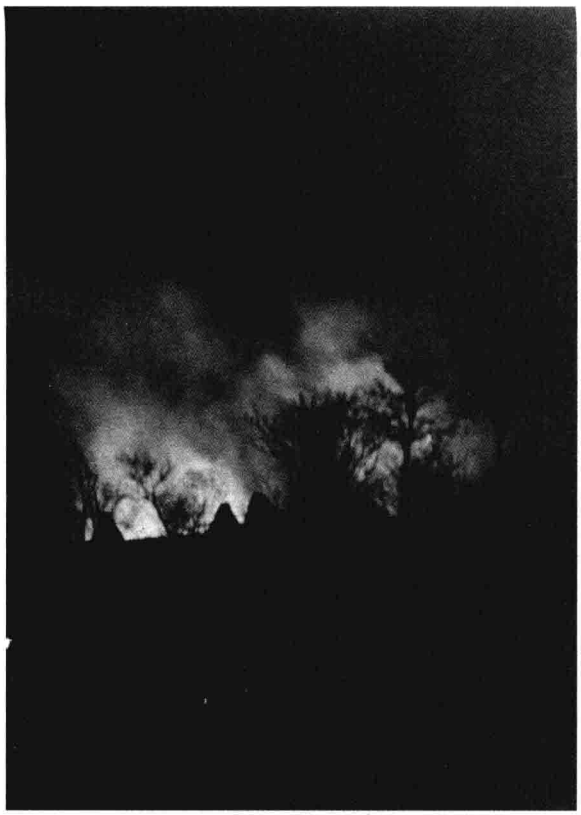
2 1938年4月1日，在芜湖三山镇的日军炮兵队正在炮击中国军队。〔《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4月21日发行，第22页〕

3 1938年4月1日，日军冈本部队在芜湖三山镇进行炮击。当地农宅被毁，树木被焚烧。〔《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22—23页〕

1　1938年4月7日，日军在徐州一带张廊地区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猛烈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5月1日发行，第2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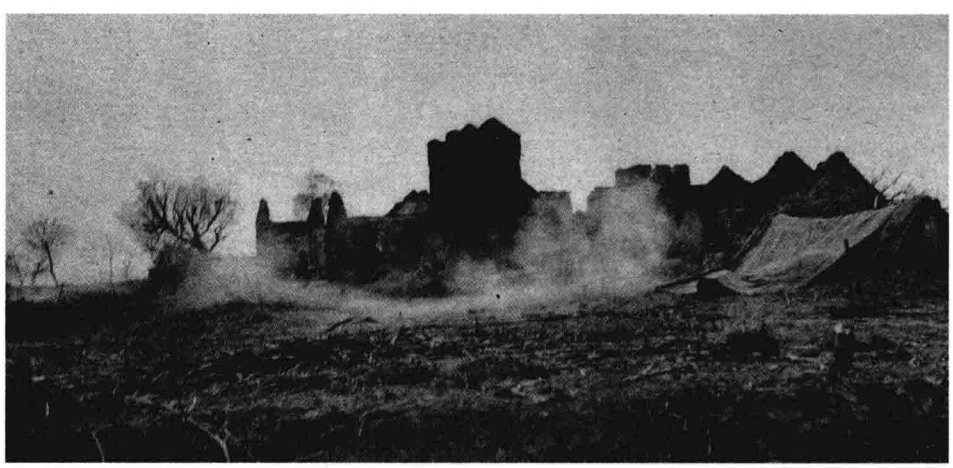
2　1938年4月，津浦战线最前线日军谷口部队正在休整，背后的房舍破坏相当严重，几乎无一完整。〔《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4页〕

3　1938年4月，津浦战线最前线谷口部队等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猛烈炮击，房屋在轰炸后成为废墟。〔《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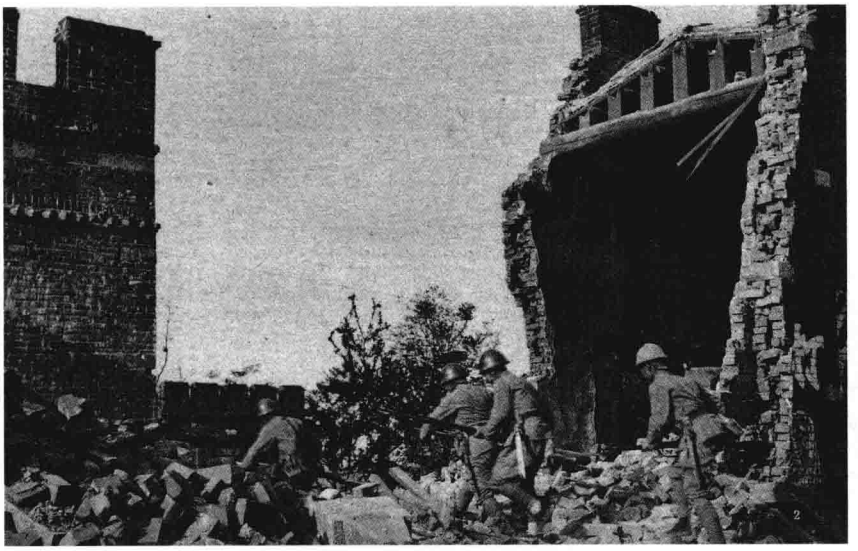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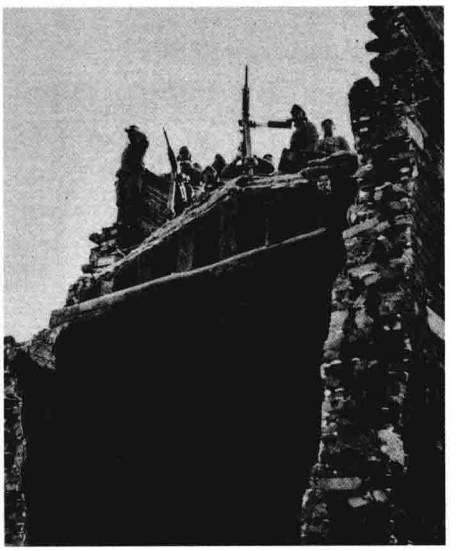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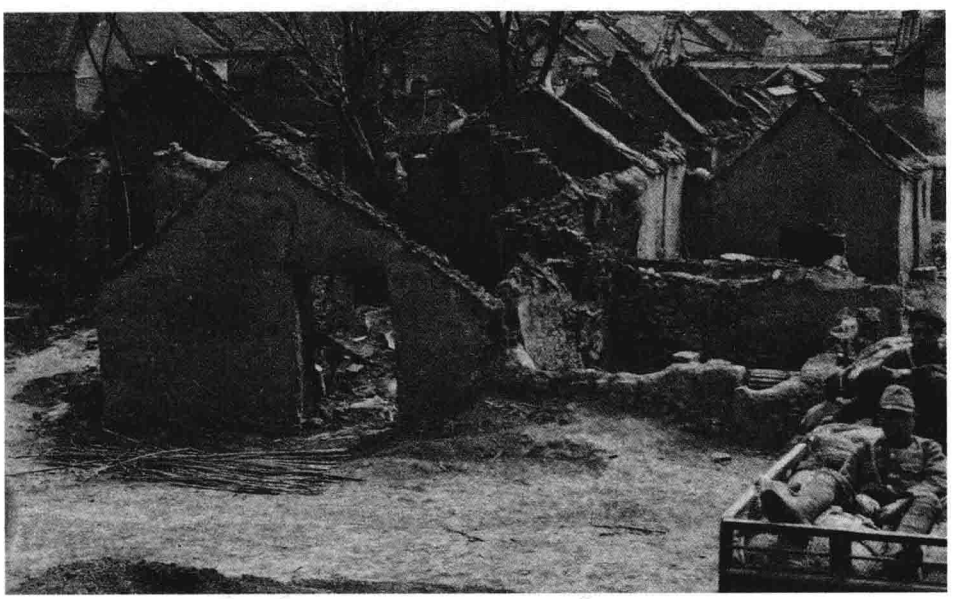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1938 年 4 月，津浦线兰陵镇附近日军正在进行“扫荡”，房屋已经被炸得破烂不堪。〔《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2 页〕

2 1938 年 4 月，津浦线兰陵镇的日军在被轰炸过的屋舍上进行防空警戒。〔《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4 页〕

3 1938 年 4 月，津浦线兰陵镇附近的民舍已经被日军严重破坏，屋舍几乎无一完整。〔《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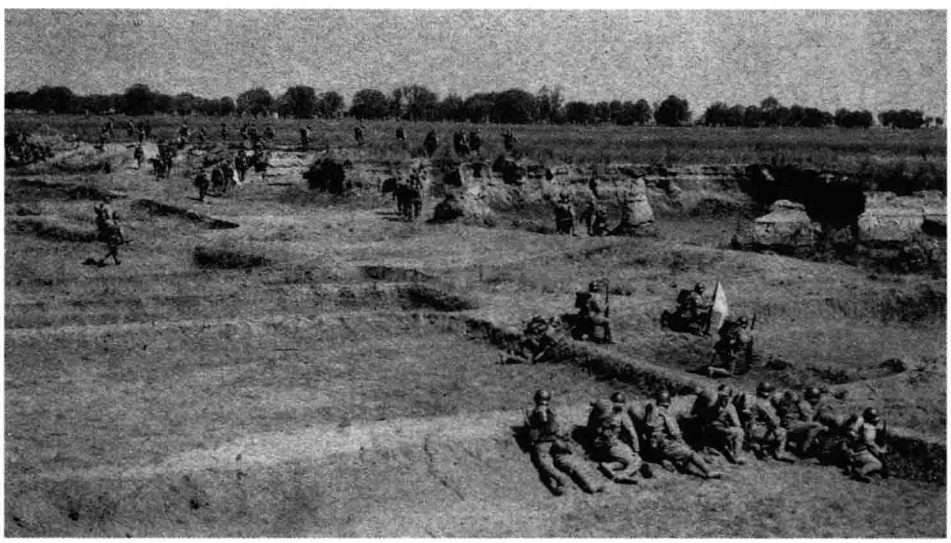
4 1938 年 4 月，津浦线兰陵镇的一户农家已经被日军占领，一群日军正在用农户家的铁锅洗涤脏衣服。〔《支那事变画报》第 27 辑，第 4 页〕

1 1938年4月，杭州余杭日军正在对附近的乡村进行“扫荡”。〔《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16—17页〕

2 1938年4月，日军正穿越农田进攻徐州。〔《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0页〕

3 1938年4月，南京日军田上部队进行阅兵式，阅兵地点在南京附近的农田。〔《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5页〕

1



2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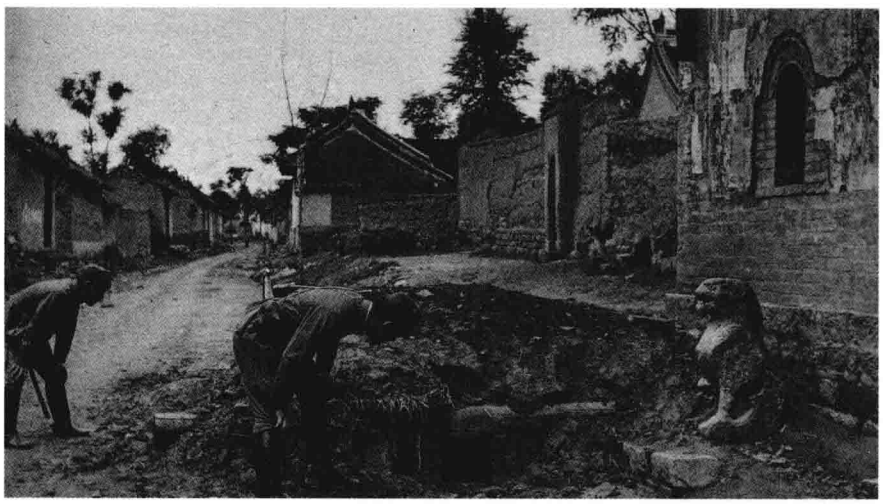
1 1938 年 4 月，津浦战线最前线，日军对农户仓库进行猛烈射击。〔《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第 5 页〕

2 1938 年 4 月，津浦战线最前线，一群日军在堑壕里点香烟，以缓解连续作战之疲劳。〔《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第 4 页〕

1 1938年4月，津浦战线最前线，日军沼田部队正在对中国阵地进行突击。〔《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5页〕

1

2 1938年七八月间，济源城的中国军队阵地被日军占领，民居被破坏。〔《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7页〕



2

3 内蒙古张鼓峰附近被毁坏的村庄和小学校。〔《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23页〕

3

1

2

3

1 1938年七八月间，罗津要塞附近的一户农家被日军占领，日军正在进行炊事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24页〕

2 1938年8月间，星子县郊外，日军多田部队正在进行突击战。〔《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第5页〕

3 1938年八九月间，日军青木部队向九江德安进军，行军过程中践踏中国百姓的庄稼。〔《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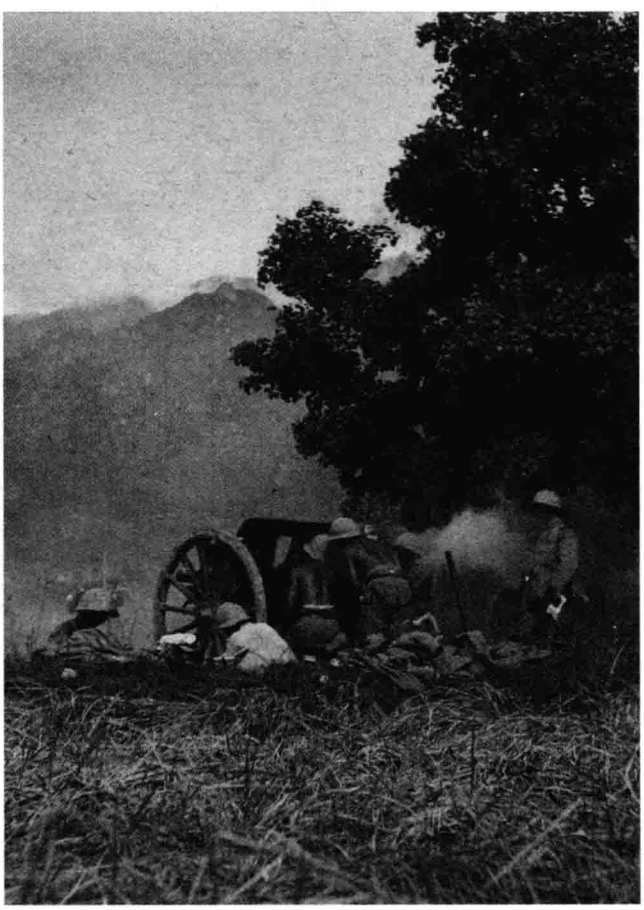
1 1938年八九月间，江南战线，日军炮兵队在东弧山山地进行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1页〕

2 1938年八九月间，日军在东弧山前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1页〕

3 1938年八九月间，江南战线，日军津田部队炮兵队在东弧山附近炮击中国守军阵地。〔《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1页〕

1

2



3

1

2

3

4

1 1838年八九月间，六安的日军梅田部队决死队在城门外进行爆破，附近农舍已经基本被夷为平地，仅仅剩下即将倒塌的墙壁。〔《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6—17页〕

2 1938年八九月间，江南战线，日军津田部队长在一户农家门口。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房屋已经破损严重。〔《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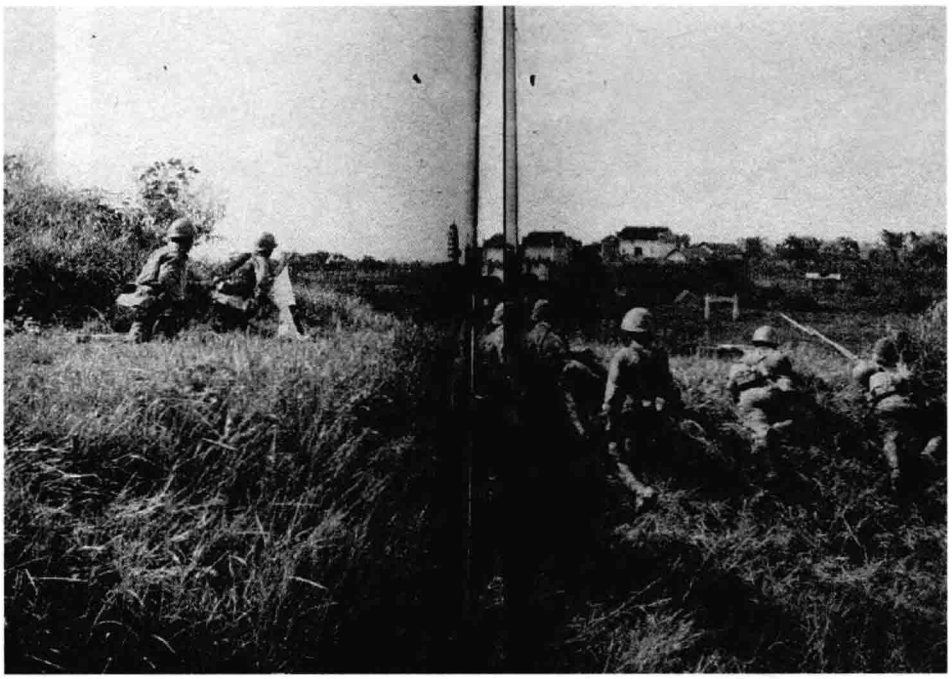
3 1938年八九月间，秀峰寺山附近的日军正在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射击。〔《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18页〕

4 1938年八九月间，扬子江北岸战线，日军在被毁坏的民居上建立观察哨。〔《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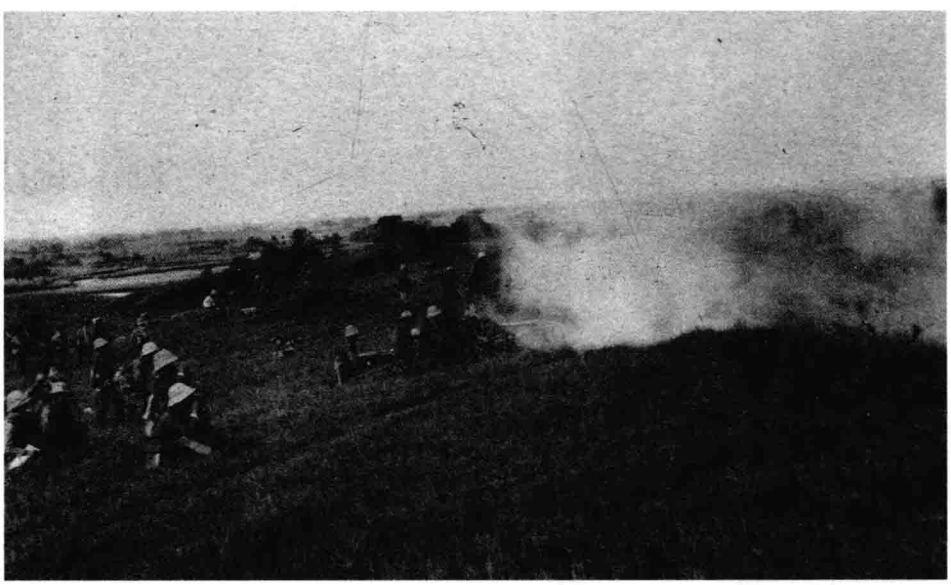
1 1938 年 8 月 30 日，江北战线，日军太田部队村上队正进攻六安。〔《支那事变画报》第 40 辑，第 24—25 页〕

2 1938 年 8 月 30 日，江北战线，日军森川部队正在对六安城进行攻击，导致城郊一片战火。〔《支那事变画报》第 40 辑，第 25 页〕

3 1938 年 8 月 30 日，江北战线，六安城城墙被爆破后冒起浓烟。〔《支那事变画报》第 40 辑，第 9 页〕



1



2

3

1

2

3

4

1 1938年8月30日，江北战线，安徽霍山的日军若松部队在山顶休整。〔《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6页〕

2 1938年8月，黄河北岸地区德庆附近的日军正在民房屋顶上监视、放哨，房屋已经损毁严重。〔《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9页〕

3 1938年8月30日，江北战线，安徽霍山排子山麓的日军原田部队正在猛烈攻击。〔《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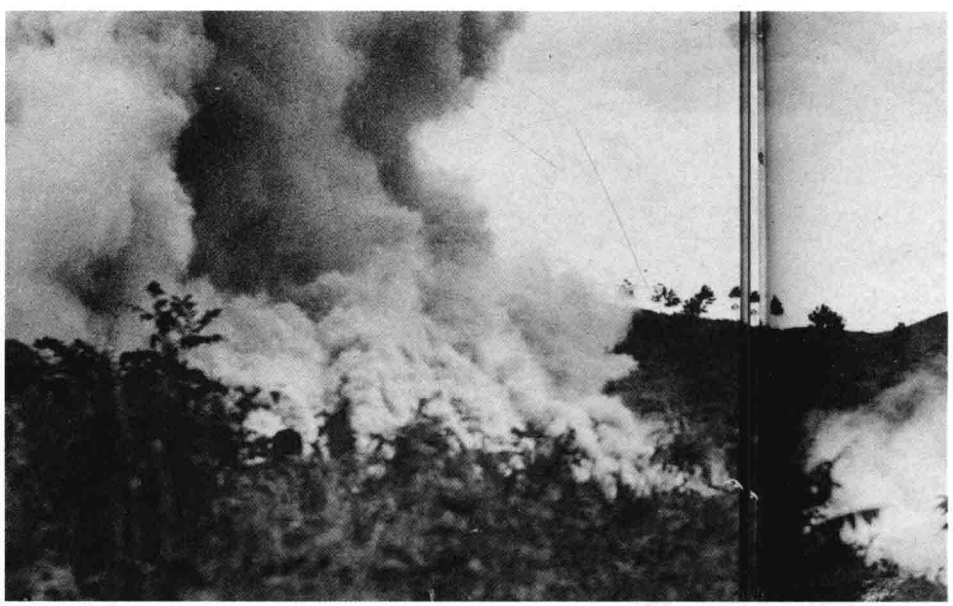
4 1938年8月，黄河北岸地区日军炮兵队在乡间炮击中国守军。〔《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9页〕

1　1938年8月，日军津田部队在瑞昌附近挖掘农民的芋头。〔《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31页〕

2　1938年9月7日，日军三谷部队向富金山顶发射烟幕弹。〔《支那事变画报》第41辑，第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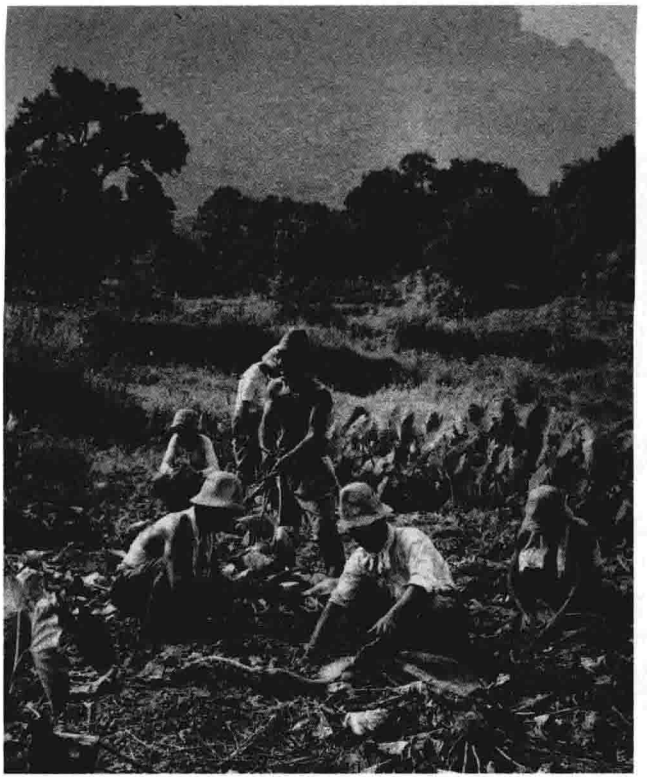
3　1938年8月30日，江北站线，史河附近的日军出动军犬搜捕中国官兵。〔《支那事变画报》第41辑，第9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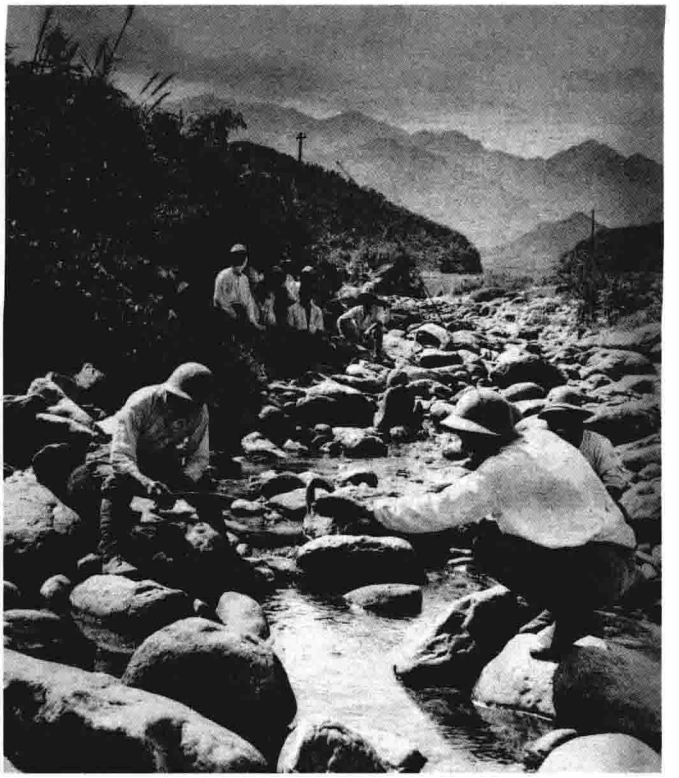


2

3



1



2

3

4

1 1938 年 9 月，江南战线，庐山山麓的日军水谷部队正在挖掘农民的莲藕。〔《支那事变画报》第 41 辑，第 13 页〕

2 1938 年 9 月，江南战线，鄱阳湖溪流的日军金守部队正在山间小溪里捉鱼。〔《支那事变画报》第 41 辑，第 12 页〕

3 1938 年 9 月 16 日，江北站线，光州攻略战中，露营的日军为了避寒，利用农家的茅草保暖。〔《支那事变画报》第 41 辑，第 21 页〕

4 1938 年 9 月 16 日，江南战线，大岭山破击战中的日军正通过庄稼地向中国军队把守的高地突击。〔《支那事变画报》第 41 辑，第 24 页〕

1 1938年9月，江南战线，田家镇附近的日本海军部队正在追击中国守军，经过激战，农舍已经破烂不堪。〔《支那事变画报》第43辑，第5页〕

1

2 1938年10月5日，江南战线，箬溪奇袭战中，日军炮兵队正在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炮击，乡村陷入战火之中。〔《支那事变画报》第43辑，第9页〕

2

3 1938年10月，江南战线，日军强入排市的中国百姓家中。〔《支那事变画报》第43辑，第13页〕

3

1

2

3

1 1938年10月，江北战线，罗山附近的日军森川部队在乡间农田布署炮位。〔《支那事变画报》第43辑，第26—27页〕

2 1938年10月，江南战线，秋意已浓，冯家铺附近的日军在百姓的农田里生火野炊。〔《支那事变画报》第44辑，第13页〕

3 1938年10月12日，江北战线，日军部队正在信阳城内“扫荡”，农民房屋遭到严重破坏。〔《支那事变画报》第44辑，第14—15页〕

1　1938 年 10 月 5 日，江南战线，隘口街作战中，日军有井部队士兵在洗涤掠自当地农户的可食用的植物根茎。〔《支那事变画报》第 44 辑，第 22—23 页〕

1

2　1938 年 10 月 5 日，江南战线，隘口街占领战役中，日本从军记者和日本士兵在挖掘中国百姓的红薯。〔《支那事变画报》第 44 辑，第 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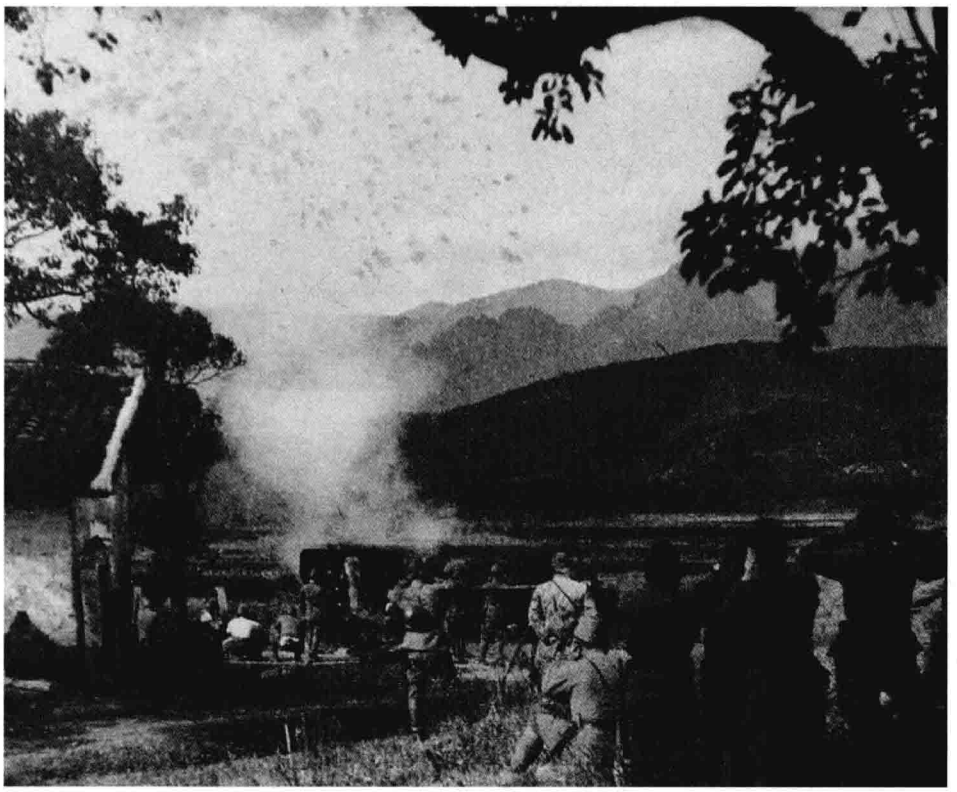
2

3　1938 年年末，日本海军曾尔部队与追击中国守军的铃木部队相呼应，炸毁珠江沿岸中国守军的碉堡。〔《支那事变画报》第 51 辑，第 20 页〕

3

1 1938年年末，庐山的日军对农村进行扫荡，并在五里驿进行猛烈炮击。〔《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24—25页〕

2 1939年3月，南昌作战中，修水河附近的日军正在进行防毒气演习。〔《支那事变画报》第57辑，第5页〕



1

2

1

2

1　1938年八九月间，日军横山部队正在庄稼地的掩体中向中国守军进攻。〔《特辑支那战线写真》第6报，第21页〕

2　1939年8月30日，江北战线，日军在农田中挖掘交通壕。〔《支那事变画报》第40辑，第24页〕

第二章

破坏社会文化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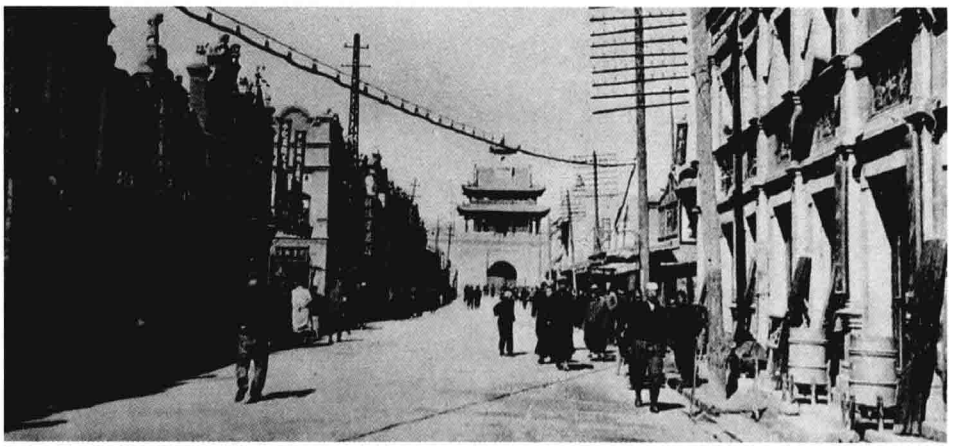
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打破了平民生活常态，使民众生活在战争疾苦之中。日军在其所占城市建立伪政权，将民众纳入其战争机器当中；在乡村实行保甲制度，征发民众修铁路挖战壕，到处掠取粮食等物资，民众在其高压统治之下艰难生存。此组图片便反映了在日军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的生活。在这当中有在日军监视下收割稻谷的农民，有被日军征发来修铁路、挖战壕、搬运货物的劳工，有在城外挖野菜充饥的儿童，有为生存摆摊卖货的小贩，有在滔天的洪水中苦苦挣扎的村民，也有拾捡瓦砾重建家园的市民，更有因家园被毁而颠沛流离的流民。在他们的表情中，有对家园被毁的痛苦，有对平静生活逝去的失落，有面对刺刀和死亡的恐惧，也有在灾难面前的镇定自若。这一幅幅抗战时期的众生相，从一个个小人物出发，从他们眼中透视这场民族浩劫。他们有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的希冀。这些照片既反映了中国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民众因日军侵略而遭受的苦难生活，也透露出普通民众在侵略面前镇定、坚忍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我们民族在这场浩劫中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一、打破平民生活常态

自日军侵华开始，大量中国平民为躲避战火纷纷背井离乡，到处寻找安身之处。随着日军的节节逼近，战火所及之处，房屋财产瞬间焚毁，广大民众流离失所，不断迁徙。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一路颠簸，茫茫大地何处可以建立家园？

日军铁蹄下的战争难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他们拖家带口四处流浪，或投亲靠友，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无处可逃的广大民众，废墟中艰难生存，或在侵略者刺刀下忍辱偷生，或作为劳工被掳掠而去，无数鲜活的生命悲惨而死。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正定、石家庄后，被日军关押于一处的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第15页〕



1

1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下的绥远、归化城内的民众走在冷清萧条的大街上。〔《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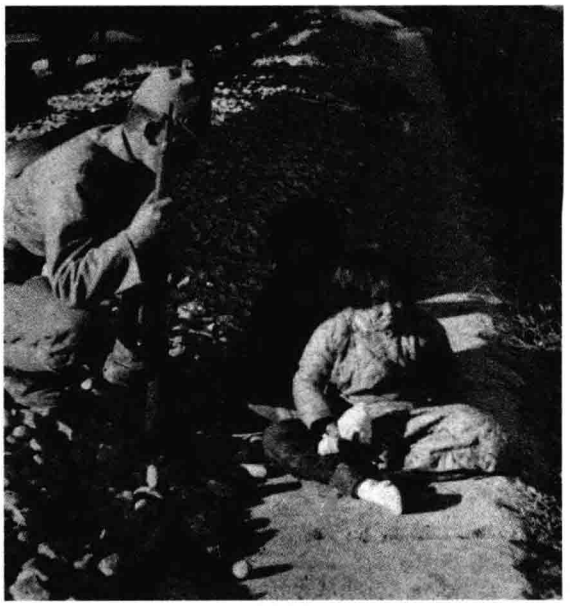
2

2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图片反映上海附近的农民被迫为日军收稻谷的场景。〔《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22页〕

3

3　1937年秋，日军攻占江南后，当地农民在日军监视下搬运收割的稻谷。〔《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22页〕

1



2

3

1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附近农民将稻谷脱粒。〔《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23页〕

2 1937年冬，河南磁州附近，被日军俘获的中国军官的年幼子女。〔《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第26页〕

3 1937年，在上海租界避难的中国百姓排队等待米店开张。〔《支那战线写真》第22报，第13页〕

1 1937年12月，在日军监视下从防空洞走出的南京市避难民众。〔《支那战线写真》第24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1月5日发行，第9页〕

2 1937年12月，人力车夫吃力地拉着占领济南的日军士兵。〔《支那战线写真》第26报，第7页〕

3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下的浙江省湖州市中国民众的生活。〔《支那战线写真》第26报，第8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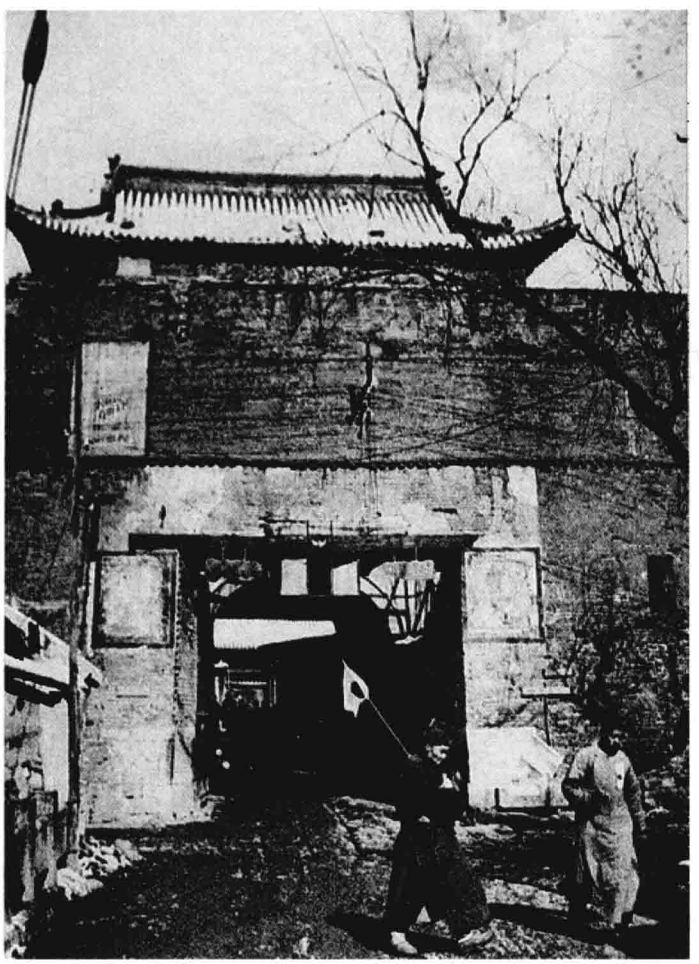
3

1 1938年初，处于日军控制下的青岛街道。〔《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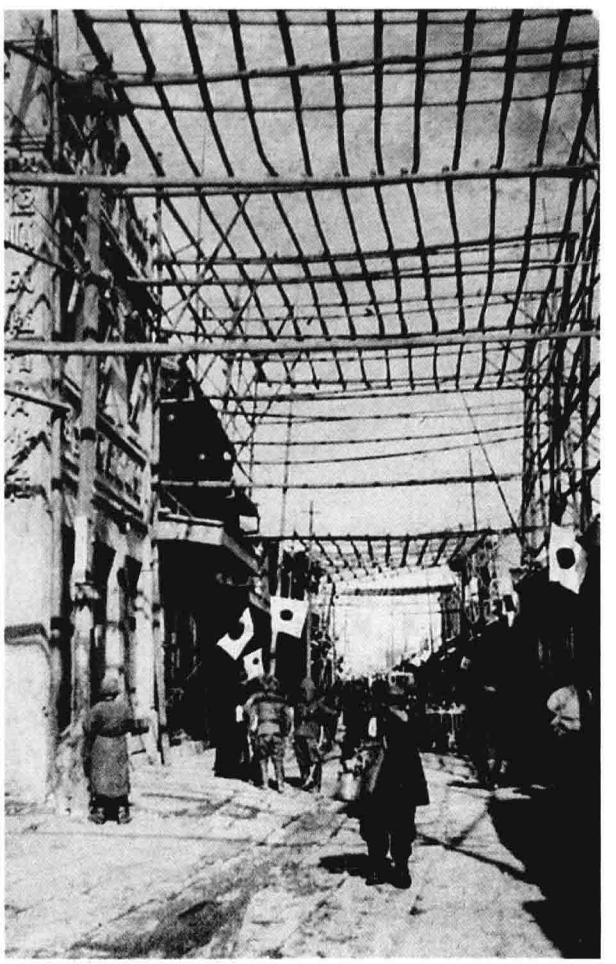
2 1938年初，日军控制下的济宁城南门入口。〔《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0页〕

3 1938年初，日军控制下的济宁民众通过日军设立的岗哨。〔《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0页〕

1



2



3

1

2

3

4

1 在日军控制下，为上海丰田纺织厂砌墙的中国工人。〔《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7页〕

2 1938年初，在黄河附近被日军征来修铁路的中国居民。〔《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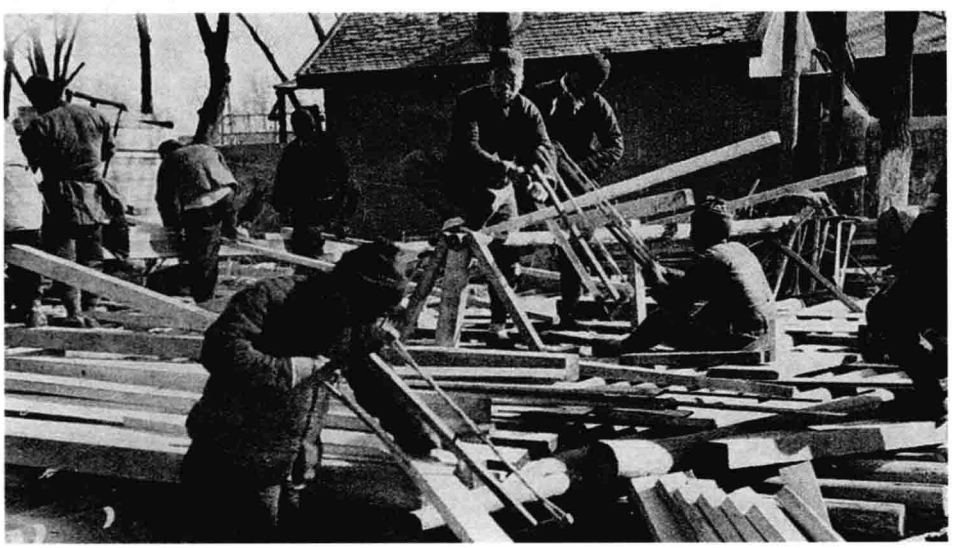
3 1938年初，日军控制下的杭州租界内的修鞋匠。〔《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7页〕

4 1938年初，杭州日本租界内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27页〕

1

2

3



4

1 1938 年初，被迫抬日军上泰山的中国居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8 页〕

2 1938 年初中国东南部的栈桥上，正在搬运货物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19 页〕

3 1938 年初的山东某地被日军征发来挖散兵壕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11 页〕

4 1938 年初，石家庄附近正在做木工活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17 页〕

1　1938年初中国东南部正在劳作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19页〕

2　1938年初，日军占领下的镇江民众的生活。〔《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20—21页〕

3　1938年初日军控制下的南京，中国难民在肉贩摊前驻足的情景。〔《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23页〕

1

2

3

1

2

3

1 到上海虹口地区避难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4 页〕

2 排队领取虹口区“居住证”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4 页〕

3 在日军控制下，被迫购买虹口地区“居住许可证”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4 页〕

■1 1938年初，河南怀庆附近生活在日军刺刀下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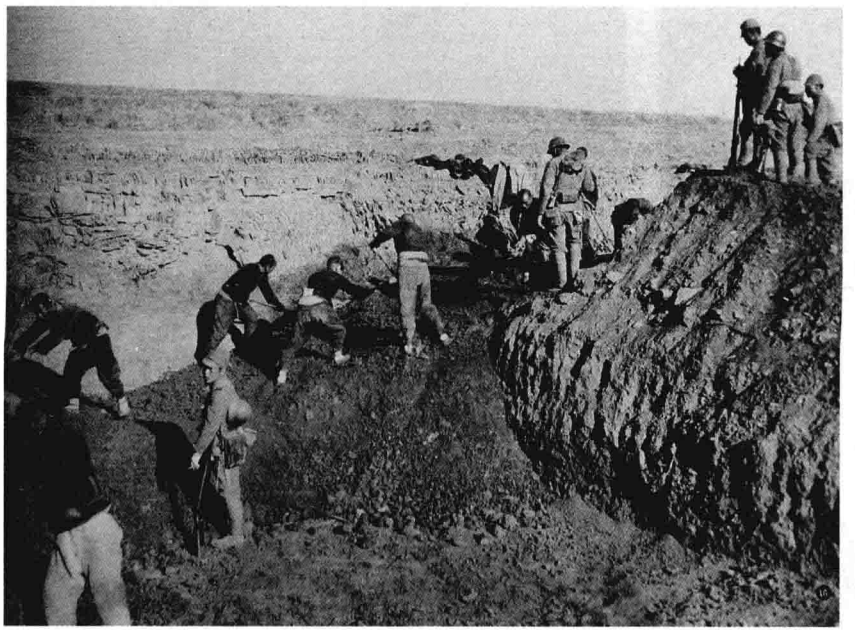
■2 1938年春，在南京郊外挖野菜充饥的中国少年。〔《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22页〕

■3 1938年初，在南京紫金山附近种地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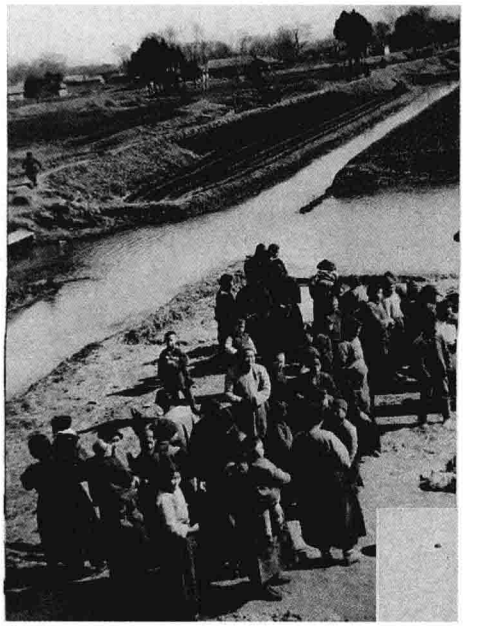
1

2

3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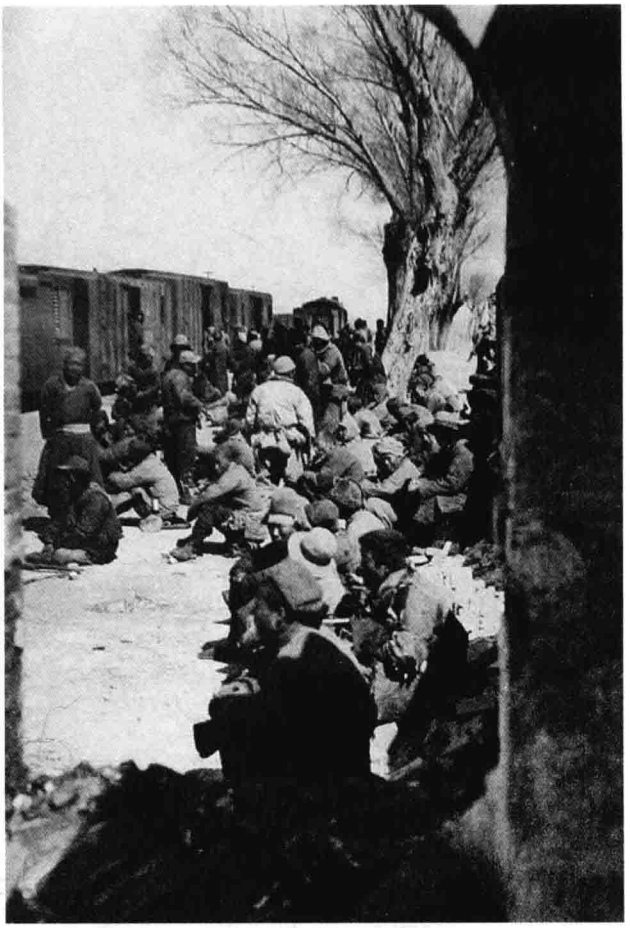
1 1938年初，河南附近被日军征发来开山修路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3辑，第16页〕

2 1938年3月，在河岸边躲避日军队伍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3页〕

3 1938年3月，在日军的监视下进出江苏南通城门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6页〕

4 在江苏南通附近旁观日军行进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6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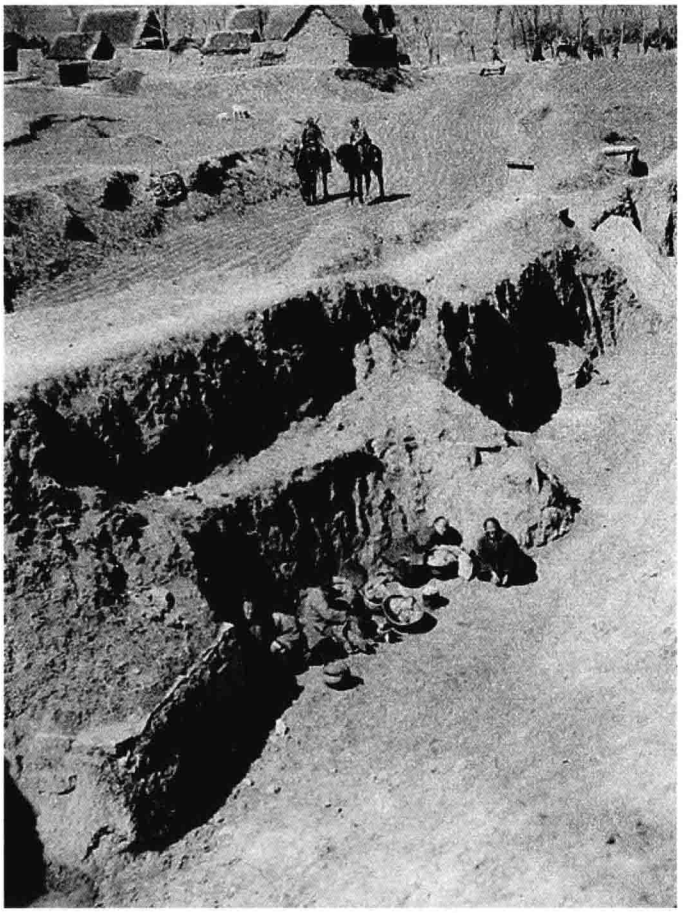
3

1　1938 年春，河南鹤壁淇县附近讨饭的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0 页〕

2　1938 年春，京汉铁路线附近修理铁路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1 页〕

3　1938 年春，河南安阳宜沟镇附近与日军一起围观摔跤表演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1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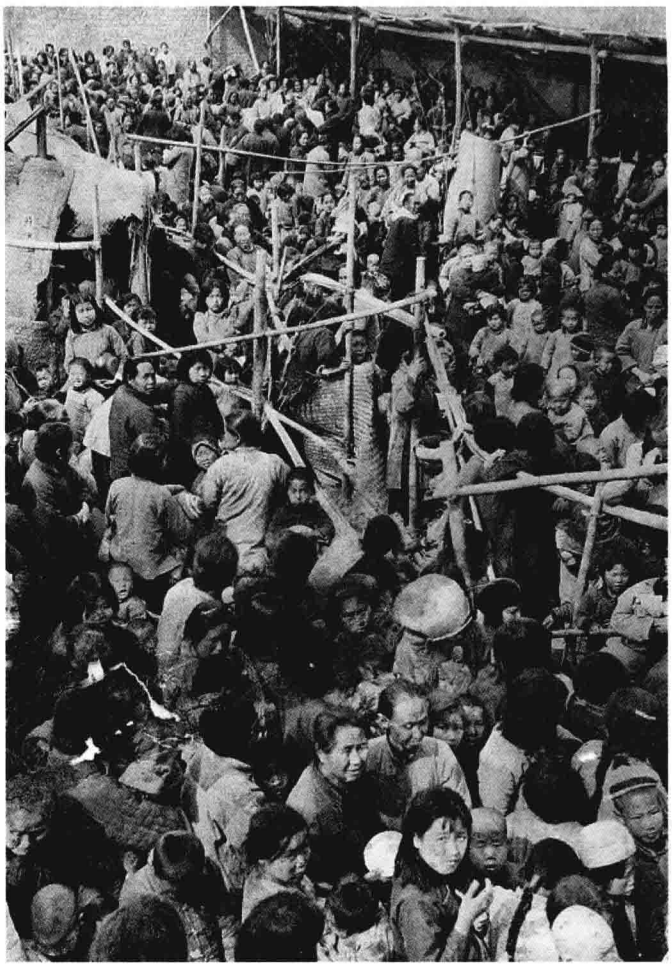
2

3

1 1938 年春，在热河承通线附近贩卖糖葫芦的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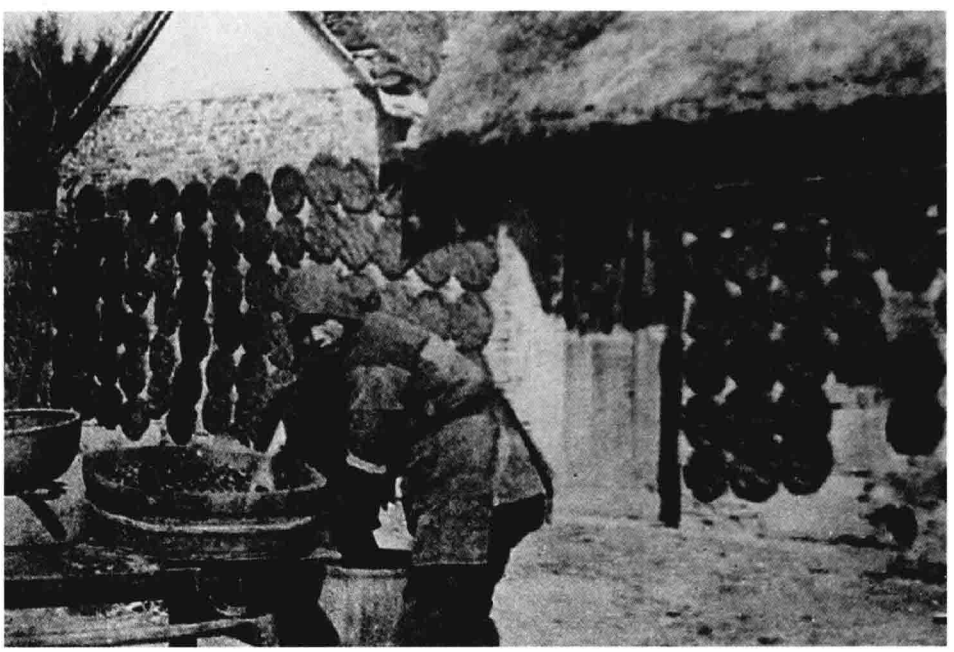
2 1938 年春，在山东临城农村一个土坑内躲避战乱的中国村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7 页〕

3 1938 年春，山东界河附近在日军监视下修建铁路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7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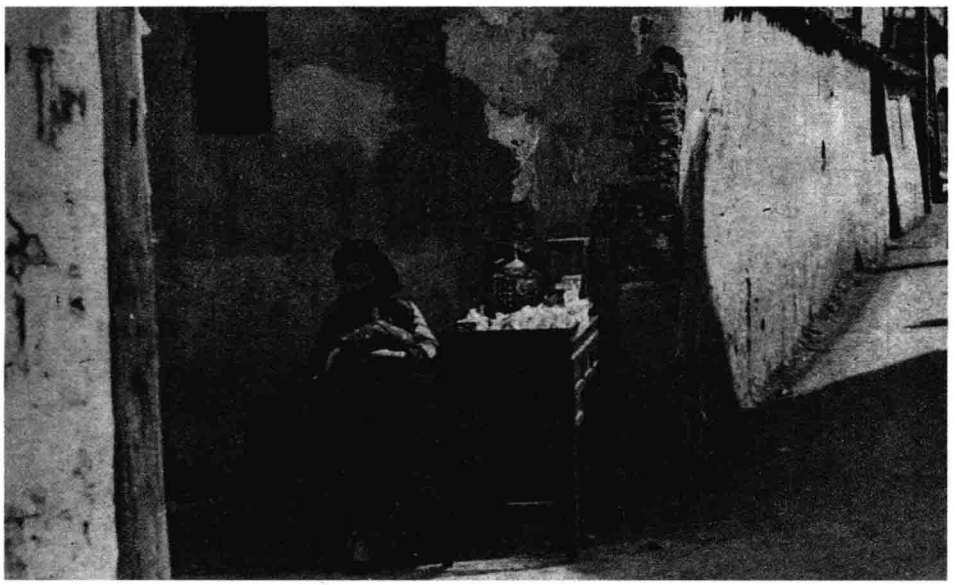


3

1 1938 年春，北京广济寺附近领粥的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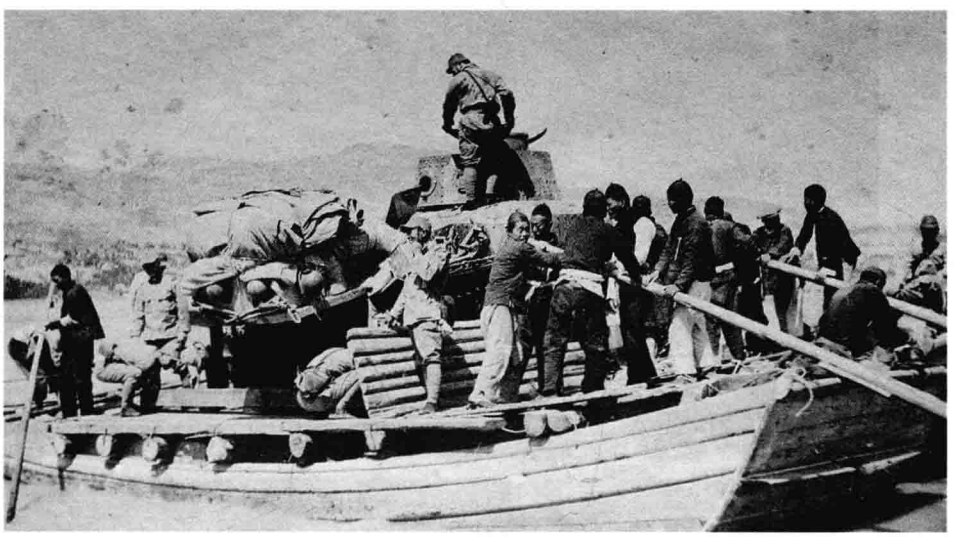
2 1938 年春，在安徽芜湖附近为日军捕鱼的中国渔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6 辑，第 20 页〕

3 1938 年，江苏扬州附近的中国民众将牛粪贴在墙上晒干作为燃料。〔《支那事变画报》第 26 辑，第 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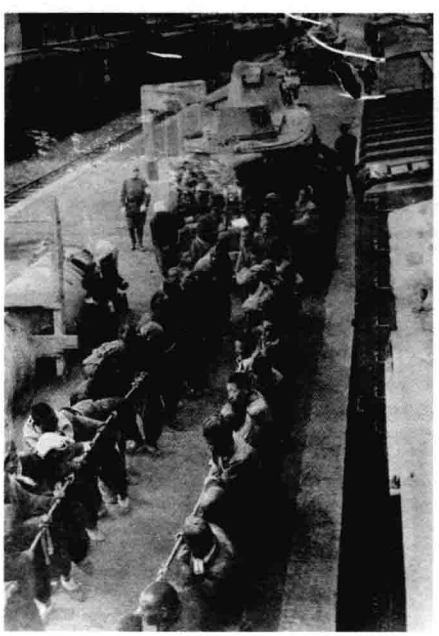
1

■1 1938年春，在南京中华门附近摆摊卖物品的中国妇人。〔《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31页〕



2

■2 1938年，淮河上的中国渔船在日军监视下运送日军的坦克。〔《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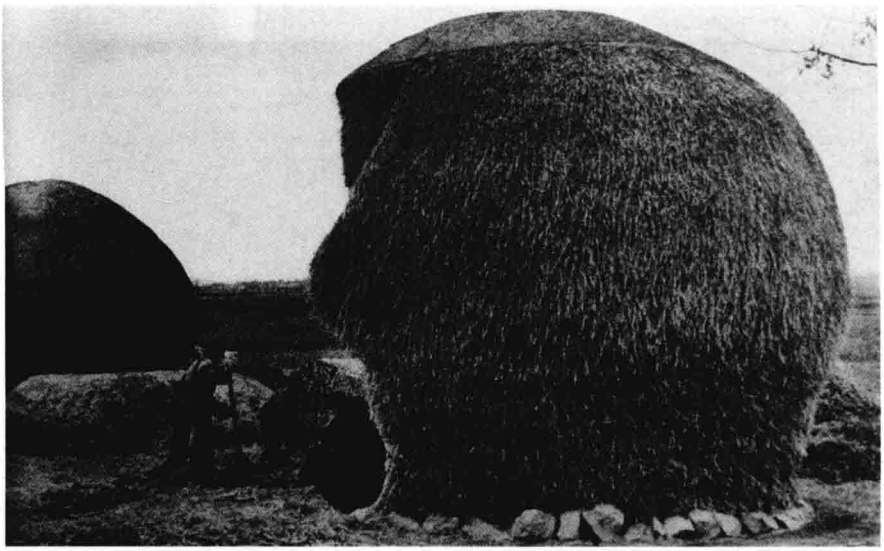
3

■3 1938年，在河南新乡附近被日军强迫拖拉日军战车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9页〕

4

■4 1938年春，安徽凤阳吸烟的中国农民。〔《支那战线写真》第43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5月18日发行，第16页〕

1



2

3

4

1　1938 年春，在安徽蚌埠长淮卫一带从事农耕的中国农民。〔《支那战线写真》第 43 报，第 17 页〕

2　1938 年春，安徽蚌埠一处打麦场及在场上劳作的中国农民。〔《支那战线写真》第 43 报，第 16 页〕

3　1938 年春，在安徽凤阳附近推石碾的农民。〔《支那战线写真》第 43 报，第 17 页〕

4　1938 年春夏间，在津浦线附近被日军搜捕到的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第 7 页〕

1

2

3

4

1 1938年春夏间，在北京前门大街拉洋车的人力车夫。〔《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10—11页〕

2 1938年梅雨时节，在被洪水淹没的家中就食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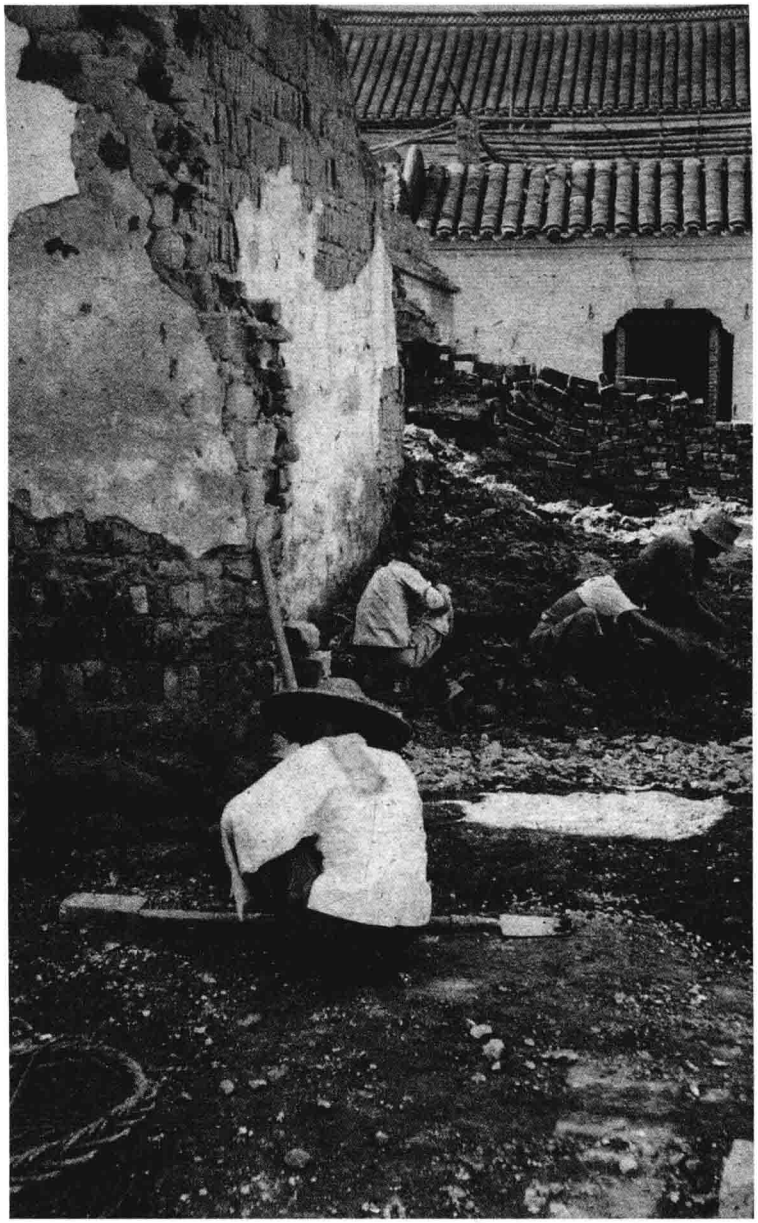
3 1938年夏，表情愁苦的济南公交车售票员。〔《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26—27页〕

4 1938年夏，在被日军轰炸的废墟中行走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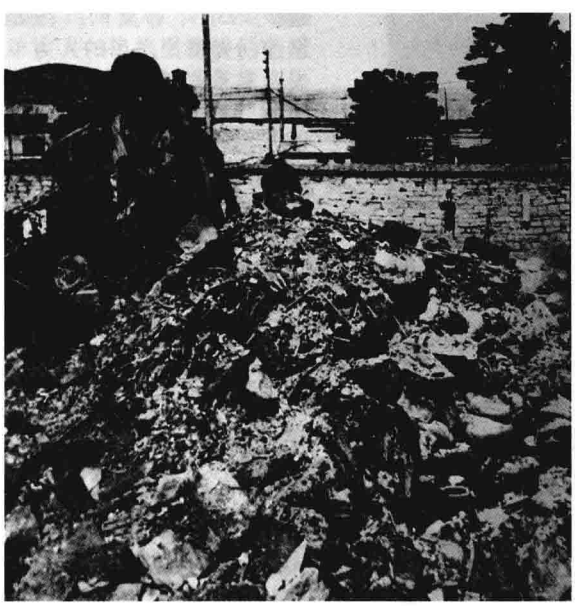
1　1938年夏，拾捡瓦砾重建家园的徐州市民。〔《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15页〕

2　1938年夏，日军占领徐州后，坐在废墟上的徐州市民。〔《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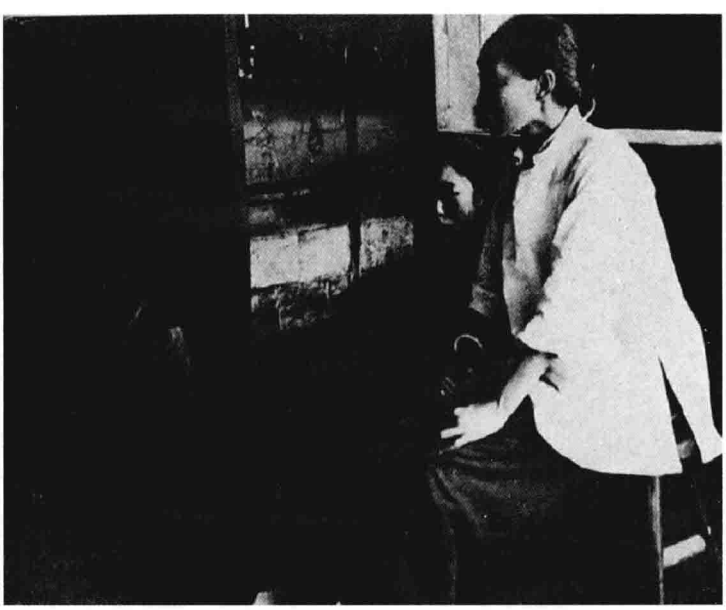
3　1938年夏季，来不及撤离而被日军俘获的九江妇女。〔《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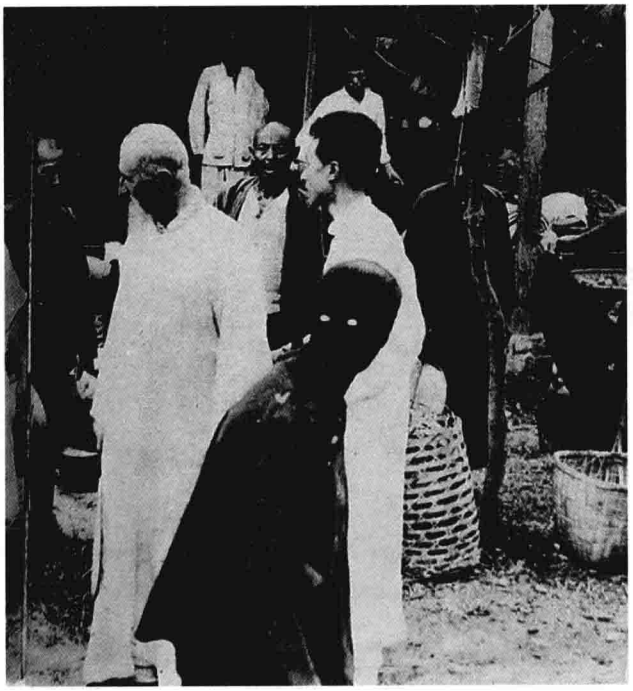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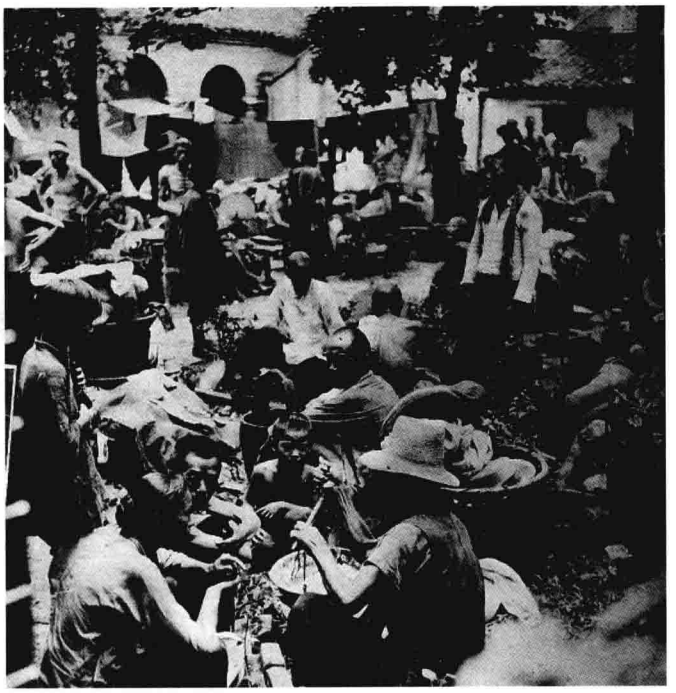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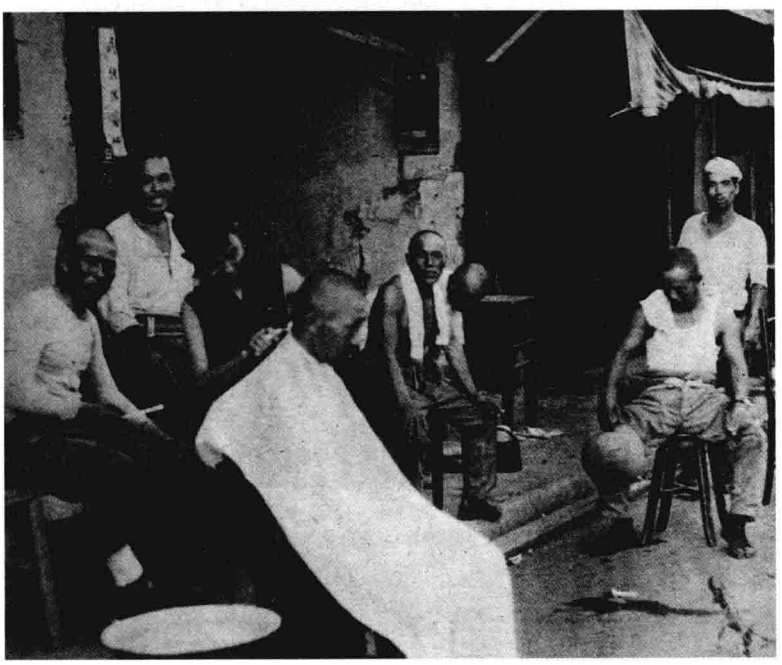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1938 年 8 月，在九江佛教会避难的中国百姓。〔《支那事变画报》第 37 辑，第 28 页〕

2 1938 年夏季，江西九江逃难的中国平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37 辑，第 28 页〕

3 1938 年夏，在江西九江给顾客理发的街头少年理发匠。〔《支那事变画报》第 37 辑，第 29 页〕

4 1938 年夏，安徽怀远因洪水淹没家园而被迫撤离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38 辑，第 6 页〕

1　1938年夏，安徽怀远民众撤离因决口被淹的村庄。〔《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7页〕

2　1938年夏，安徽怀远，家园被淹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7页〕

3　1938年秋，在鄱阳湖地区，日军监视收稻谷的中国农民。〔《支那事变画报》第41辑，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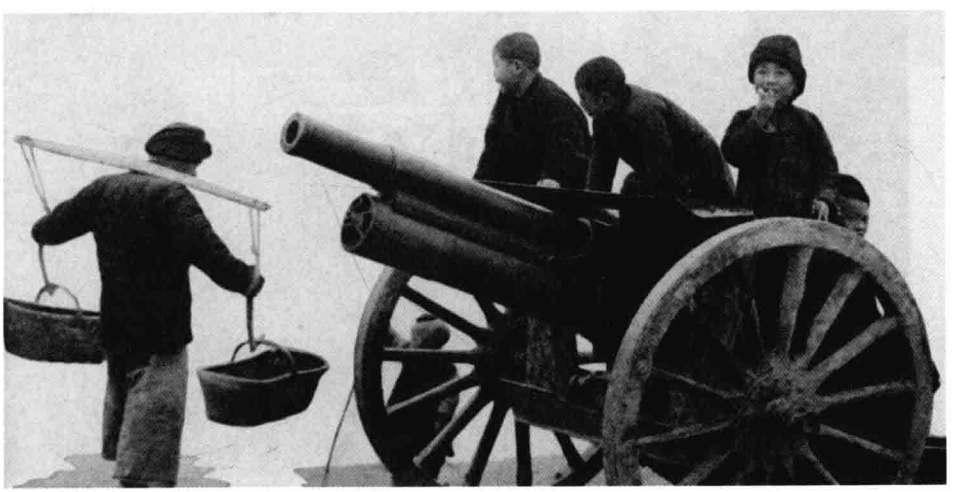
1

2

3

1

1 1938 年 12 月，正在晾晒红薯干的中国百姓。〔《支那战线写真》第 75 报，东京朝日新闻社 1938 年 12 月 28 日，第 8 页〕



2

2 对武器不知就里的儿童，把大炮当成了好玩的玩具。〔《支那战线写真》第 75 报，第 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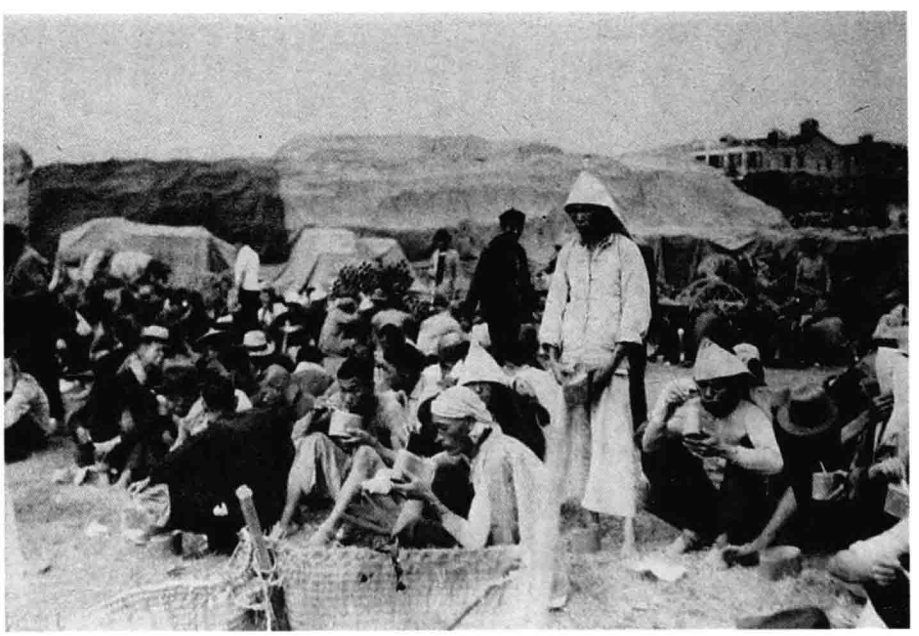
3

3 1938 年底，日军占领下在广东街道上摆弄狮头的中国儿童。〔《支那战线写真》第 75 报，第 9 页〕

1

2

3



4

1 1938年冬，在南京城门口通过日军检查哨的中国民众。〔《支那战线写真》第76报，第11页〕

2 1938年冬，江西九江东孤岭，中国民众晾晒棉花。〔《支那战线写真》第75报，第9页〕

3 被日军强迫合照的中国儿童。〔《支那战线写真》第75报，第9页〕

4 1938年冬，被日军雇佣的广东民工正在吃饭。〔《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6页〕

1

2

3

4

1 1938 年冬，日军占领下的张家口街市已开始日本化。〔《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1 页〕

2 1939 年初，日军侵占湖北蒲圻城后产生大量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 53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2 月 12 日发行，第 22 页〕

3 1939 年初，日军控制下的山西运城街景。〔《支那事变画报》第 52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2 月 5 日发行，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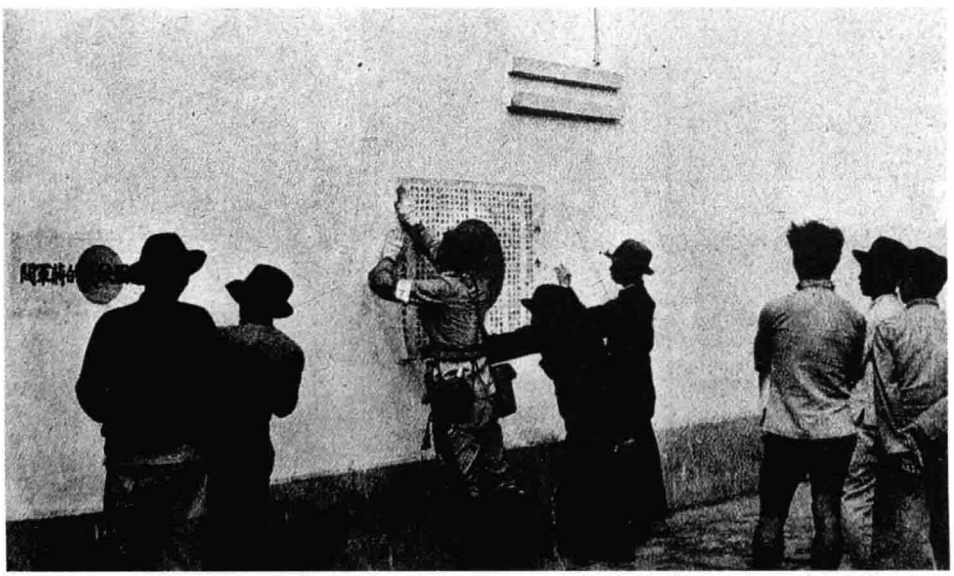
4 1939 年初日军侵占下的岳阳民众的生活。〔《支那事变画报》第 53 辑，第 23 页〕

■1 1939年初，人力车夫拉着一名占领海口的日军行走于街市。〔《支那战线写真》第84报，东京朝日新闻社1939年3月1日发行，第12页〕

■2 1939年2月，观看日军张贴布告的海口居民。〔《支那战线写真》第84报，第12页〕

■3 1939年，日军控制下的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条街道。〔《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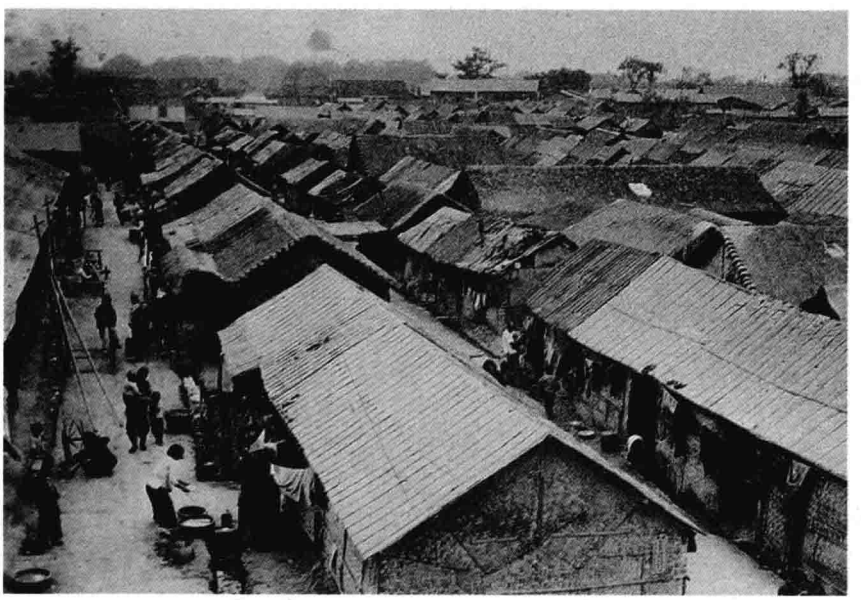
1



2

3

1



2

3

1 1939年春夏，在上海闸北某哨卡接受日警检查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9页〕

2 在上海公共租界棚户区居住的中国难民。〔《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9页〕

3 在上海公共租界生活的中国难民与打瞌睡的租界巡捕。〔《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9页〕

■1 1939年春，上海黄浦江边一群正在吃饭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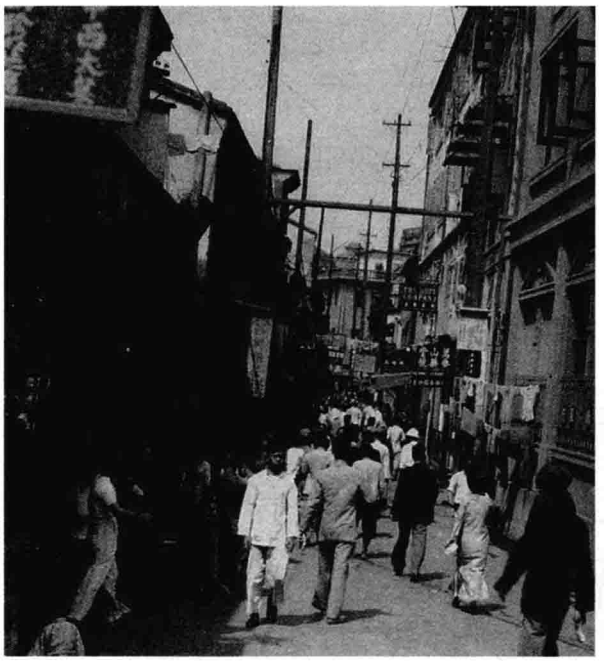
■2 1939年春，上海公共租界中艰难生存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11页〕

■3 1939年春，上海苏州河一带，正在售卖食品的中国商贩。〔《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11页〕

1

2

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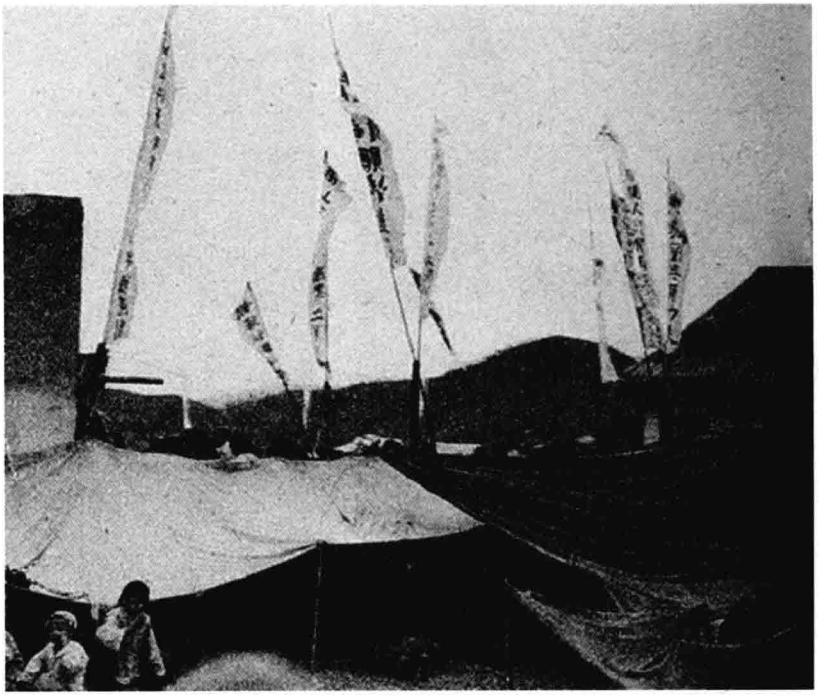
1 1939年，日军控制下的厦门鼓浪屿街景。〔《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15页〕

2 1939年，在日军控制下正在修缮被毁房屋的上海市民。〔《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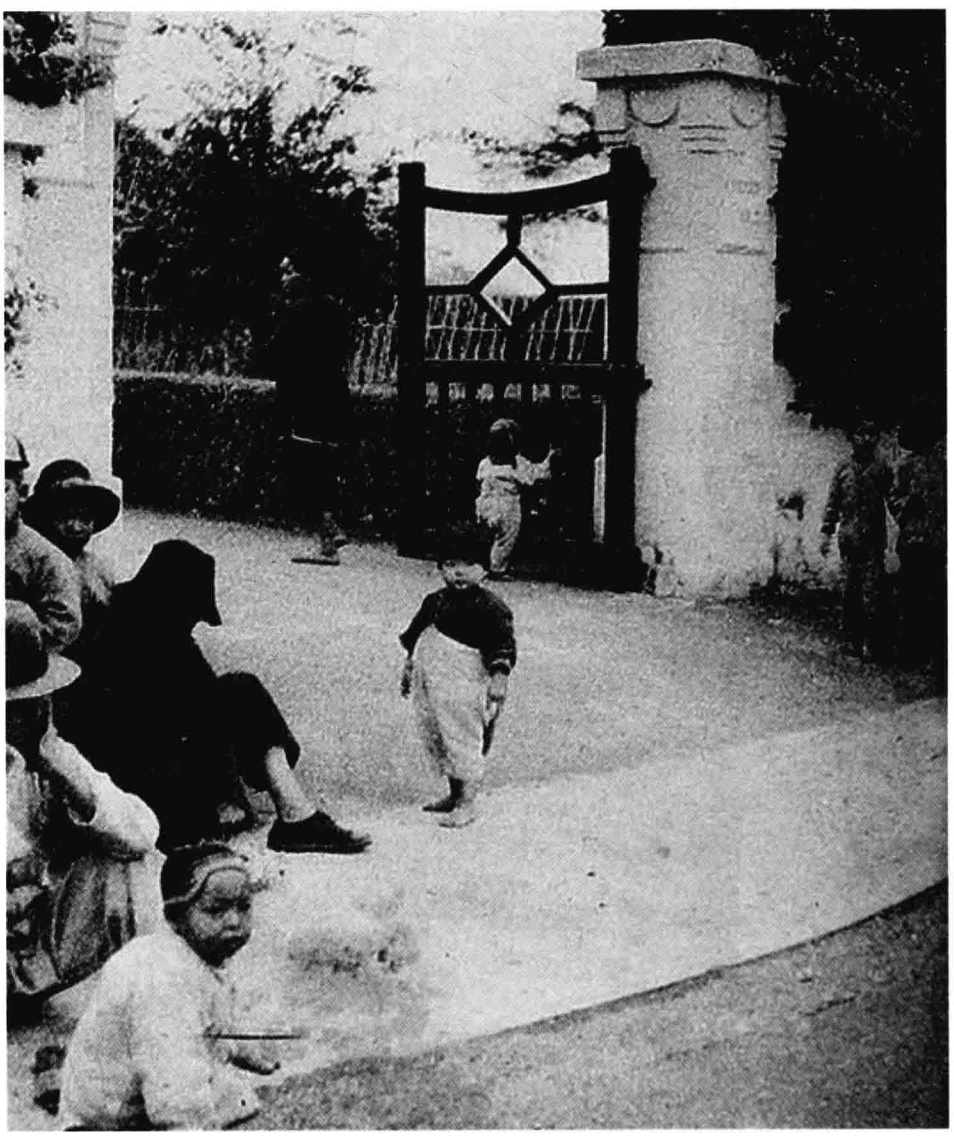
3 1939年，在日军监视下收拾瓦砾重建家园的上海闸北地区的中国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21页〕

1 1938年初在罗湖一带的中国战争流民。〔《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19页〕

2 1938年初在罗湖一带的中国战争流民。〔《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19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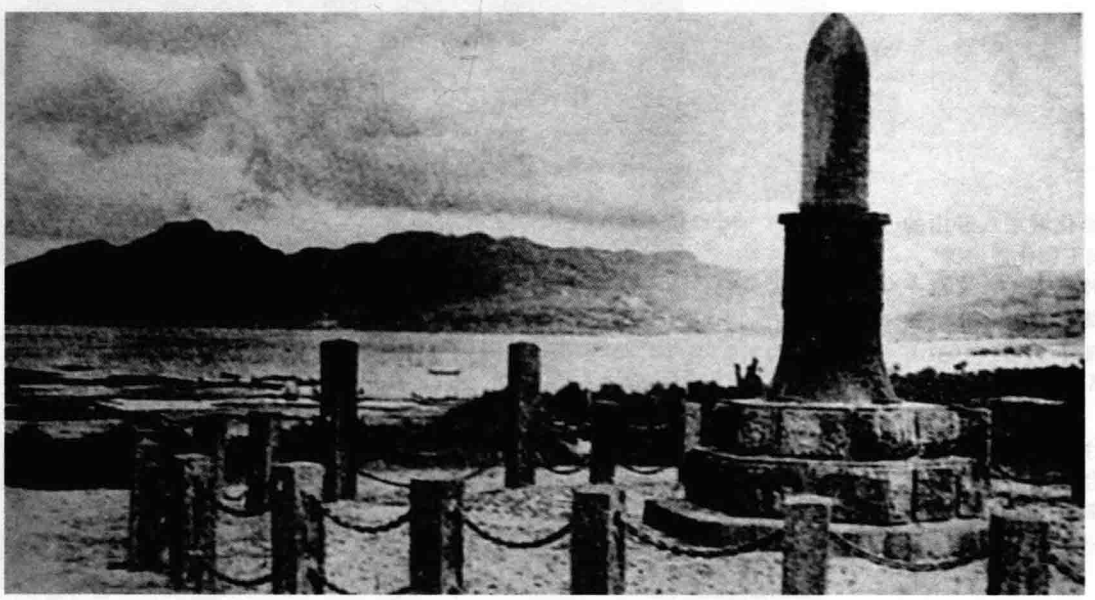


2

二、广立碑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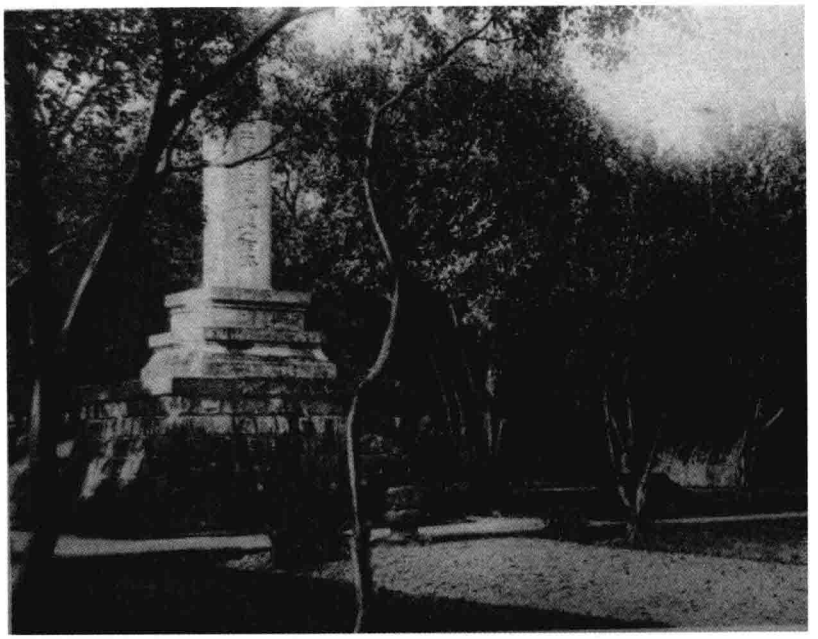
为了建立和维护其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大肆劫掠和毁坏中国庙宇、塔碑，如山东的章丘、高密、海阳、邹平、菏泽、沂水等地，均是无庙不毁；山西境内的纯阳宫、大佛寺、三清店、关帝庙、大禹庙等寺院，非劫即毁。日军破坏中国的寺庙和碑塔，代之以修建代表日本宗教和文化以及宣扬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的纪念碑塔，借此实现其文化征服与精神同化的目的。

比如，“忠灵塔”是一种纪念用建筑，用以埋葬和祭拜战死的日本军人。日军侵华期间曾在中国多地建造“忠灵塔”，并定期举行祭拜仪式。2014 年 1 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日军侵华档案，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部分甲级战犯的侵华罪证。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显示侵华期间日军曾多次在新京（长春）举行靖国神社参拜活动，地点选在“忠灵塔”。其中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关于靖国神社临时大祭仪式之件报告》中，规定于 1943 年 4 月 25 日 10 点 15 分，在新京“忠灵塔”为战死亡灵举行参拜仪式，并附有参拜细节，具体包括参拜时的服装、队列、枪械等规定。



位于台湾澳底海岸的北白川亲王 1895 年台湾登陆露营纪念碑。〔杨莲福编著：《图说台湾历史》，（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年 1 月版，第 129 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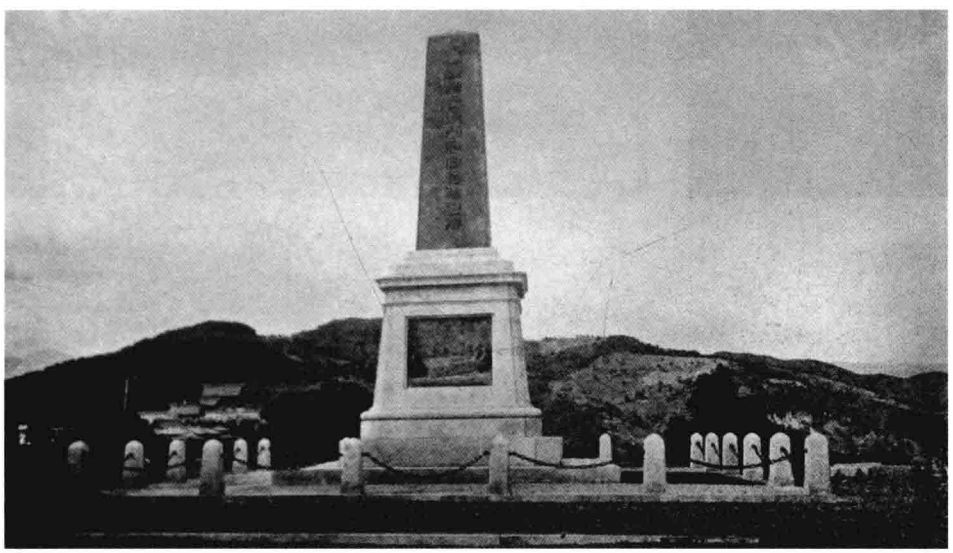
1 台湾彰化城东八卦山的“北白川亲王彰化遗迹碑”。〔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台北）胜山写真馆昭和六年（1931）六月版，第 141 页〕

2 建在台北圆山的 1895 年日军“征台战役”死亡的日本陆军墓碑。〔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1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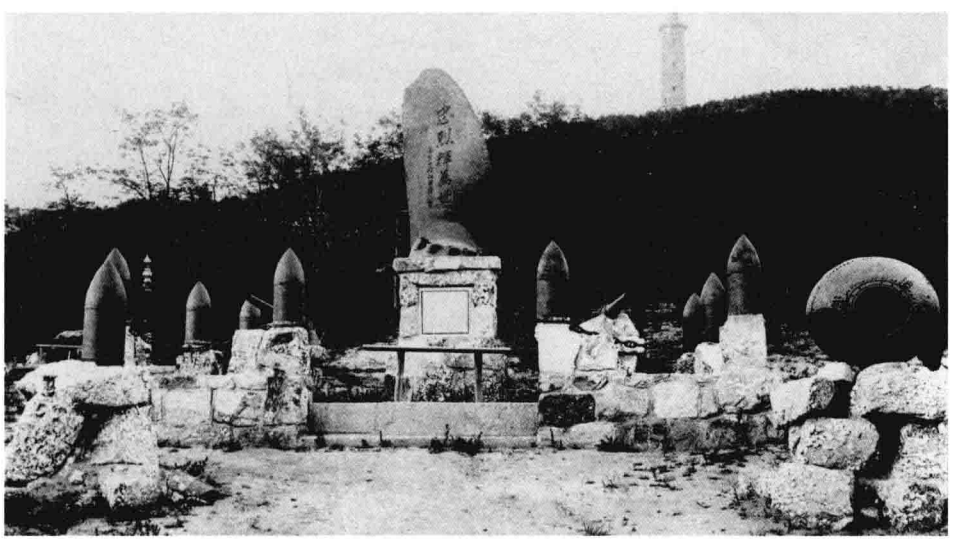
3 19 世纪 30 年代，日本殖民当局为在雾社事件中死亡日本人建造的“雾社事件殉难殉职者之墓”纪念碑。〔王延友提供〕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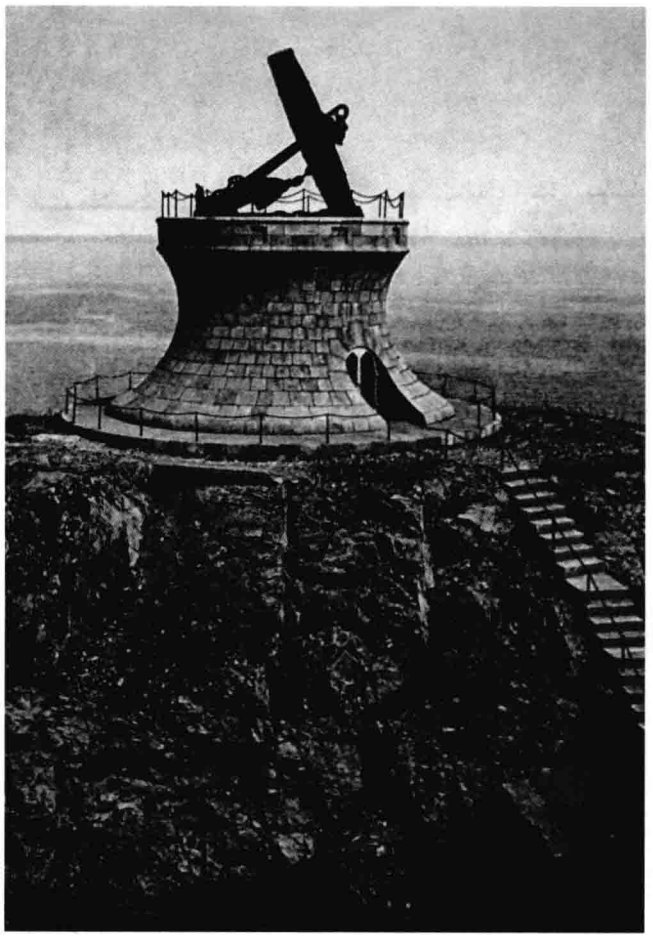
4

1 旅顺白玉山“表忠塔”。本塔从1907年6月开建，于1909年11月建成，耗资25万日元。〔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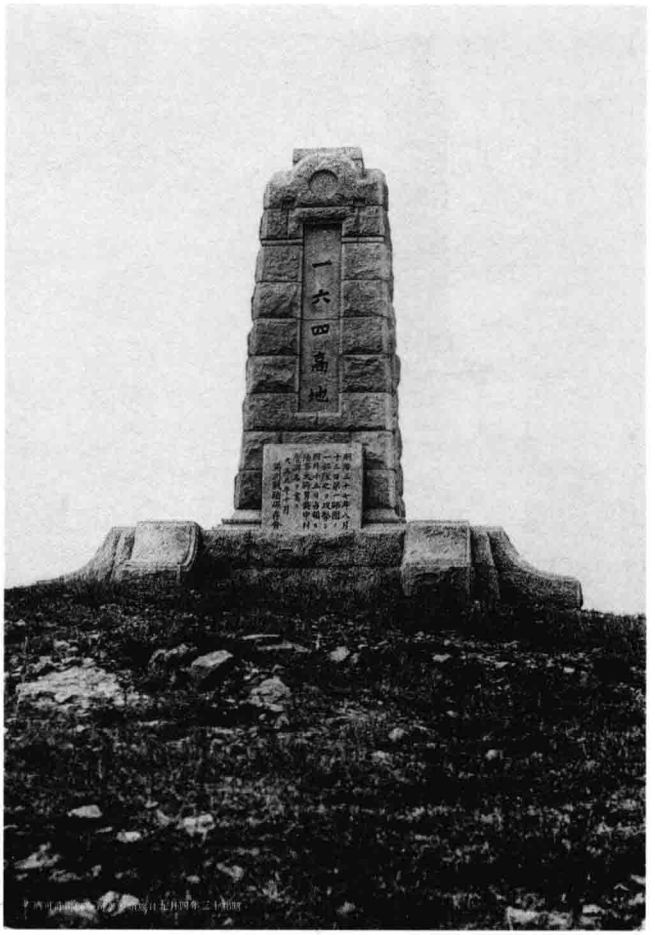
2 1912年建造的尔灵山纪念碑。“二〇三高地”因海拔高203米而得名，是日俄战争双方争夺旅顺的主战场之一。双方为争夺该地均死伤惨重。战后，乃木西典改此山名为“尔灵山”，并为该碑题写了碑名。〔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58页〕

3 位于台北圆山台湾神社前面剑潭山上的“台湾总督府警察官招魂之碑”。〔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1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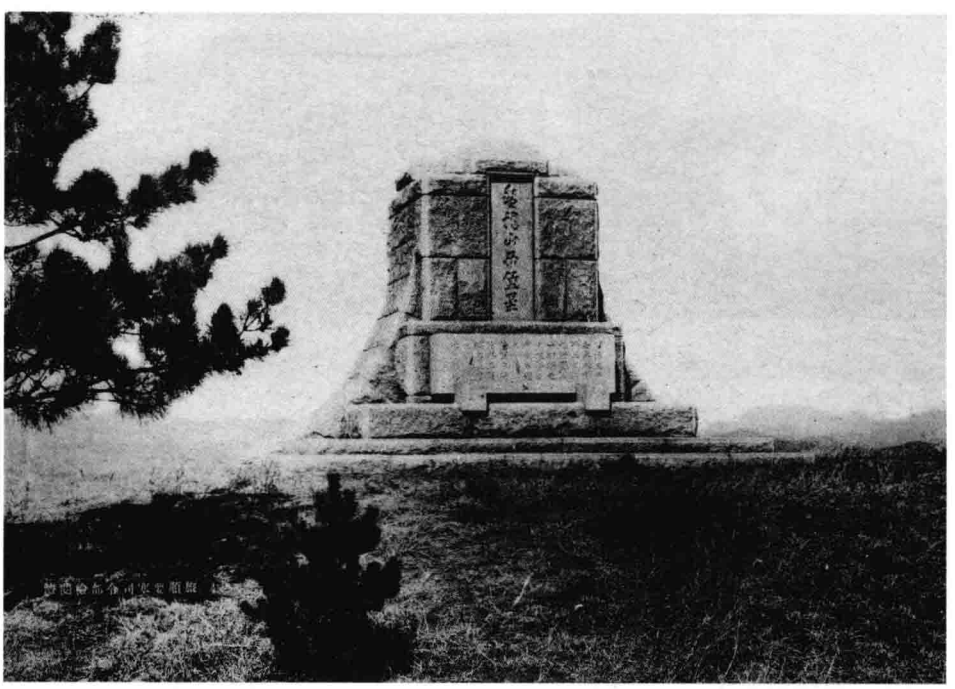
4 日俄战争后，日军建立的旅顺第三次塞港敢死队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中文字为“忠烈辉万世”。〔王延友提供〕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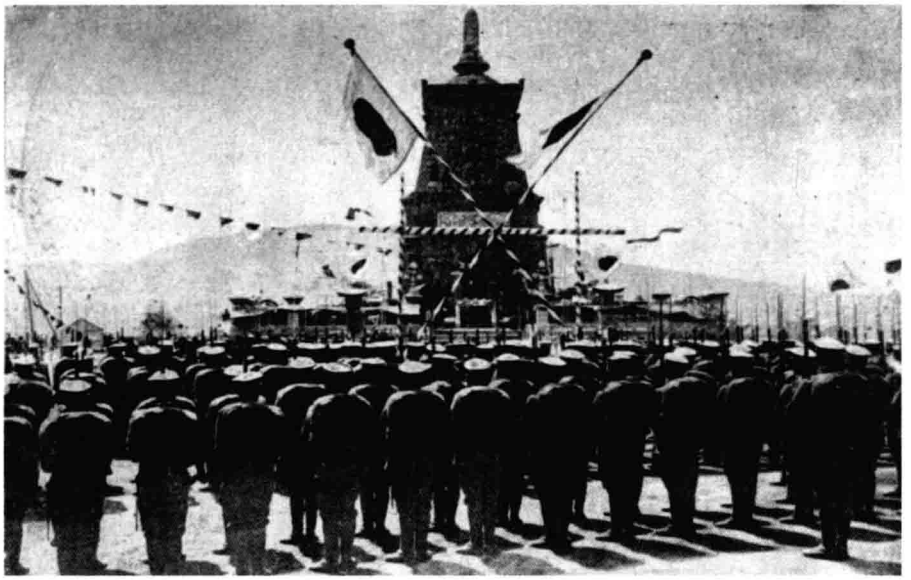


3

1 1916年于大连老虎尾半岛修建的旅顺港口闭塞队纪念碑。〔唐功春主编：《旧明信片中的老大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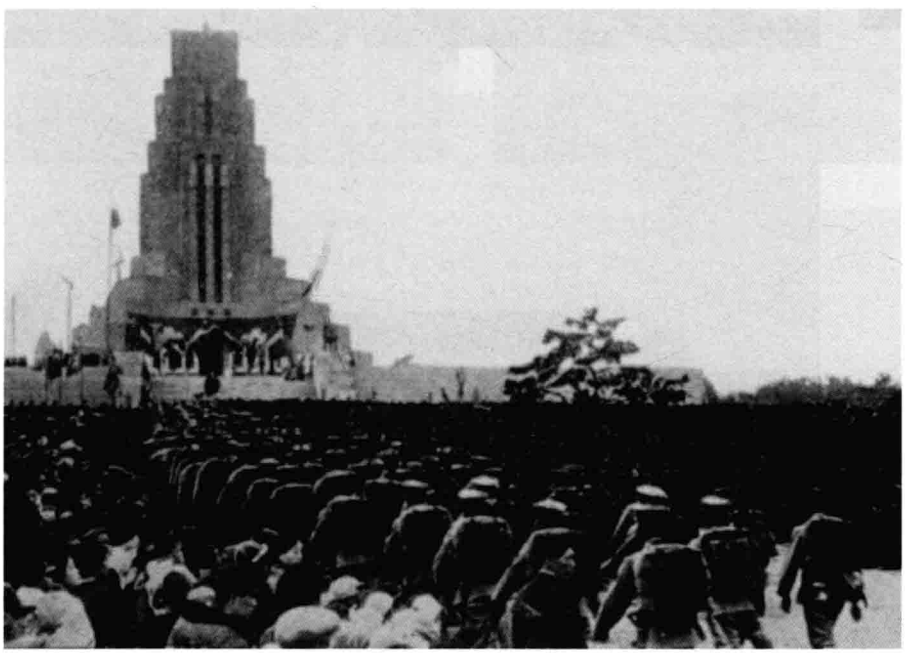
2 “一六四高地”纪念碑。满洲战迹保存会1916年建。碑名由日本陆军大将、男爵中村觉题写。〔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54页〕

3 1916年建成的盘龙山西堡垒纪念碑。〔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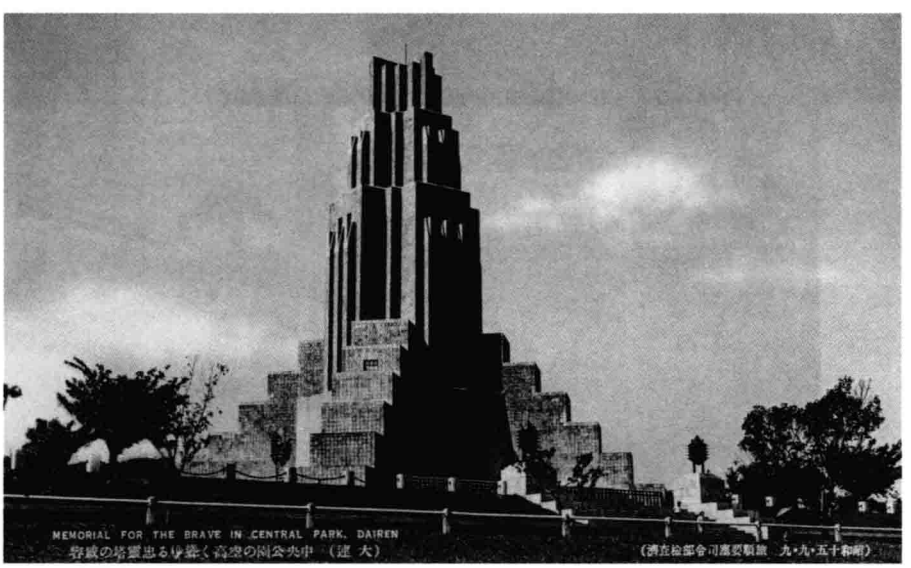
1

1 参加大连“表忠碑”祭拜仪式的日军将士。“表忠碑”建造于1910年至1911年，位于大连朝日广场（现三八广场）。〔守屋秀也：《南满洲写真帖》，（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1917年7月版，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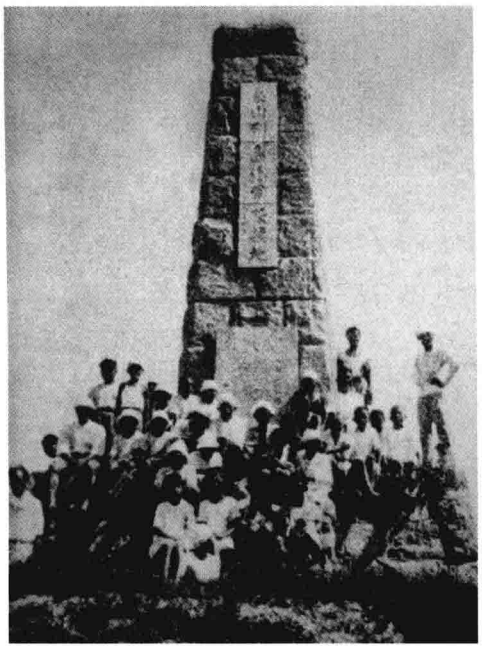
2

2 日伪在大连“忠灵塔”祭祀阵亡的侵华日军。〔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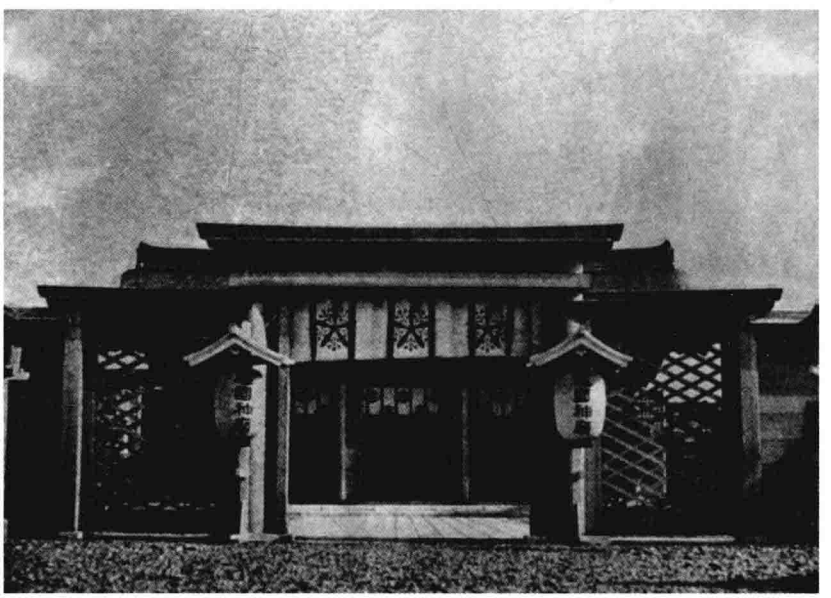
3

3 大连“忠灵塔”。1926年建于中央公园，用于安放日俄战争中日军阵亡者的骨灰。〔唐功春主编：《旧明信片中的老大连》，第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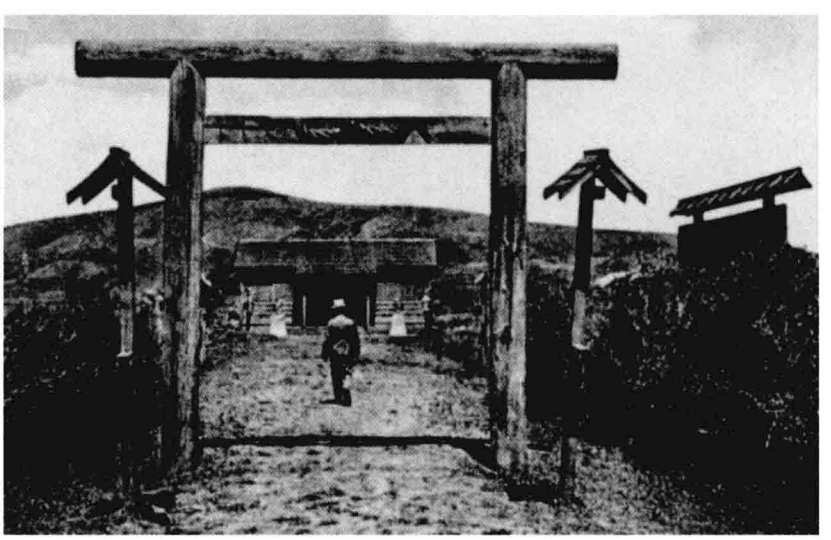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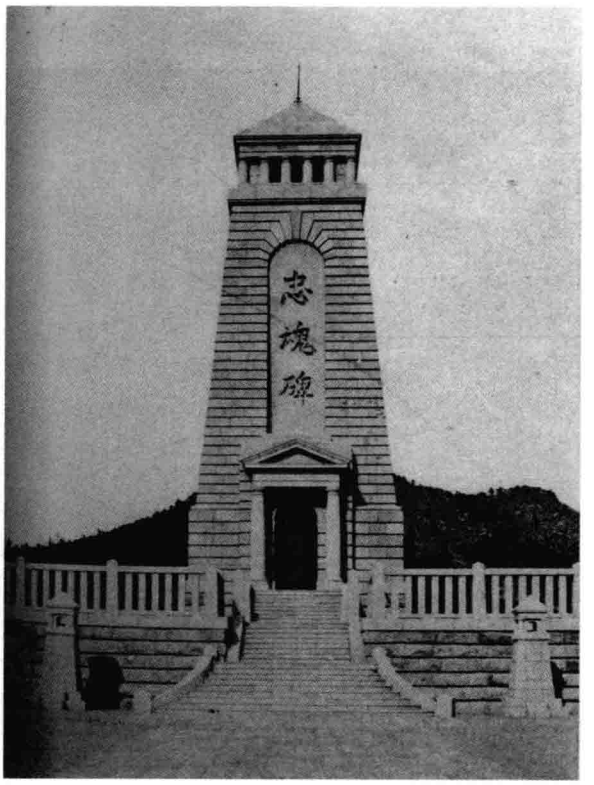
1　1913年建立的长山列岛日本海军根据地碑。〔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图史》，大连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21页〕

2　日伪当局每年在长春的“忠灵塔”下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为侵华战争中的阵亡者招魂。〔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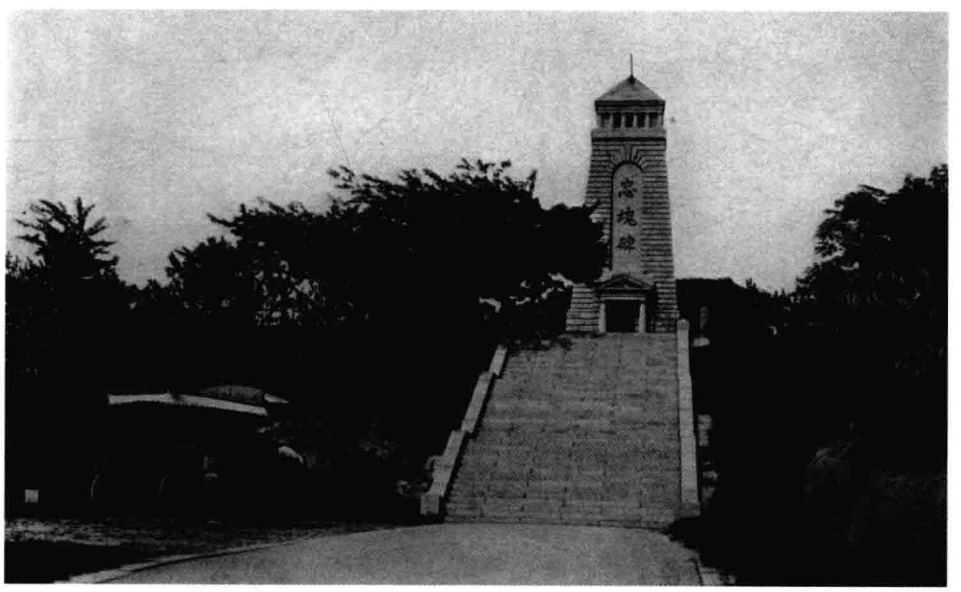
3　1940年溥仪奉关东军之意在其皇宫内供奉起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号称天皇始祖的“天照大神”。〔傅光中提供〕

4　日伪强行在东北农村修建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并强迫中国老百姓参拜。图为设在吉林敦化农村的供奉“天照大神”的小型神社。〔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44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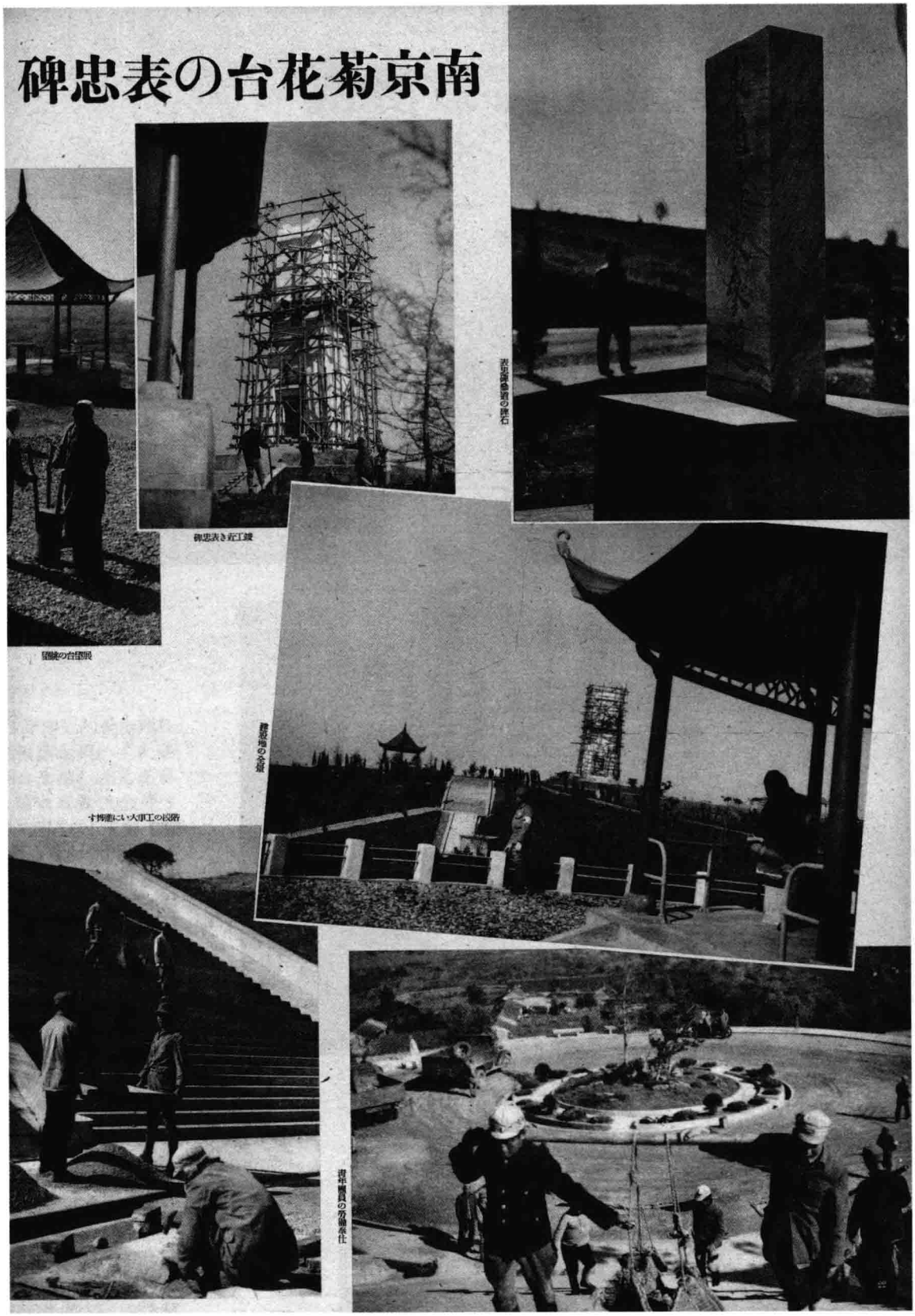


3

1 建于1937年5月，位于通辽北门外的蒙古风格的“忠魂塔”。〔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45页〕

2 日军青岛“忠魂碑”正面。〔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株式会社秀英舍第一工场大正七年（1918）九月十五日发行，第240页〕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纪念在日德青岛战役结束中阵亡的日军，日方在青岛太平山（日本称为“旭山”）设立的青岛“忠魂”。碑高78.5尺，正中“忠魂碑”三字由日本守备军司令官神尾光臣题写。〔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2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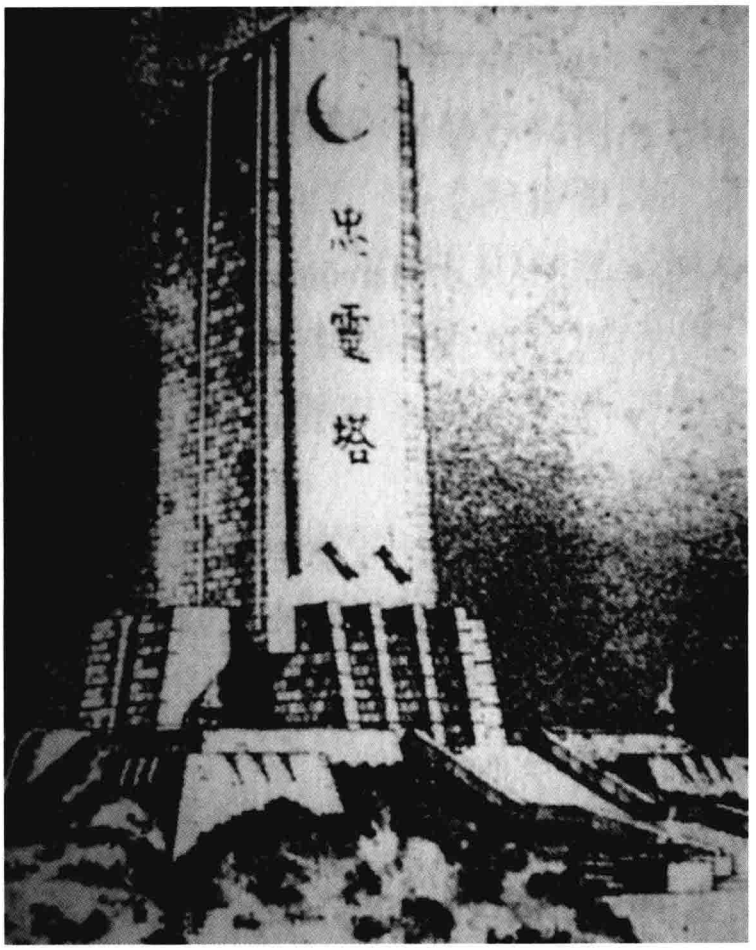


1939 年 10 月，日本画报报道的正在修建中的南京菊花台“表忠碑”。〔《支那事变画报》第 70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11 月 5 日发行，第 22 页〕

1940年12月13日，日本画报用整版报道南京菊花台“表忠碑”启用揭幕仪式。〔《支那事变画报》第74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1月5日发行，第14页〕

日本画报用整版报道1938年11月建立的上海大厂镇日军“表忠塔”。朝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铃木1938年11月27日拍摄。〔《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25辑，朝日新闻社1938年12月17日发行，第34页〕

1



2

1 日本港督矶谷廉介到任后颁发的“告谕”被刻成石碑，放在中区原皇后像广场一个铜龛式的雕花御座里面。〔谢永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香港）明报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第 101 页〕

2 1942 年 2 月 9 日，日军在香港马己仙峡道和山顶道交界处修建阵亡日军的“忠灵塔。”〔谢永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第 42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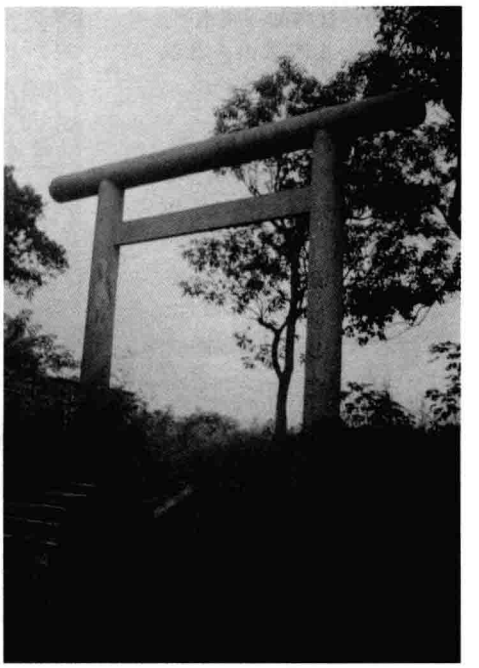
三、广建神社

神社，是崇奉与祭祀神道教中各神灵的社屋，是日本宗教建筑中最古老的类型。神社的起源甚早，但真正深植民心与发扬光大，应该是19世纪中的明治维新之后。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宣布政教合一，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即国家神道，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从此，信奉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民的义务，神道教成为日本统治国民的手段。

神社原本主要祭祀对象为主神，即天照大神（也称太阳女神）。但是，近代军国主义兴起之后，它被改造为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国家神道”，并把这些思想灌输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因此神道成为日本皇权的象征。日本政府制定繁琐的程序，使其成为强制性的教育与文化仪式。同时，凡是日本侵占的地方，都要建立神社，作为其征服者和行使权力的标志。因此，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神社，便被赋予军事侵略和精神统治的内涵。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便在南满各地兴建神社。到1940年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修建祭祀天照大神的“建国神社”时，日本在东北建造的神社已经超过200座。日本长期占据的台湾、大连、青岛神社数量也很多，侵占时间较长的中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也先后建造了不少神社。可以说，修建神社，是日本继军事征服之后实现精神征服的重要手段。

桃园神社是台湾全岛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日本神社。图为桃园神社的正殿。〔洪致文：《阿里山森林铁路纪行》，第25页〕

1



2

3

1 图为台湾日据时期修建的嘉朴子东石神社的第一重鸟居（表示进入神社地界的牌坊），迄今保存完好（神社正殿已拆除，今改名中正公园）。〔洪致文：《阿里山森林铁路纪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1月版，第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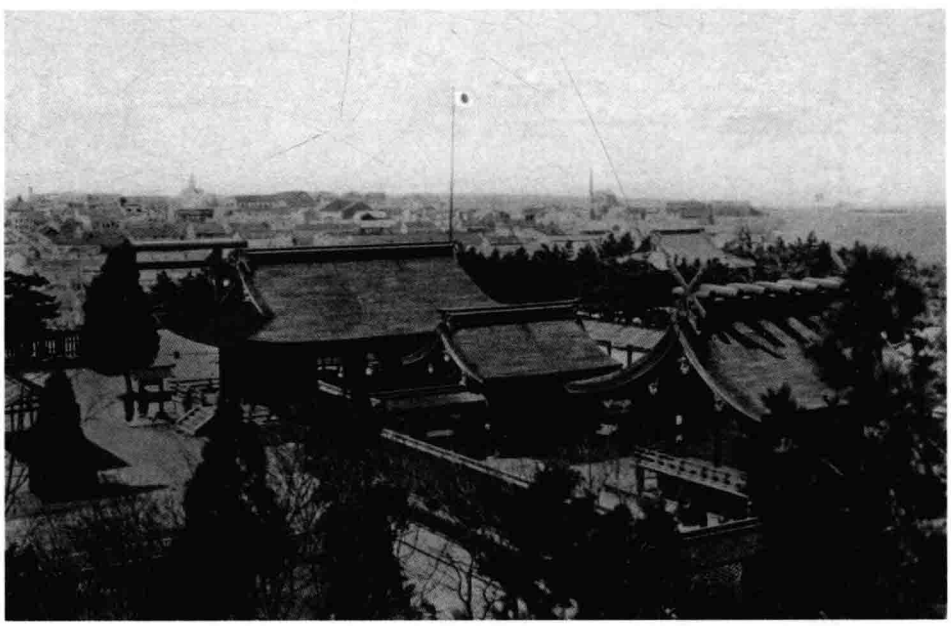
2 台湾日据时期的原始建筑——嘉义朴子东石神社的第二重鸟居。此鸟居是罕见的至今保存完好的台湾日据时期的神社建筑原物。〔洪致文：《阿里山森林铁路纪行》，第23页〕

3 重修后的桃园神社木制鸟居。〔洪致文：《阿里山森林铁路纪行》，第23页〕

1 桃园神社内的一座木亭。〔洪致文：《阿里山森林铁路纪行》，第 2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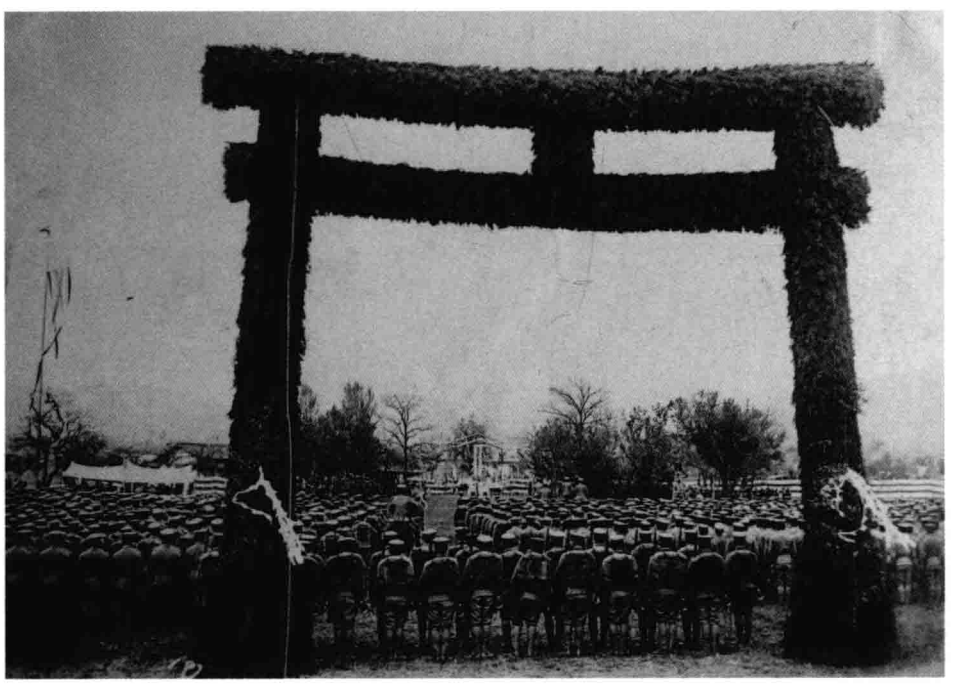
2 为强化文化宣传和渗透，1915 年 1 月，日占当局在青岛贮水山建立日本神社，强令路过山下的中国人向神社鞠躬。图为日本青岛神社全景。〔山下富吉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帖》，青岛礼品馆昭和十三年（1938）五月印刷，原书无页码〕

1



2

1



2

1 1928年，日军陆军第二师团登陆青岛，在进攻济南之前，首先前往青岛神社举行参拜仪式。由此可见，日军参拜神社是其军事侵略的精神动员。〔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886—887页〕

2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前参拜神社。〔赵晓林藏〕

■1 登陆青岛的日本海军参拜青岛日本神社。〔远藤一二：《青岛》，细谷真美馆昭和十四年（1939）12月5日印刷，原书无页码〕

■2 图为青岛神社门口的牌坊以及前来参拜的日本人。〔远藤一二：《青岛》，原书无页码〕

1

2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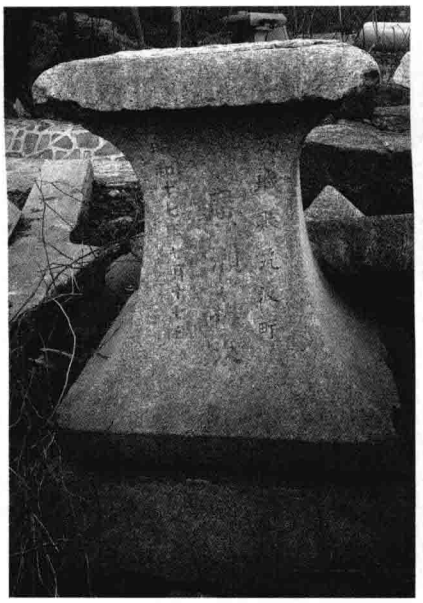
1 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山脚下，躺着两根约有9米长的花岗岩石柱，它们是1939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在这里建造的“济南神社”的遗存，即神社鸟居的两根立柱。〔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2 刻有“奉纳”字样的石碑。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奉纳”精神，就是蛊惑日本军人要“忠君报国”，无私“奉纳”自己的一切，包括年轻的生命。〔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3 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内，原济南神社被拆除后堆放在一起的建筑材料。〔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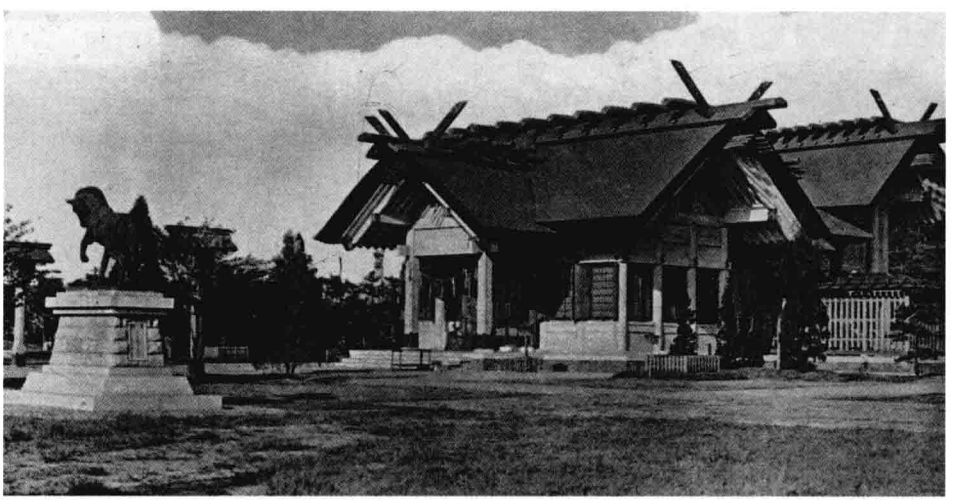
4 济南神社的一根修长的赭红色的石条上刻着一个“奉”字，另一侧的同样形制的一根石条上，则刻着一个“献”字。它们不是中国汉字，而是日文汉字。〔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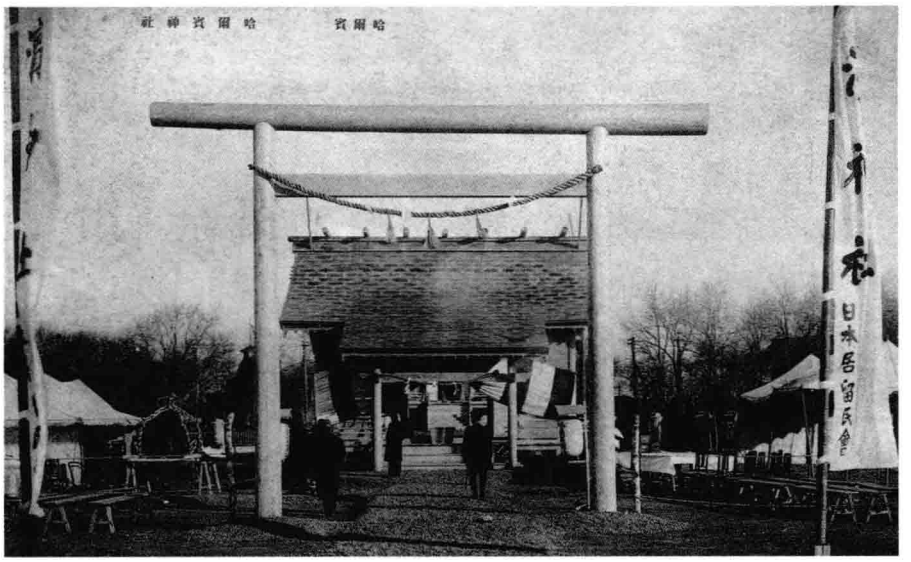
4

1 日本长野县人山崎武源太的墓碑。立碑的时间是“昭和十七年七月吉日”，即1942年7月的某日。此碑石材上乘，制作考究，墓主人山崎生前应该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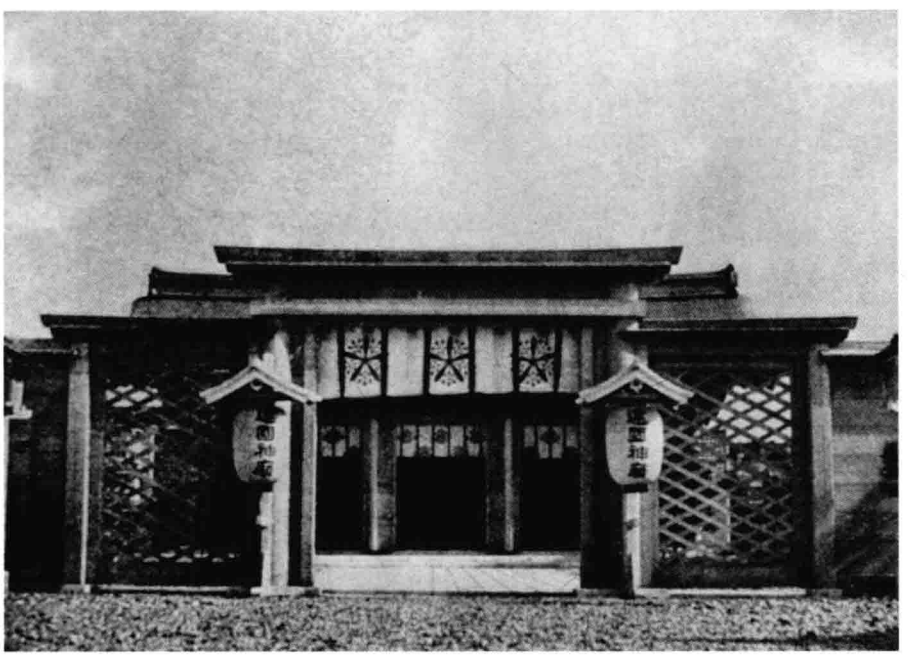
2 济南神社遗留下的茨城县筑波町人广濑森次的墓碑。1942年7月17日立。〔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3 这是日本冈山县人□□顺长的墓碑。立碑的时间是1942年7月7日。〔傅光中2014年12月18日拍摄〕

4 大连神社。1907年建成，主要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天皇。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规定关东州各级官吏、大连市民、中小学生等，要定期参拜。1945年日本投降后迁往日本山口县下关市。大连神社旧址现为大连外国语学院所在地。〔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137页〕



1



2

3

1 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的日本神社。〔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888—8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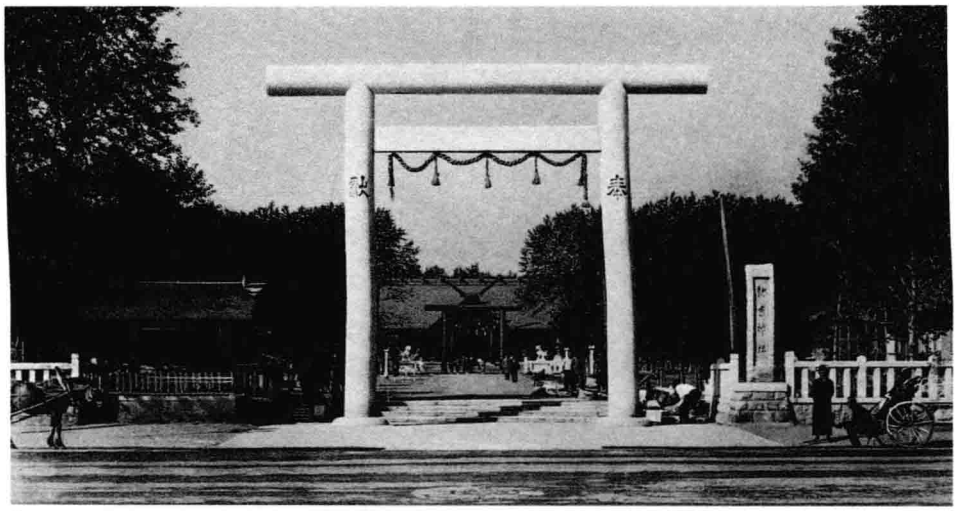
2 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后，奉关东军之意搬回了代表日本照国之祖的“天照大神”，并在伪满皇宫内供奉。〔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41页〕

3 日伪还在农村修建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强迫老百姓参拜。图为设在吉林敦化农村的小型神社。〔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第1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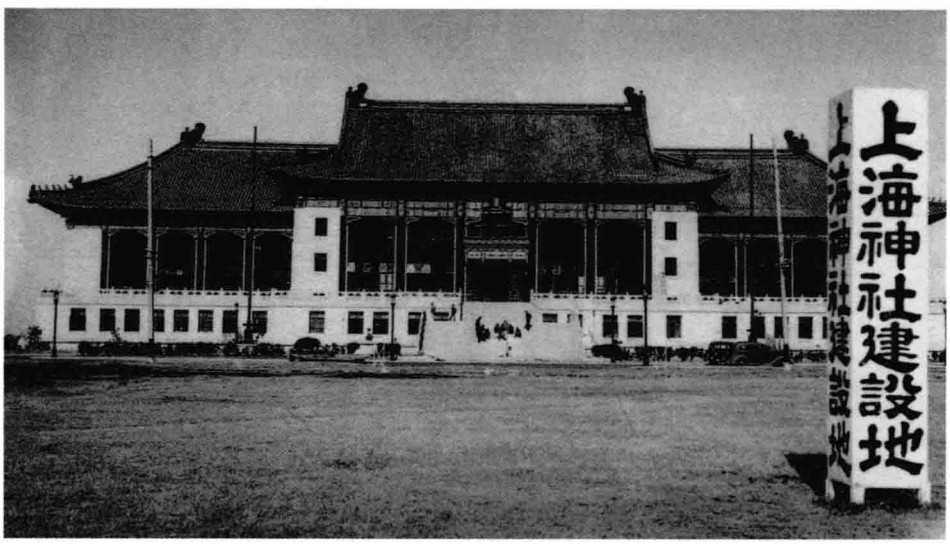
■1 日本侵略者在长春建造的“新京神社”。〔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882—883页〕

■2 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一年后就在上海市政厅前竖起“上海神社建设地”的牌子。〔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8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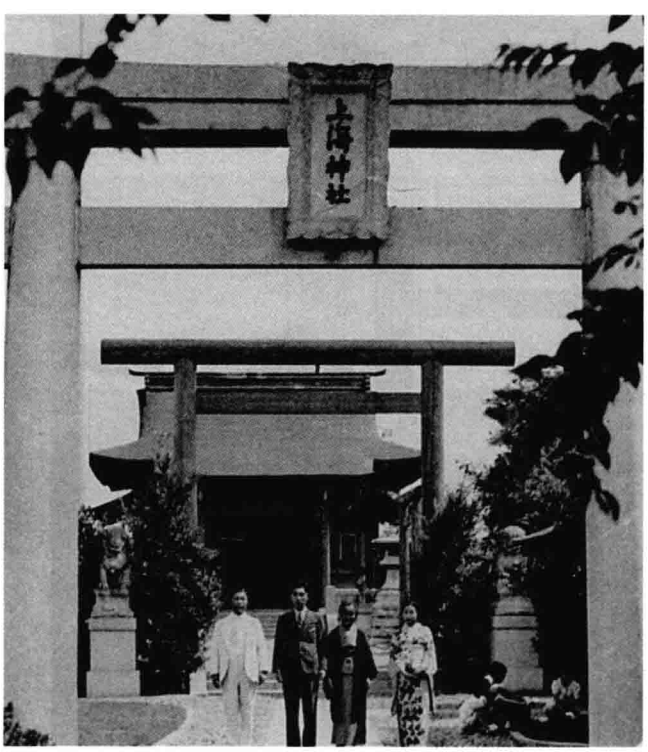
■3 建造精致的上海神社。〔王延友提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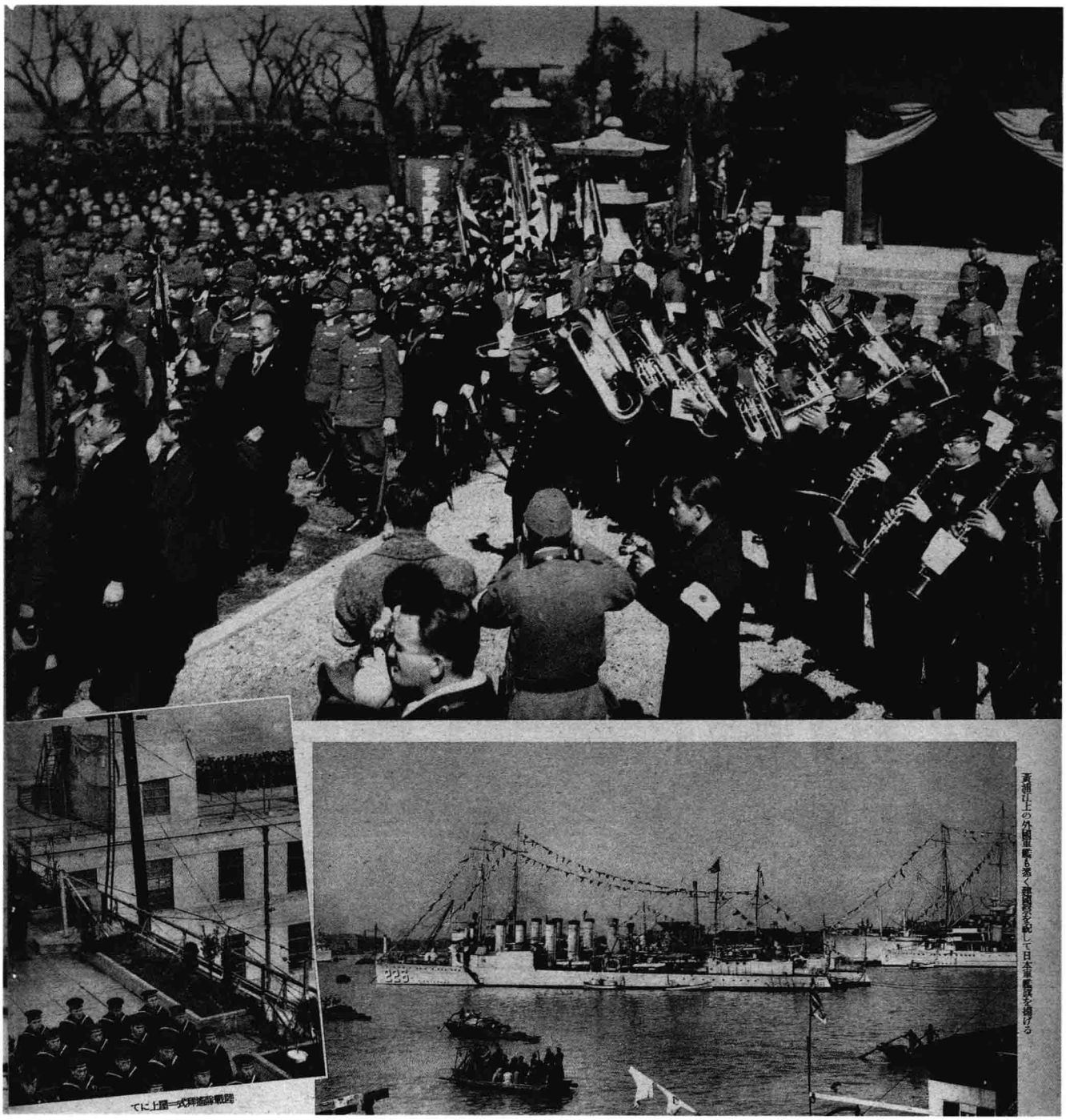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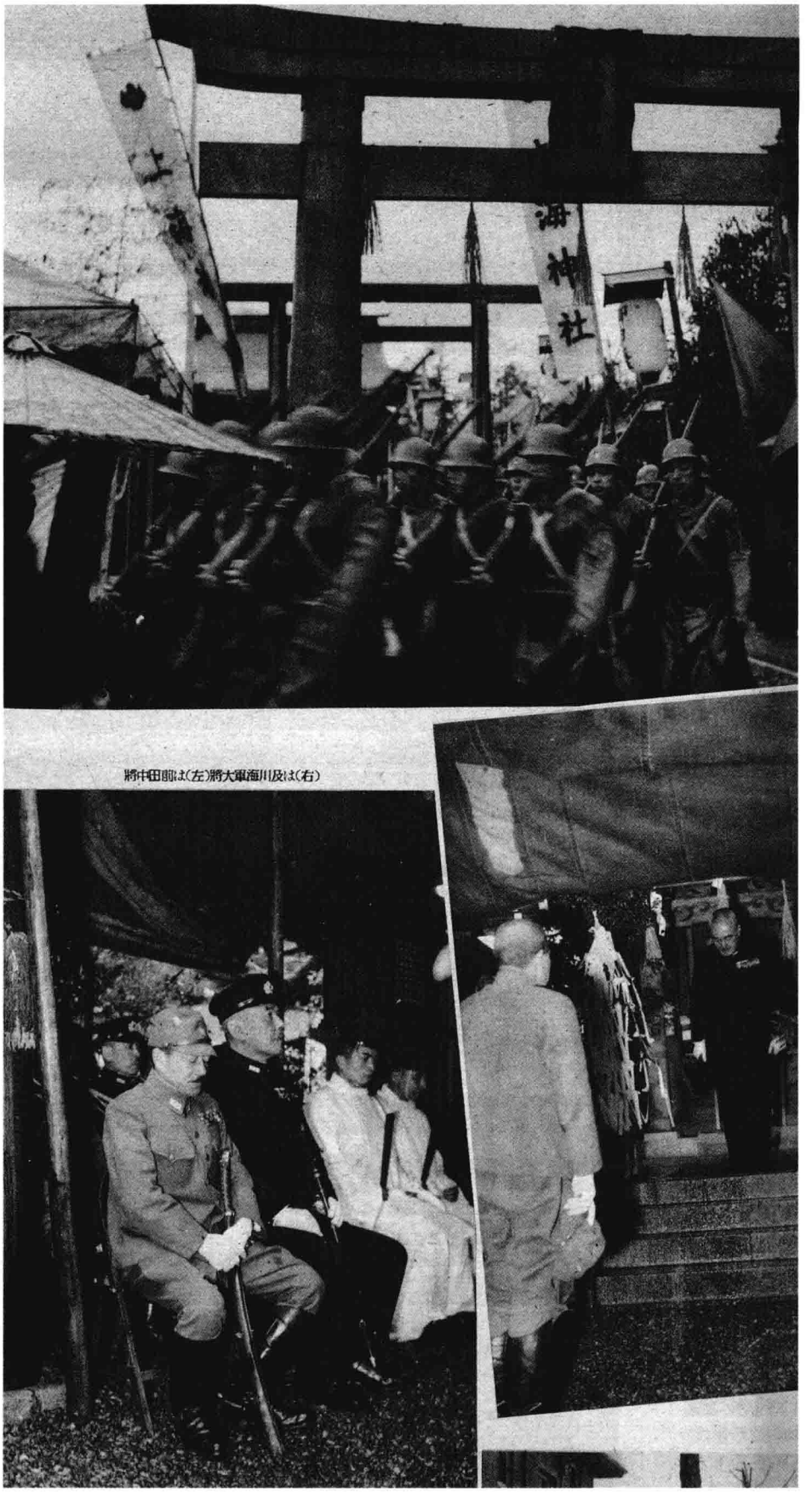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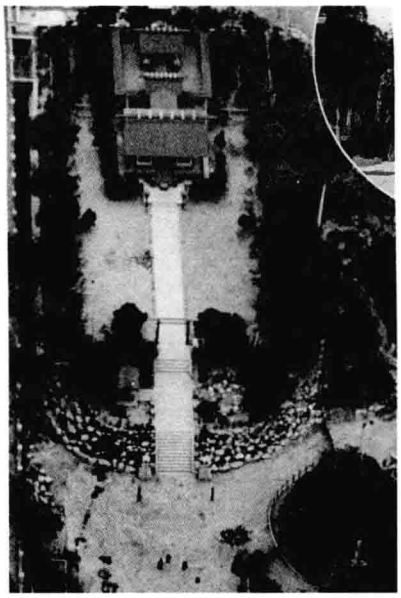
此二图反映了日本建国祭之日上海神社的场景。左图为日本建国当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本部门前情景；右图为1938年2月下旬的日本建国祭之日，松井石根参拜上海神社。〔《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29页〕



1938 年 2 月下旬，上海神社，参加日本建国祭的日本人合唱日本国歌（上图）。左下图为庆祝日本建国纪元节，在上海黄浦江停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遥拜仪式；右下图为日本军舰挂起彩旗时的场景。〔《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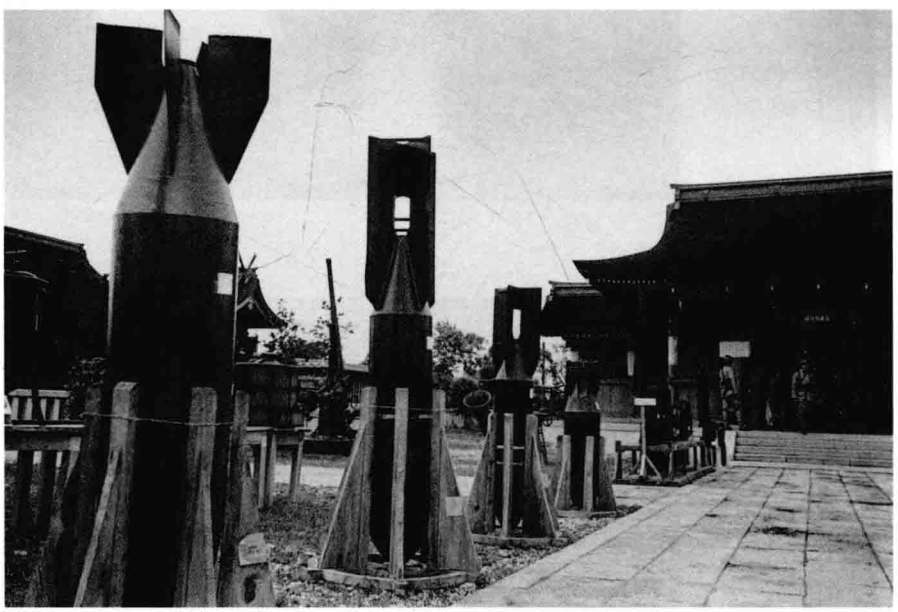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日军官兵参拜上海神社。〔《支那事变画报》，第79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3月20日发行，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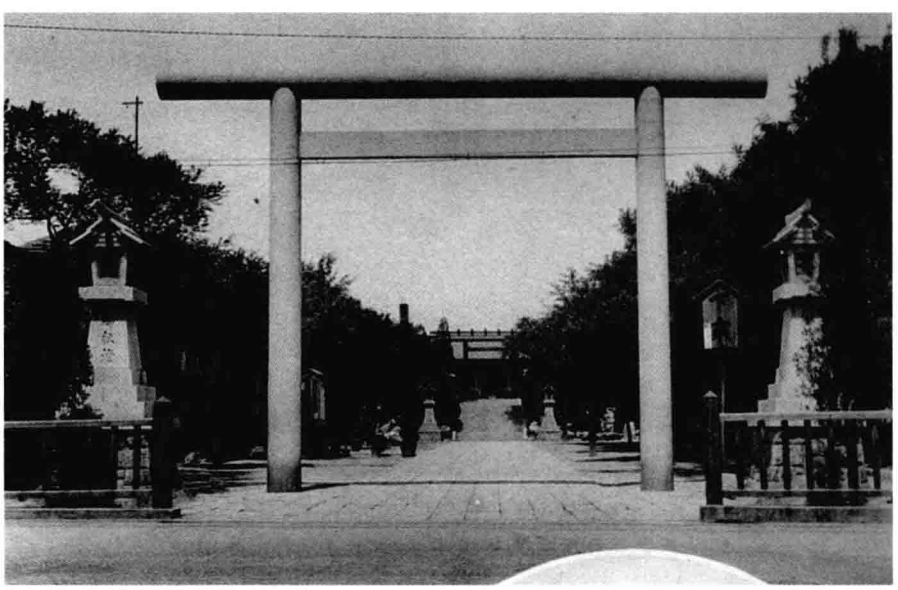


1

2



3



4

1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人建造的天津神社鸟瞰。〔王延友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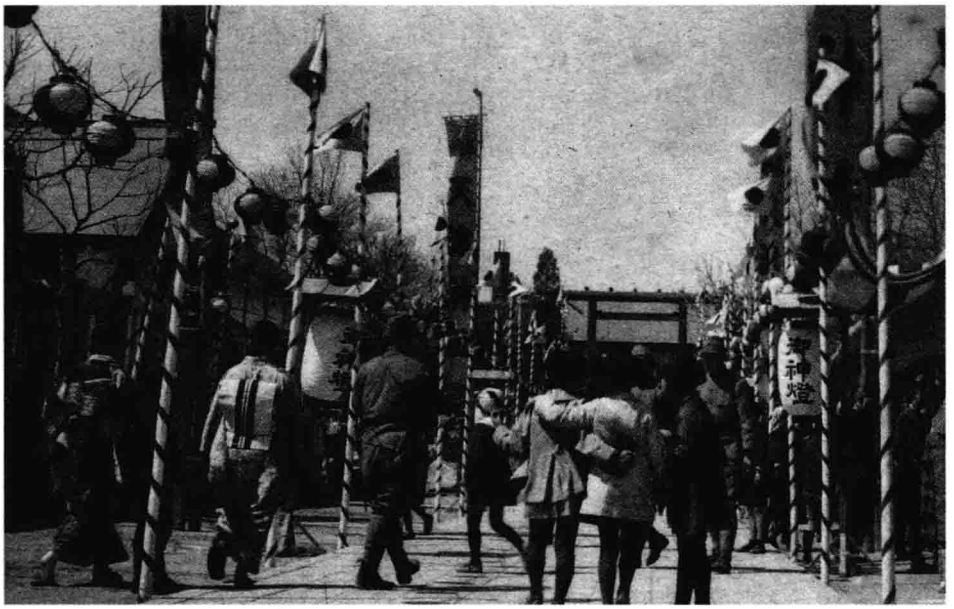
2 1946年，南京的日本神社被国民党当局改造成为“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888—889页〕

3 1946年，南京神社的一组附属建筑被改辟为“日军战利品陈列室”。庭院里倒立的是缴获的日军的炸弹。〔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890—8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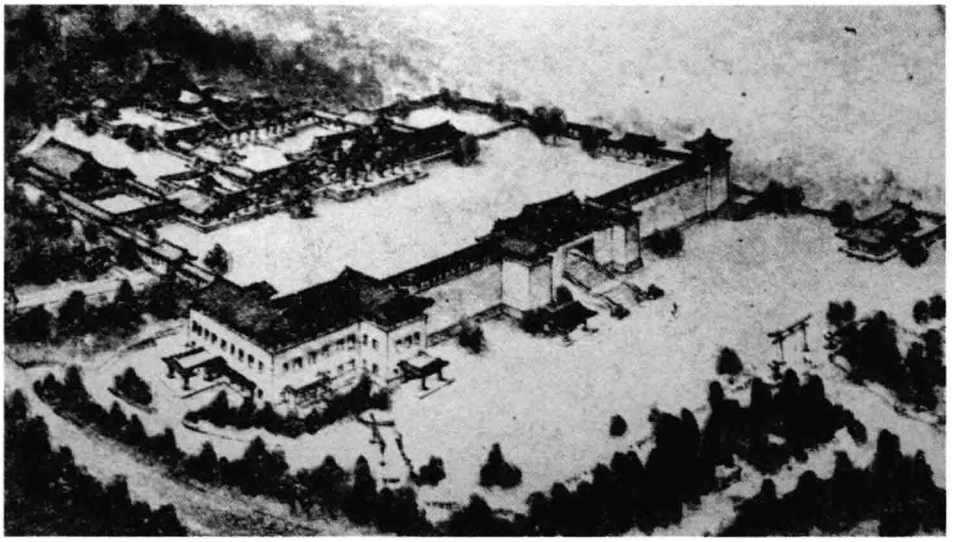
4 被日本人视为“森严”的天津神社。〔王延友提供〕

1

2



3



4

1 天津神社的拜殿正面。〔王延友提供〕

2 上海松江神社。〔王延友提供〕

3 1938年4月，日本天津神社的春祭的情景。前往春祭的有日本军人，也有日本侨民或随军家属。〔《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4 建在香港岛风水宝地的香港神社全景。原神社建筑在香港光复后被拆除。〔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之侵略写真图说》，（东京）大月书店1994年7月版，第138页〕

第三章

强化社会统治机构

平津失陷后，日军又调集重兵进攻河北与晋察绥，企图实现南北夹击，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从1937年8月起，日军在实施军事占领的同时，建立社会统治机构，以维护其占领区所谓的社会治安，妄图通过社会控制，实现其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战争长期化的要求，重新调整对华方针，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政策，建立伪政权，军事上大力整顿和加强汉奸军队，进行所谓“整肃（沦陷区）治安”，为日军提供军事支援和后勤保障。1939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治安肃正要纲》中强调：“为了恢复治安，首要的政策是恢复警察、保卫团和自卫团等组织的自卫力。”在此方针指导下，先后在各地成立了警备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实施军事镇压和社会控制。

一、设立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和伪军警武装

警备队是日伪统治其占领区的重要军事力量，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成为巩固统治维护各地治安的骨干力量。

华北伪政府警备队的装备和士气都高于华北伪政府正规军的大多数部队。他们一般都由当地日军部队直接控制，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装备。每一阶级的警备队员薪饷也比较高，每人每月配给食量 30 公斤，除 15 公斤粮价在薪饷之内扣除外，其余 15 公斤粮价在各县警备队点编整理结余款下或预备费内解决。各级警备队都配备有日本指挥官、教官，完全由日本人指挥。大多数时候是由日军军曹分队直接配属骨干，相应战斗力也比较强。在华北沦陷区，当时警备队总兵力为 95000 人，其中装备步枪 79000 支，轻重机枪 230 挺，手枪 5000 支，自动步枪 400 支。为与日军和华北治安军相区别，警备队通常着装为黑色制式军服。1939 年 8 月 12 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治安部保卫团、警察队改编为警备队，随后公布的《县警备队编成暂行规定》和 10 月 13 日公布的《县警备队编成暂行规定》补充附件，明确规定“县警备队专任讨伐与警备，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司法警察业务”。1943 年 5 月底，为适应华北政务委员和伪中央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的权限调整，同时与日本警备队名称相区别，华北伪政权制定了《保安队暂行编制规则》，警备队改称保安队，重新进行了改编，成为日军统治华北的重要力量。

冬季耐寒行军演练，日军驻北平守备队在前往通州的途中。〔徐宗懋提供〕

（一）关内占领区设立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和伪军警武装

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关于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日军警备队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的报道。左上角照片：1937 年 7 月 31 日，站在河北日军通州守备队大门顶上进行警戒的日军警备队士兵；中右侧照片为伪冀东政府通州保安队队长（穿白长衫者）；左下为当时的通州城城楼以及城墙下的广升煤栈。〔《支那事变画报》第 2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7 年 8 月 15 日发行，第 27—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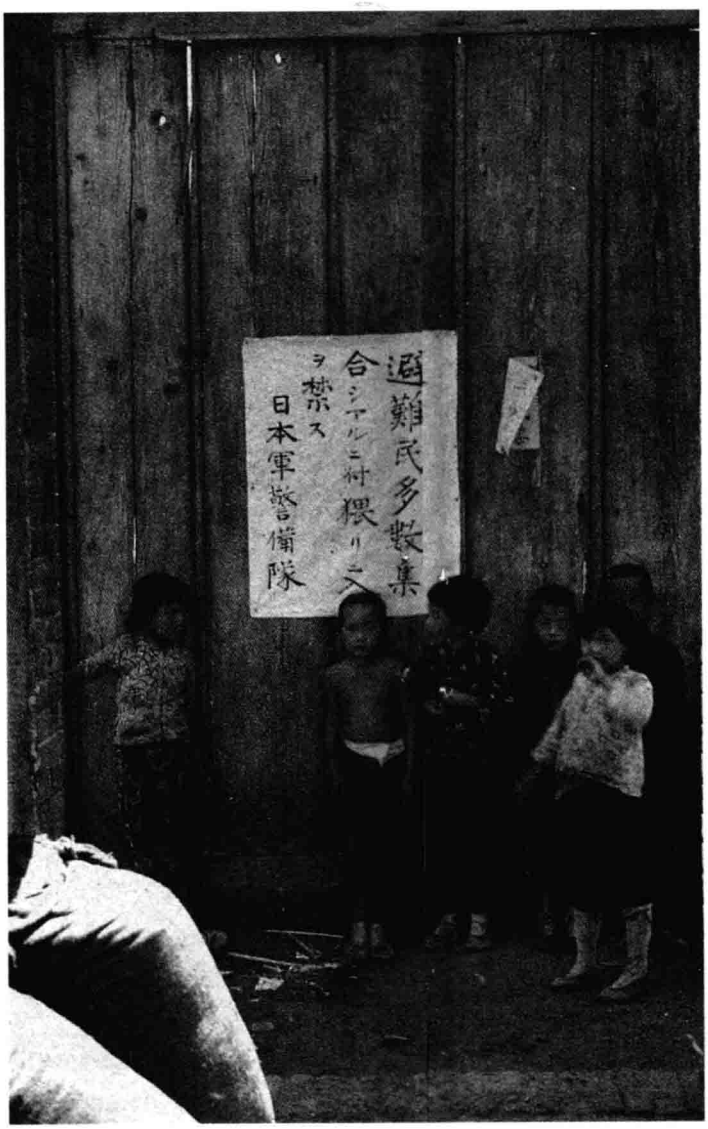
1937 年 8 月初的日军通州守备队军营大门。画面左下方还有防御用的沙袋堆起的掩体。〔《支那事变画报》第 3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7 年 8 月 30 日发行，第 23 页〕

1937 年 7 月底 8 月初，被日军解除武装的伪冀东政府通州保安队。〔《支那事变画报》第 2 辑，第 26 页〕

1　1937 年 8 月，伪唐山冀东自治政府下辖之唐山保安队分列式。〔《支那事变画报》第 3 辑，第 30 页〕

2　1937 年 9 月初，沧州清县，被收容在日军警备队设置的难民营中的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 7 辑，第 22—23 页〕

1



2

1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占领镇江后，利用汉奸人员组建起伪自治会巡逻队，协助日军管控社会治安。〔《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20页〕

2 1938年3月上旬，上海宝山县（今宝山区），中国姑娘为驻守县城内的日本警备队军官缝补衣服。日本画报刊登这幅照片，目的是宣传中国百姓对日军的“欢迎”态度。〔《支那事变画报》第21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3月11日发行，第3—4页〕

1

2

1

2

3

4

1 1938 年 3 月，从伪临时政府自卫队总队队部走出的伪军大将何丰林。〔《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 27 辑，第 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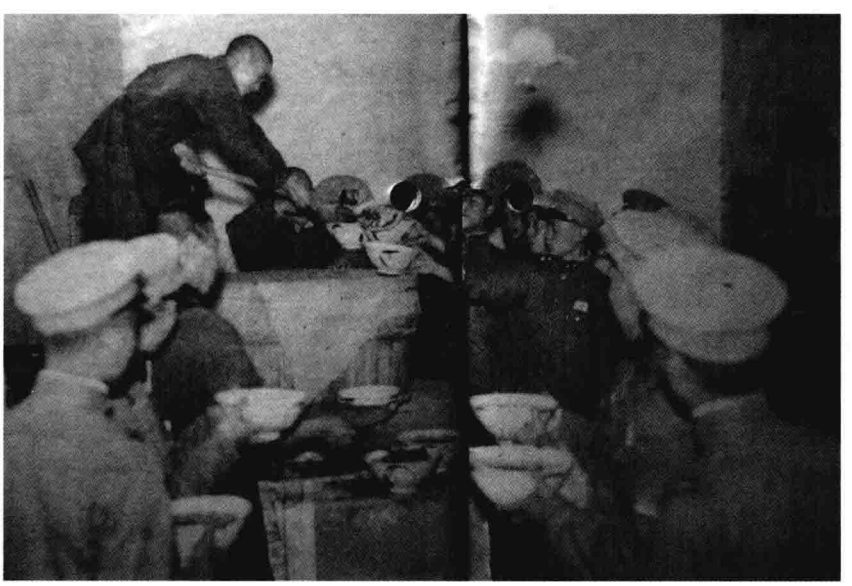
2 1938 年 3 月，伪临时政府自卫队兵营休息室参加读书活动的卫队士兵。〔《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 27 辑，第 6 页〕

3 1938 年 3 月，伪临时政府自卫队总队军乐队。〔《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 27 辑，第 6 页〕

4 1938 年 3 月，受日本教官训练的伪临时政府自卫队总队队列。〔《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 27 辑，第 6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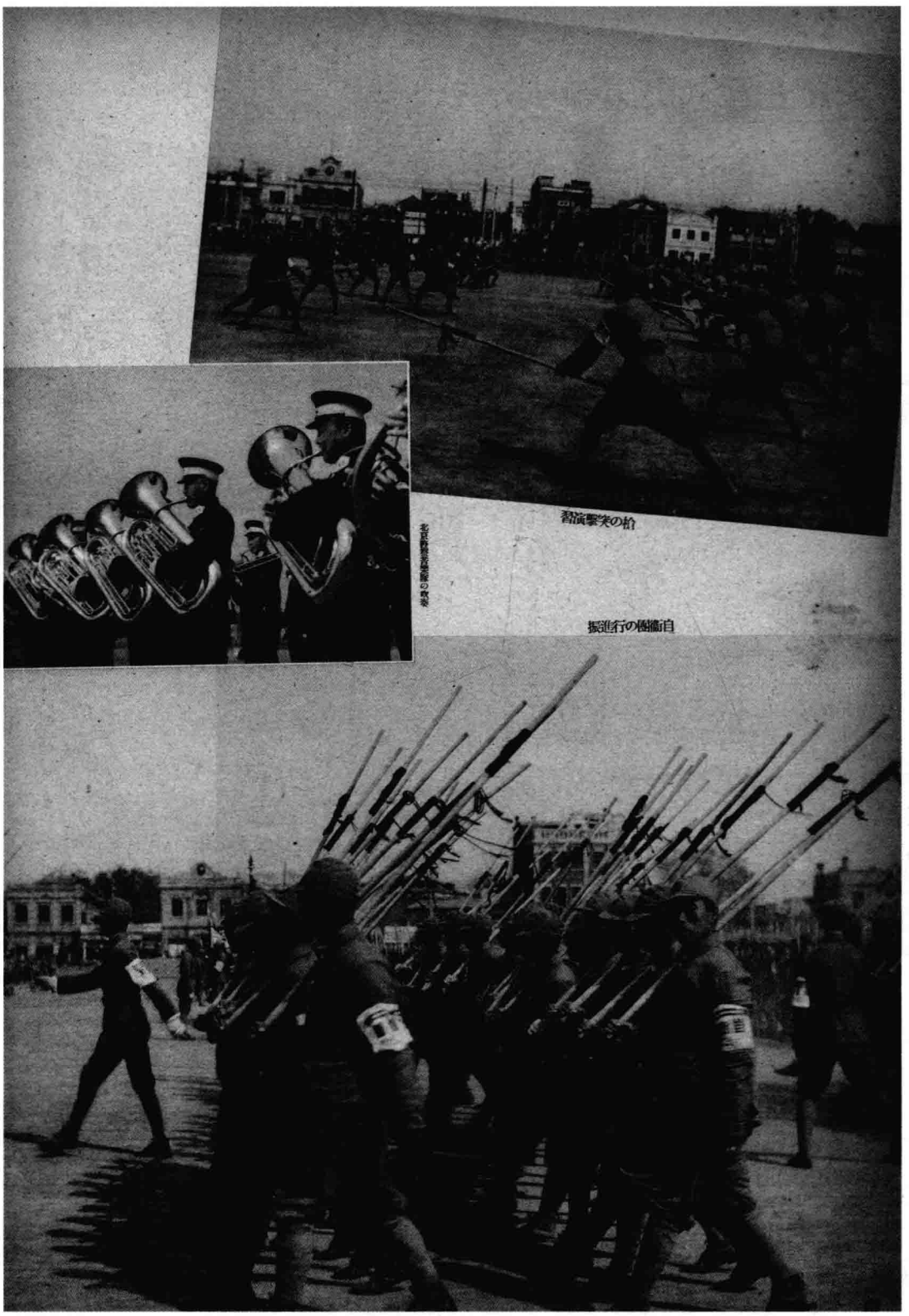


3

1 1938年3月，日军教官植田少尉给自卫队将校军官授课。〔《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27辑，第7页〕

2 1938年3月，伪临时政府自卫队列式。〔《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27辑，第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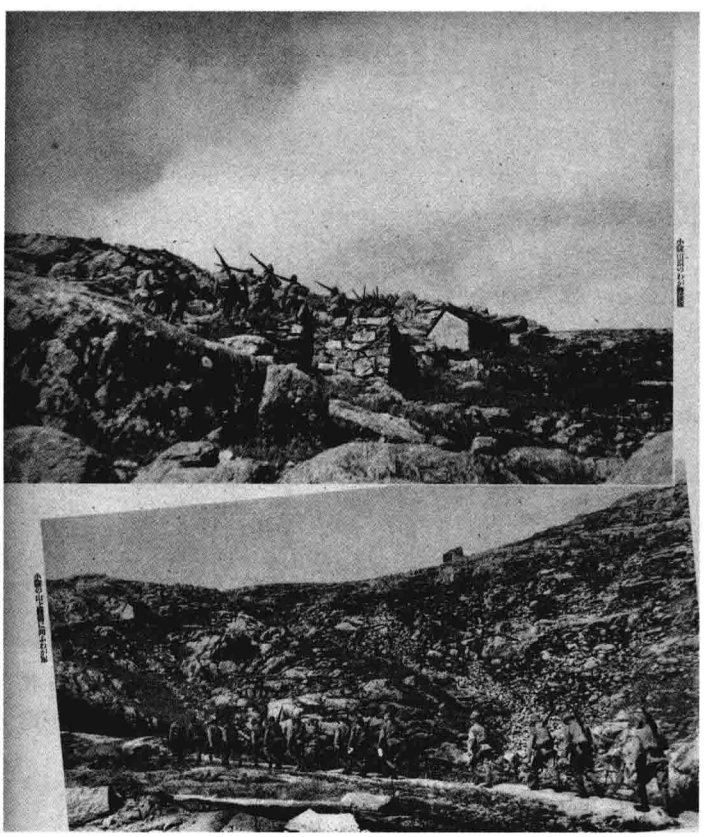
3 伪临时政府自卫队士兵领晚餐。〔《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27辑，第6—7页〕



1938 年 4 月，右上图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辖之伪北京自卫团练习枪刺搏击，下图为该自卫团演练行进队列，左中图为正在演奏的北京警察乐队。〔《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0 页〕

反映伪北京自卫团训练及日伪高官检阅伪北京自卫团的一组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1 页〕

日本画报对日军驻怀远警备队之报道之一。左上图为1938年8月下旬，被洪水浸泡的日军怀远警备队本部入口；下图为驻守怀远荆山的日军荻野部队利用掩体进行警戒，提防抗日武装的进攻。〔《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8页〕



1938年8月下旬，日军警备队在皖北活动的情况。上图为在小陵山顶行进的日军警备队；下图为负责小陵山顶警戒的日军警备队向山顶前进。〔《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9页〕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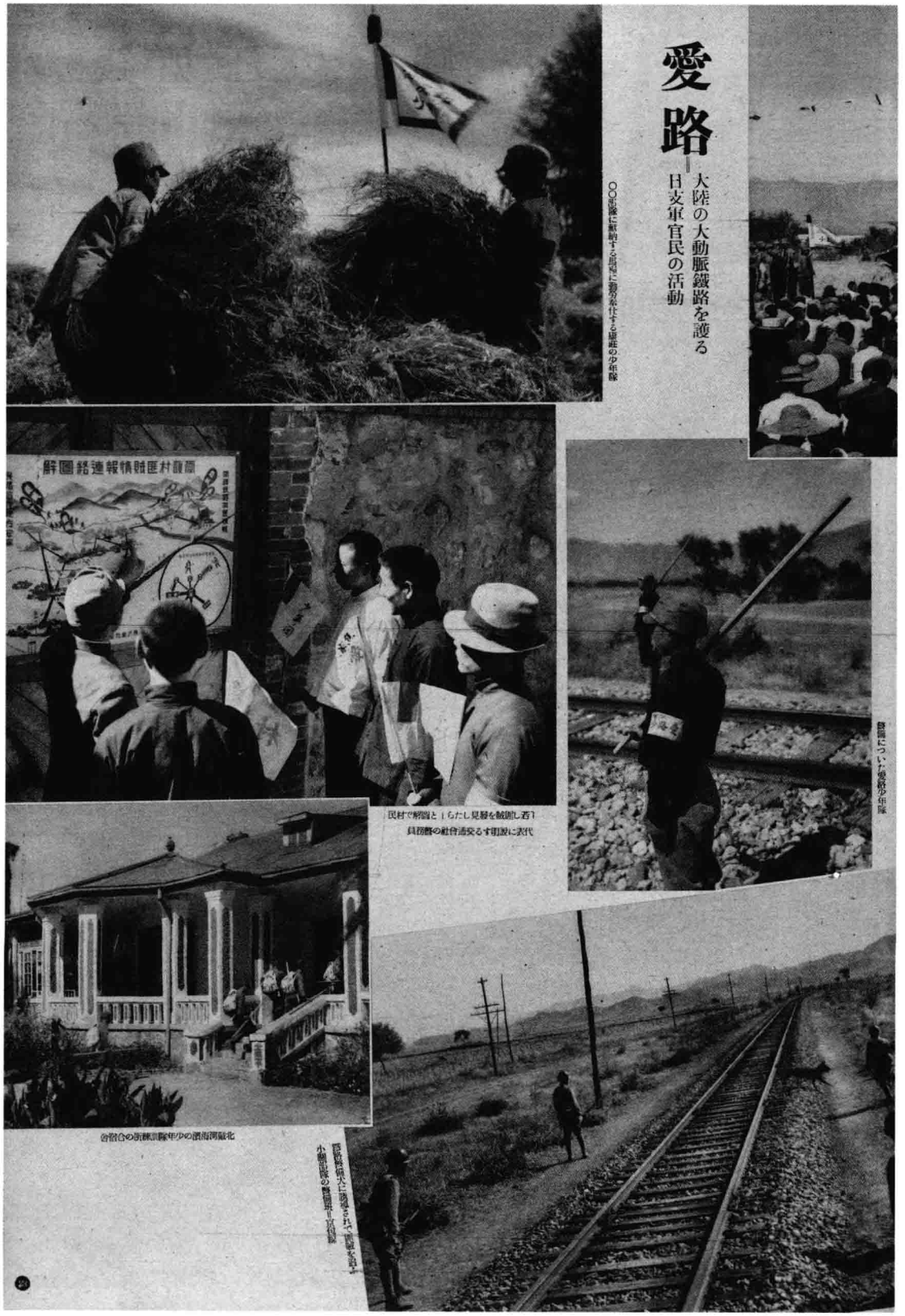
1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海防空虚的情况下，从大亚湾登陆占领广州。这是广州街道上，日军警备队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的情景。〔http://news.163.com/05/0607/12/1LL6KRHR00011247.html，2005年4月30日〕

2 1938年12月中旬，北京城门口两名伪警察队女警察拦住一名乘坐黄包车的中年妇女进行搜身，并检查其随身携带的物品。〔《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12月21日发行，第25页〕

3 伪临时政府自卫队进行射击训练。〔《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27辑，第7页〕

4 日本济南警备队军官齐藤清。1944年2月下旬，他在济南市外马鞍山附近斩杀2名中国宗教界人士。同月，在其上司的指挥下在城外警察署内严刑拷问并杀害了6名中国平民。〔李占江：《齐藤清：大规模逮捕监禁平民》，《大众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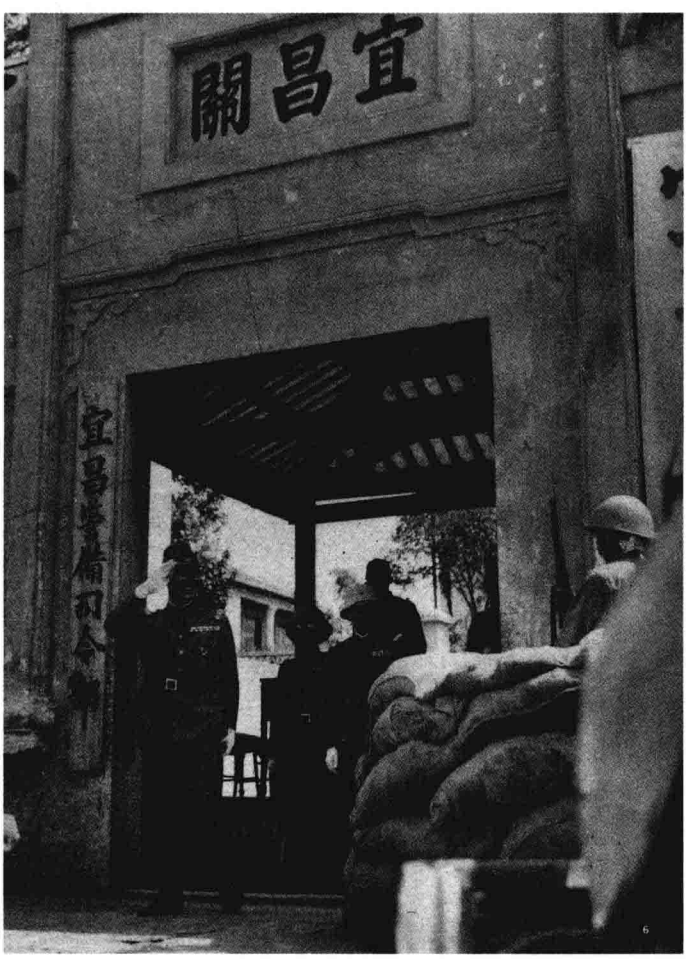
1939 年 1 月，日本新闻画报记录日本广浦海军防备队附属之长州小学校开学典礼的一组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 52 辑，第 8 页〕



1939 年 10 月，为保障中国大陆铁路线的畅通，日伪当局除了动用铁路守备队等常规武装外，还蛊惑中国青少年组建了“爱路少年队”，协助日军守护铁路安全。图为《支那事变画报》发表的一组有关日伪军政人员在京包线、北戴河等地举行“护路护村”活动的报道。〔《支那事变画报》第 69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10 月 20 日发行，第 23 页〕

1939年10月20日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日军铁路警备队以及伪爱路少年队所谓的“护路”活动内容。〔《支那事变画报》第69辑，第22页〕

1



2

1 1940年6月中上旬，日军占领宜昌后在城内设置的警备司令部。〔《支那事变画报》第84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6月12日发行，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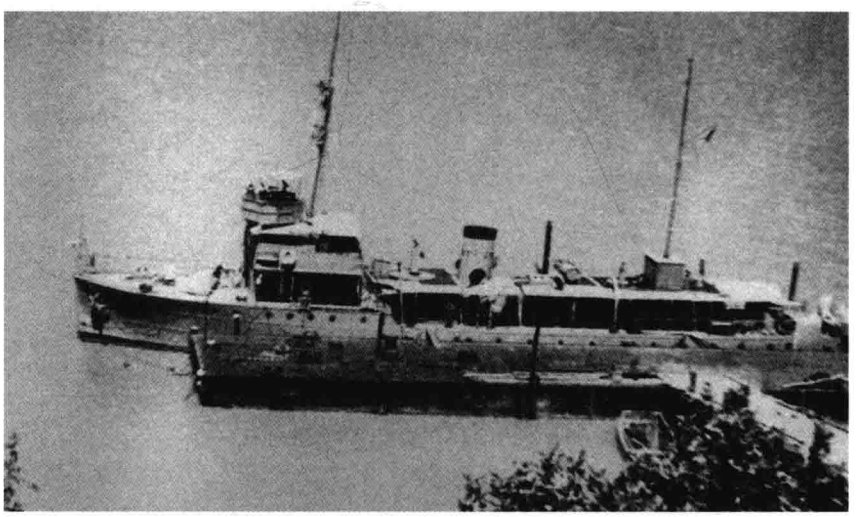
2 1940年9月中上旬，日军军官视察宜昌警备司令部。〔《支那事变画报》第8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9月20日发行，第6页〕

1 1940年9月中上旬，日军军官在警备队官佐的陪同下从宜昌方面眺望长江对岸情况。〔《支那事变画报》第84辑，第6页〕

2 九江日军水上警备队使用的俘获于中国海关的“文星”缉私艇。〔萨苏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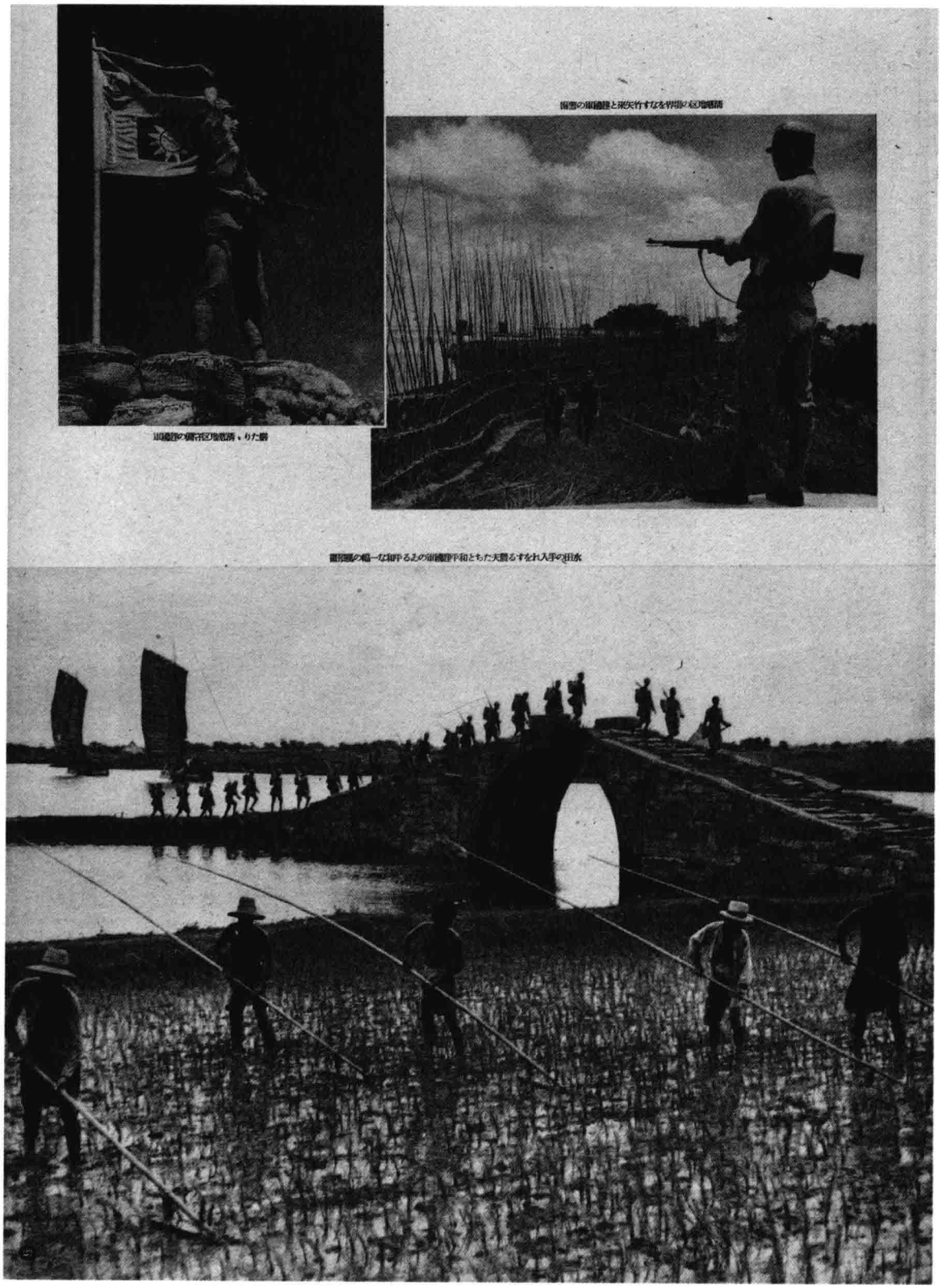
3 1940年8月，日伪军在坦克掩护下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支那事变增刊》第35辑，第30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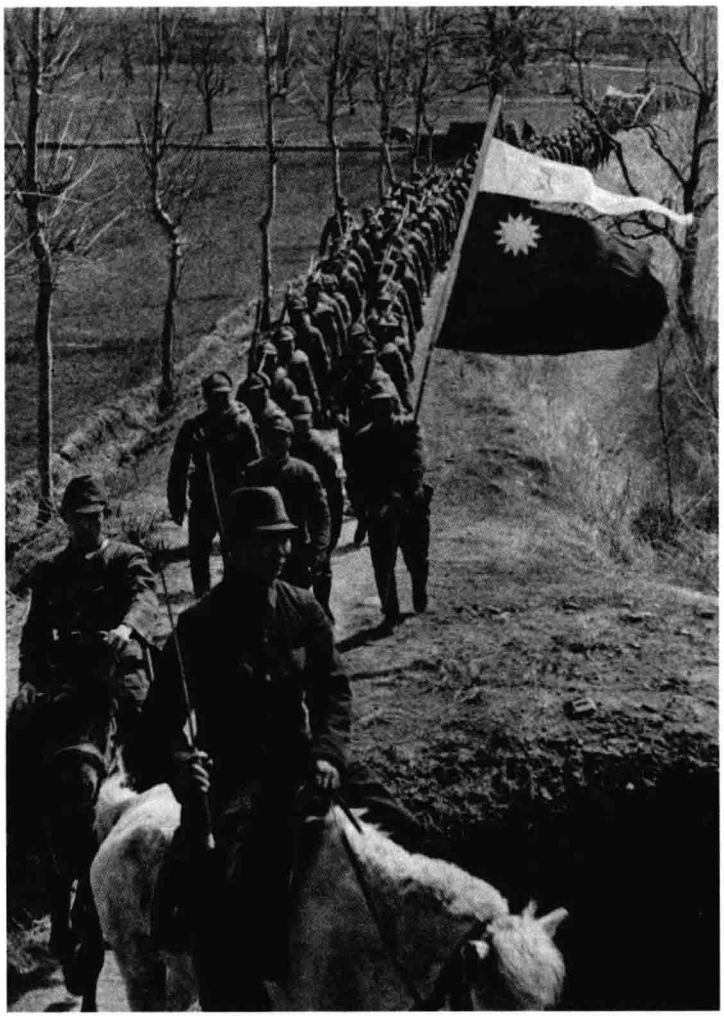


2

3



1941 年 7 月中上旬，参加“清乡”活动的伪建国军站岗、巡逻的情景。〔《支那事变画报》第 97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41 年 7 月 20 日发行，第 23 页〕



1

■1 1940年8月，为虎作伥的伪和平建国军。〔《支那事变增刊》第35辑，第31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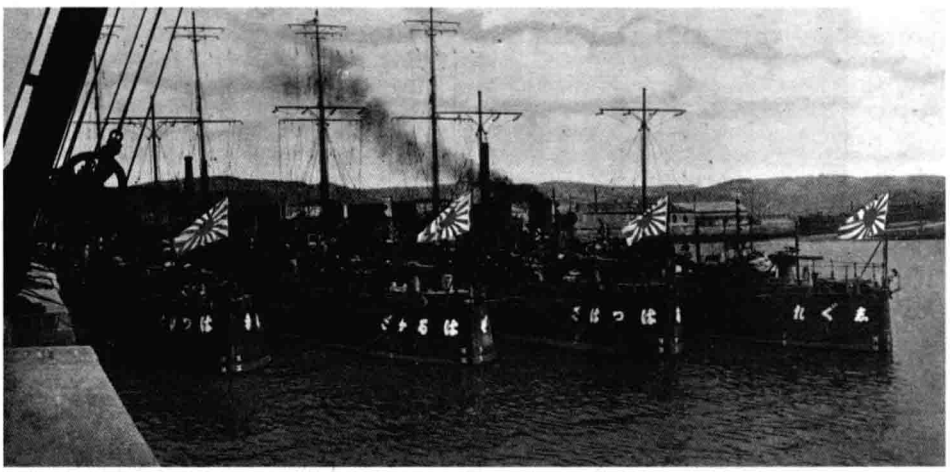
■2 1942年8月，日军某部与伪吴江县警备队在“清乡”时大肆收缴民间武器，并将其所谓“战利品”进行展示，以炫耀“清乡”之成果。〔王延友提供〕

1938年7月，有关日军杭州警备部队活动的一组新闻照片。〔《支那事变画报增刊》第20辑，第29页〕

（二）各个殖民地设立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和伪军警武装

1. 大连（1905—1945）

1 停泊在旅顺东港内的日本警备驱逐队。〔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 10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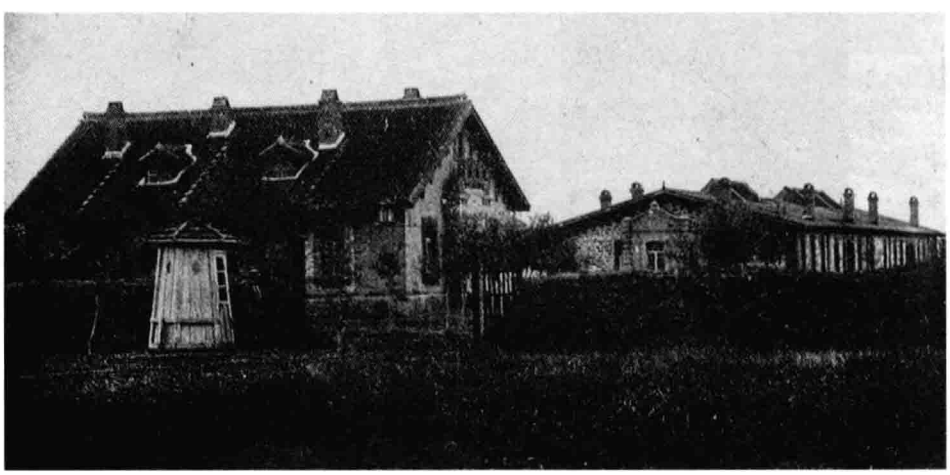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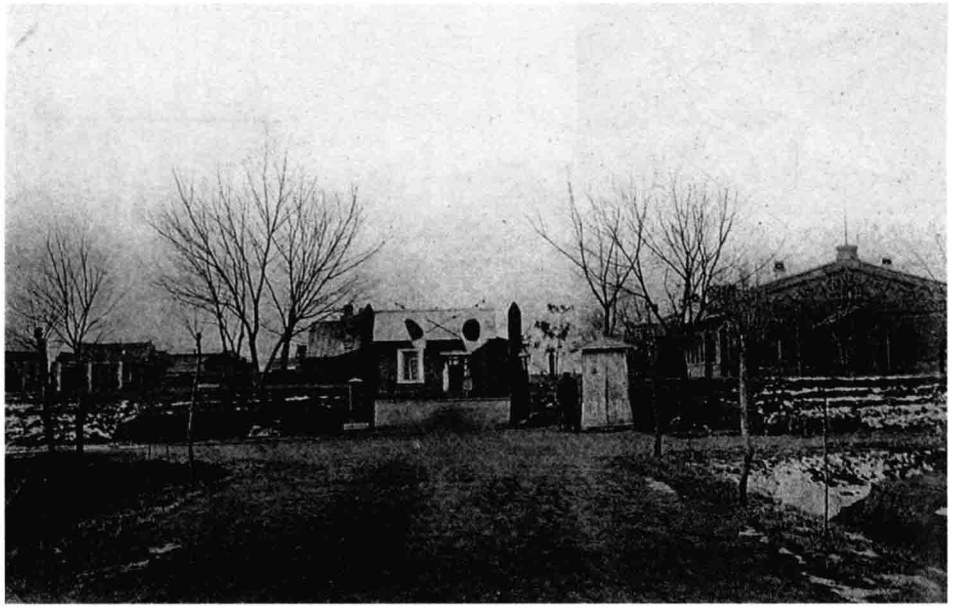
2 关东军大连宪兵分队本部。〔唐功春主编：《旧明信片中的老大连》，第 12 页〕

2

3 日军烟台守备队营房。〔守屋秀也：《南满洲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3



1

1 关东军海城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2

2 关东军铁岭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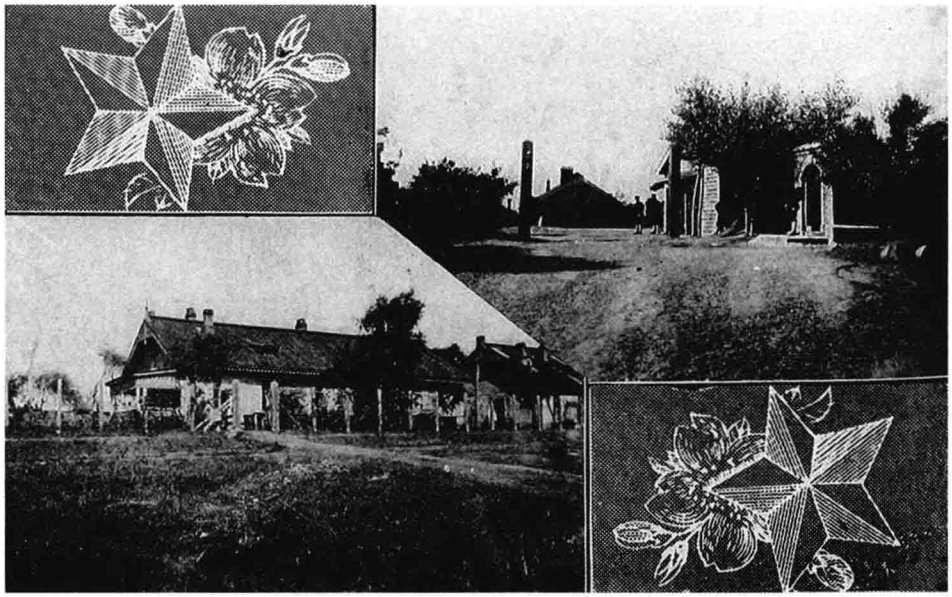
3

3 关东军公主岭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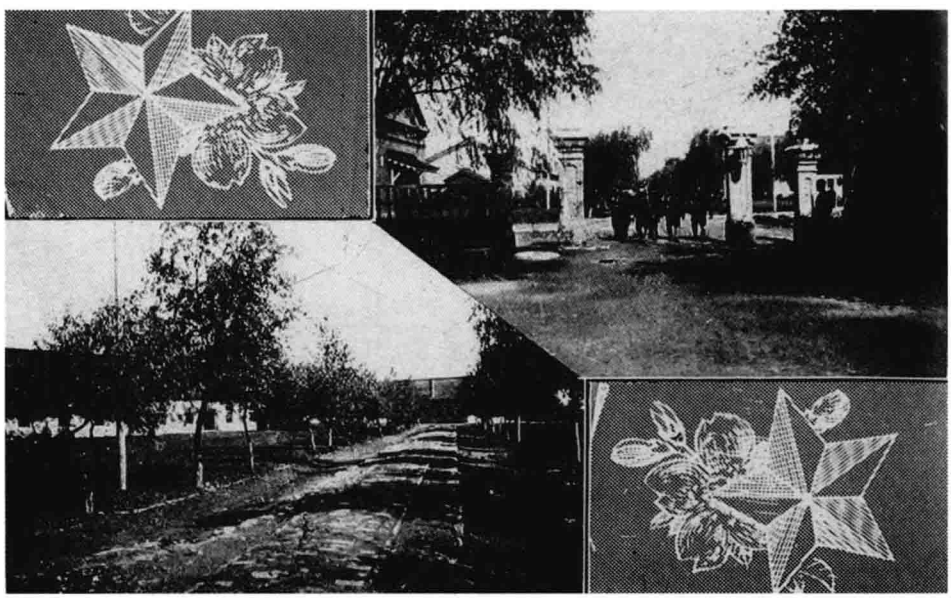
1 关东军郭家店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2 关东军开原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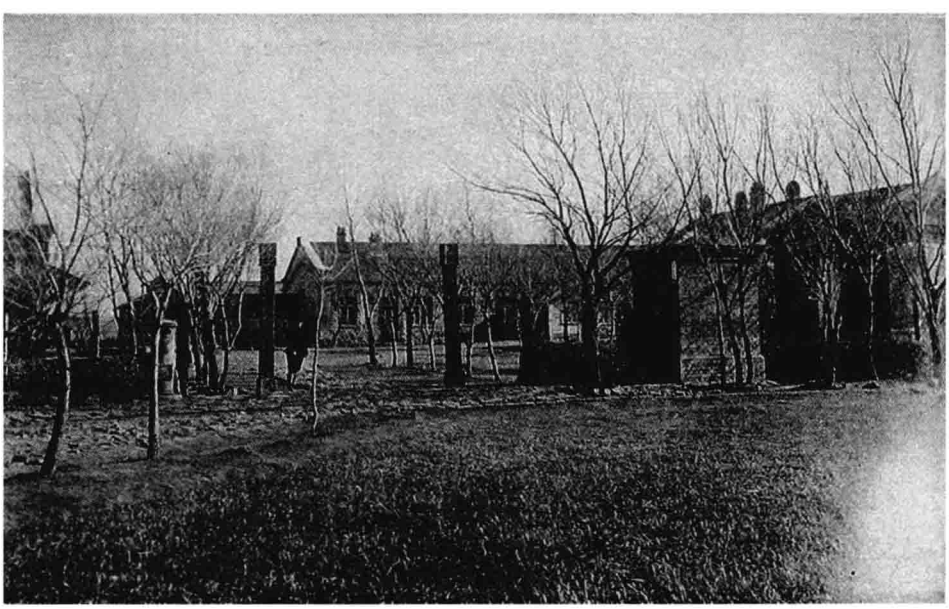
3 关东军昌图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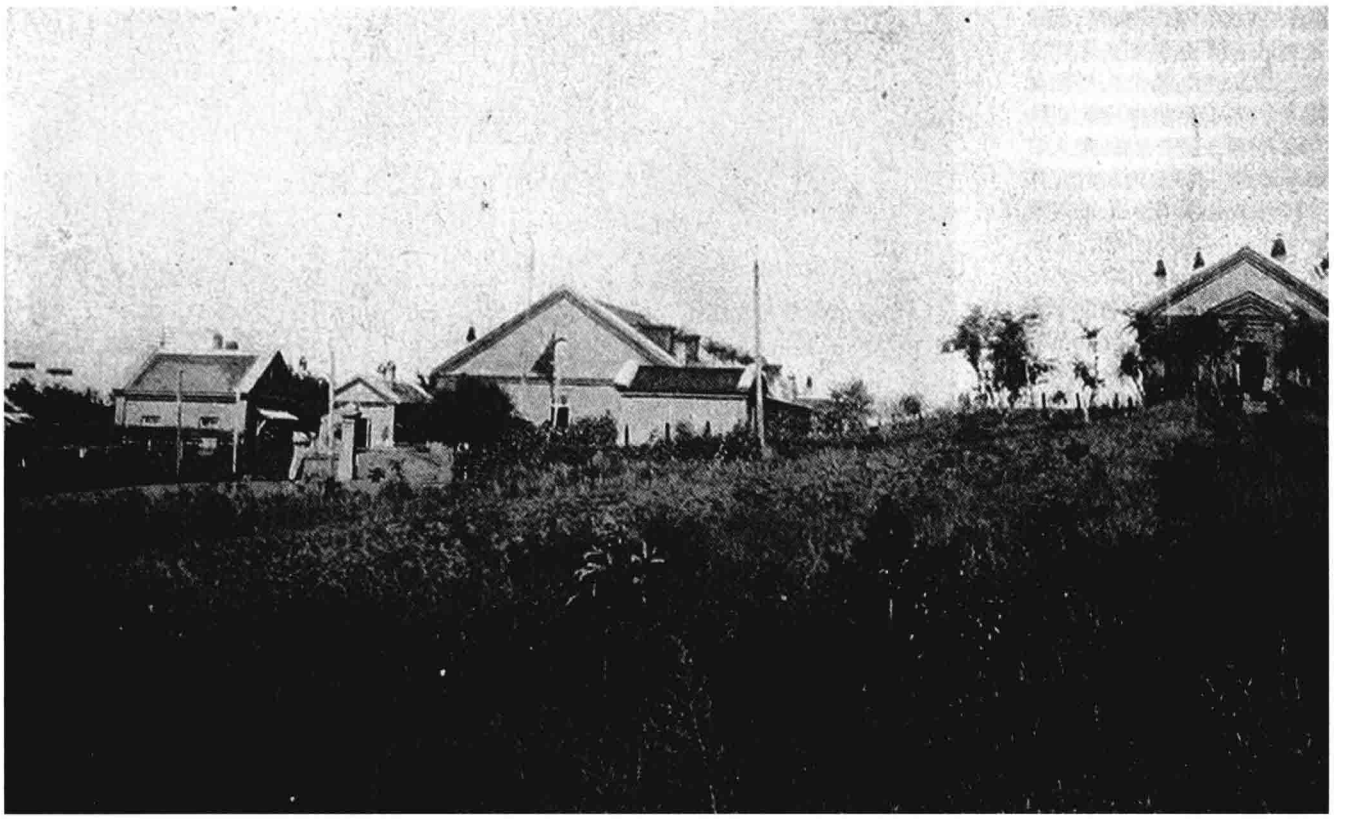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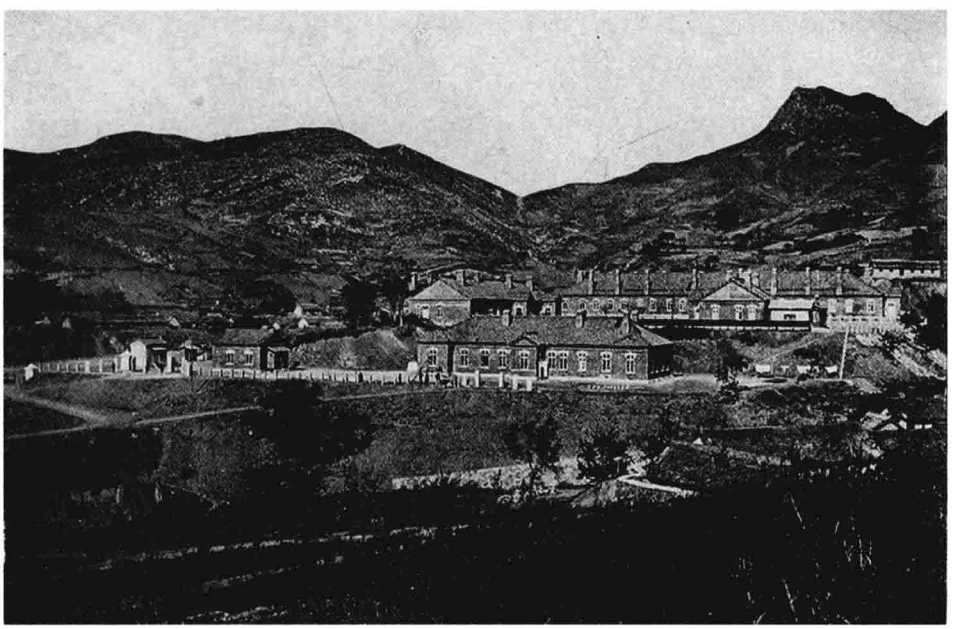
2



3



1



2

1 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2 关东军本溪湖守备队军营。〔守屋秀也：《〈满洲日日新闻〉创刊满十周年纪念写真帖》，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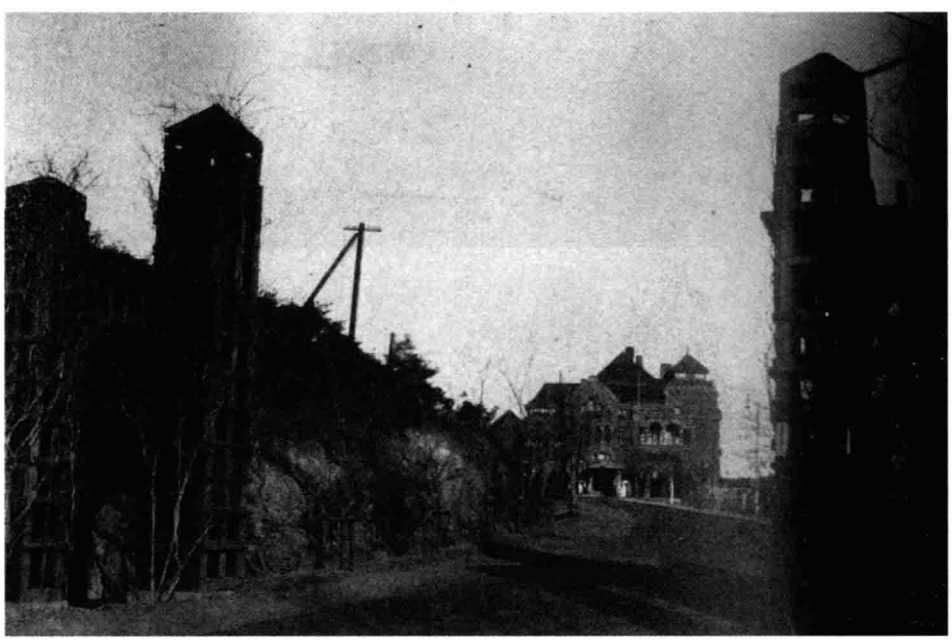
2. 青岛（1914—1924）

1

1 1914年11月26日，日本宣布在青岛设守备军司令部，任命独立第十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神尾光臣为守备军司令官，青岛进入日本军政府占领统治时代。图为神尾光臣头像。〔王廷友提供〕

2

2 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原德国胶澳总督府旧址）。〔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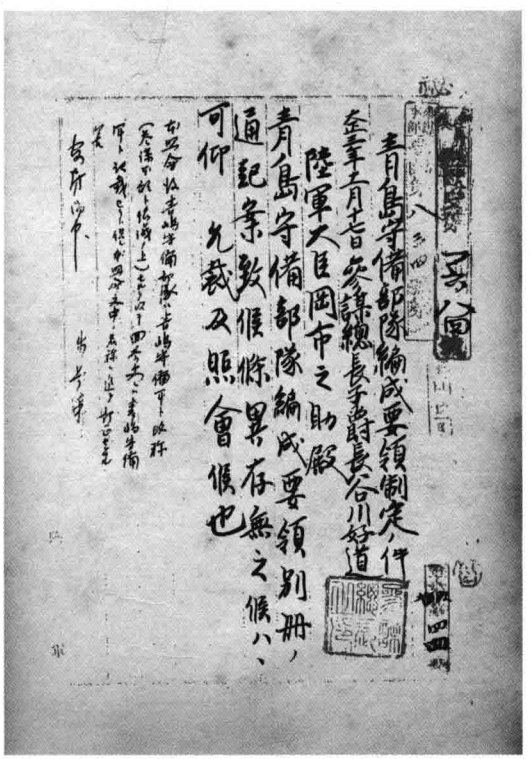


3

3 日本占领后，将位于信号山麓（日本占领时期称神尾山）的原德国总督官邸改为守备军司令官官邸。图为官邸（现名为迎宾馆）院门。〔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103页〕

1

1 青岛守备军水上宪兵分队及港务所旧址。左上角人像为水上宪兵分队长、宪兵中尉冈村铁彦，右上角人像为港务所主任毛利文治。〔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 111 页〕



2

2 1914 年 11 月 21 日，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青岛守备部队编成要领制定件》。〔青岛市档案馆藏，B5-1-109〕

1 青岛日本军政长官竹内纠夫（1866—1917）。日本占领青岛后，他被任命为日军驻青岛军政长官，升任少将，1917年病死于青岛。〔龙口乙三郎编辑兼发行：《青岛纪念写真帖之青岛军政纪念水道部》，东京市京桥品南大工町五番地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五日四版发行，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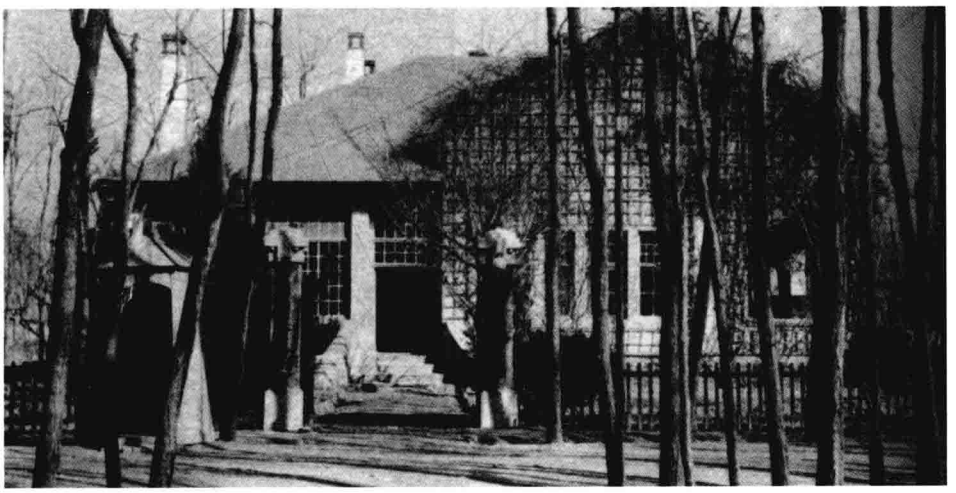
2 青岛守备军陆军部部分官长。〔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2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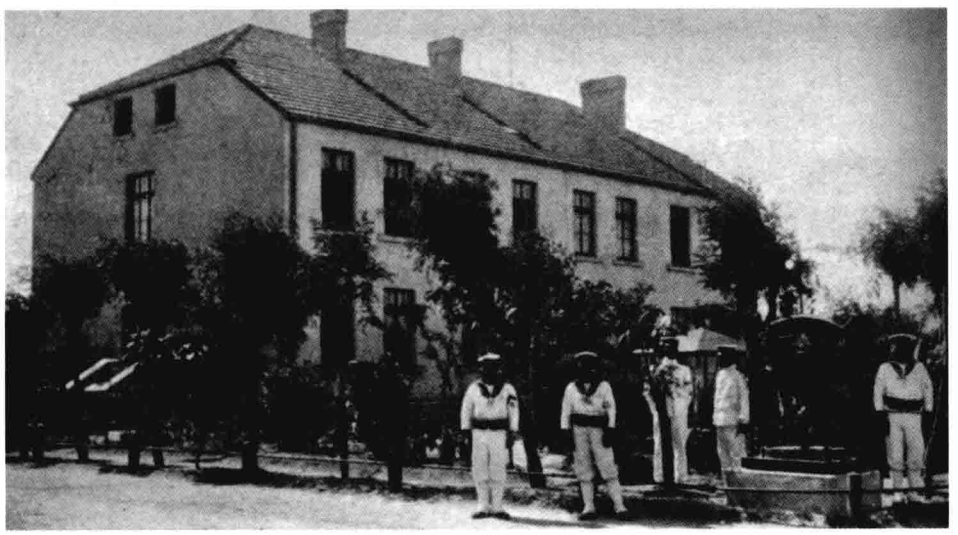
1

■1 青岛防备队司令部海军人员。〔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4页〕



2

■2 日本青岛陆军守备队军营。〔赵春光主编：《历史的烙印——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陈列展览纪略》,(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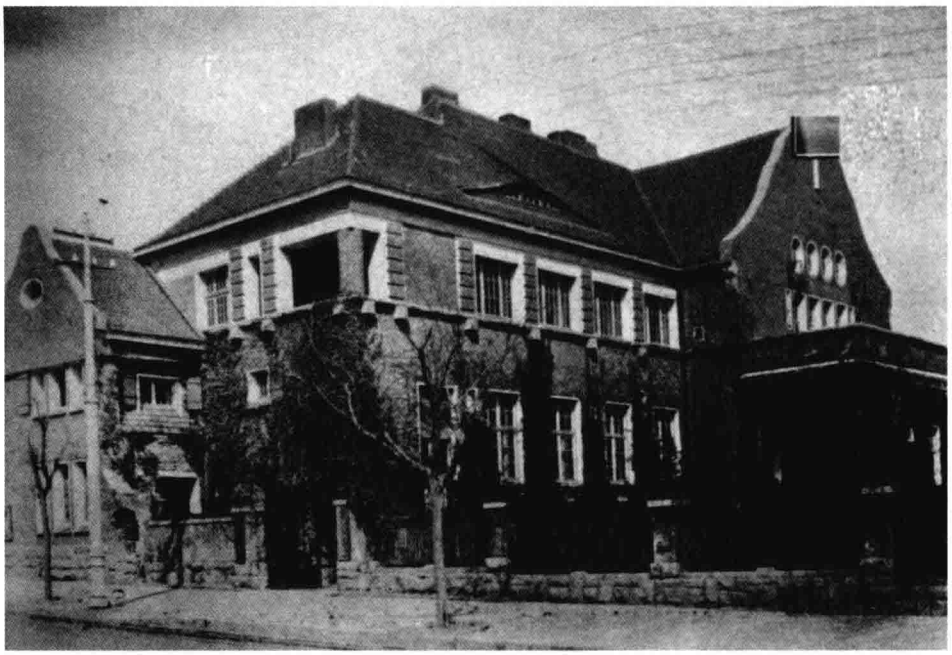
3

■3 日本青岛海军守备队军营。〔赵春光主编：《历史的烙印——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陈列展览纪略》，第168页〕

■1 日本青岛守备军临时军法会议会址。〔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66页〕

■2 日本青岛守备军万年兵营。〔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239页〕

■3 日本青岛守备军若鹤兵营。〔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2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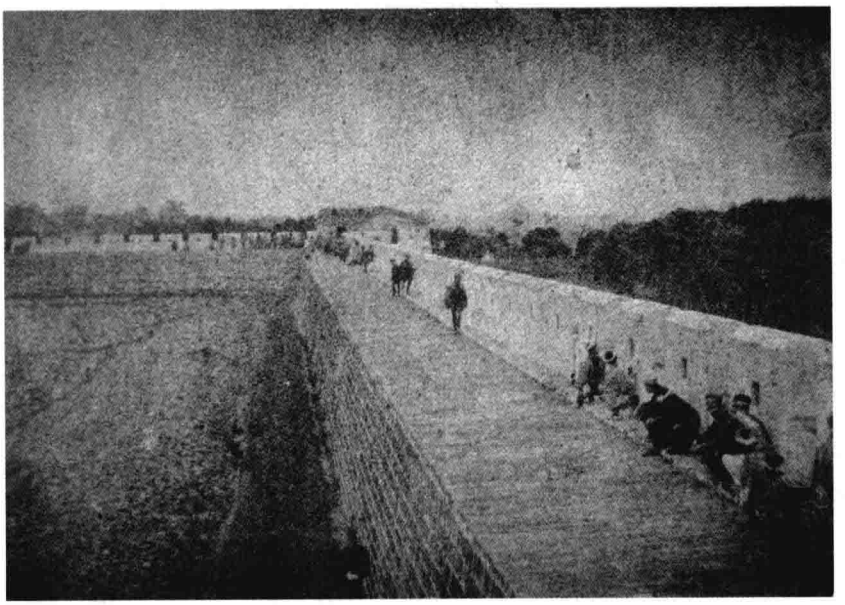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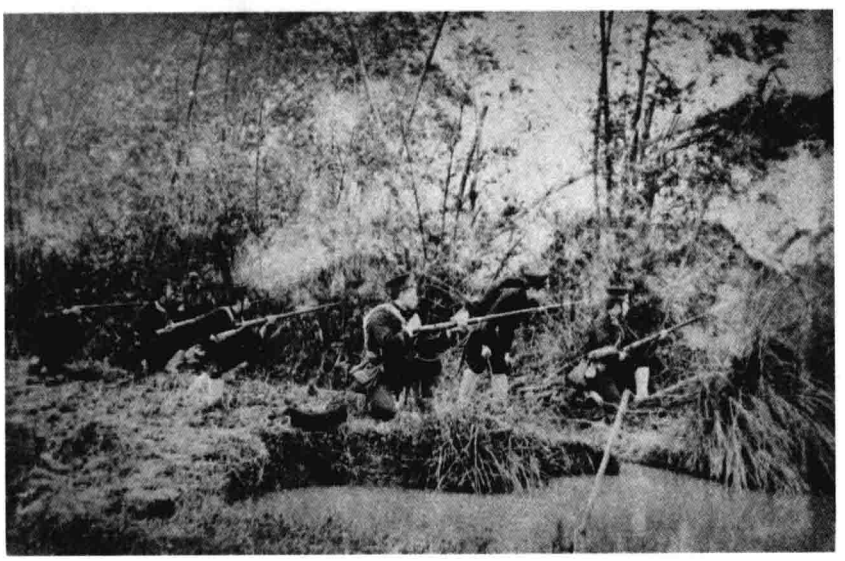
3

3. 台湾（1895—1937）

1



2



3

1 1896年元旦凌晨义军袭击台北县城时，日方紧急编制台北警备队，加强城防守备。〔远流台湾世纪回味编辑组编：《认识台湾：回味1895—2000》，（台湾）远流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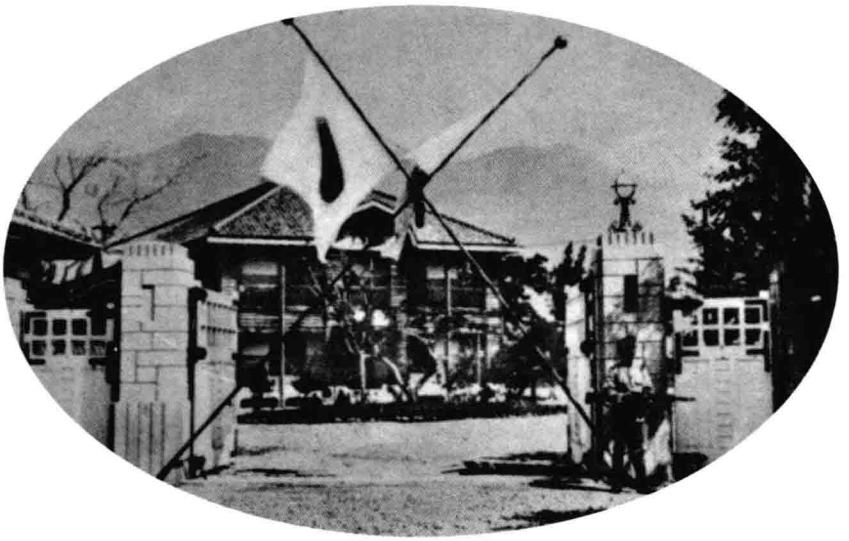
2 1896年元旦凌晨，台北警备队在城墙上防御抗日义军的情形。〔雄狮美术编辑部编：《摄影台湾》，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0页〕

3 1896年2月，日军警备队在台北南门附近搜捕抗日义军。〔雄狮美术编辑部编：《摄影台湾》，第69页〕

1 1896年2月，日军警备队闯入台北南门附近民宅搜索的情形。〔雄狮美术编辑部编：《摄影台湾》，第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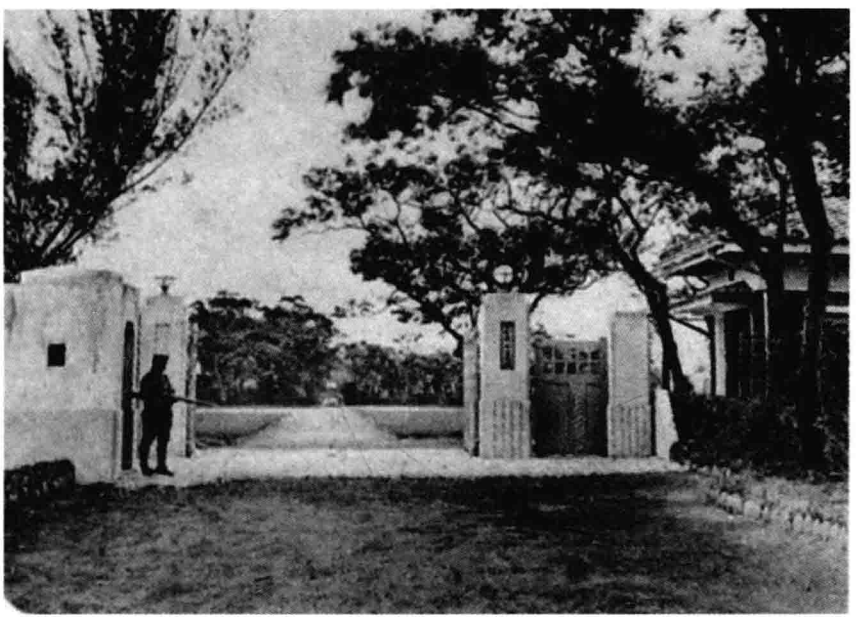
2 1896年元旦义军袭击台北县城后，日军警备队于1896年2月进行大搜查。图为日军警备队在台北南门附近闯入民宅搜查的情景。〔雄狮美术编辑部编：《摄影台湾》，第68页〕

3 1902年5月25日，日军警备队屠杀了前来“归顺”的150余人。此为大屠杀开始前在云林县斗六镇“归顺”典礼现场。〔远流台湾世纪回味编辑组编：《认识台湾：回味1895—2000》，第24页〕



1

■1 日军台湾警备队花莲港分屯大队营房。〔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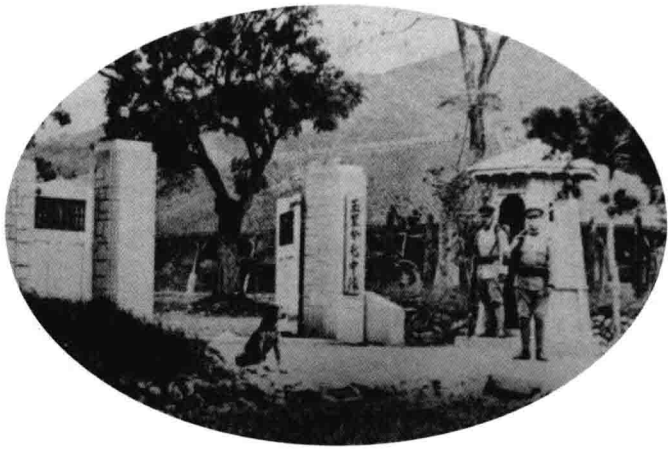
2

■2 日军台东街警备队分遣中队(隶属于花莲港分屯大队)营房。〔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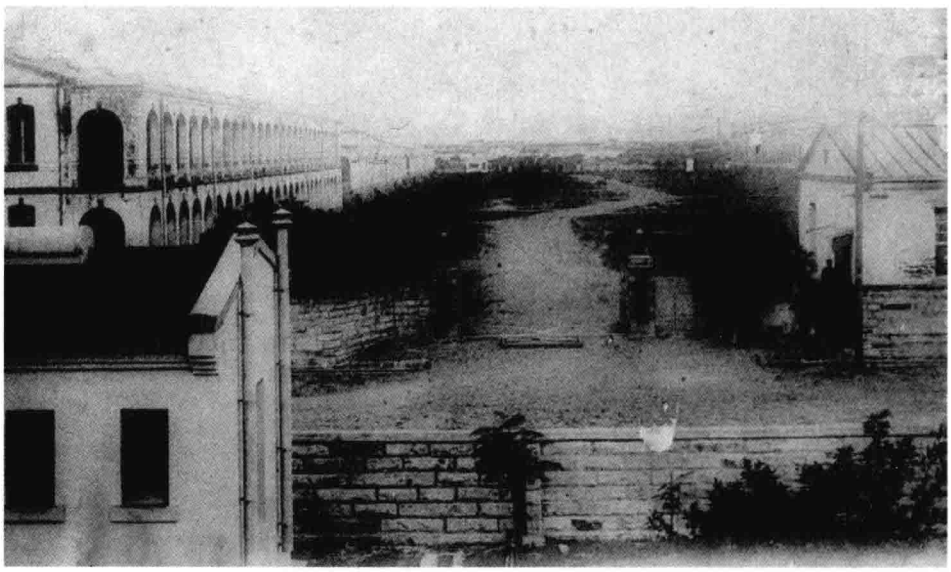
3

■3 日军警备队宜兰分屯中队营房。〔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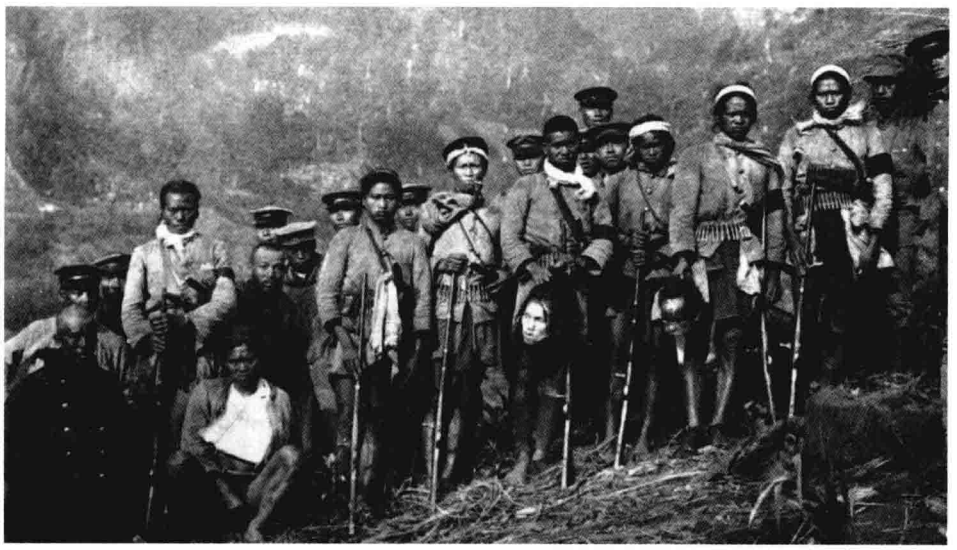
4

1 日军警备队宜兰分屯中队营房内部。〔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2 日军警备队玉里分屯中队营房门口。〔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3 日据时期台湾守备步兵第一联队“永久兵营”营址。〔杨莲福提供〕

4 1913 年，日军台湾守备队血腥镇压原住民的起义，对原住民部落勇士公开斩首。日军曾将这幅照片刊登在随后发行的所谓“征讨”画册上，以为炫耀。〔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第 366—367 页〕



1

2

3

■1 穿着日军军服的台湾原住民打着赤脚，手提太鲁人的首级，与日本军警人员合影。台湾偏远地区原住民小国林立，械斗不断，日本殖民当局有意挑动他们彼此对立，驱使他们自相残杀。〔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第370—371页〕

■2 日军镇压原住民起义后，强行与原住民妇孺合影。〔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第368—3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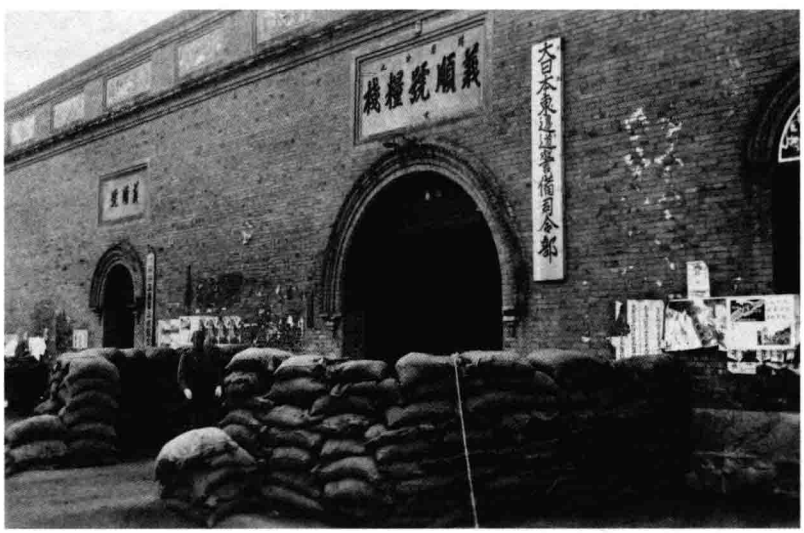
■3 1930年11月20日雾社“讨伐队”解散，日军开始撤离。右侧列队“欢送”的是留下继续“清剿”的日军警察警备队。〔王延友提供〕

4. 伪满洲国（1932—1945）

1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是镇压和屠杀东北人民的总指挥部；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图为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门及主楼。〔松本丰三：《满洲概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1939）8月10日发行，页码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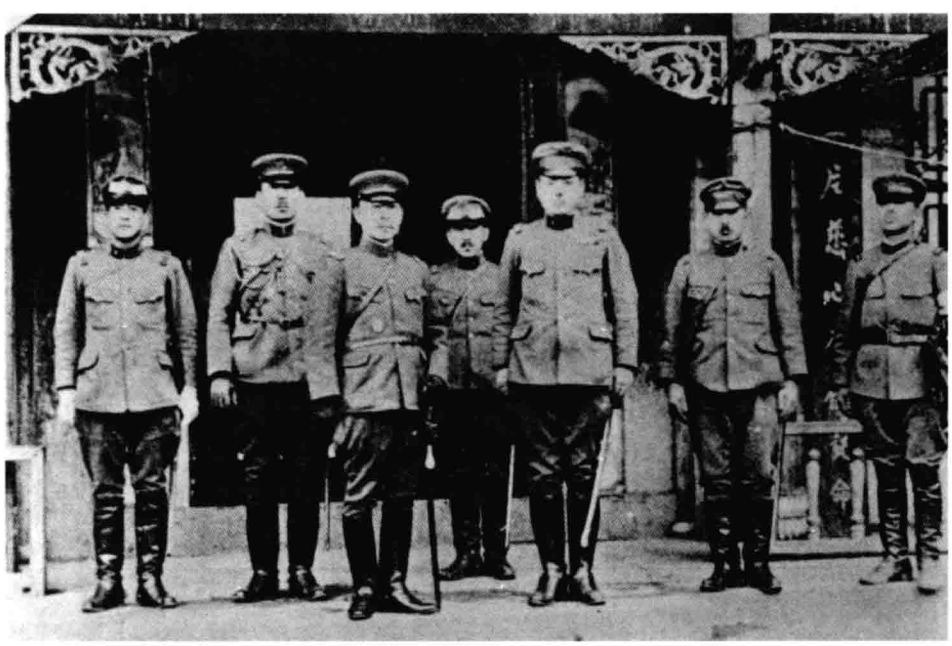
1

2 图为日军东边道警备司令部。〔满铁博物馆藏〕



2

3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左三）与其幕僚军官在郑家屯关东军儿岛支队本部大门前合影。〔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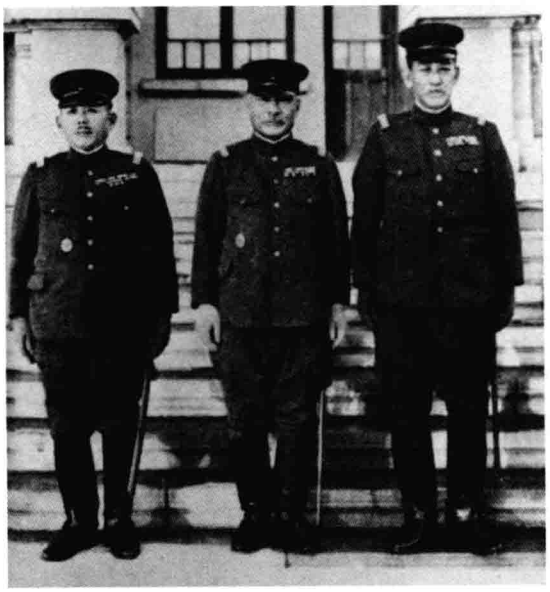
1 日本关东军黑龙江省依兰守备队。〔满铁博物馆藏〕

2

2 关东军第一师团独立守备队在奉天警备团配合下，围剿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方志馆编：《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37页〕

3

3 日本关东军驻清原县守备队强占该县县立中学校舍作为其军营。〔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1

2

■1 关东军第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右起武田、井上、佐藤各中将的合影。〔吉林省图书馆藏〕

■2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川上精一是平顶山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省档案馆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82页〕

■3 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装备了滑雪板。〔《大东亚战争写真史（4）·乐土兴亡篇》，富士书苑昭和二十九年（1954）八月二十五日版，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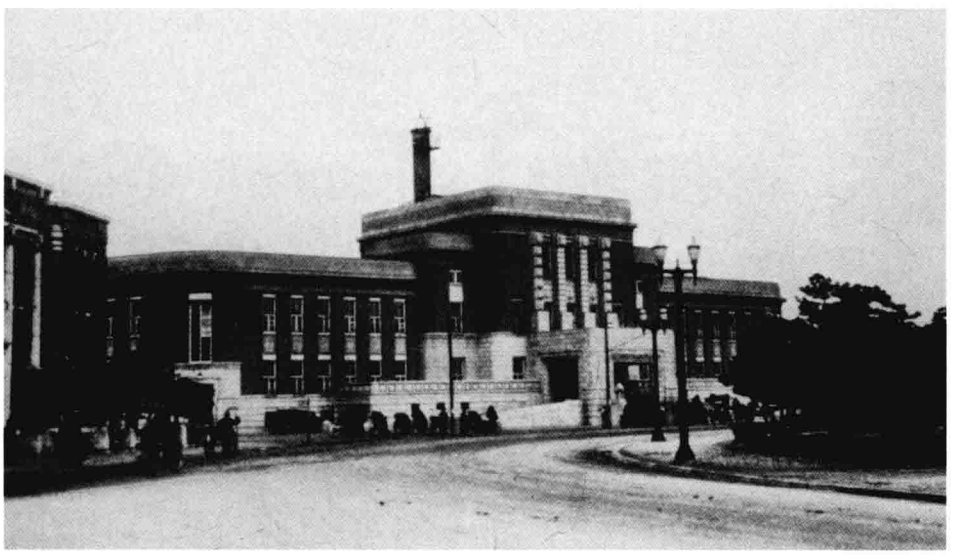
■4 在进行冬季训练的关东军铁道守备队。〔《大东亚战争写真史（4）·乐土兴亡篇》，第88页〕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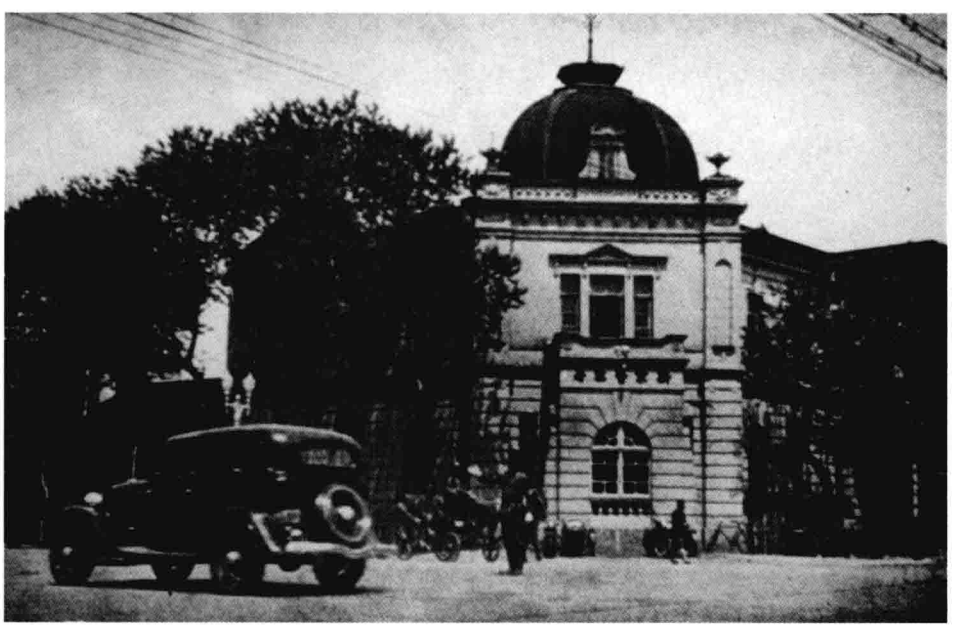
1

1 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的骑兵巡逻队。〔《大东亚战争写真史（4）·乐土兴亡篇》，第88页〕



2

2 伪满奉天市警察署。〔关东局：《关东局施政30年史》，大连师专1936年10月出版，书后附图〕



3

3 伪满新京（长春）警察署。〔关东局：《关东局施政30年史》，书后附图〕

1 日本警察在奉天(沈阳)郊外与抗日武装交火。〔《日支事变写真帖》第二卷，忠孝之日本社昭和七年(1932)三月二十七日版，第69页〕

2 伪满森林警察队驻地。〔满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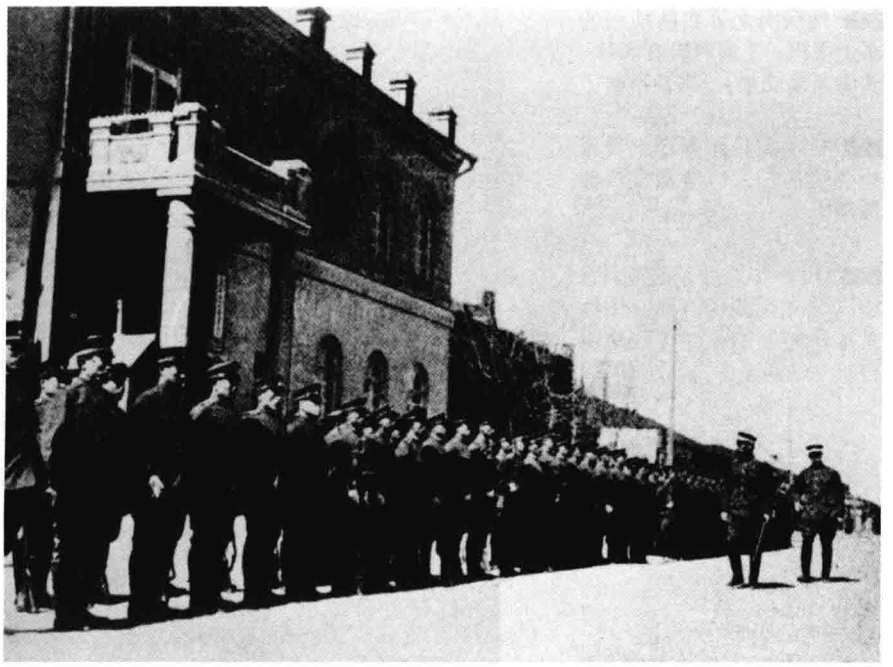
3 伪满吉林巡警。〔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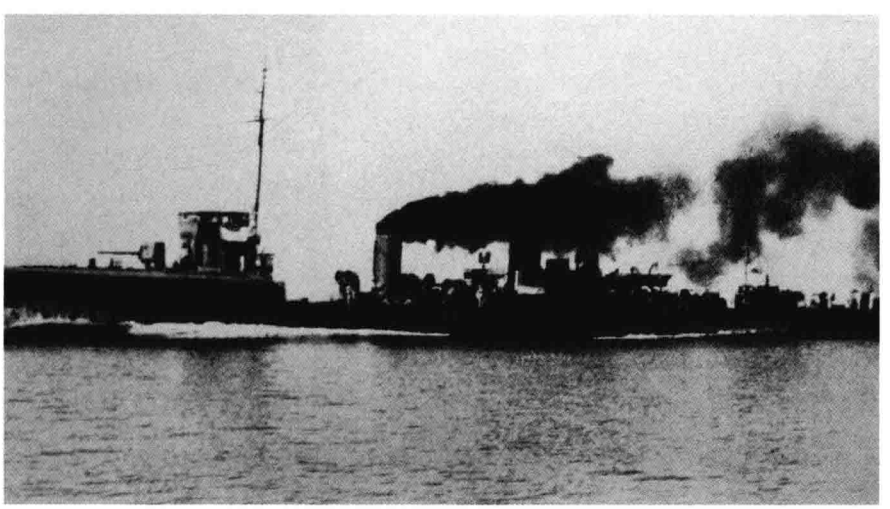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伪满国境警察的岗哨。〔佐藤定胜：《最新满洲帝国大观》，第 181 页〕

2 伪满国境警察部队。〔佐藤定胜：《最新满洲帝国大观》，日本诚文堂新光社 1937 年版，第 174 页〕

3 伪满国境警察骑兵队。〔佐藤定胜：《最新满洲帝国大观》，第 2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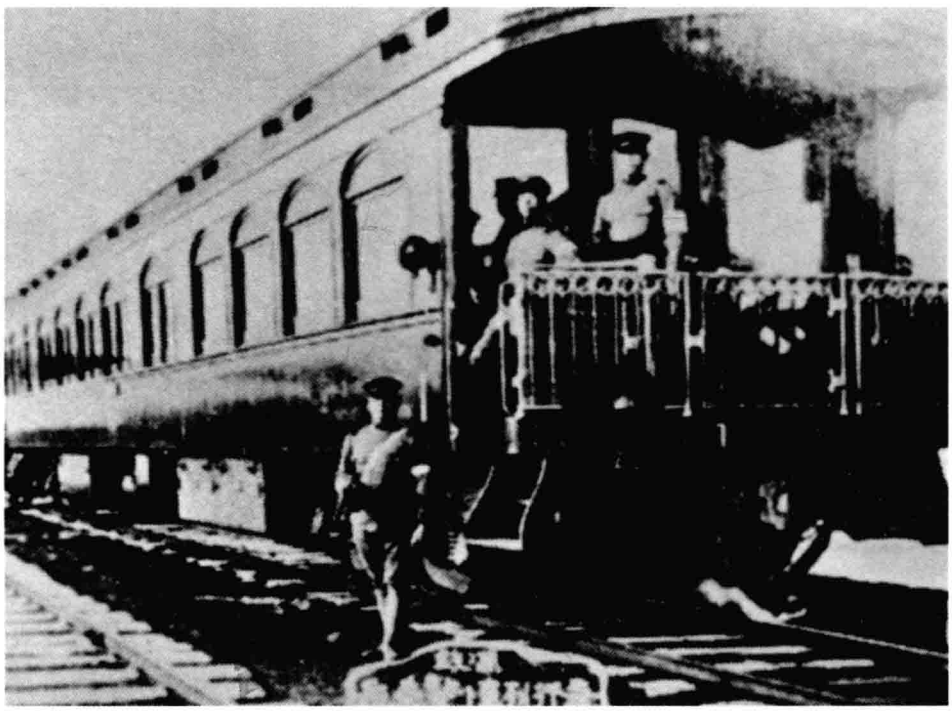
4 伪满海上警察的巡逻舰艇。〔满洲国通讯社：《满洲国现势》，满洲弘报协会 1938 年版，书后附图〕

1 伪满海上警察队使用的水上飞机。〔满洲国通讯社：《满洲国现势》，书后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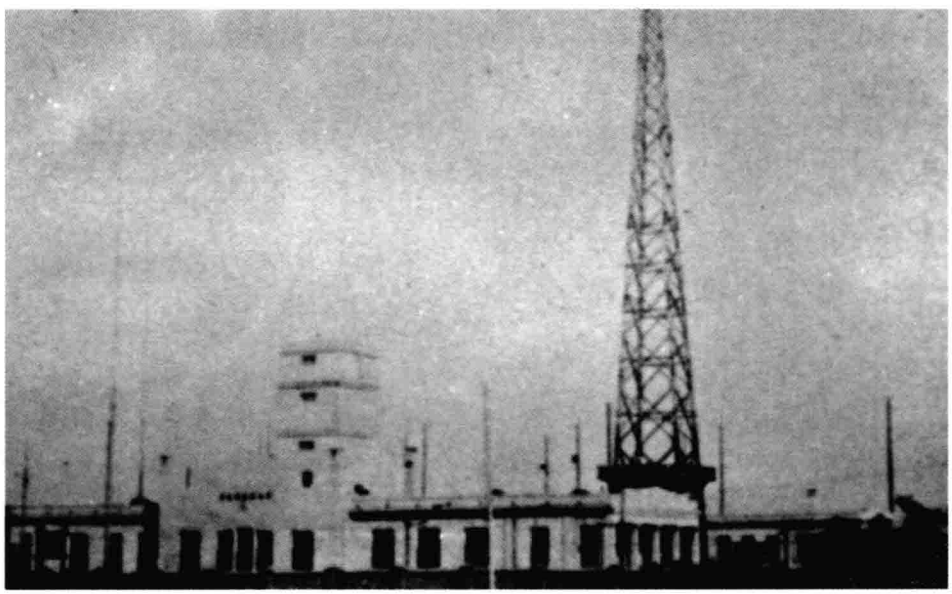
2 日本宪兵在列车上设置检查人员。〔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3 1945年5月，该特别警备队成立无线探查队。图为关东军控制的东北无线电信台。〔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1



2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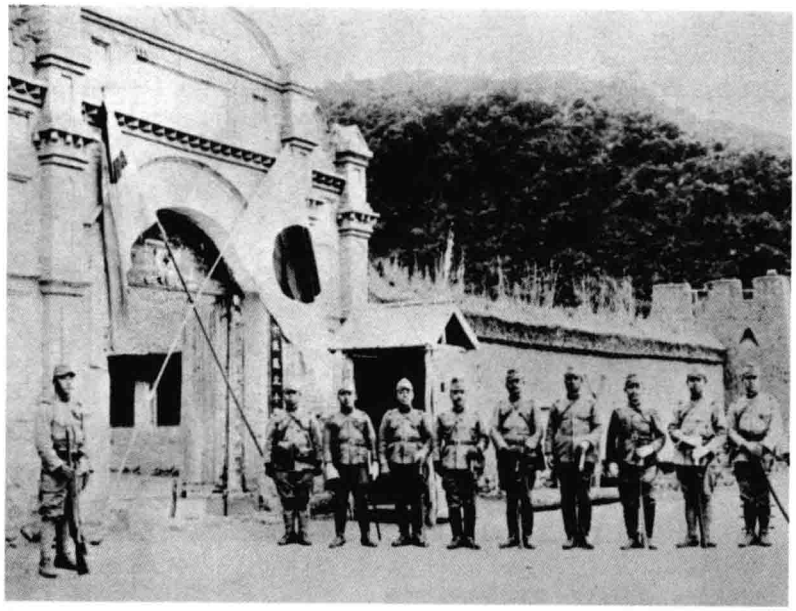
2

3

1 警护军总队实施特务实习，进行降落伞使用演示。〔哈尔滨旅史编纂委员会编：《秘录满洲铁路警护军》，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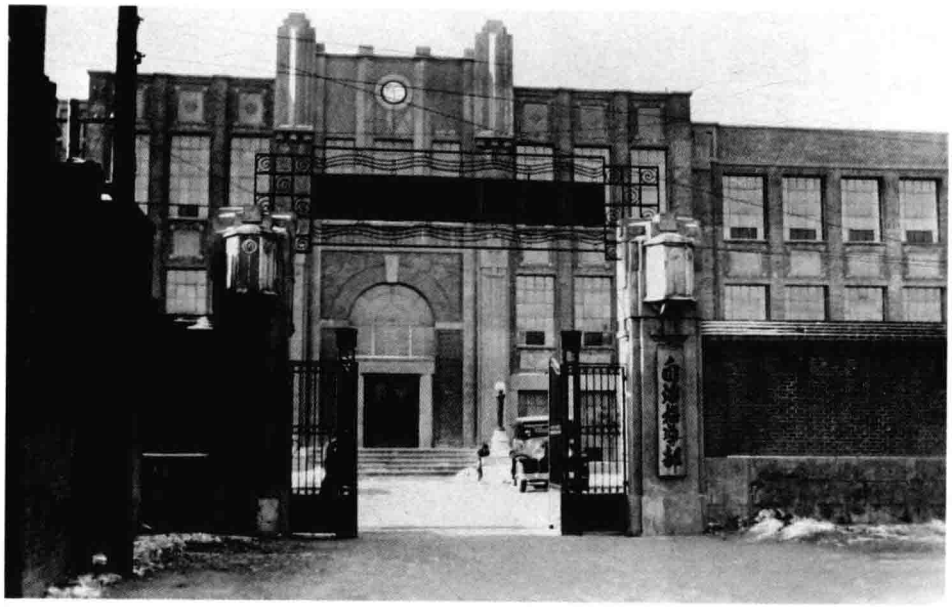
2 警护军铁山包特别工作队特别情报班。〔哈尔滨旅史编纂委员会编：《秘录满洲铁路警护军》，昭和五十二年（1977）12月8日发行，第4页〕

3 日军设立东边道讨伐司令部，指挥日伪军、警、宪、特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围剿。〔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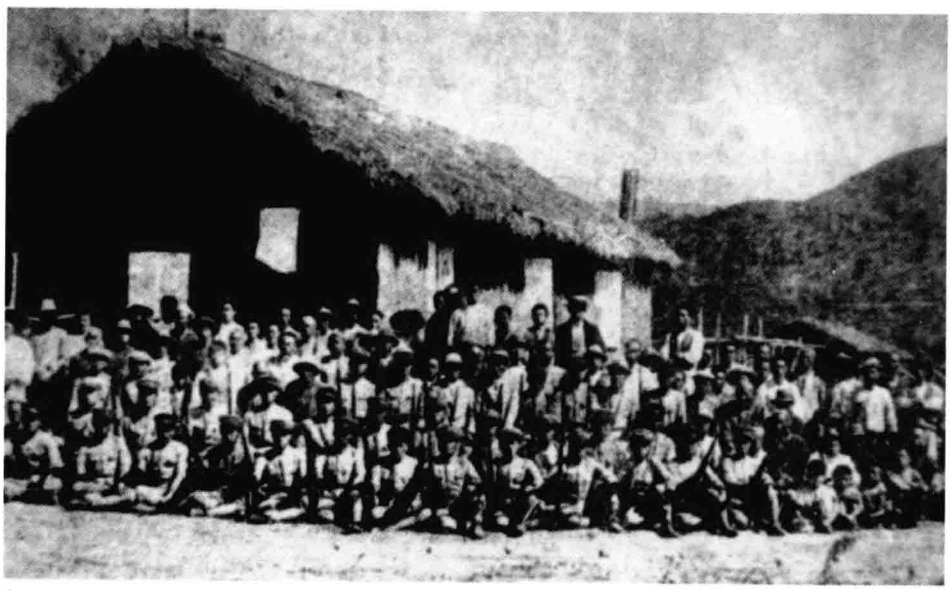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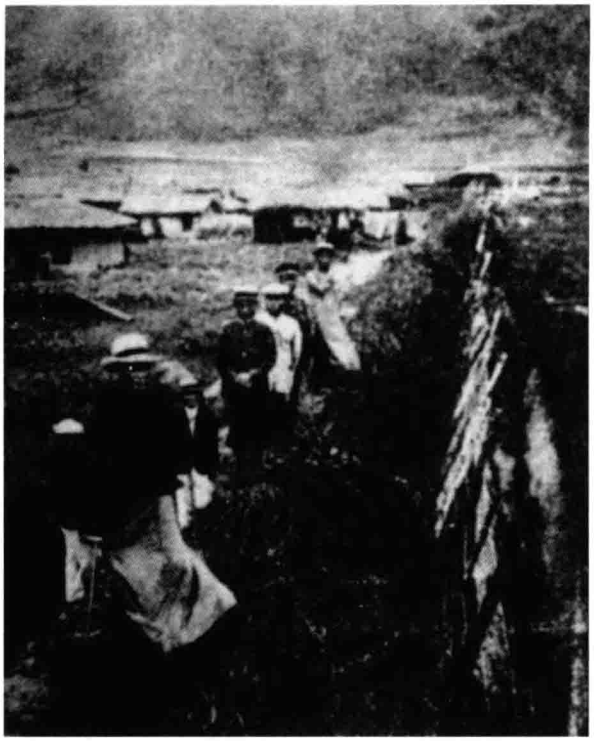
4

1 担任讨伐任务的东边道讨伐大队。〔伪满皇宫博物院藏〕

2 1931年11月10日，日军在沈阳成立了“自治指导部”，此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伪自治指导部，以控制地方政权。图为伪奉天（沈阳）自治指导部全体成员合影。〔吉林省革命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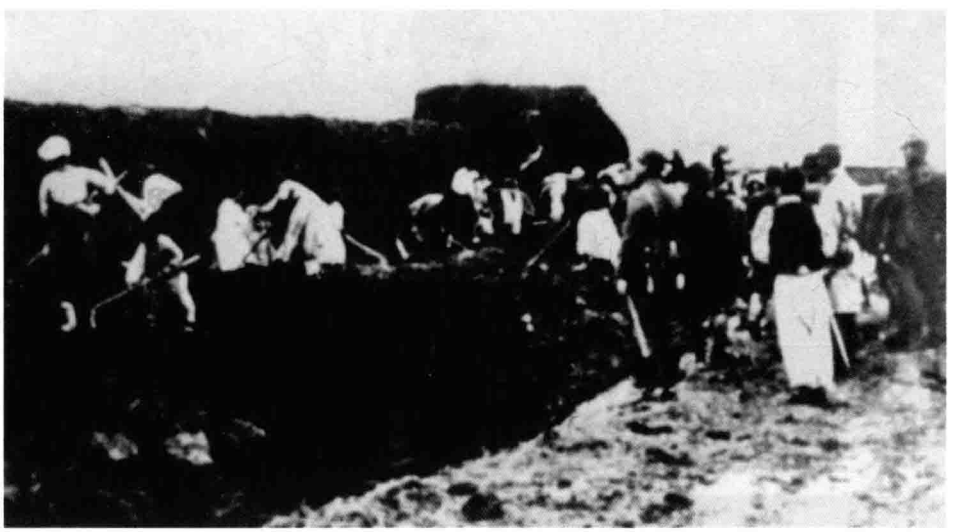
3 伪奉天（沈阳）省自治指导部。〔满铁博物馆藏〕

4 图为日军警备队与汪清县闹枝沟“集团部落”成员合影，该部落驻扎日伪军警30余人，村民入住后便被强行管制起来。〔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省档案馆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第1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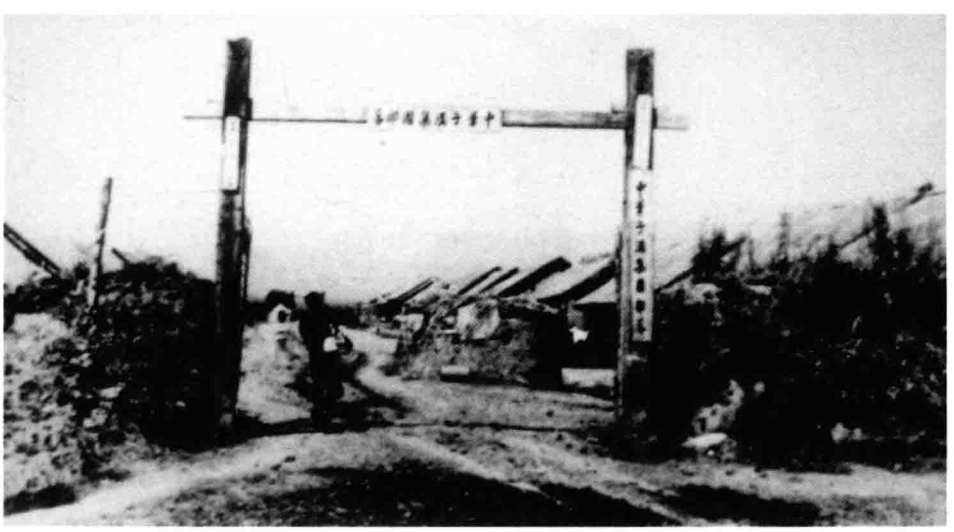
1

1 珲春县烟筒山“集团部落”为防止村民逃跑而修筑的防护壕和铁丝网。〔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省档案馆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第195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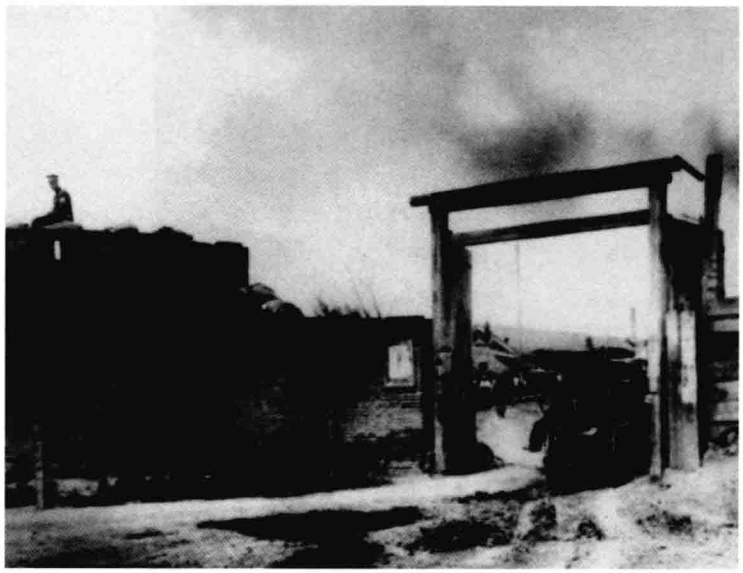
2 日伪军警用刺刀和棍棒逼迫群众修筑被称为“人圈”的“集团部落”。〔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81页〕



3

3 敦化县中苇子沟“集团部落”居民出入大门，需出示“居民证”“出入证”和“携带物品证”。此为该“集团部落”当时的照片。〔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省档案馆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第196页〕

1



2

3

4

1 东北日伪军警进入山区搜捕抗日义勇军。〔杨克林提供〕

2 通河县“集团部落”在大门旁设立起岗楼，并派守备队士兵日夜把守。〔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83页〕

3 日军警备队在东北野外搜寻抗日义勇军。〔杨克林提供〕

4 伪满时期，辽西日军警备队进入高粱地搜索抗日义勇军。〔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上），第956—957页〕

1

■1 日伪军警利用东北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封杀抗日武装力量。〔杨克林提供〕

2

■2 伪满时期，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警马队出动“清剿”抗日联军。〔杨克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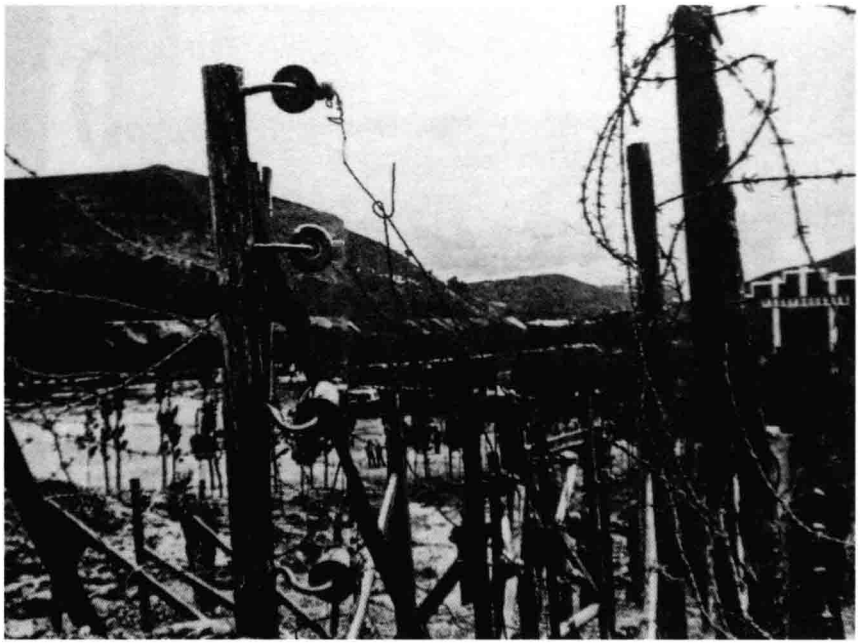
3

■3 在东北某碉堡旁，日伪军警扣押一名被反剪双手的中国中年男人。〔杨克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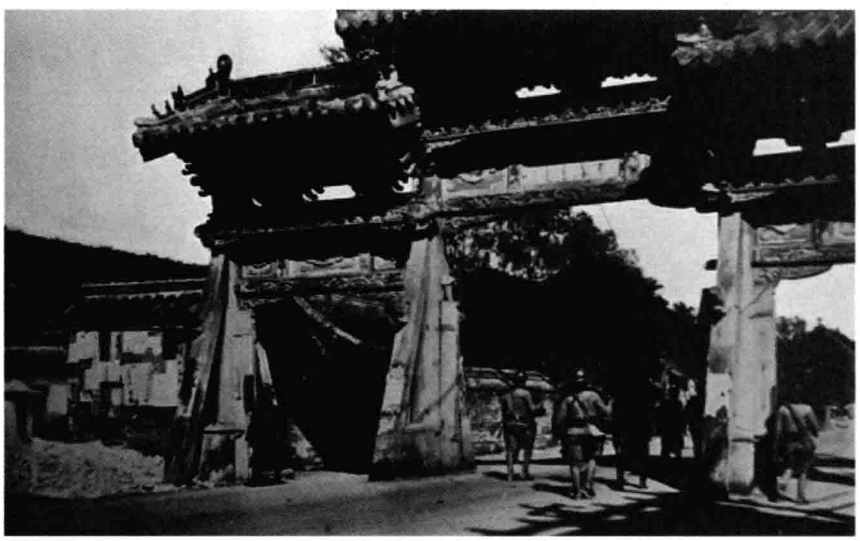
1 伪满洲的兵站基地化——四周竖起铁丝网，并拉上电网，戒备森严。〔杨克林提供〕

2 1931年9月19日下午，日军一支警备队正在沈阳故宫前武功坊牌楼下巡逻。〔傅光中提供〕

3 被日军俘虏的东北抗日人士。〔杨克林提供〕



1



2

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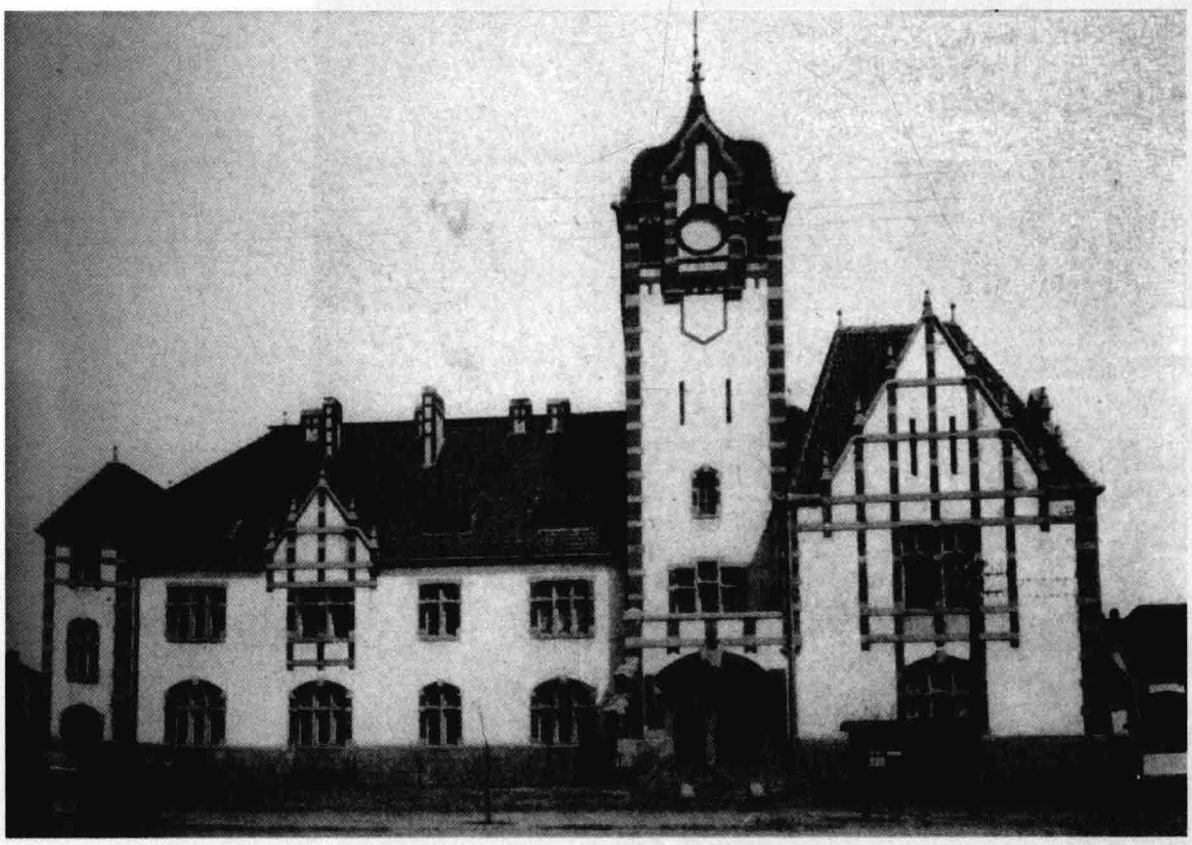
1 伪满时期，日本宪兵枪杀抗日人士。〔杨克林提供〕

2 伪满时期，被日伪军警枪杀的抗联官兵的尸体。〔杨莲福提供〕

3 被日伪军警杀害的东北抗联杰出领导人杨靖宇的遗骸。〔杨克林提供〕

二、组建宪兵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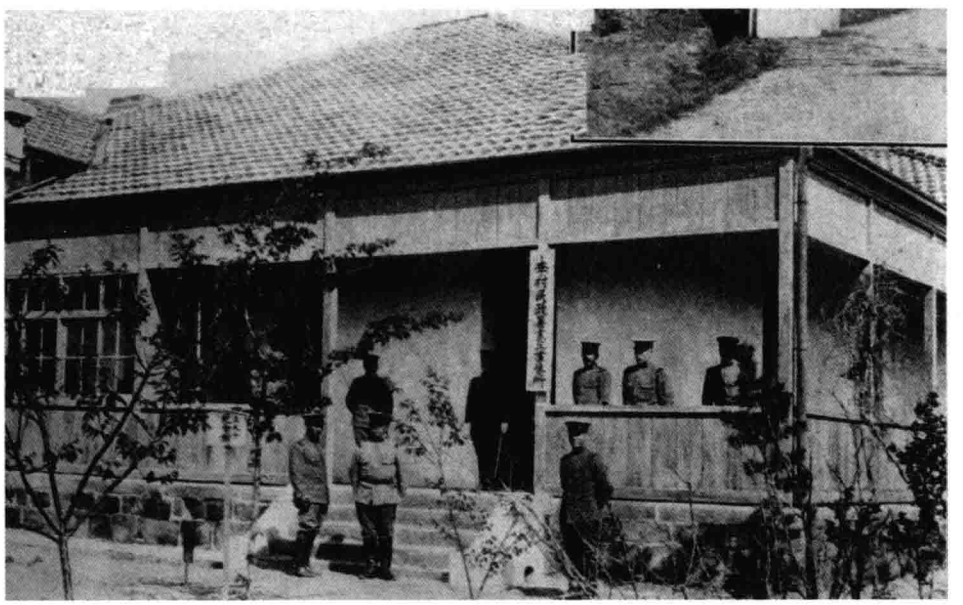
宪兵是一种军事警察，主要负责维持军队纪律。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宪兵拥有绝对权力。1899 年日本颁布的宪兵令里指出：“宪兵为陆军兵科之一，受陆军大臣管辖，职掌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之业务。”在二战时期占领区，宪兵更是充当了搜捕镇压抗日分子的主力。



1915 年 12 月设立的日本青岛守备军宪兵队。〔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 19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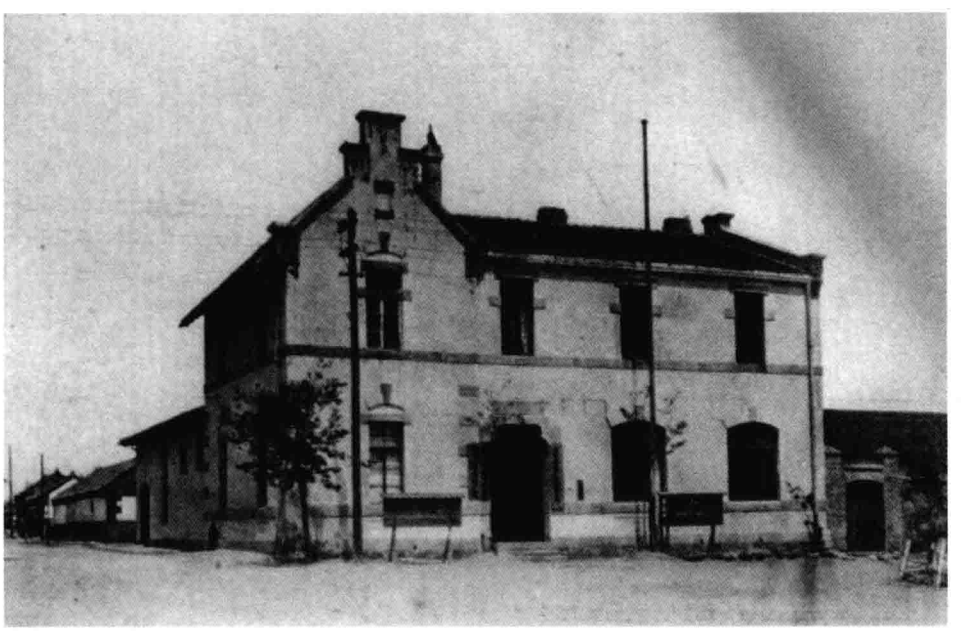
1

■1 日军青岛守备军宪兵队李村分队长、宪兵中尉尾吉五郎。〔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 264 页〕



2

■2 日军青岛守备军宪兵队李村分队队部。〔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 2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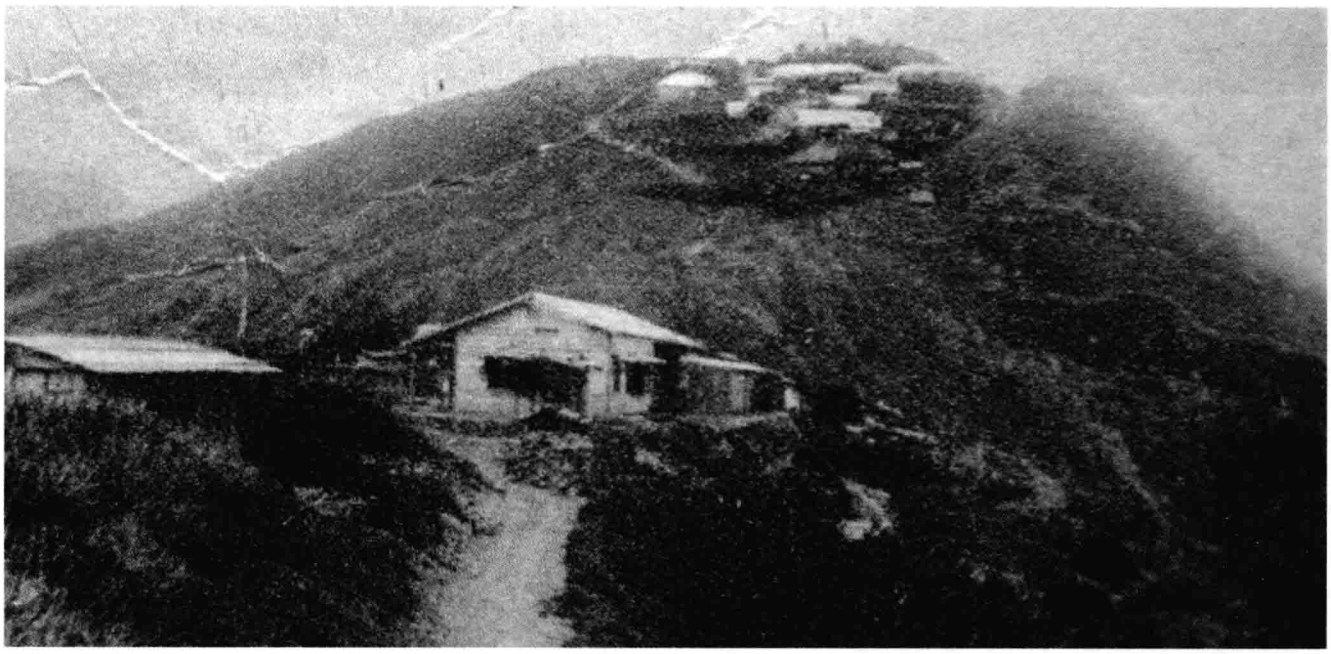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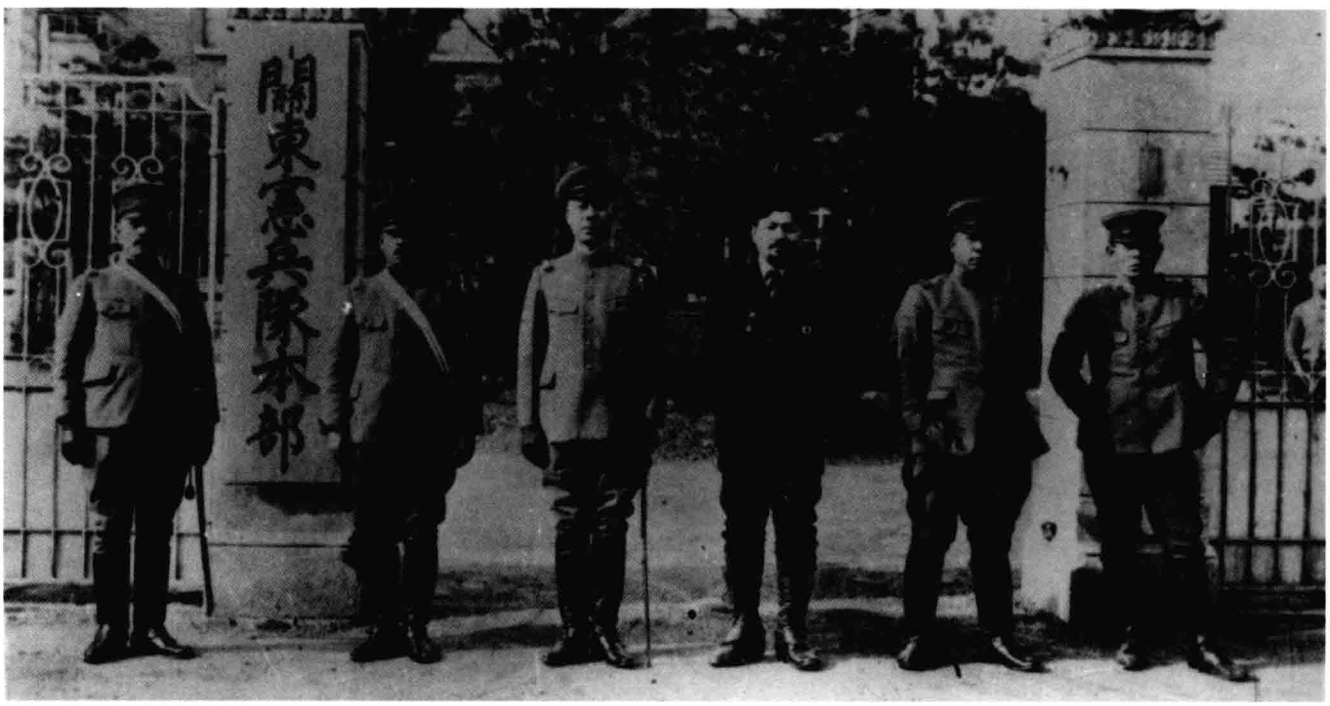
■3 日军青岛守备军宪兵队台东镇分队营房。〔阿部圭二监修、和气六郎著作兼发行：《青岛写真案内》，第 236 页〕

1 位于台湾新竹州三方河发源地的高山族聚居区的宪兵巴陵分遣所。〔胜山吉作编:《台湾绍介最新写真集》,第 88 页〕

2 沈阳关东宪兵队本部大门。左三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万仁元:《汪精卫与汪伪政府》上,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7 月版,第 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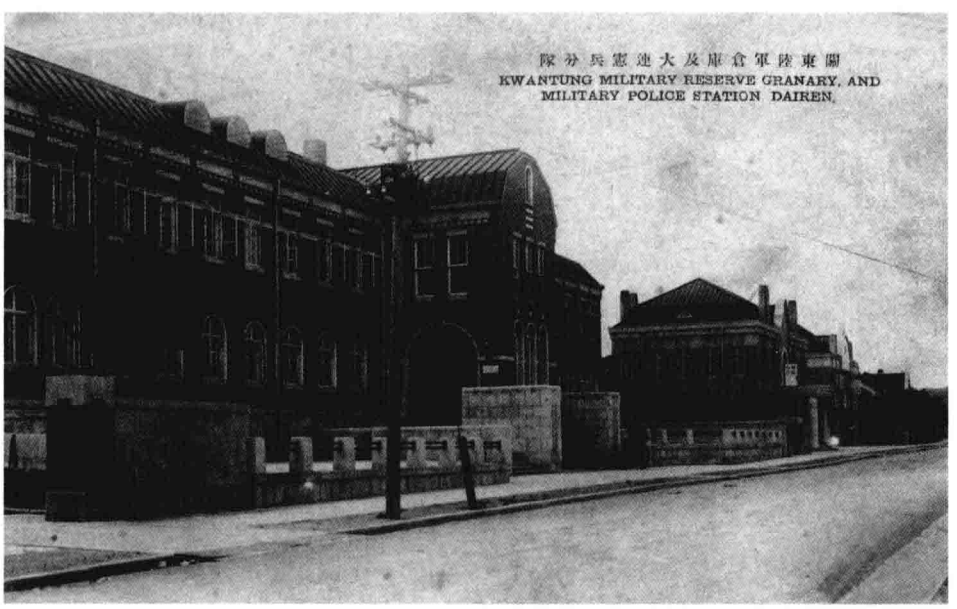
1



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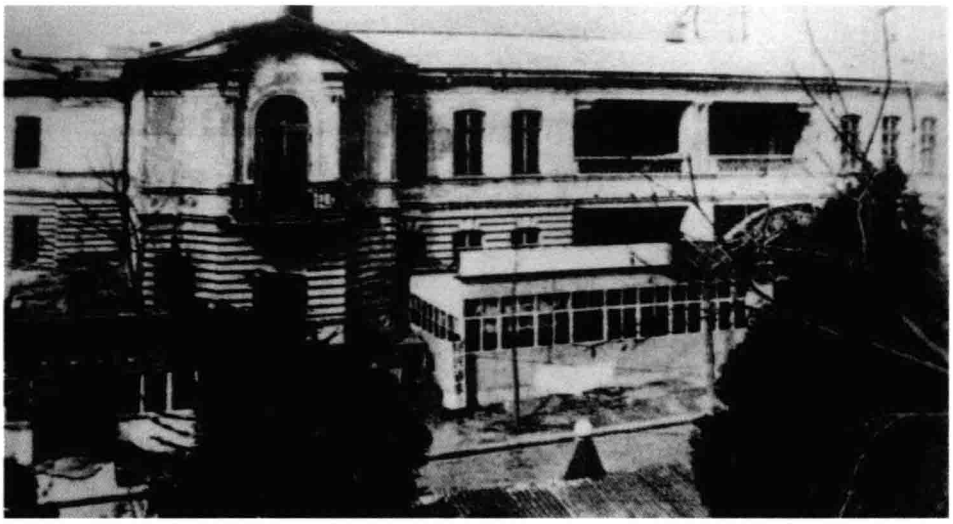
3

1 1932年6月，日本对关东宪兵队进行改编，正式设立了关东宪兵司令部（初设在奉天）。图为1935年由沈阳迁驻长春的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外景。〔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第153页〕

2 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警务部长东条英机（左一）部署“治安肃正”任务。〔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省档案馆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书中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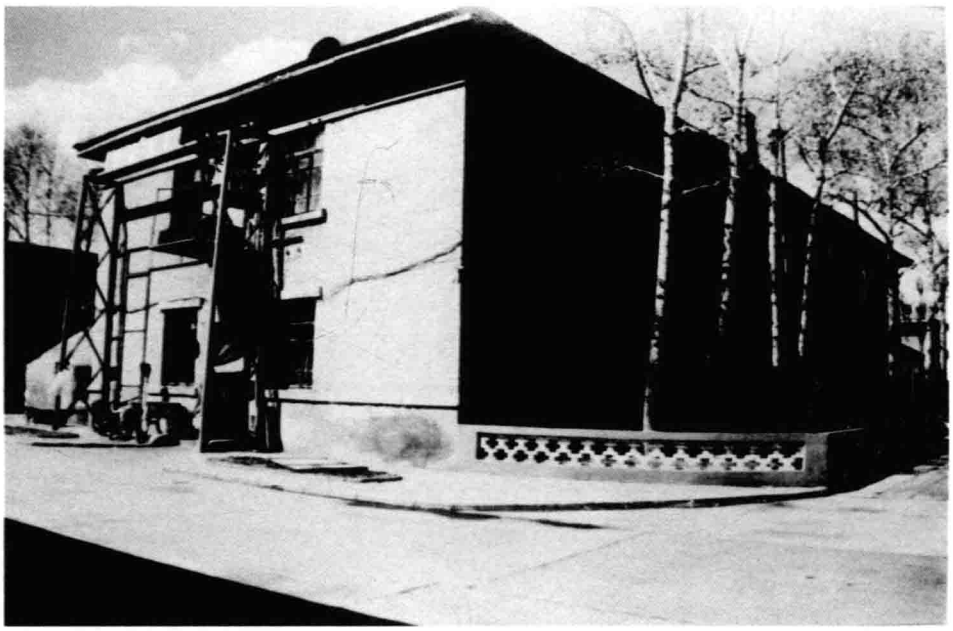
3 日军大连宪兵分队成立于1905年2月。图为大连宪兵分队所在地。〔唐功春主编：《旧明信片中的老大连》，第67页〕

1 日本驻旅顺关东宪兵队所在地。〔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图史》，第91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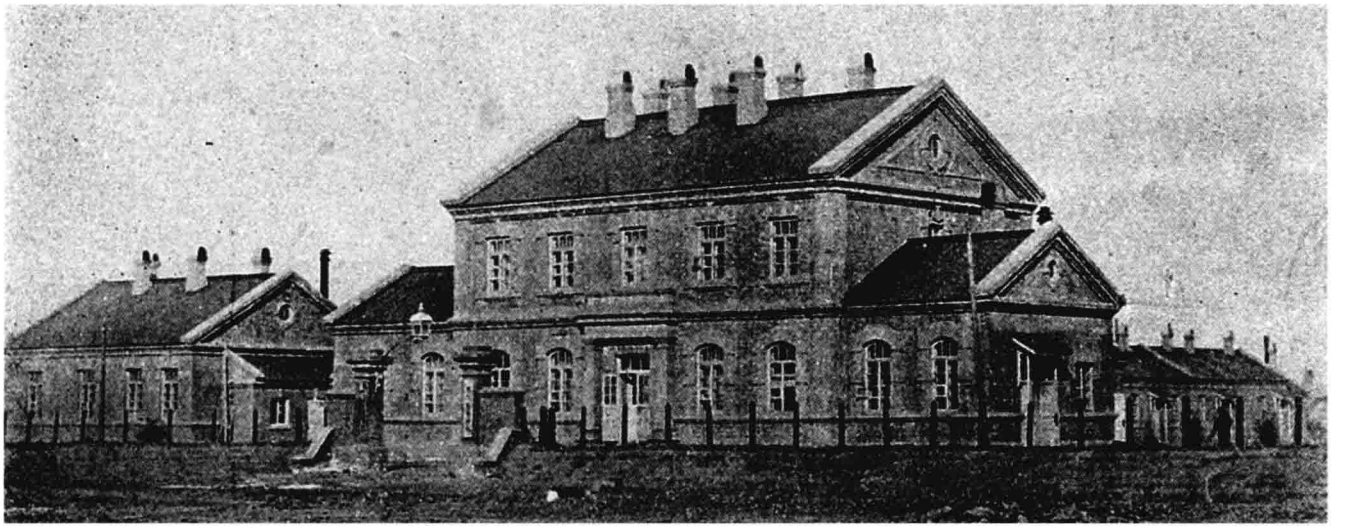
2 驻扎伪满洲国海拉尔的日本宪兵队营房。〔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方志馆编：《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第58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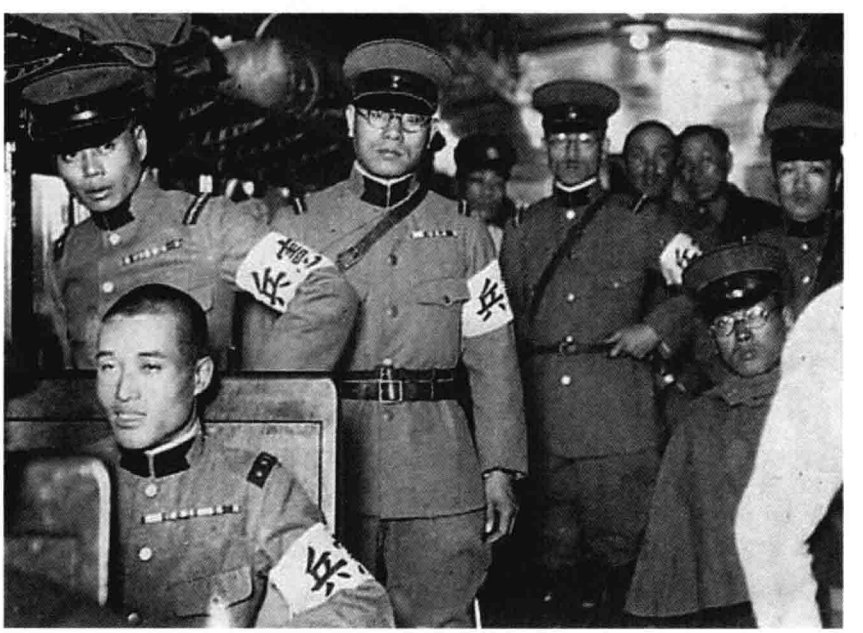
3 驻扎伪满洲国山城镇日本宪兵队营房。〔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方志馆编：《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第58页〕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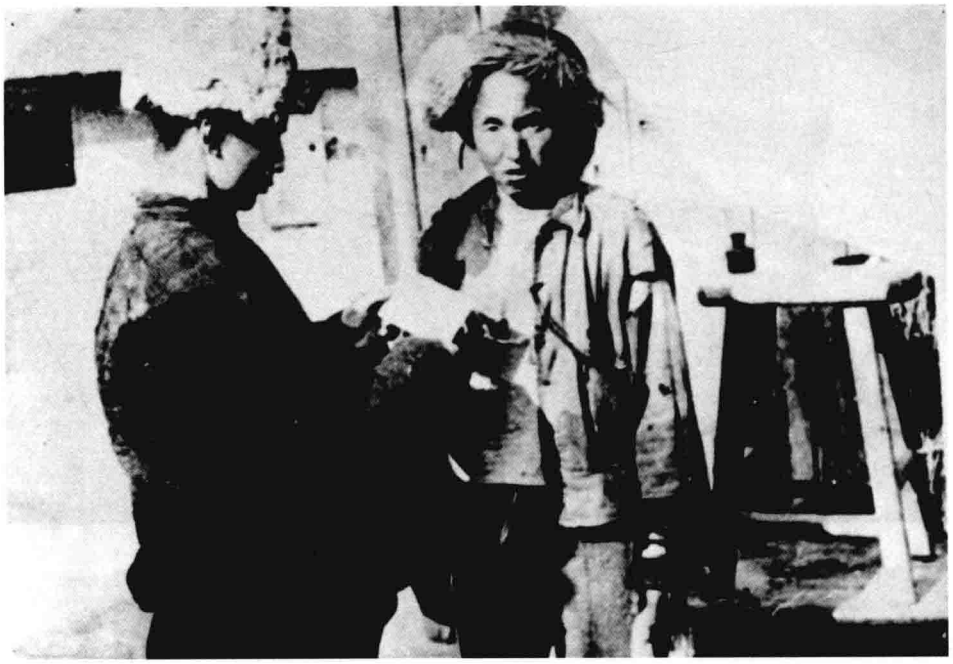


3

1 20世纪初期奉天宪兵分队营房。〔松浦吉蔵：《满洲纪念写真帖》，（东京）松浦写真馆1909年7月版，原书无页码〕

2 1932年4月20日，日本傅家甸宪兵队纪念摄影。〔十千雷影：《侵华罪证：1932年傅家甸日本宪兵队合影》，2012年12月19日，http://qing.blog.sina.com.cn/2907486305/ad4cb86133002sg8.html?sudaref=www.haosou.com，2015年3月20日〕

3 伪满时期一列火车车厢中的日本宪兵官兵。〔傅光中提供〕



1

■1 日伪宪兵特务搜查东北平民群众。〔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第1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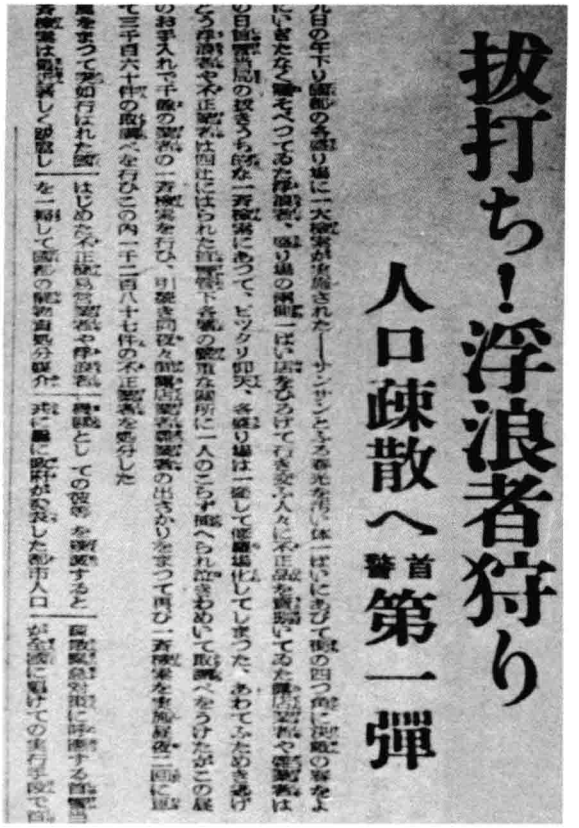
2

■2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搜捕化装成平民试图逃亡的中国士兵。凡是类似军人模样和特征的民众或已放下武器的军人，都一律被捆绑起来用卡车运至城外实施屠杀。〔薛冰：《南京沦陷史的补白》，《老照片》第44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4页〕

3

■3 日本宪兵通信队在锦州附近架设通讯线路。〔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方志馆编：《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第59页〕

1



抜打ち！浮浪者狩り

人口疎散へ首警第一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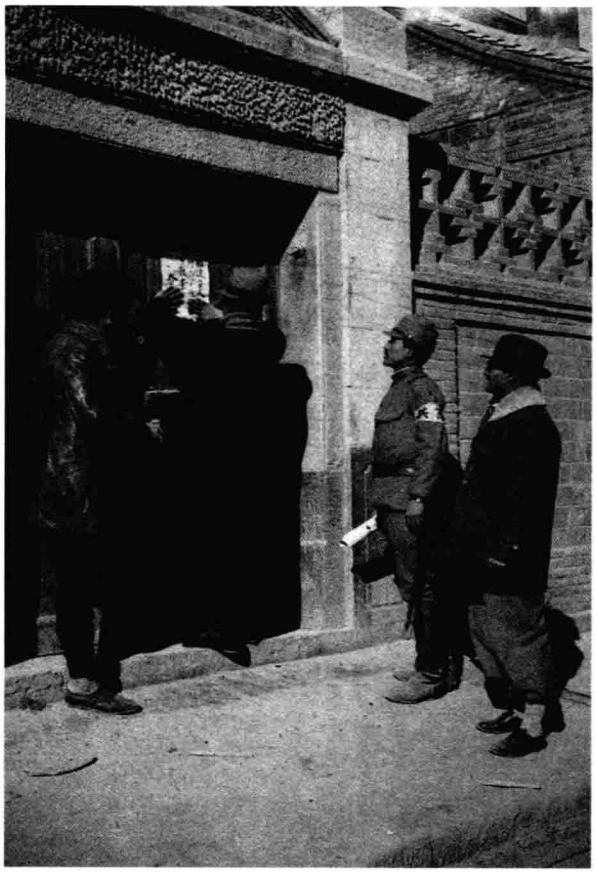
2

3

1 1938年年底，日军占领广东某地后，街头一名日本宪兵在向一个中国当地儿童的手提篮里放花生。日本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特派员拍摄的这幅照片，意在宣传日军对没有反抗能力和是非观念的弱势群体的关爱及友善，这是日军实施宣抚政策的惯用手法。〔《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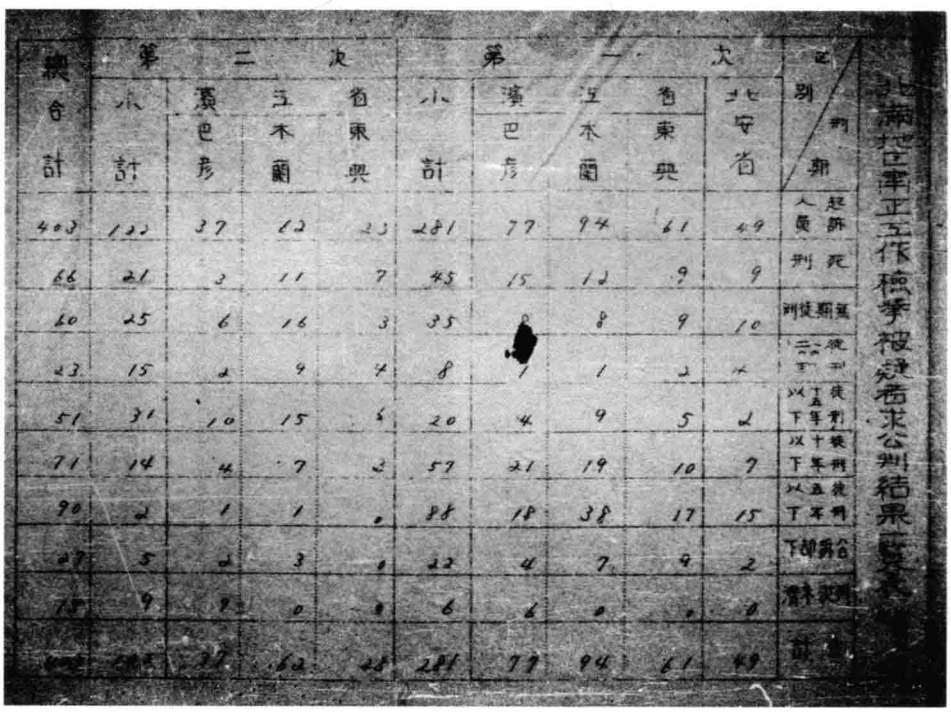
2 当年有关伪满警察和宪兵在“新京”抓“浮浪者”的报道。〔柴景顺1984年拍摄〕

3 伪满警察和宪兵在车站搜捕抗日爱国志士。〔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第154页〕



1

2



總合計	第二次 小計	第二次 濱巴彥	第二次 江木蘭	第二次 省東興	第一次 小計	第一次 濱巴彥	第一次 江木蘭	第一次 省東興	第一次 北安省	区別 / 刑期
403	122	37	62	23	281	77	94	61	49	起訴人員
66	21	3	11	7	45	15	12	9	9	死刑
60	25	6	16	3	35	8	8	9	10	無期徒刑
23	15	2	9	4	8	1	1	2	4	徒刑二十五年
51	31	10	15	6	20	4	9	5	2	徒刑十五年以下
71	14	4	7	3	57	21	19	10	7	徒刑十年以下
90	2	1	1	0	88	18	38	17	15	徒刑五年以下
27	5	2	3	0	22	4	7	9	2	合罰罰下
15	9	9	0	0	6	6	0	0	0	刑罰未決
[illegible]	[illegible]	37	62	23	281	77	94	61	49	計

3

1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占领太原城后，其宪兵和特务给无人民宅贴上封条，以示“保护”。〔《支那事变画报》第12辑，第31页〕

2 1937年10月中旬，日本宪兵向中国饥民发放馒头等食物，企图收买人心。〔《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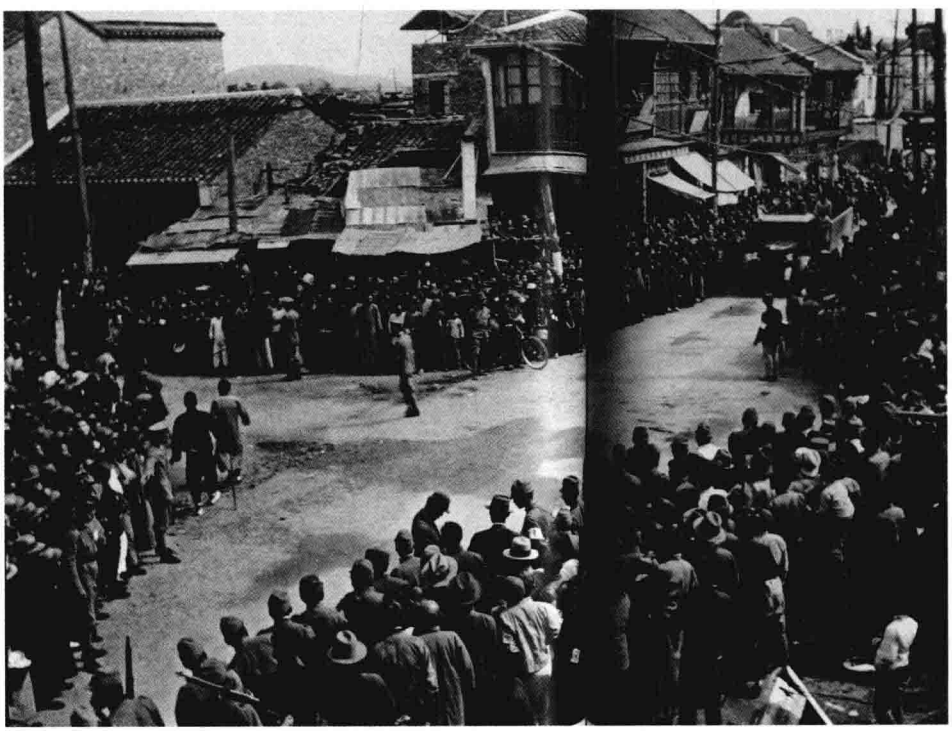
3 伪满警察和宪兵两次制造“巴东木惨案”的统计表。〔柴景顺1984年拍摄〕

左图反映的是，1937 年 12 月中上旬， 河北德县县城，守卫县城南门的日本宪兵与该县伪自卫团团员检查过往行人；右图为 1937 年 12 月中上旬，河北德县县城，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正在购买中国商贩牛肉的日本宪兵。〔《支那事变画报》第 13 辑，第 3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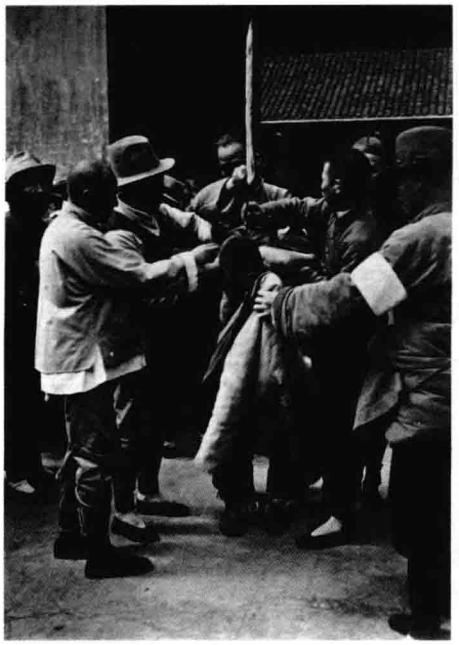
1 为了震慑被其占领的镇江民众，日军1938年1月占领镇江后，逮捕和审判抗日分子，并召集市民围观。〔日本军医小野正男拍摄，秦风老照片馆藏〕

2 日伪军警在镇江闹市区处决抗日分子。〔1938年1月日本军医小野正男拍摄，秦风老照片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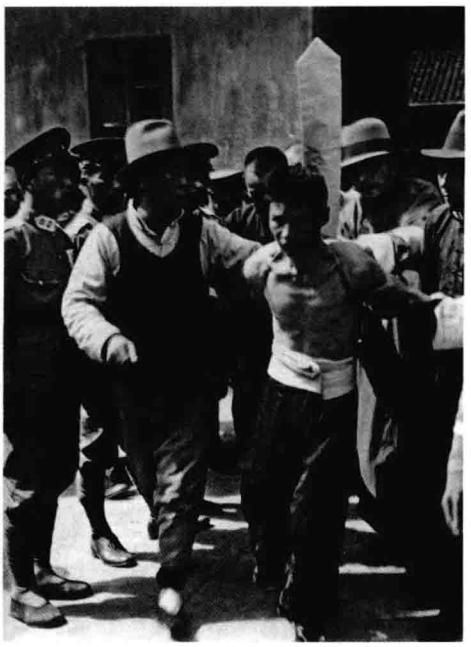
1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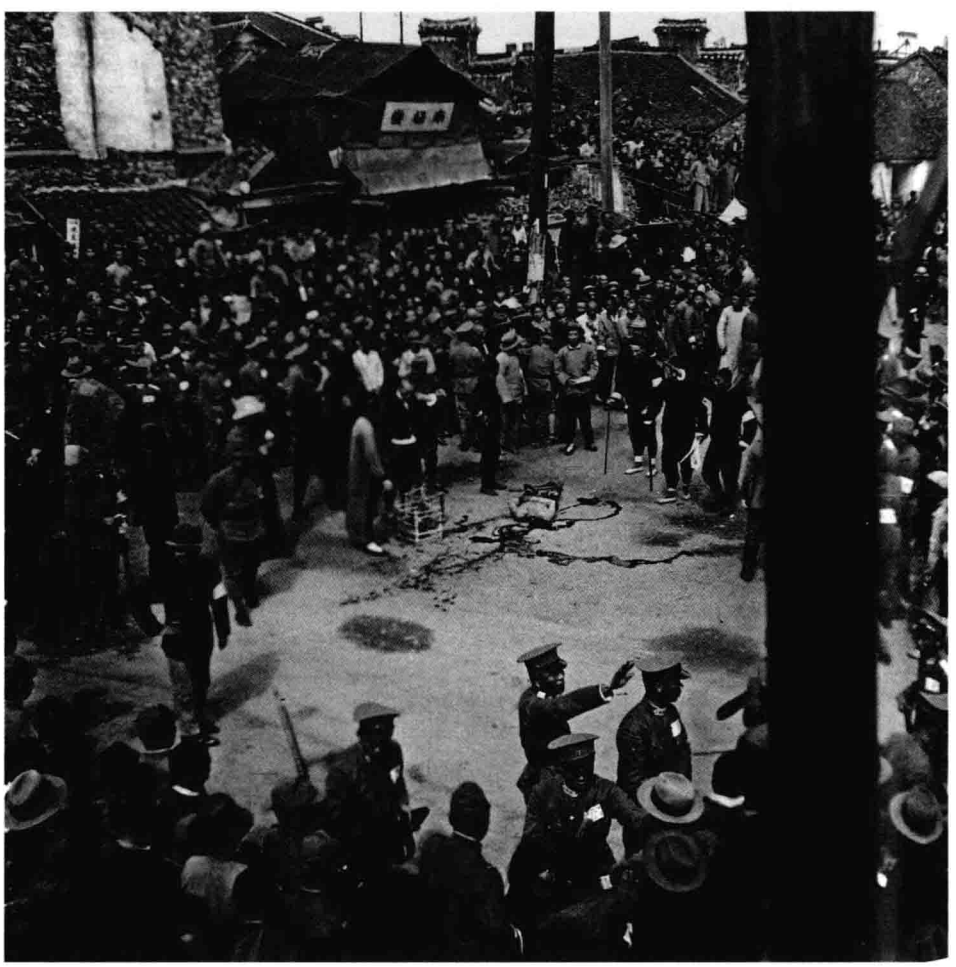


2

1 1938年1月，抗日分子行刑前，伪警察为其脱去上衣并在其背后插入行刑牌。〔小野正男拍摄，秦风老照片馆藏〕

2 这位抗日志士被推出行刑前，神情刚毅。最左边穿警服者为镇江伪政府警察。〔1938年1月日本军医小野正男拍摄，秦风老照片馆藏〕

3 刽子手当街砍下抗日志士的头颅，然后将其放到笼子内悬挂示众，围观的镇江市民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日本军医小野正男拍摄，秦风老照片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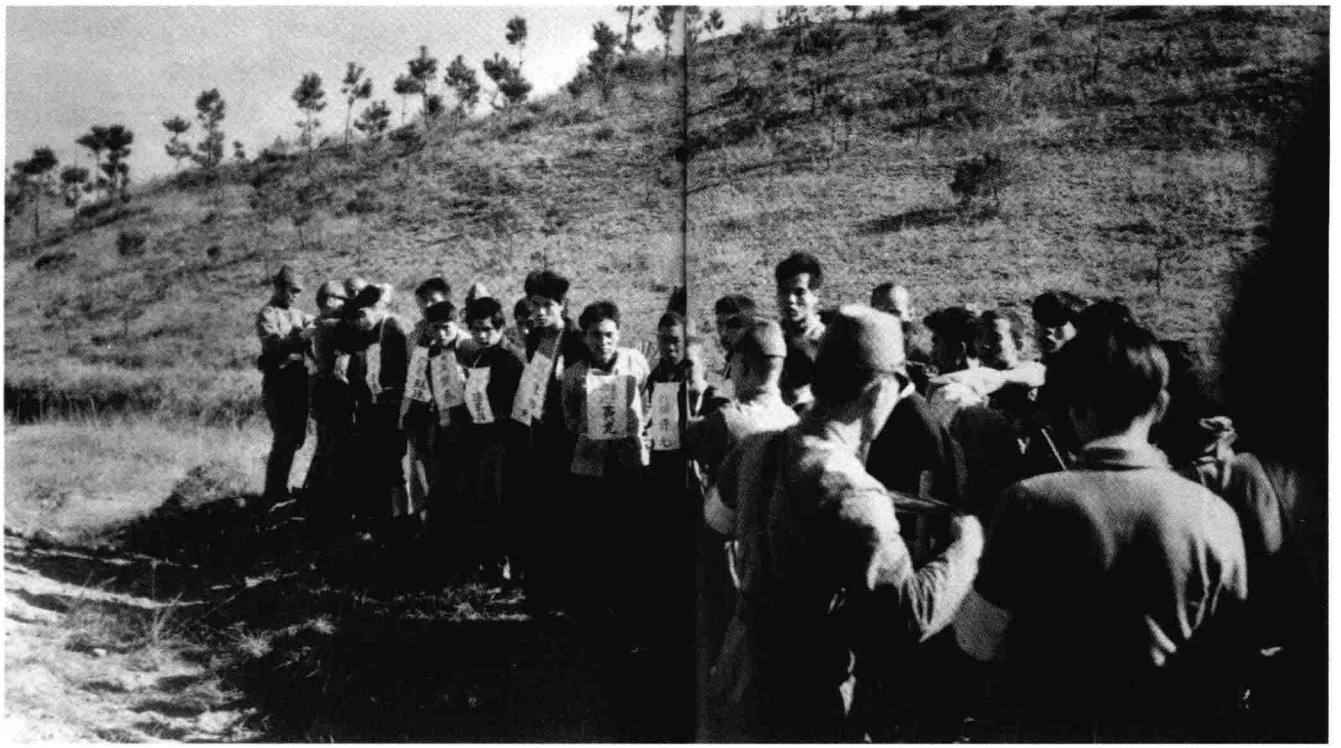
3

1 抗日分子当街遭斩，日军还摆上一口棺材，示警意味浓厚。〔冯克力：《老照片》第59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66—167页〕

2 被华南日军宪兵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中国抗日志士。日本宪兵中，有的穿军装戴白色袖标，有的穿便衣。〔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60—61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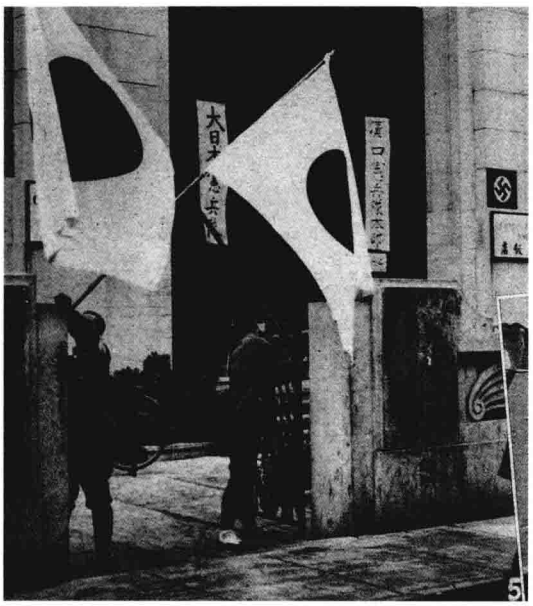
1

2

1 被带到刑场即将执行枪决的中国抗日志士。这些抗日志士共19名，其中有一个名叫谭华润的，其“罪名”是“抗日”；另一个叫麦荣，其所谓罪名是“抗拒宪兵”。〔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60—61页〕

2 1938年4月下旬，在日本宪兵的监督下，伪北京女警察对过往市民进行搜身检查。〔《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6页〕

1938 年 4 月下旬，从昆山开往南京的火车客车车厢内，日本宪兵对旅客进行监视和检查。〔《支那事变画报》第 26 辑，第 10 页〕



1

2

3

1 1938年12月上旬，日军占领汉口后，把贴有德国纳粹标志的汉口某高级饭店作为其汉口宪兵队本部并插上日本国旗。〔《支那事变画报》第47辑，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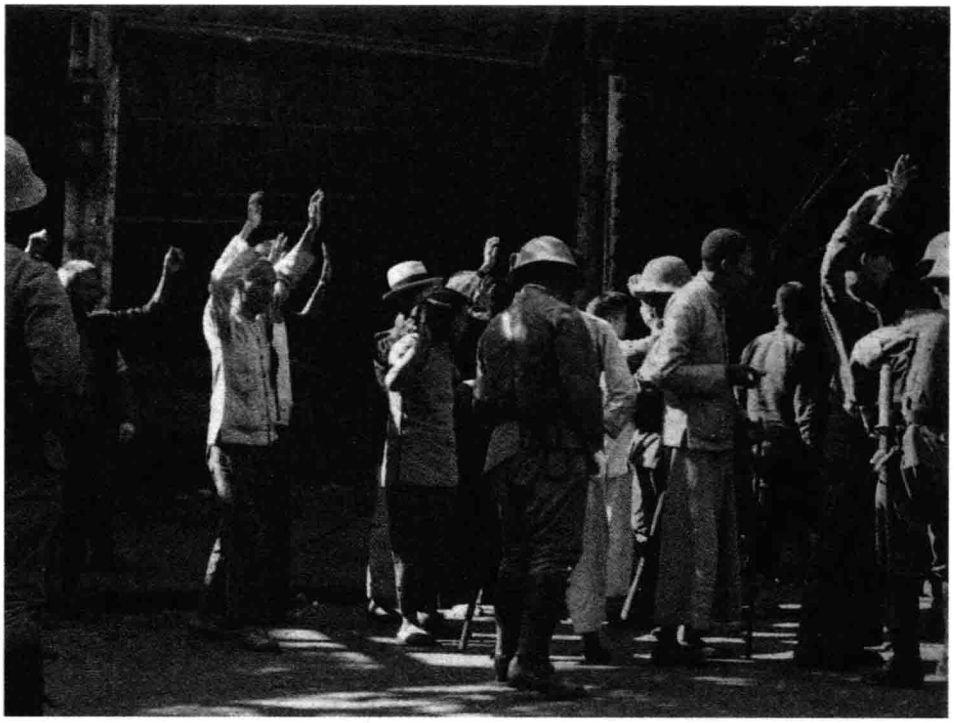
2 1938年12月中旬，广东省佛山镇，日本宪兵将被其抓捕的“强盗”反剪双手后，在其胸前贴上写有他们姓名的白纸，当街示众。在“强盗”队列的左侧，立有“倘有胆敢入屋行窃或盗取他人财物者当以此种处罚”的警示牌。〔《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第13页〕

3 1938年12月中旬，占领广州城后，日军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鸠占鹊巢，入驻“广东省会警察局”即广州警察局大院。图为宪兵队市区检验班由此出动的情景。〔《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第13页〕

1　1938年12月中旬，广东佛山归乡难民受到日本宪兵的搜身检查。〔《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第20页〕

2　1938年12月中旬，在佛山镇某街道一侧墙柱贴有“良民保护协同，凶犯惩戒处分”的标语下，这些被日本宪兵反剪双手罚跪在街道一侧的所谓“凶犯”，其实大多是年迈的老妪，其善良面孔完全不像强盗。〔《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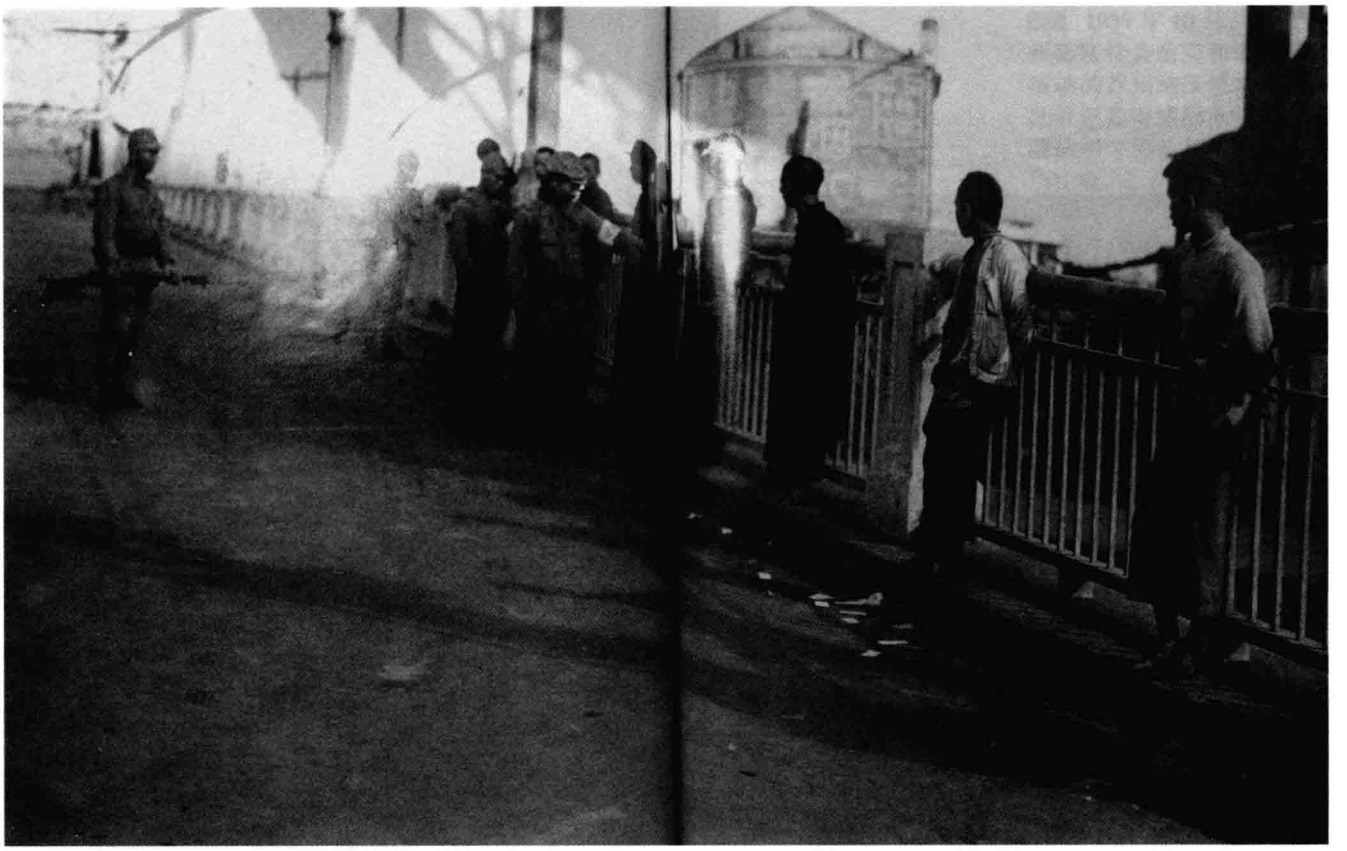
3　1939年1月，广州的汉奸组织举办的慰问日本宪兵与伪广东自警团之警备队的“日华联欢大会”。〔《支那事变画报》第52辑，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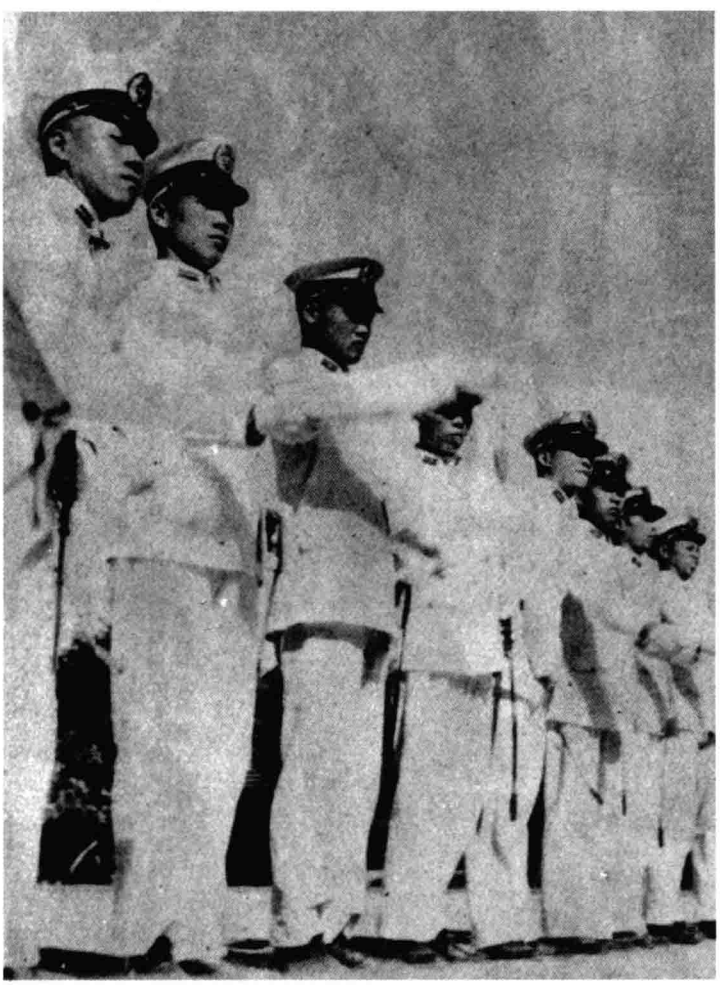
1

2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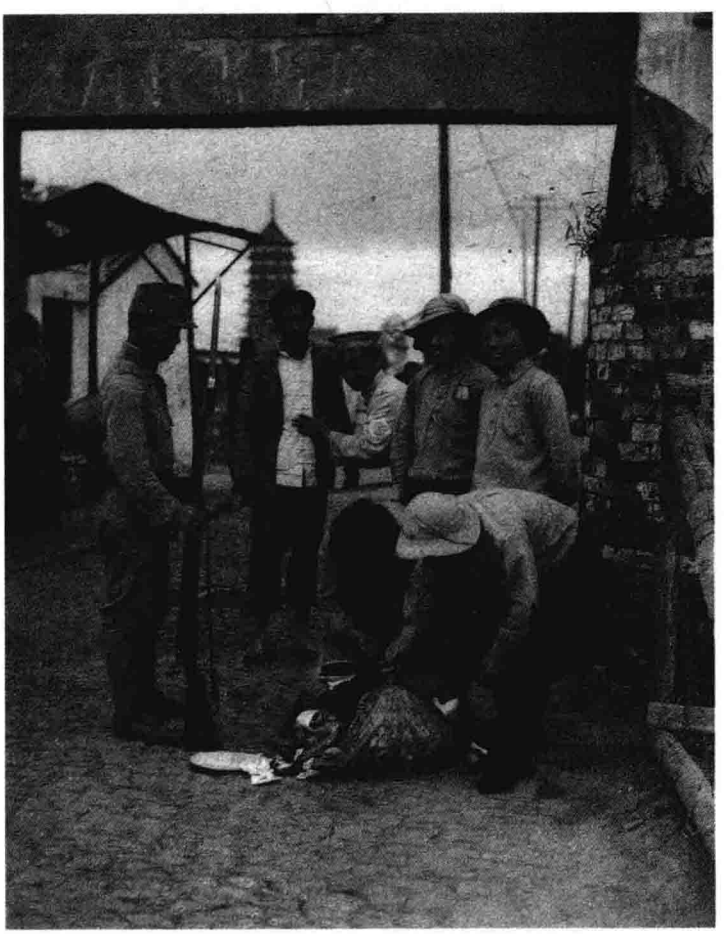
2

1 1938年11月3日，日本宪兵把被他们抓捕的中国“便衣队”捆绑到广东大亚湾桥的栏杆上。〔《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年（1975）七月一日版，彩色插頁〕

1 日军占领广东地区后，伪维新国民政府在广东组建了维持治安警察队，以配合日本宪兵对公众实施管控。〔杨莲福提供〕

1939 年 10 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番禺县绥靖军成立大会。日伪在各地成立的绥靖军在镇压抗日力量、维护其统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图为日本画报摄影记者对此次成立活动的报道。〔《支那事变画报》第 69 辑，第 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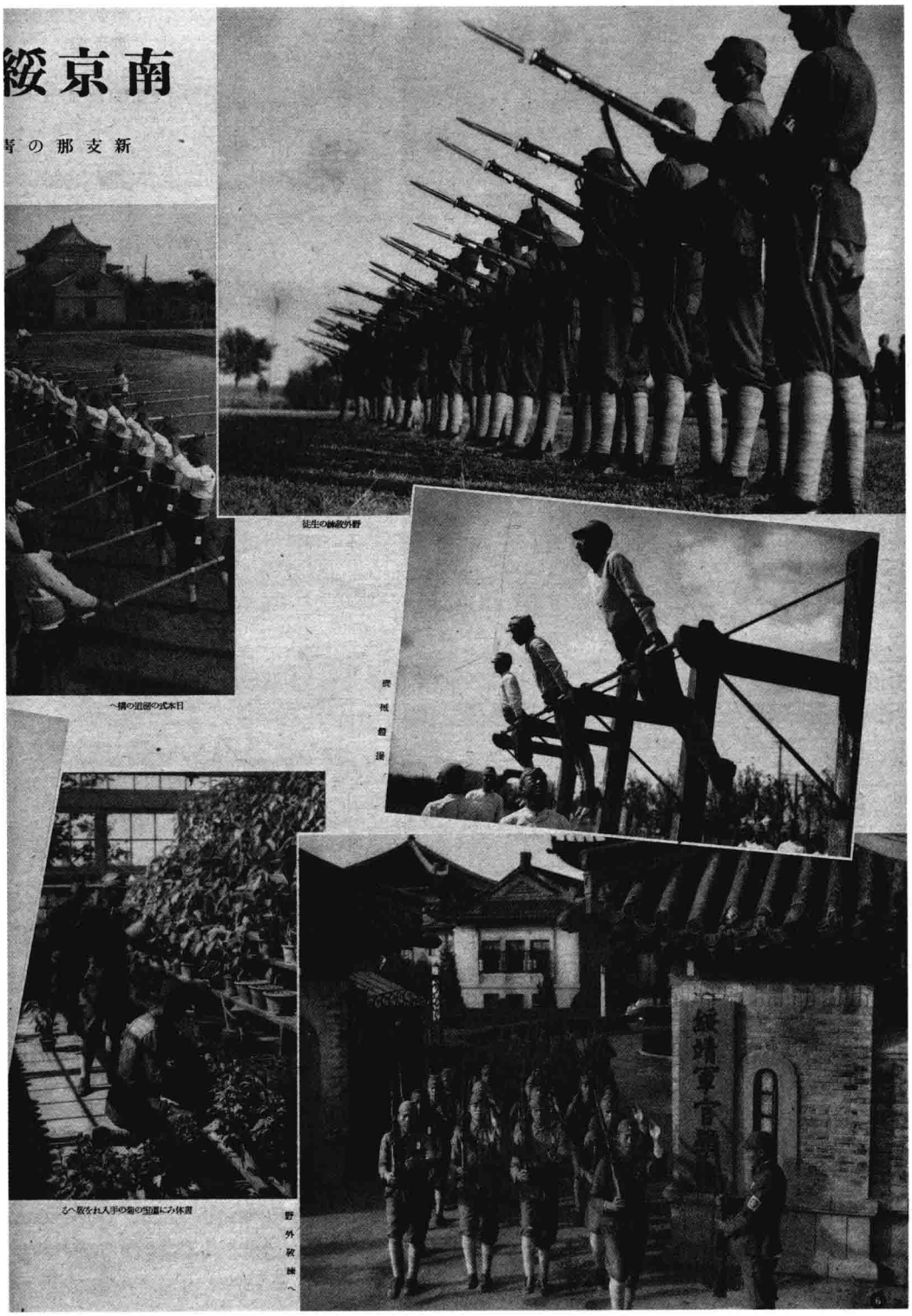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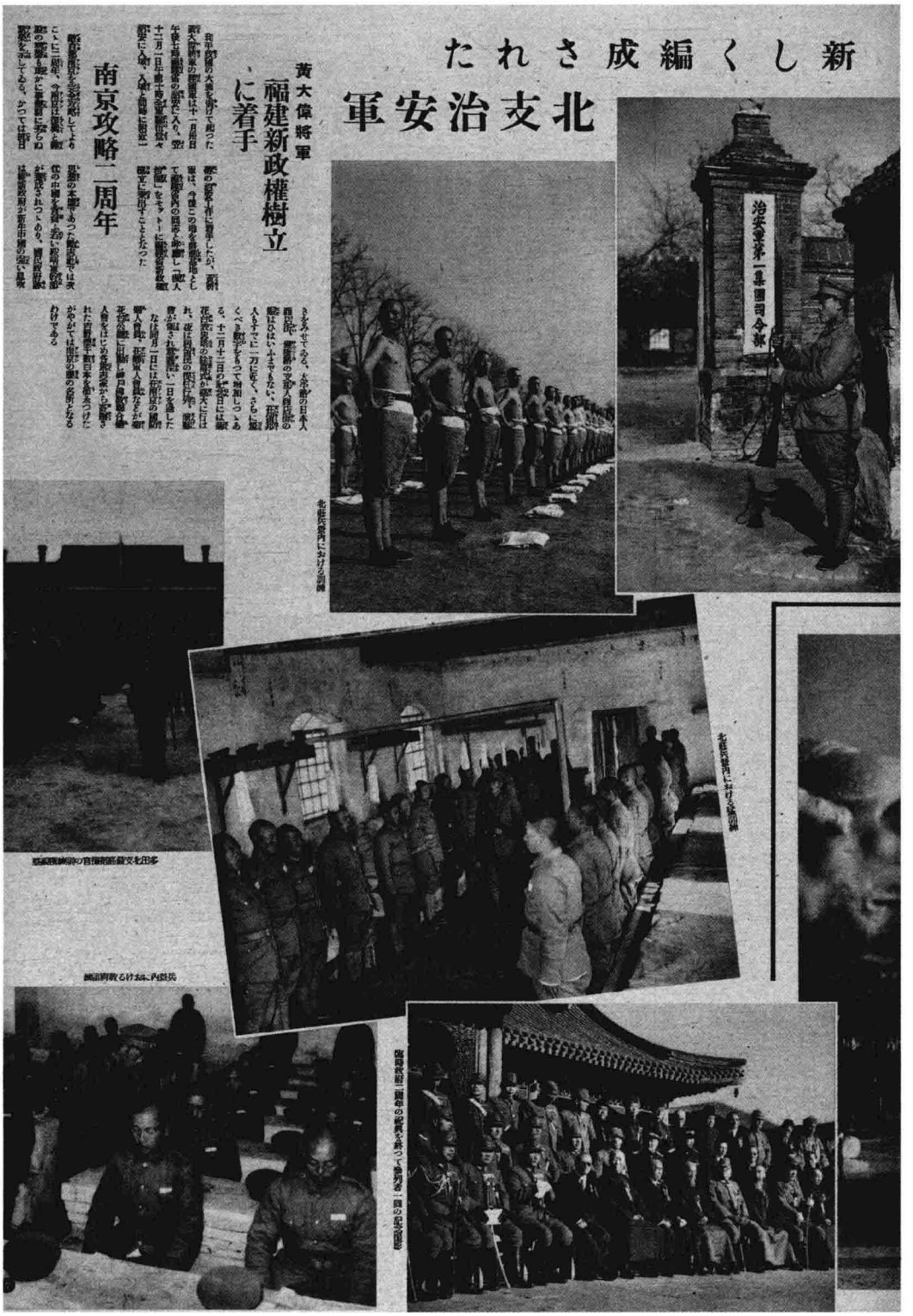
2

1 1939 年 10 月，负责苏州街区社会治安和镇压反日活动的苏州地区绥靖公署。此处还是绥靖部苏州地区绥靖队司令部及其军法处机关所在地。〔《支那事变画报》第 70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11 月 5 日发行，第 18 页〕

2 1939 年 10 月，在苏州城乡接壤，日伪军警搜查平民身体及其包裹。〔《支那事变画报》第 70 辑，第 18 页〕



1939 年 11 月，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并发表的一组有关伪南京绥靖军官学校的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 71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11 月 20 日发行，第 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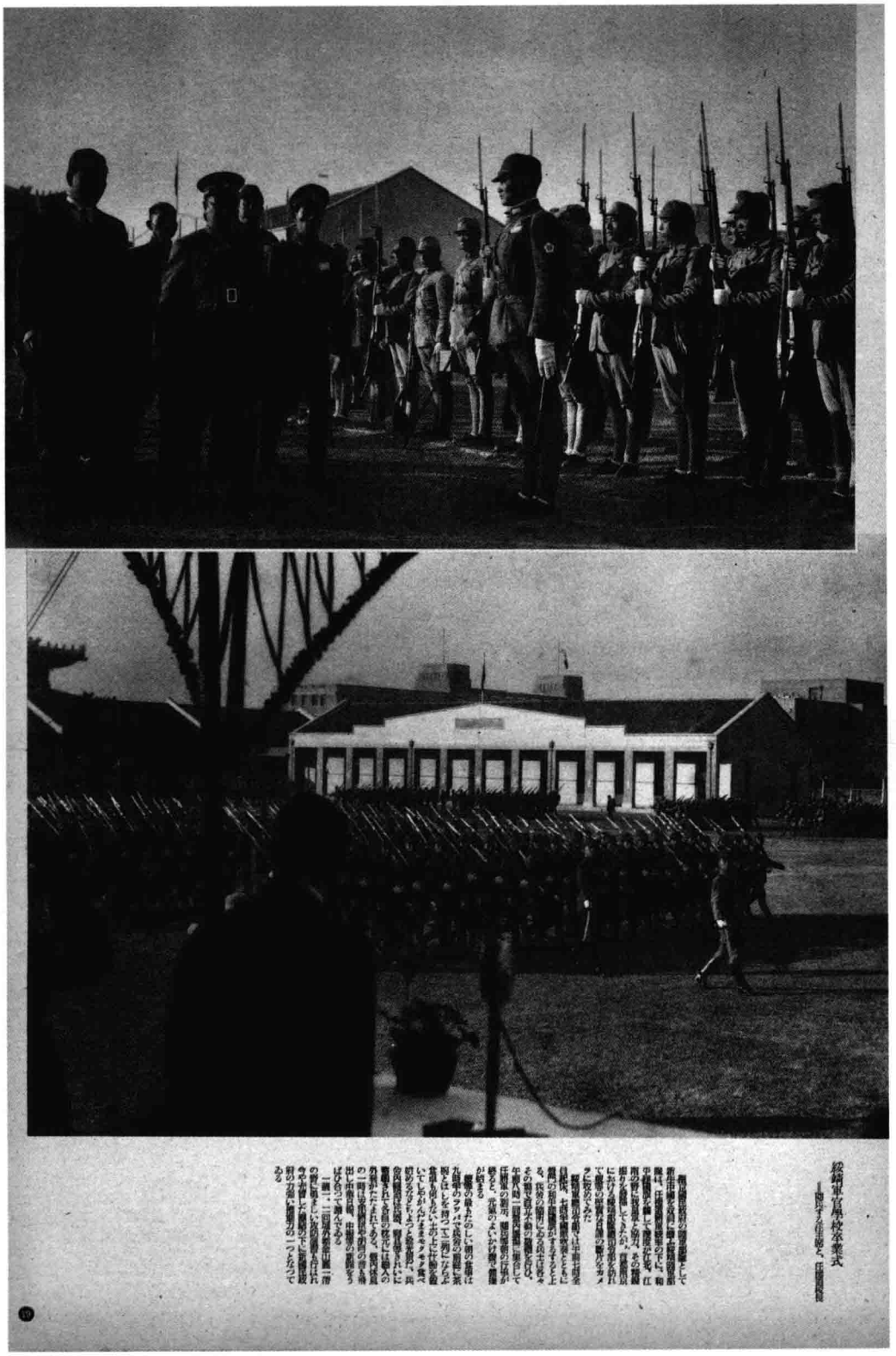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并发表在《支那事变画报》上的有关伪华北治安军活动的一整版新闻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74辑，第7页〕

1 1940年5月，在日伪军警监控下的于武汉街头上演的所谓“新政府拥护运动”。〔《支那事变画报》第83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5月20日发行，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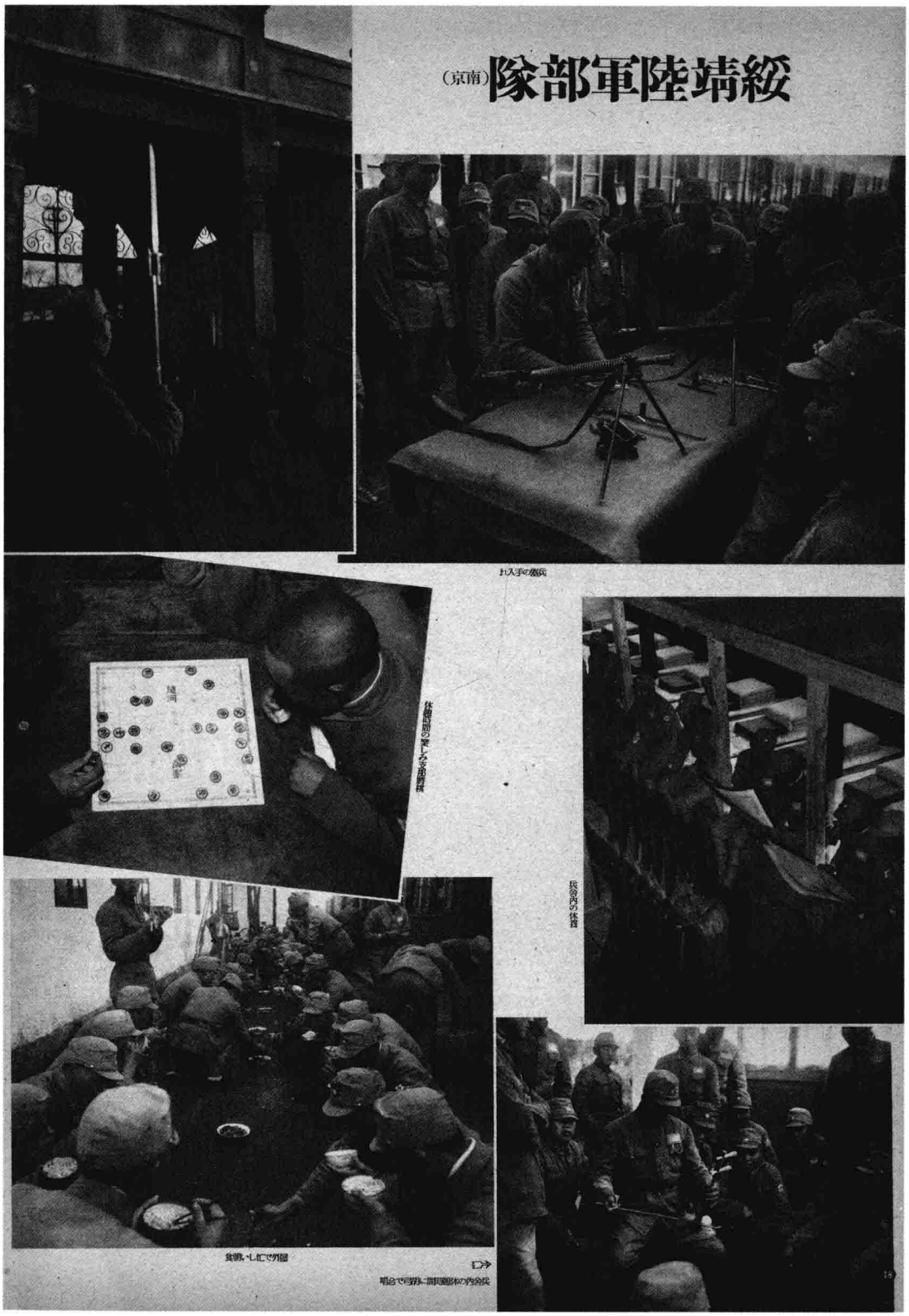
2 1941年7月1日，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任命李士群为该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处长的布告。〔《支那事变画报》第97辑，第23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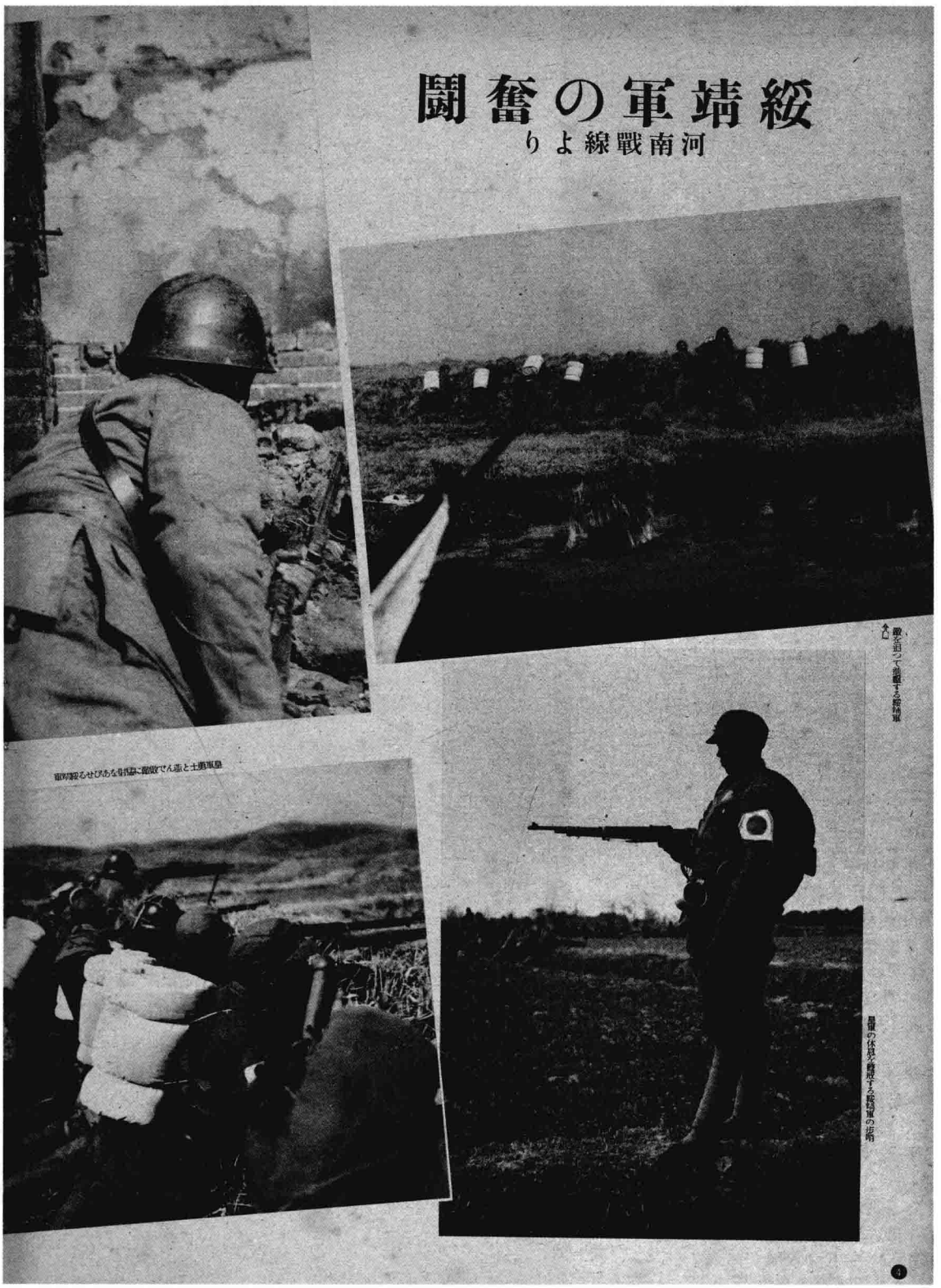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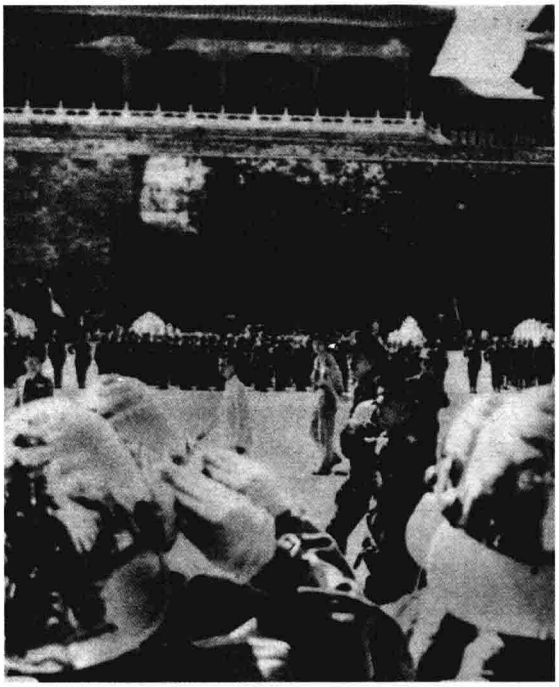
1940年12月，日本随军摄影记者对汪精卫出席汪伪绥靖军官学校毕业典礼的一组报道。〔《支那事变画报》第90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0年12月20发行，第19页〕



1940 年 12 月，日军随军记者拍摄并发表的有关南京绥靖陆军部队守备、训练和军营生活的一组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 90 辑，第 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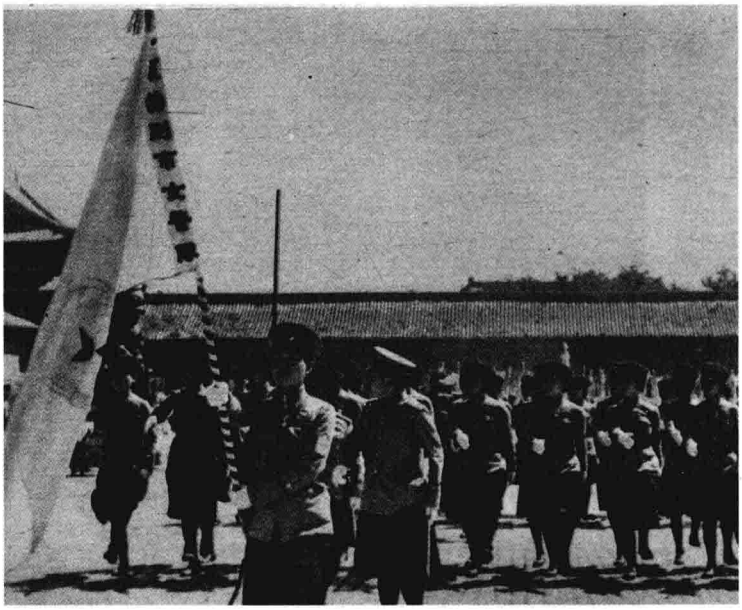


1941 年 2 月，在河南前线与抗日武装作战的汪伪绥靖军。〔《支那事变画报》第 92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41 年 2 月 20 日发行，第 4 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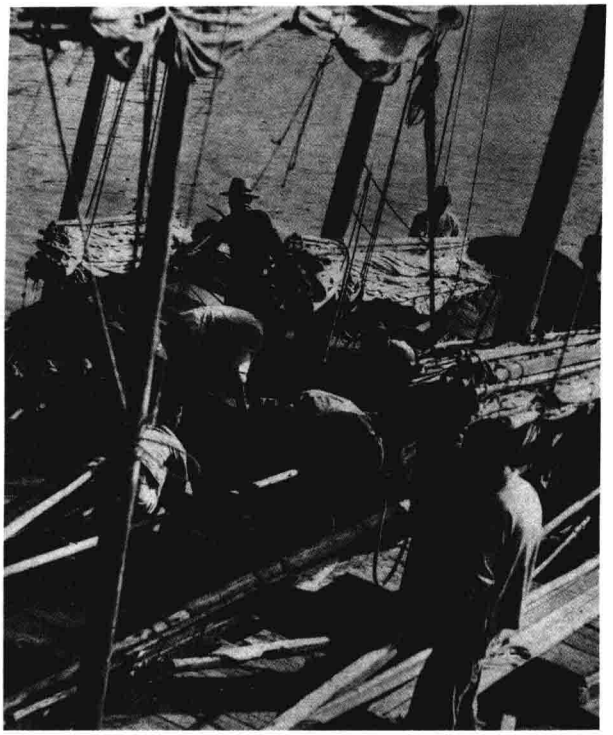
4

1 1941年9月中上旬，日伪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检阅式。〔《支那事变画报》第99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1年9月20日发行，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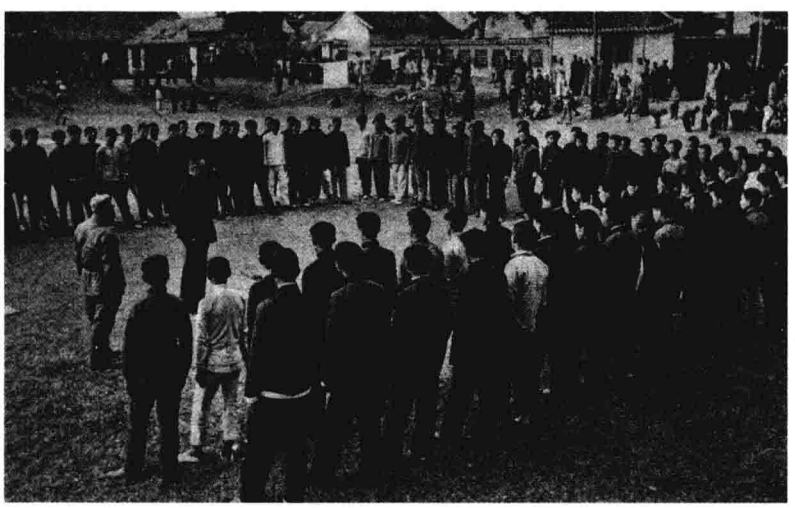
2 1941年7月，伪暂编陆军第十师乘车出动“围剿”新四军。〔《支那事变画报》第97辑，第22页〕

3 1941年9月中上旬，在北京参加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伪北京特别市女警队的分列式。〔《支那事变画报》第99辑，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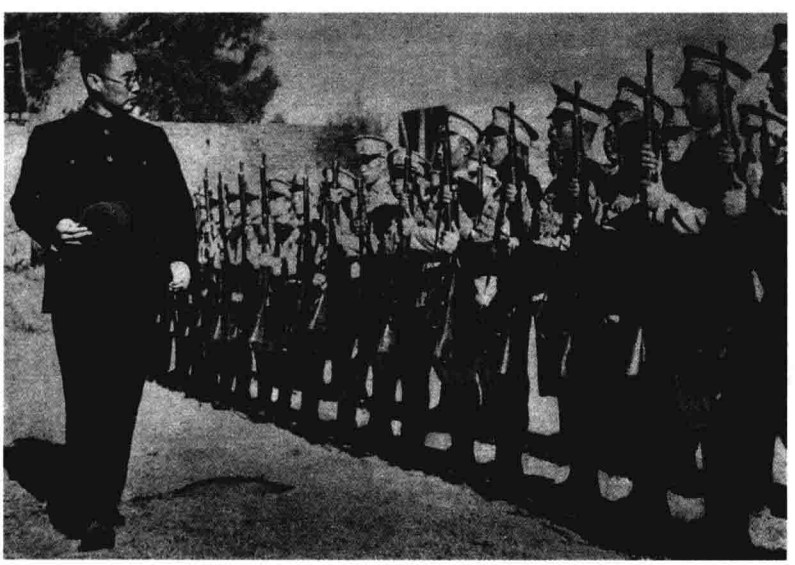
4 1941年9月中上旬，日伪高官在天津举行的水上警察阅兵式上。〔《支那事变画报》第99辑，第20页〕



1



2



3

1 1941年11月中上旬，日军宪兵搜查中国渔船，进行所谓的“治安工作”。〔《支那事变画报》第101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41年12月8日发行，第20页〕

2 1941年11月中上旬，伪常熟县政府组织青壮年成立乡村自卫团。图为伪县长向自卫团训话的情景。〔《支那事变画报》第101辑，第29页〕

3 1941年11月中上旬，“清乡”行动开始之前，伪常熟县县长检阅参加“清乡”的伪警察队。〔《支那事变画报》第101辑，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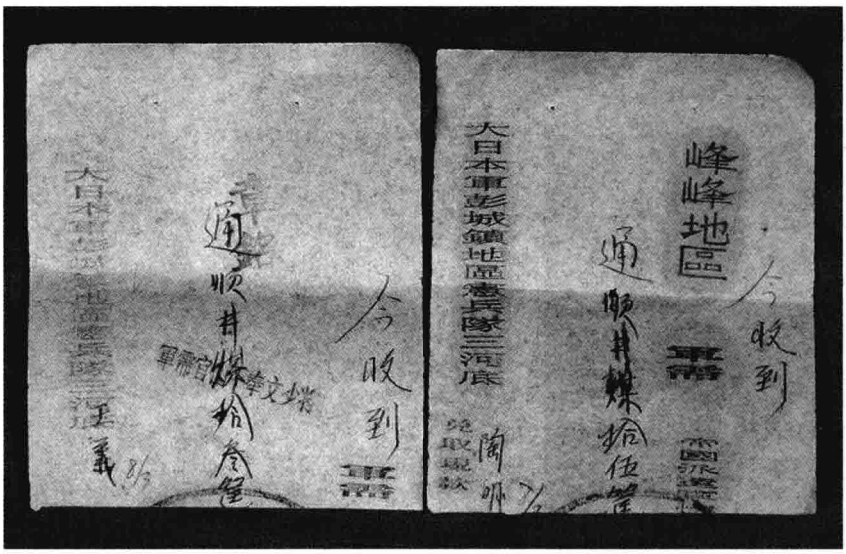
■1 经日本宪兵队检查盖章后，被寄往马尼拉的外文明信片。〔http://www.kongfz.cn12342384pic，2015 年 3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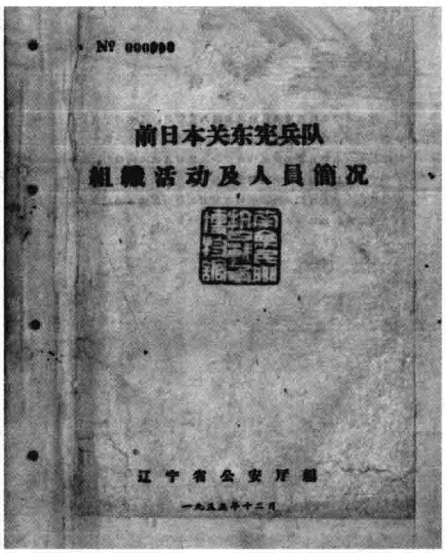
■2 驻扎河北邯郸彭城镇地区的日本宪兵队三河底开具的收条。〔杨建明提供〕

■3 1955 年 12 月，辽宁省公安厅编的《前日本关东宪兵队组织活动及人员简况》的封面。〔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藏〕

■4 日本济南宪兵队队部。〔杨建明提供〕

1


2



3

4

三、广设特务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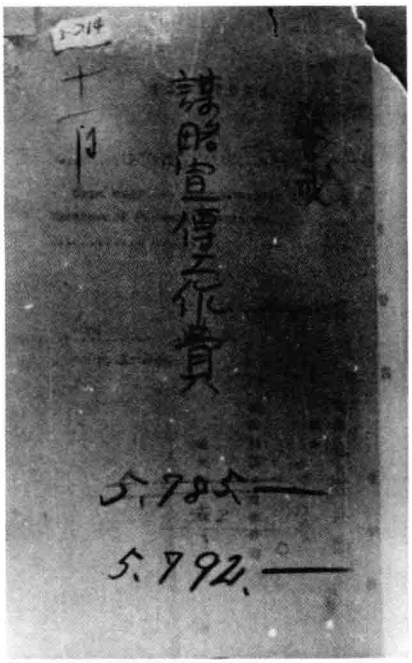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特务机关的活动逐渐公开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其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北宁、津浦两条铁路沿线区域。北宁线由廊坊到山海关，津浦线由天津到沧县，重点地区（如塘沽、唐山、山海关、沧县）均设有联络点，其负责人为山下中佐等，松井大佐为最末一任的特务机关长，直至日本投降。特务机关的活动，总的目的都是为了配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除天津的各个特务机关外，北平、通县、保定、唐山、济南、青岛、太原、张家口等地也先后都立了由天津日本驻屯军领导的特务机关。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在北面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主要开展对苏间谍活动；在南面以奉天（沈阳）为中心据点，从事对华“谋略”工作。关东军成为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地统治的“太上皇”。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在维持伪满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伪满初期的警务委员会等统治机构中，特务机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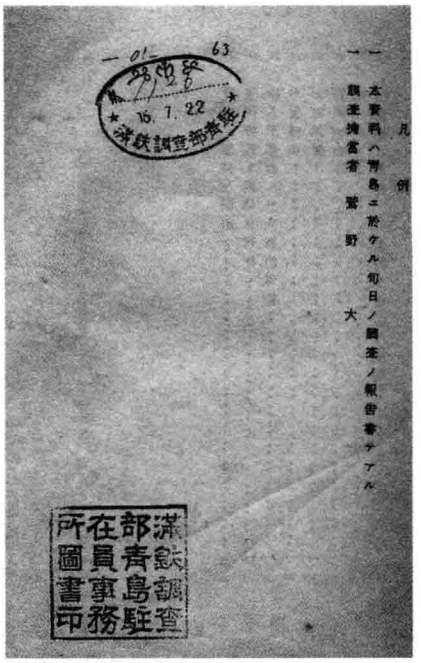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加强开展所谓“秘密战”。关东军特务机关一方面加强对苏谍报谋略活动，一方面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和破坏。为此，关东军决定在原有特务机关的基础上，又在伪满政权内部设立由其直接控制的特务机关伪保安局，形成“日满协作”的特务系统。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共同镇压“反满抗日”的中国人民。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活动于中国东北，还将黑手伸向内地。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定了分离华北的计划。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大肆进行侵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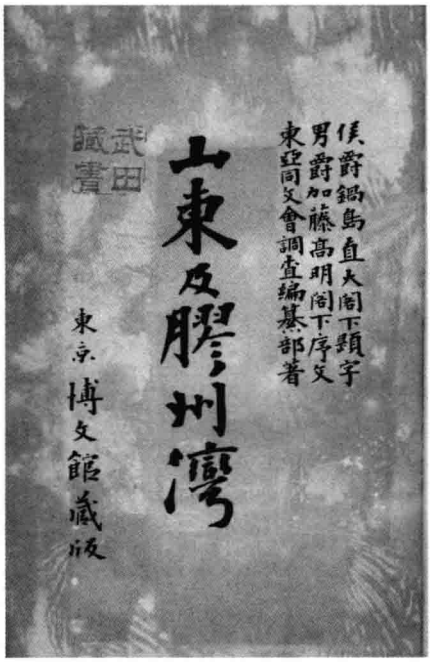
在中国抗战爆发三周年之际，当日本已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之时，日本山东特务机关总长河野在日本大阪媒体华北版宣扬中日合作，配合汪精卫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8月31日，双方草签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按照该文件的内容，中国完全沦为满足日本军事经济需要、任其榨取勒索的殖民地。该条约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卖国条约。



1



2



3

4

■1 日本间谍谋略宣传工作费用清单。〔戚厚杰主编：《日谍在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26页〕

■2 1913年，“铁满调查部”青岛驻在员事务所特务制作的调查报告。〔阎立津、李生德、阎振辉编著：《日本两次侵略青岛图志》，青岛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7页〕

■3 1914年日本特务机构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印行的《山东及胶州湾》。〔日本人武田收藏〕

■4 金璧辉（川岛芳子）与日本军官的合影。〔杨克林、曹红编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336页〕

1

2

3

4

1 金壁辉（1906—1948），原清朝皇族，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女，日文姓名川岛芳子。六岁时，她被父亲送给日本友人川岛浪速养育，取日本名川岛芳子。最终她为日本特务所利用，走上叛国的道路。〔王延友提供〕

2 1932年担任伪安国军司令的金壁辉（左）。她一身戎装，右侧坐立者为在伪满政府任职的日本文官和武官。金壁辉曾协助日方策划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及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秘密潜逃旅顺事件。〔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963页〕

3 1948年3月25日，金壁辉在北平遭枪决后的遗容。因子弹从后脑射入后由脸部穿出，其面部遭到毁坏。〔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960页〕

4 中国行刑法警和中外记者对金壁辉的尸体进行查验和拍照。〔秦风老照片馆编：《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下），第960页〕

1

2

■1 影佐祯昭（1893—1948），日本陆军中将，特务机构首脑之一。参与创办兴亚院，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策划建立汪伪政权的活动，设立特务谋略机构“梅机关”并担任机关长。〔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第 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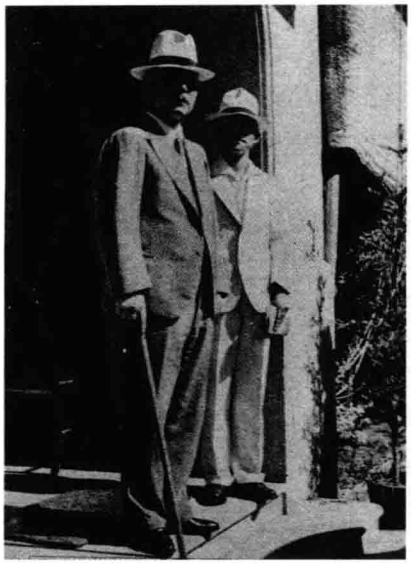
■2 日本派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傅光中提供〕

■3 1931 年 11 月 10 日，土肥原策划天津骚乱，使溥仪乘戒严之机逃出天津。〔赵继敏提供〕

■4 在土肥原、川岛芳子等日本特务的密谋下，1931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2 时许，溥仪等人登上日舰“淡路丸”，通过海路去往东北。〔赵继敏提供〕

3

4



1

2

3

4

5

1 日本北平松井特务机关长寺平大尉（右）。〔《支那事变画报》第2辑，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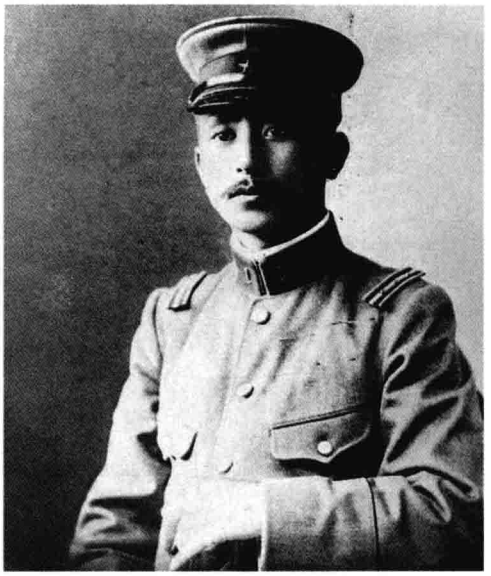
2 设在通州的日本特务机关。〔毕英杰、白描编：《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70页〕

3 1937年7月29日，在通州事件中被伪冀东政府保安队击毙的日本驻通州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朝日新闻》1937年8月1日，第2版〕

4 驻承德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原址大门。〔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史实》，（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54页〕

5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主要成员：前排左起中岛中佐、松井机关长、樱井少佐。〔洪桂已编纂：《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台北“国史馆”1986年6月编印，第19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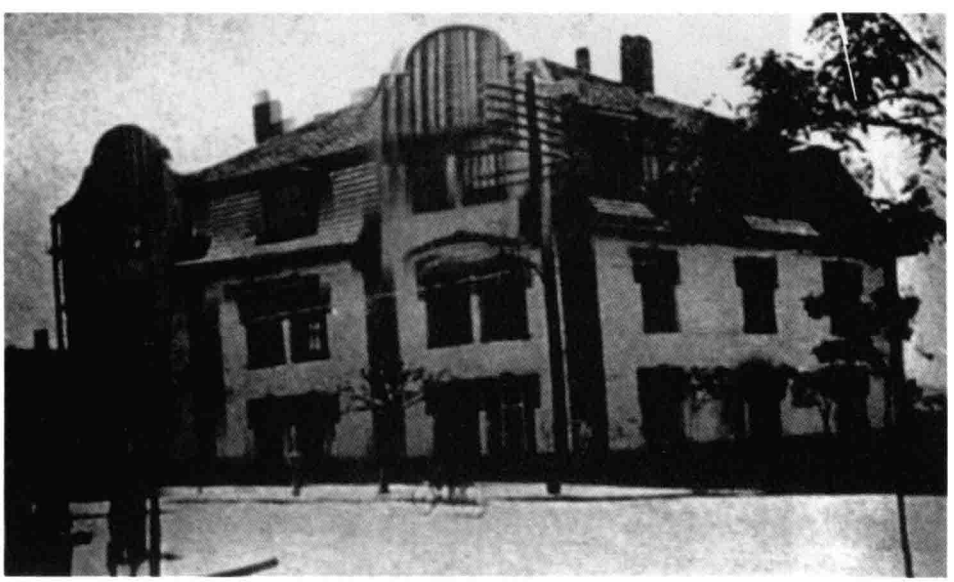
1 河野悦次郎（？—1944），日本陆军中将。曾任太原、青岛、济南特务机关长等职。〔http://zh.wikipedia.org/wiki/河野悦次郎，2012年11月15日〕

2 梅津美治郎（1882—1949），日本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参谋总长等职务，后担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1935年6月，迫使中方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杨克林、曹红编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上册，第267页〕

3 满铁调查部大楼。〔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方志馆编：《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机构图鉴》，第191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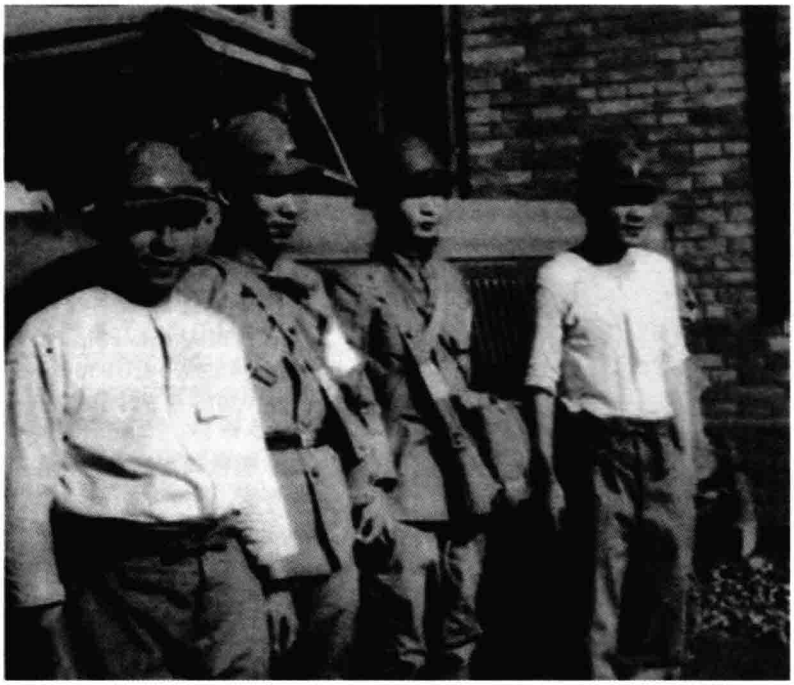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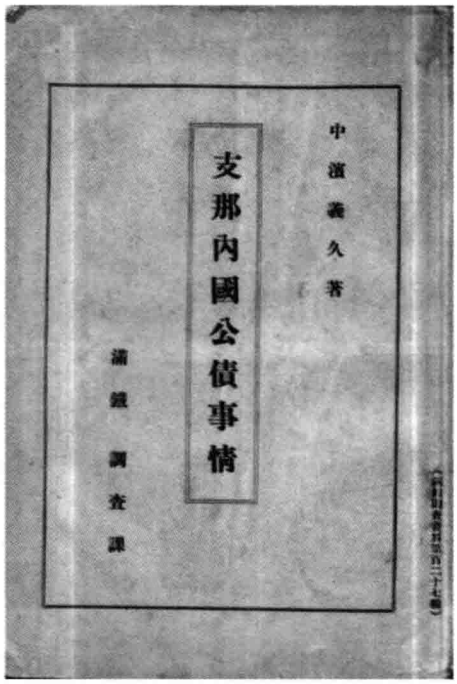
1 位于大连南山街10号的日本陆军奉天特务机关大连出张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e715cd0100bb72.html，2015年3月3日〕

2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日本宁波特务机关旧址。〔《宁波沦陷七十周年祭》，2011年3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0pnn5.html，2015年3月19日〕

3 满铁调查部青岛驻在员事务所。〔阎立津、李生德、阎振辉编著：《日本两次侵占青岛图志》，青岛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4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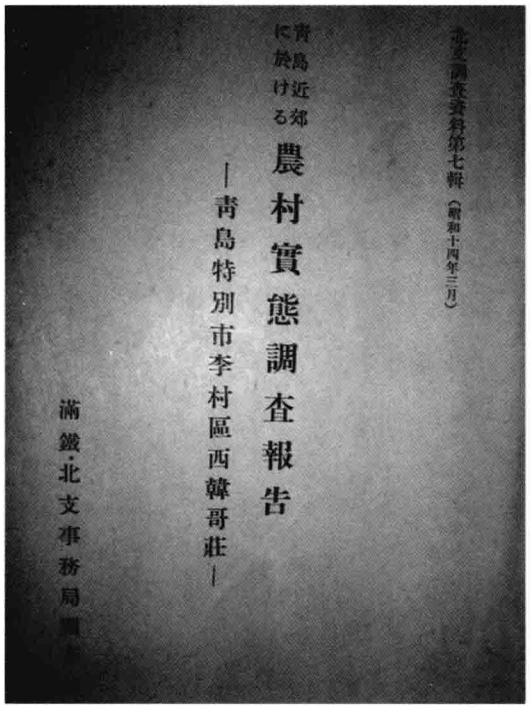
4

1 满铁调查部人员。〔沈克尼：《日本满铁调查部的兵要地志调查及情报搜集》，《军事世界》2012年第14期〕

2 满铁调查课编印的《支那内国公债事情》。〔武菁提供〕

3 在中国内地进行间谍调查的满铁铁道调查第四班成员。〔戚厚杰主编：《日谍在中国》，第61页〕

4 1939年5月8日，日本济南陆军特务机关提交的秘密报告《山东省产业经济概况》。〔《各种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报告（选）》，2010年3月2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f6e800100h4op.html，2015年3月1日〕



1

2

3

4

■1 1939年3月的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关于青岛近郊李村区西韩哥庄农业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2325c0102esux.html，2015年3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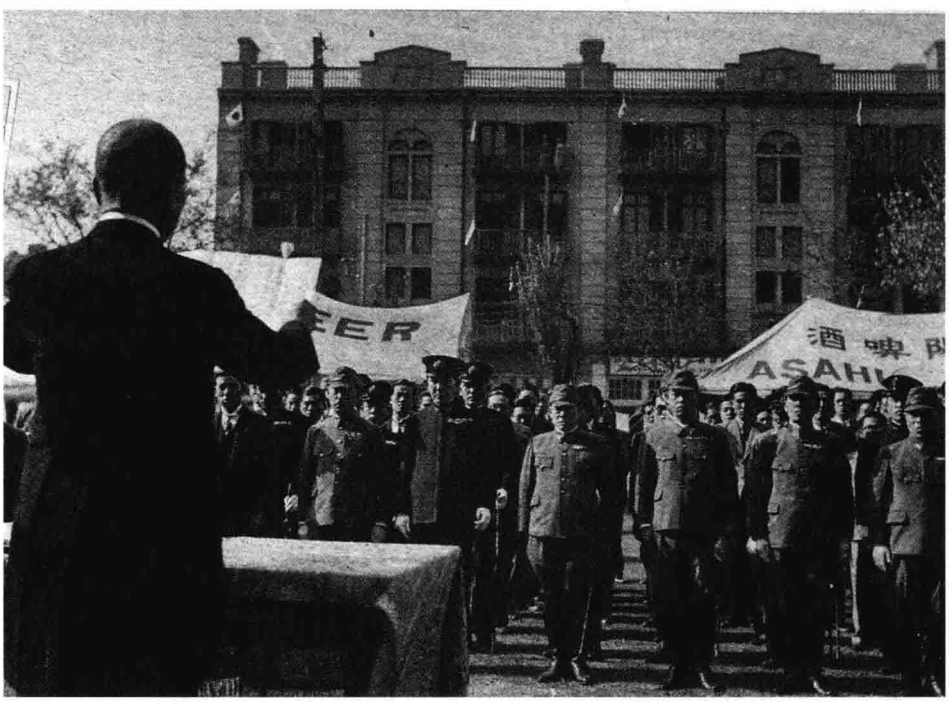
■2 日本特务雇佣的汉奸赵龙田。〔《良友》1937年5月号128期，第6页〕

■3 德王身边被日本兵特机关安插了间谍。图为伪蒙古新政府主席德王（左二）、伪蒙疆政权将领李守信（左一）与日本人的合影。〔《支那事变写真帖》，无页码〕

■4 曾担任日本间谍的意大利人万斯白（左首第二人）。〔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文缘社译，国光印书馆1945年10月版，第3页〕

1

2



3

1 日本负责管理伪蒙及汪伪控制区域特务事务的部级机构兴亚院。《决定版昭和史8·日中戰爭勃発（昭和12—13年）》，每日新聞社昭和五十九年（1984）四月三十日版，第81页〕

2 兼有谍报工作使命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支那事变画报》第55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9年3月20日发行，第30页〕

3 日方在武汉举行的华中联络部成立后的"开厅式"上，该部负责人津田向部属训话。〔《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29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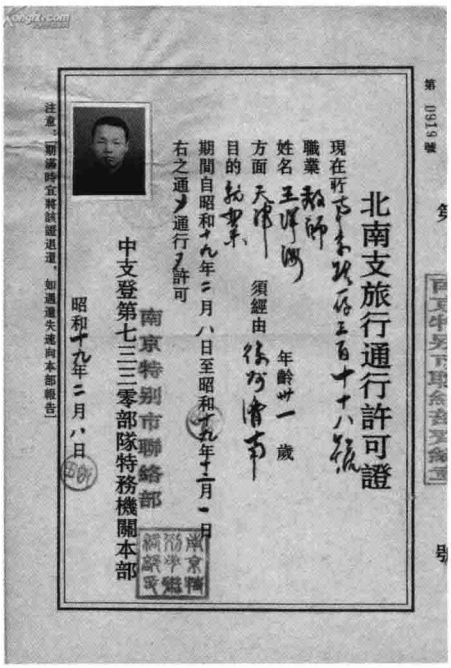
3

1 1939 年 12 月上旬，参加北京新街道“地镇祭”的喜多兴亚联络部长在“地镇祭”的填土仪式上。〔《支那事变画报》第 73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12 月 20 日发行，第 18 页〕

2 1941 年 3 月 1 日，天津体育场，日伪组织召开的“新民运动民众大会”，山下特务机关长到会致祝词。〔《支那事变画报》第 93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41 年 3 月 20 日发行，第 18 页〕

3 野田部队长为首的日军便衣队。〔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编：《满洲派遣纪念写真帖》，昭和九年（1934）4 月至昭和十年（1935）6 月印刷，无页码〕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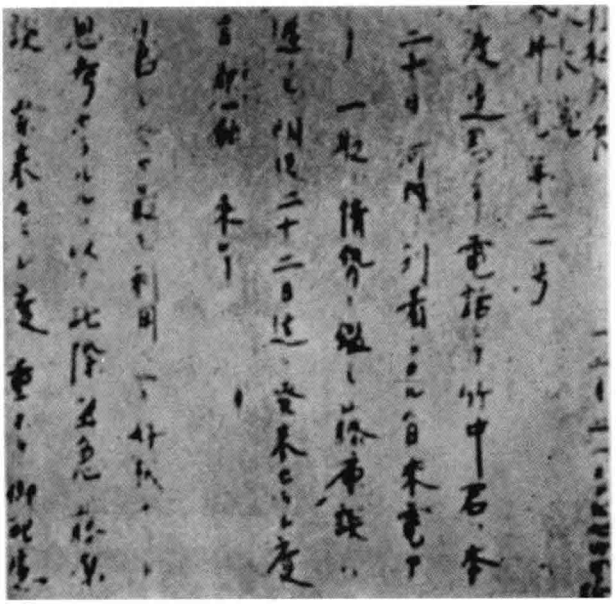
4

■1　1939年1月，日本特务机关组织训练汉奸“突击队”。〔《支那事变画报增刊》第26辑，封底〕

■2　1944年2月8日，中支登第七三三〇部队特务机关本部南京特别市联络部颁发的《北南支旅行通行许可证》。〔杨建明提供〕

■3　日本特务机关丹阳宣抚班在工作。〔钟建华：《日本特务机关丹阳宣抚班始末》，2013年2月6日，http://www.dydaily.com.cn/culture/shidian/2013/02/16/162717.shtml，2015年3月3日〕

■4　1943年前后的日军山东特务头子、济南特务机关长河野中将与伪军将领张宗援（左二）等合影。中间站立者为河野，拍摄地点为青岛。〔寻找父辈的历史足迹：http://blog.sina.com.cn/yyqsz，2015年3月19日〕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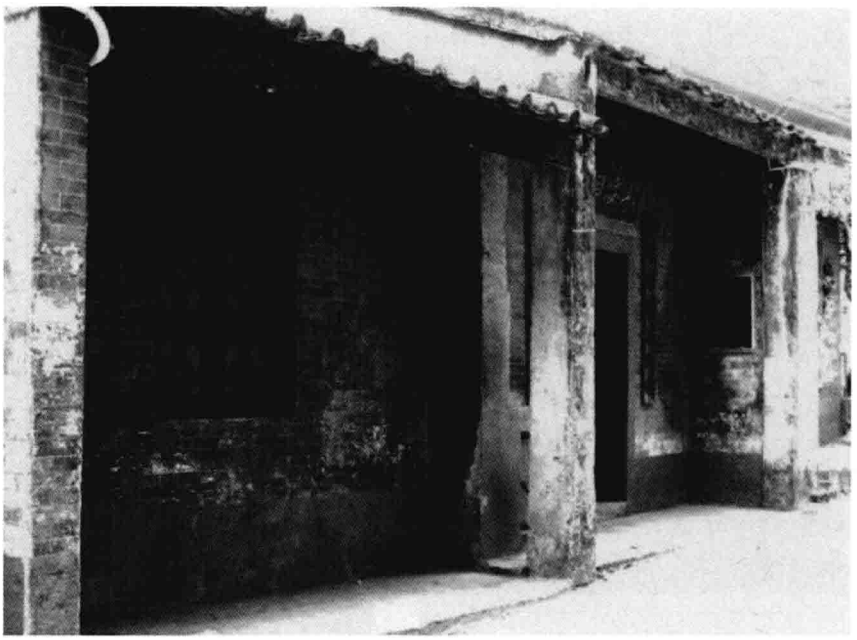
1 汪精卫逃出重庆后，今井武夫向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发出的密电原件。〔翁玉荣:《中国革命史图集》,（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第 220 页〕

2 战后，梅思平书写的他在日本特务的挑唆下投敌卖国的经过。〔万仁元：《汪精卫与汪伪政府》下册，第 85 页〕

3 1940 年 11 月 30 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图为条约的部分内容。〔翁玉荣:《中国革命史图集》，第 221 页〕

4 日本间谍开设的提供色相服务的按摩馆，既搜集情报，又腐蚀中国人。〔戚厚杰主编：《日谍在中国》，第 37 页〕

1 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鸦片馆，经常被作为间谍的据点。图为在河北某地的日本鸦片馆。〔戚厚杰：《谍影：日本侵华中的间谍秘档》,（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3 年 6 月版，第 4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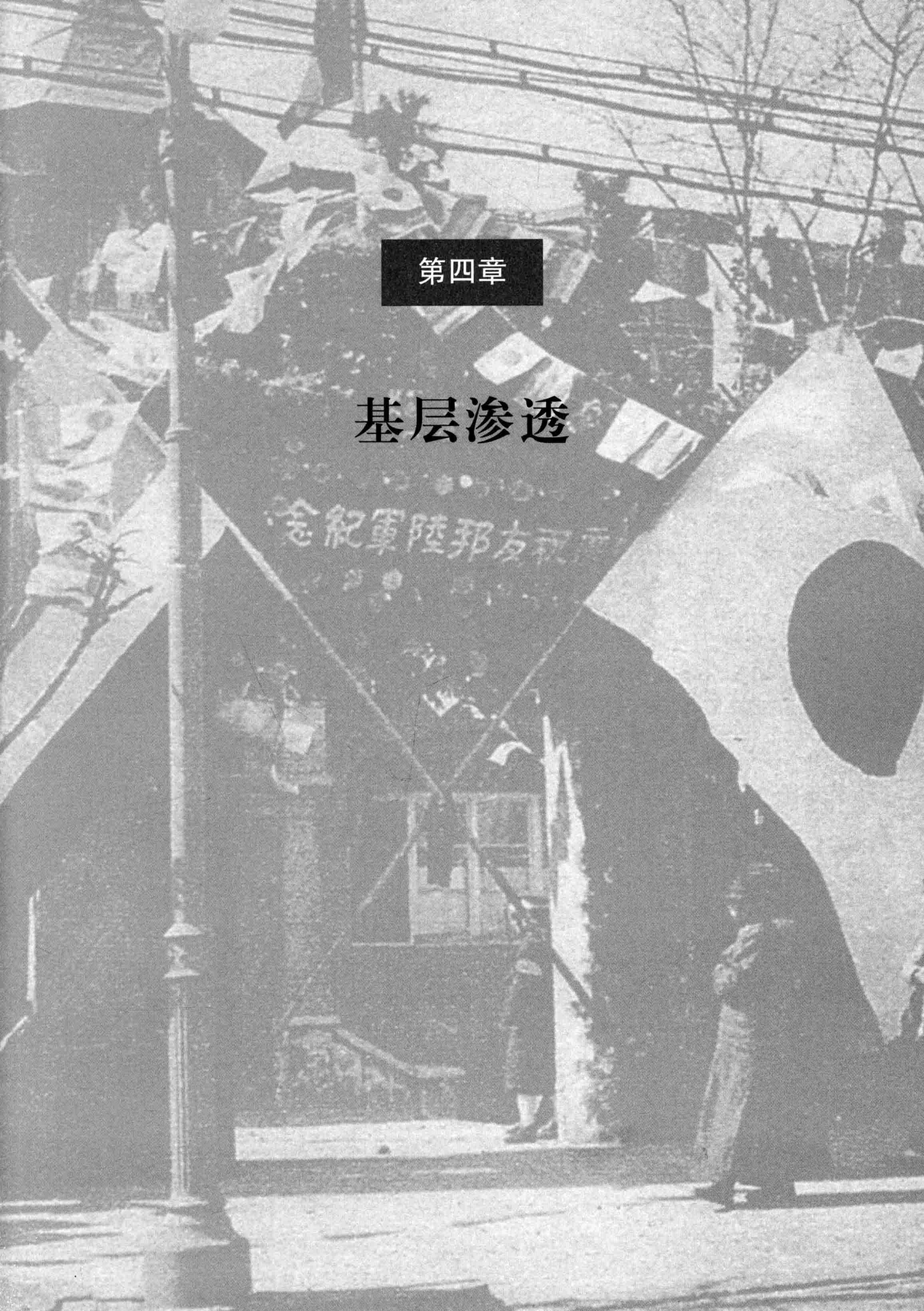
1

2 图为着中国旗袍负责搜集情报的日本妓女。〔戚厚杰：《谍影：日本侵华中的间谍秘档》，第 47 页〕

2

3 日本间谍无孔不入，僧人也是他们常用的身份。图为上海东本愿寺的僧人与在华日侨。〔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57 页〕

3



第四章

基层渗透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为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通过各种社会组织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向基层渗透。日军每攻一地，即建立各种统治政权和奴化机关，采用军警镇压、机关管控、欺骗宣传等措施，实施“以华治华”的统治政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县或县以上政权机构瘫痪，县政府官员有的随中央政府西撤，有的则转移到农村。实际上当时县一级行政机构极其混乱，常发生一县有几个县长对立：有原国民政府的县长，有国民党军队新委任的县长，也有未经委任而自行由地方绅士推举的县长。

1938年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各县公署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以及秘书处，各科设置科长及科员2至4人。负责本县之户口调查、保甲编制、财政整理以及战后建设、教育复兴等各项行政事务。另外县公署还要负责本县的禁烟、自卫等事宜。县公署之外还成立县政咨询会，由县知事延聘地方公正人士6至12人组成。县政咨询会为议事机构，议决的事项包括县单行规则、县预算决算、县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等。有关法规还规定凡未设地方法院或县司法处之各县，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1938年8月，“维新政府”又命令一部分县知事兼任县警察所所长。伪县知事似乎总揽一县的行政、司法、财政、治安等诸多大权。实则不然，“维新政府”时期，尽管华中、华东地区的日军并不像它在东北那样，大小机构都有日本人做副职，但其对各县行政事务插手较多，甚至在日伪政权成立后长时间内日本顾问与县知事同室办公。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取代“维新政府”。为取得其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地位，与“维新政府”不同的是，汪伪政府的基本口号是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1940年6月，汪伪政权改省长制为省主席制。8月，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政府下设第一、二、三科和秘书处。各县直属机构设有区公所、卫生事务所、县立医院、县警察大队、自卫团总部、县金库、警察局、教育局、财政局，仿效战前国民政府科局并行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县政府的科是县公署的一个下属单位，县知事掌握科长的任免权，并全权管理一县之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的局，虽然隶属于县政府，但各局的人事权控制在省政府相应的主管各厅，各局局长大多由省政府主管各厅指派。实际上一省之内的建设、财政、民政、教育等各部门均各自为政，如关于教育的政策是由省政府的教育厅制定，下达至县府的教育局执行，县长对此也无权过问。沦陷初期这种制度已中断，汪伪政府将财政科、教育科改为财政局、教育局，各局长多由主管各厅指派，自成系统，下则径发局令，对上则径报本厅。各局之间，亦只有个别发展之企图，缺乏统一之意志，致一县之工作中心，无从确定。汪伪此举旨在渗透基层，收回事权，控制税收。

然而，此时的县府各局对伪省府各厅的依赖程度，远逊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伪县府各局之于省府各厅不再唯命是从。为改变省县之间这种不相统属的关系，日伪在华东、华中地区频繁发动“清乡”，扫除基层渗透的障碍。

对日本占领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以便取得各种资源。日伪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就在农村建立各级行政组织，力图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大多自行解散。一段时间内，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地痞流氓倾巢出动，土匪帮会武装抢劫，殷实富户拥兵自卫。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迅速在占领区建立傀儡组织，一方面维持其占领区秩序，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些组织汲取物资以支撑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沦陷初期日军在各城镇建立的维持会、自治会只是准政权组织，迄至 1938 年 3 月“维新政府”成立后，日伪县政权机构——县公署才正式成立。1940 年 3 月，日汪政权宣布恢复战前国民党政权的“法统”，遂将县公署改名为县政府。

除了军事镇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进行欺骗与愚弄，鼓噪“中日亲善”“互相提携”，通过维持会、自治会、新民会、宣抚班等各种组织活动及控制手段，向基层渗透。

一、组织“维持会”

维持会又名“治安维持会”，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官员撤离后，伪政权尚未正式建立之前，由各地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的维持地方秩序，或为日军供应军需的过渡性政权组织。抗日战争伊始，日军为了加强地方控制、筹集粮秣，建立了互不统属的“维持会”，作为一种临时政权机构。1938 年 3 月，“维新政府”成立，日本侵略者将汪伪政权推至前台，着手组建县公署，建立了“正式”的基层行政机关。但维持会仍然保留到抗战结束。此外侵略者在县乡建立保甲机构，实行连坐和互相检举的办法，加强地方社会控制。

日军占领某个城镇之后，便多方物色该地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建维持会。参加维持会的人员身份复杂多样，其动机亦各异，但维持会上层成员基本上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成为日军每到一地寻求的目标，他们具备与日本人合作的条件。这些人进入维持会，有的是想保住自己的财产，有的想借此发迹，有的是基于维持地方秩序的考虑，其中一些人还是在日军胁迫之下出面组织维持会的。这些人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

维持会的职能应以维持地方秩序为首要，而事实上，则是主要负责供应日军的军需和日常用品。各地维持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清理市容，收埋尸体；接着协助日军检查过往城门的行人，对出入城门者提供证明等；有的维持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修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桥梁、建筑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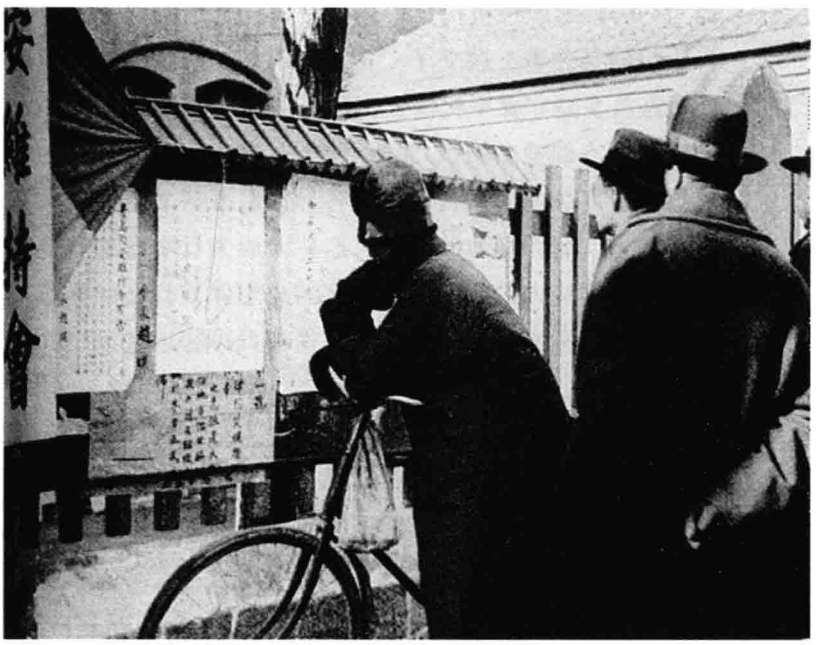
维持会主要为日军提供军需的职能与某些地方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维持会的初衷不相一致。有的维持会会长还常招致日军的辱骂、毒打。甚至有的维持会委员的家人遭到日军的欺侮，他们也无力出面保护。维持会内部的中国人毫无权力，以致他们自身利益不断遭到损害，使那些有心维护地方秩序而进入维持会的人渐渐退出，有的干脆以消极怠工的方式等着日本人的辞退。这些相对有名望的人退出维持会后，日本人不得不依赖那些浑水摸鱼之人甚至地痞无赖做事。维持会越来越蜕变为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一方面为“皇军”搜集物资，另一方面，维持会职员也借日军的名义中饱私囊。维持会也就成为抗日武装打击的对象。

日本侵略者要求维持会成为其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而出面组织维持会的中国人有的却出于维持地方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目标的不一致，导致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存在着冲突。维持会内部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为维持会与沦陷区民众之间的对立，维持会成员亦成为抗日军民打击和镇压的目标。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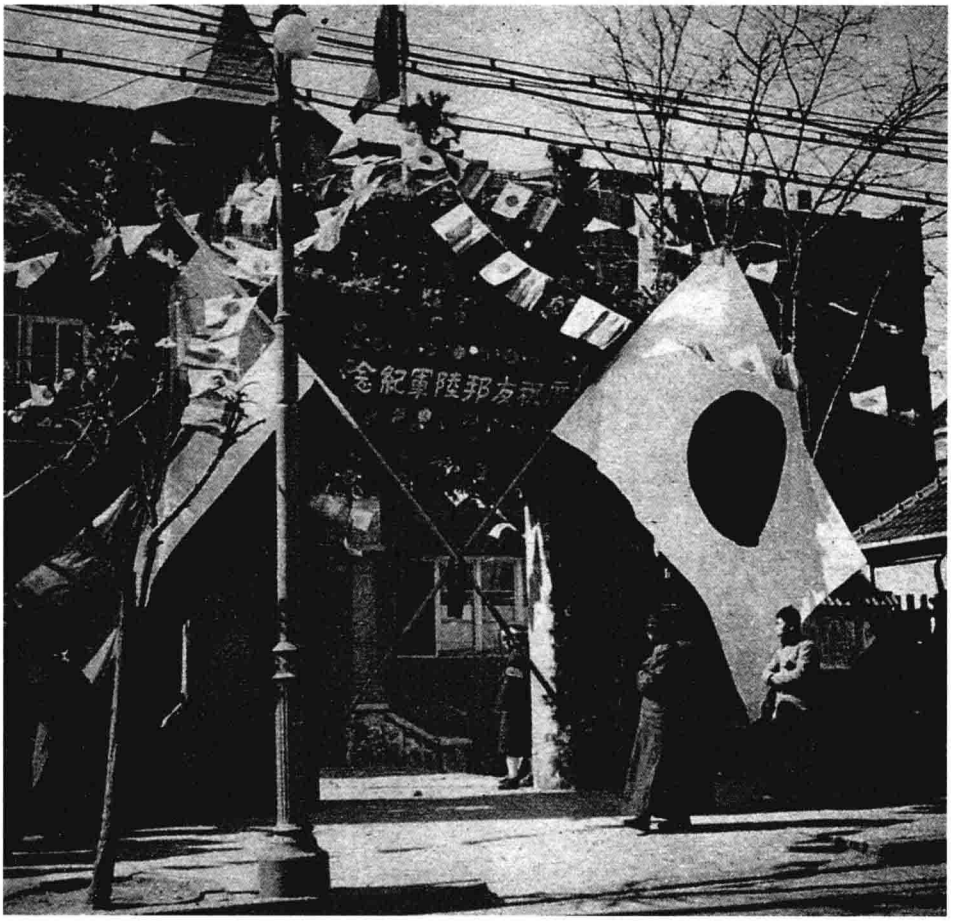
4

1　1938年7月，在徐州市内宣传“中日亲善”活动的徐州维持会成员。〔《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第27页〕

2　1937年11月，天津治安维持会有关成员合影。〔《支那事变画报》第8辑，第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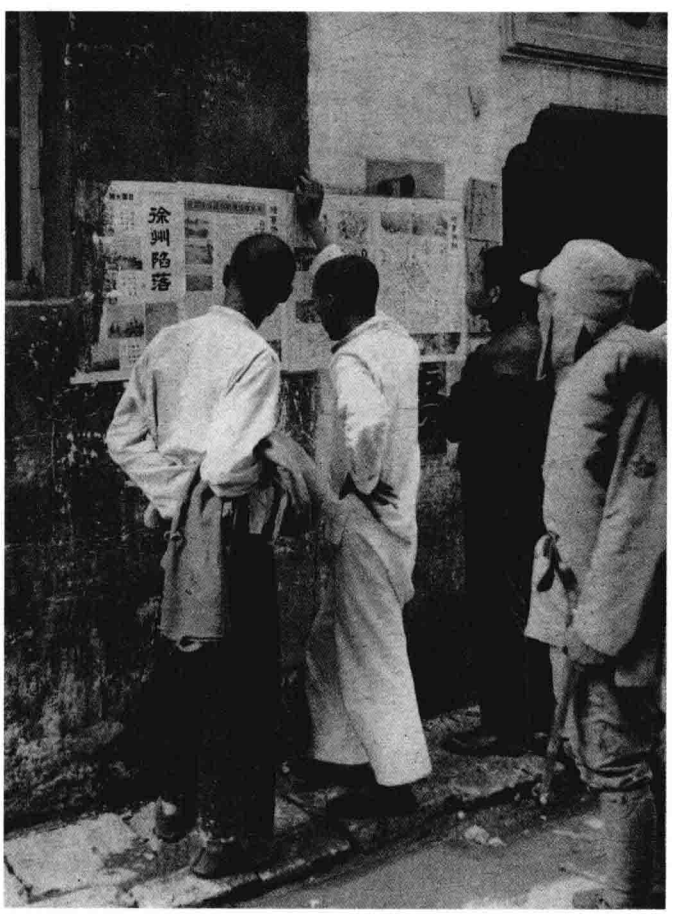
3　1938年1月30日，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图为该维持会成员合影。〔《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3页〕

4　1938年2月初，青岛维持会张贴的告示。〔《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0页〕



1

■1 1938年3月，日本陆军纪念日，张灯结彩的伪青岛维持会外场景。〔《支那事变画报》第23辑，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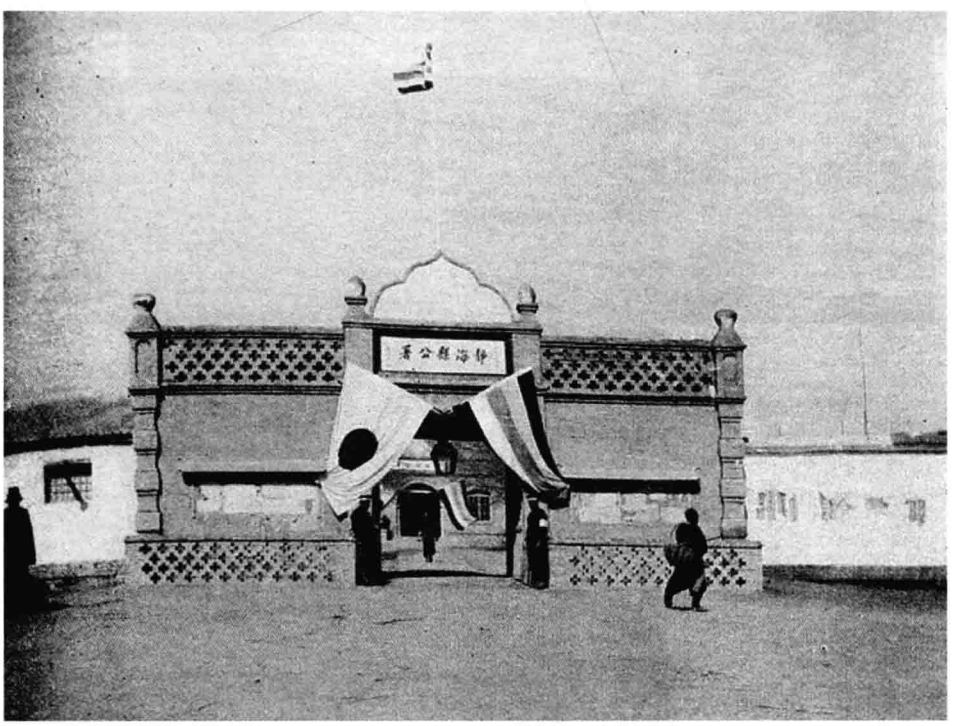
2

■2 1938年8月，徐州治安维持会布告。〔《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8月21日发行，第15页〕

■1 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所在地。〔《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3页〕

■2 1938年3月，伪静海县公署掠影。〔《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12页〕

1



2

1

2

3

4

1 1939年1月，伪武昌治安维持会成立。图为在武昌中山纪念堂聚集的庆祝伪维持会成立的群众。〔《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19页〕

2 1939年1月，伪武昌治安维持会成立。〔《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18页〕

3 伪南海县维持会成立。〔《支那事变画报》第53辑，第12页〕

4 1939年2月，伪南海县行政专员公署成立。〔《支那事变画报》第53辑，第12—13页〕

二、成立“自治会”

与维持会不同的是，自治会不单以地域关系组成，还包括民族自治会、妇女自治会等，直接听命于日军占领当局。日军广泛建立自治会，目的不在实现自治，而是分裂中国的民族、血缘等固有关系，制造各种裂痕和壁垒。

例如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所探讨的江苏日伪基层组织显示，1938年6月，日伪下令将原县城所在地的维持会改为县公署，县以下仍称维持会或自治会，且一直延续到汪伪“清乡”之时，并没有按照伪江苏省《各县城乡组织暂行章程》的规定建立“城乡——村坊——保——甲制度”。新四军将领粟裕初率抗日先遣队进入苏南时，见到的是如此情景：“当我们出动之初，汉奸敌探，到处横行，常依日寇势力，狐假虎威，敲诈人民。而这离敌人百数里之地，竟亦组织维持会，替日寇办粮食，送猪牛、鸡蛋，有些地方竟强迫人家幼女集中维持会中，以备欢迎日军奸淫”；邓子恢的描述是这样的：“在新四军未到以前，路东许多地区是在日寇卵翼中的伪政权统治着，如当时的六合、仪征、来安、嘉山、天长都是伪县、区长，乡下则是维持会，当时中国政权多数无形瓦解，存在的也退到边界上去，政府权力不出大门……”但这些维持会、自治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两面派，他们是“日本军队来了，打鞭炮欢迎，弄些妇女去慰劳皇军；中国军队来了，也打鞭炮欢迎的。这种两面派主持了一切，与日寇互不侵犯，企图苟安妥协”。陈毅描述新四军初到茅山时的情况是：“我们初来，任何地方普遍是维持会，普遍挂良民证，普遍挂太阳旗，我们军队到一个地方，居民每每误会为日军，当着‘皇军’来欢迎，后来知道是国军，才把欢迎‘皇军’那一套收起来，改成另一套。”因而即使这些维持会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日伪基层行政组织，只不过是地方人士应付环境变化而成立的组织。对地方人士而言，日军、忠义救国军等都是外来势力，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与日军、忠义救国军妥协，亦可以替后者做任何事，甚至不惜出卖良心。

1938年6月，新四军到江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其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亦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起初国共两党的抗日工作便是摧毁日伪基层行政组织，打击镇压汉奸。项英1938年6月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写到：“对于伪政权应把它摧毁，建立我国政权，只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即我力量不能到达或群众尚未发动而不能斗争的地方，才有容许两面派或暗中派人去取得消息，但这绝不能成为方针。”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日伪基层的维持会、自治会多被抗日军队摧毁。项英1939年1月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除了敌人据点以内的，伪政权是普遍的取消了，中国的政权是普遍的建立恢复起来了”，两面派亦销声匿迹。1939年4月《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报道也指出：“苏南地方行政组织像保甲长、乡、镇、区公所、县政府，渐都恢复了。敌人的经济掠夺被打击了，现在广大的苏南乡村不

仅不能抽壮丁，而且也不能收田赋。”这些报道不乏宣传夸大之词，因为日伪控制区域的维持会、自治会依然存在，但这些组织基本上是两面应付，并不仅仅服务于日伪政权。中共茅山地委书记兼茅山部队政委汪大铭在1939年12月份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句容县日伪某据点自治会会长：该镇自治会会长是本地的一个富翁，“当自治会会长是由地方上层推举，两面应付。对敌人方面送捐送情报，敌伪下来时招待欢迎。对我们也一样的应付，他见到我们去，很客气地招待，并一再表示对敌敷衍是出于无奈，不是真心做汉奸。他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天王寺敌伪组织和活动情况，以及收捐收税的情况。我们对他作了一番正面教育，要他每三天向我们送一次情报。一切应付敌人的措施都要事先报告我们。”〔1〕

实际上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到日汪“清乡”之前，江苏日伪的实际统治区域仅囿于铁路沿线和较大的城镇，广大农村地区基本是在国共两党和游击队掌控之中。日军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江南地区，从1937年底以来，就成为中共及重庆游击队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地区，南京政府（指伪政府）威令难以贯彻，正因为如此，日汪才合作发动大规模的“清乡”。〔2〕

伪绥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大门，正门标示用汉文和蒙文两种文字书写。〔《支那事变画报》第23辑，第12页〕

〔1〕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4页。
〔2〕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6页。

1 1938年11月25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仪式上之踩高跷队伍。〔《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14页〕

1

2 1938年12月，伪广州妇女维持会成立仪式上老年妇女游行队列。〔《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7页〕

2

3 1938年12月，伪广州妇女维持会成立仪式上青年妇女列队游行。〔《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6页〕

3

1

2

3

4

1 伪镇江自治委员会成立之伪法庭。〔《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0 页〕

2 镇江中山路上的中国伪巡警。〔《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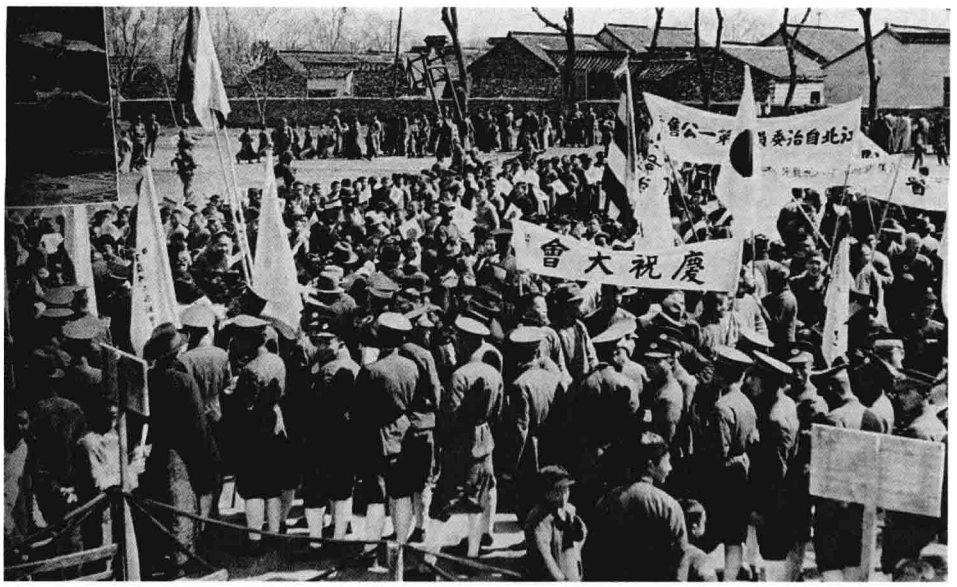
3 伪镇江自治委员会会长柳衍斋留影。〔《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21 页〕

4 1937 年，伪张家口自治委员会成立。〔《支那事变画报》第 6 辑，第 19 页〕

■1 1938年5月，伪江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场。〔《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12页〕

■2 1938年5月，伪蚌埠自治委员会成立时，日伪人员出入会场的情形。〔《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4页〕

■3 1938年10月，蒙疆伪政权代表德王、李守信、于品乡等访日。〔《支那事变画报》第44辑，第30页〕



1

2

3

三、举办“宣抚班”

日军占领地方后军队分为三部分：战斗部队、宪兵队和宣抚班。其中宣抚班主要做政治性的工作，负责日军占领某地后恢复社会秩序的任务。维持会便是由宣抚班负责组建、隶属于宣抚班并在其控制下进行活动的组织。宣抚班直属于日军特务机关，是日军中负责宣传、安抚的随军组织。日军所到之处，宣抚班成员以演说、办报、书写标语等手段，宣传“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掩盖其侵略本质。其成员最初基本为日本正规军人，后来吸纳大量中国人参加，以便于进行欺骗宣传。例如北平宣抚班等即为这类政治宣传组织，其活动极具欺骗性。

1938 年 4 月，自日本国内新来的宣抚班成员在卢沟桥附近考察，日军军官正在向宣抚班人员宣讲当时中日两军作战的情况。〔《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5 页〕

1 北京妇女宣抚班的宣抚办公处，其成员来自多个民族。〔http://www.picturechina.com.cn，2015年3月2日〕

2 日伪宣抚班成员利用北京医科大学教室进行日语授课。〔《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4—15页〕

3 1938年春，北京妇女宣抚班开办施粥处，并为民众分发食物，笼络人心。〔《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5页〕

1

2

3

1

2

3

4

5

1 1937 年 11 月 20 日，日本宣抚班在太原张贴告示。〔《支那事变画报》第 12 辑，第 28 页〕

2 1938 年 4 月，济南妇女宣抚班开设的女子训练所。〔《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9 页〕

3 1938 年 4 月，日伪在济南开办的宣抚班女子训练所。〔《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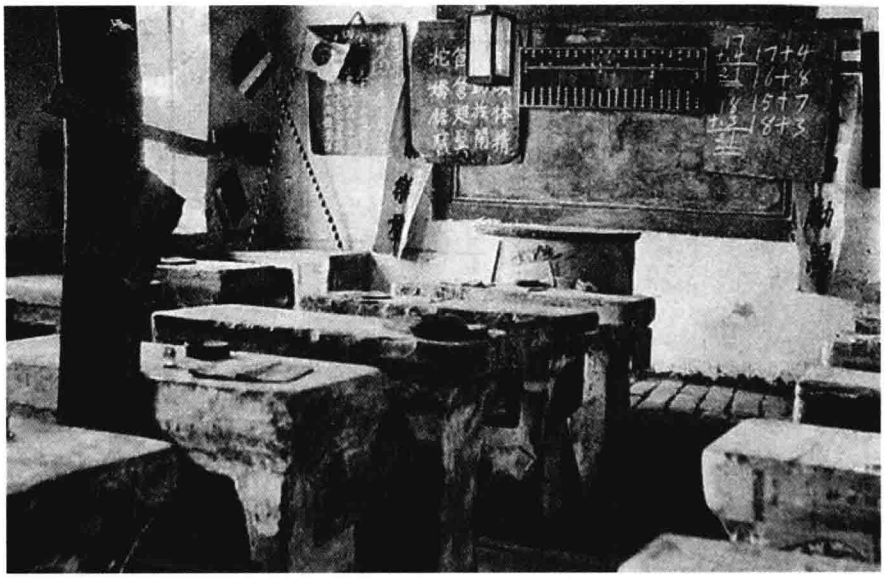
4 1938 年 4 月，北京妇女宣抚班为贫困儿童理发。〔《支那事变画报》第 25 辑，第 15 页〕

5 1938 年，华北宣抚班中日成员合影，班长为中岛成子。〔《支那事变画报》第 18 辑，第 30 页〕

1 1938年4月，上海日军宣抚班教室。〔《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29页〕

2 1938年5月，活跃于含山的日军宣抚班，图中一对中国父女（段月霜父女）加入了宣抚班。〔《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24页〕

3 北京妇女宣抚班组织的职业培训。〔《支那事变画报》第38辑，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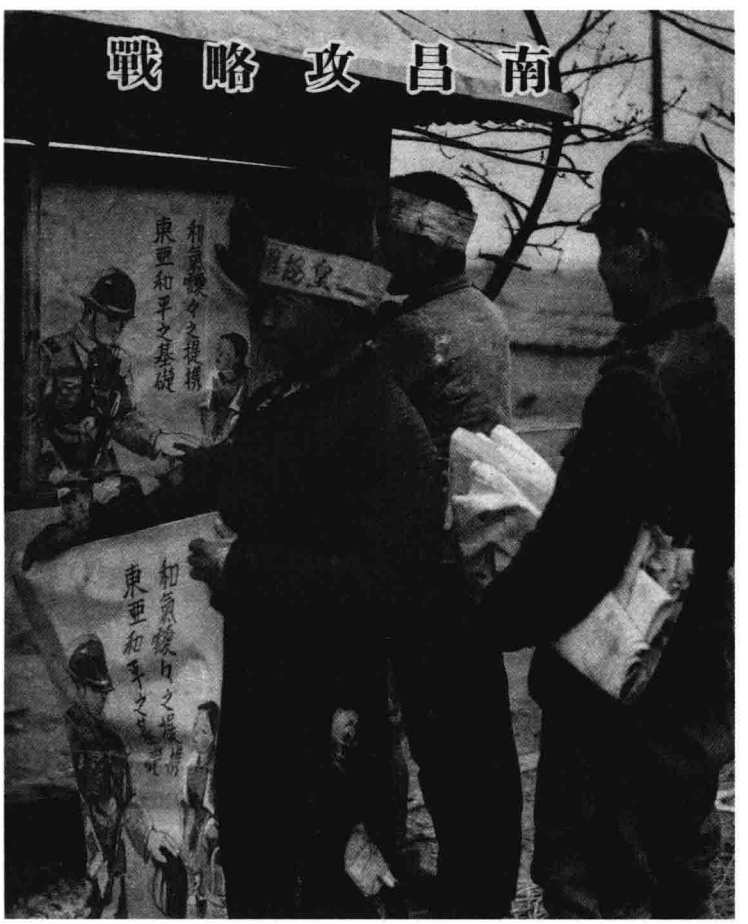
1

2

3

1

2



3

1 北京妇女宣抚班成员组织年轻女性制作女红。〔《支那事变画报》第 38 辑，第 21 页〕

2 北京妇女宣抚班制造之日式工艺品。〔《支那事变画报》第 38 辑，第 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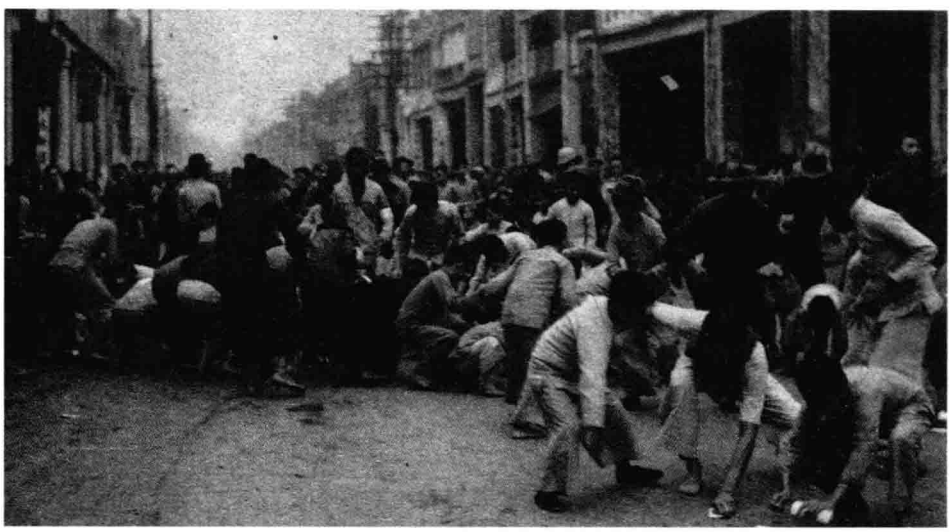
3 1939 年 4 月，南昌宣抚队张贴海报。〔《支那事变画报》第 57 辑，第 1 页〕

1 日军宣抚班在南昌城墙原有抗日海报上贴上亲日反蒋标语。〔《支那事变画报》第 57 辑，第 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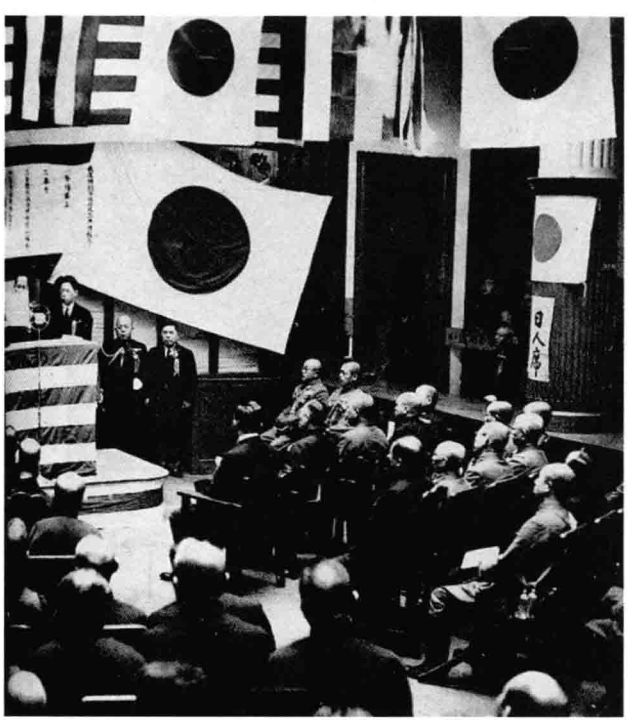
2 1939 年 2 月，日军宣抚班在海口进行奴化宣传，受欺骗的百姓争抢日军抛洒的慰问品。〔《支那事变画报》第 53 辑，第 7 页〕

3 太原日伪军宣抚班训练所。〔《支那事变画报》第 59 辑，第 14 页〕

1



2



3

1 1939年5月，山西太原宣抚班训练所内，日方成员“优待”中方战俘。〔《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30页〕

2 日本华北方面军宣抚班干部合影。〔《支那事变画报》第37辑，第6页〕

3 1938年9月，北京日军宣抚班训练所相关人员在进行训话。〔《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第30页〕

1

2

3

四、成立“新民会”

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推动下，新民会成立。新民会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本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中，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新民会”打着“新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实现东亚文化同种族之中日满三国共存共荣”的旗号，实际上它是日军控制的“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社的关系终至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最初的新民会纲领是：“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促进友邦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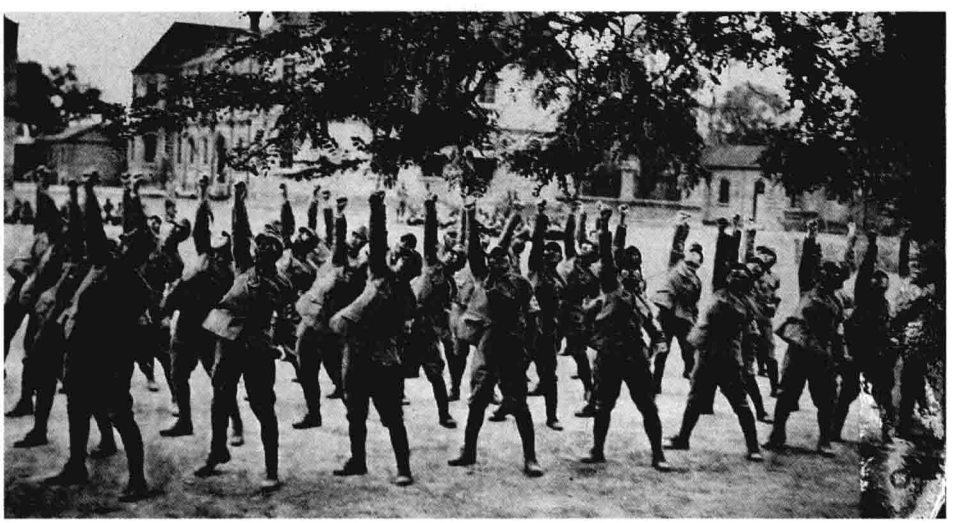
新民会在北平建立“中央”一级机构，下面各县、区、乡也都设立新民会的总会、分会和办事处。甚至各行各业、学校、团体等也都建立了新民会的基层组织。在各级新民会中，均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由于新民会分布面广、成员多，加之它集民众团体与行政机构于一身，在控制民众思想和行动上确能收一时之效。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它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1]

---

〔1〕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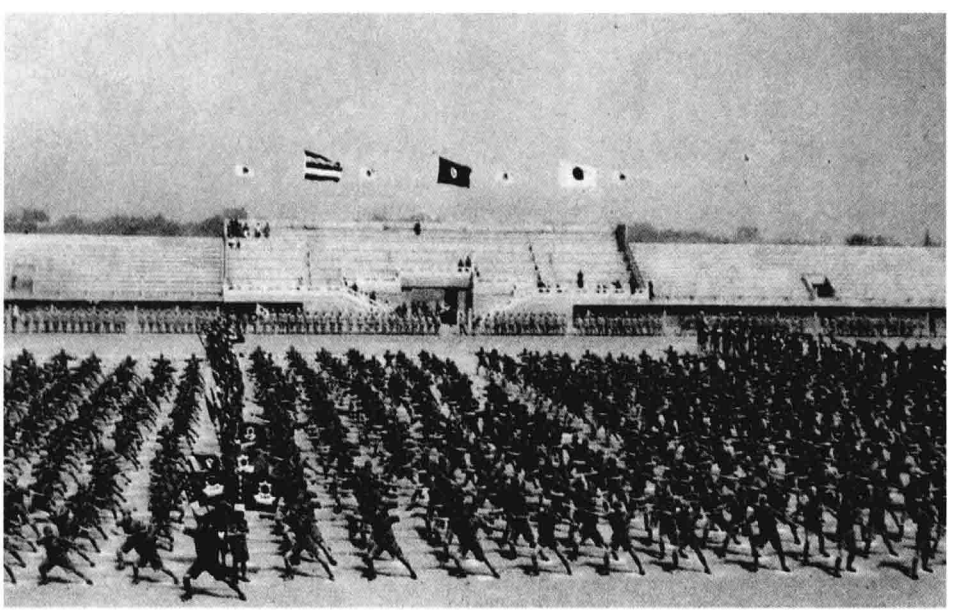
1

1 1939年山西新民会军事训练团进行的队列操练。〔《支那战线写真》第76报，第7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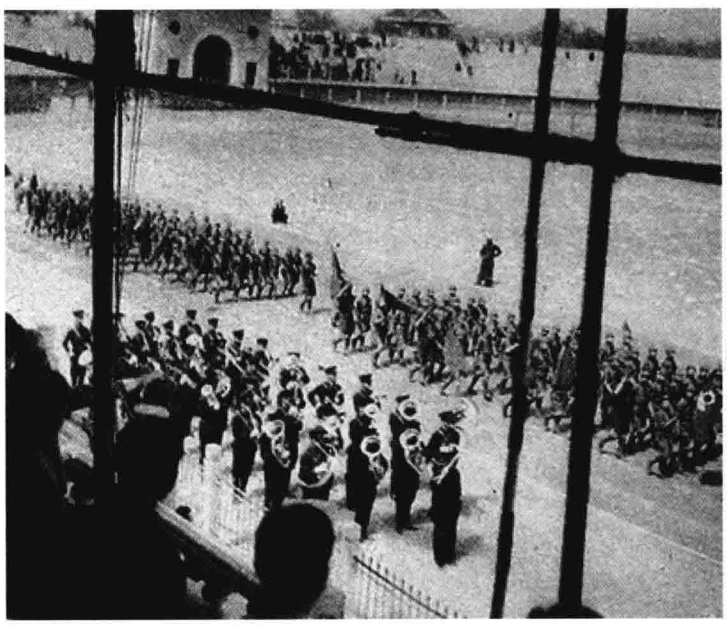
2 1939年5月，新民会在北京北海公园进行军事训练。〔《支那事变画报》第59辑，第28页〕



3

3 1939年5月，北京新民少年团在北京市民运动场进行操练。〔《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30页〕

1



2

3

1 1939年5月，伪新民少年团在北京先农坛欢迎日伪及纳粹德国官员。〔《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30页〕

2 1939年5月，伪新民会少年团在北京市民运动场进行队列表演。〔《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30页〕

3 1938年12月，伪新民会在紫禁城午门举行亲日集会。〔《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10页〕

第五章

社会控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分南北两条战线对中国进行侵略。北线沿平汉铁路南下，相继占领北京、天津、洛阳和武汉；南线自上海始，经南京占领武汉。战争初期，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吠中，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和大中城市。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日本战线越拉越长，其在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为进一步掠夺战争物资，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在其占领区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为切实控制地域广袤的中国区域，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军事占领与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

如果说建立各种社会基层组织是日本实施基层渗透的“硬功夫”，那么，推行奴化教育、编练伪军、组织集会、推行日本化生活方式与信仰等，即成为日本对中国占领区进行社会控制的“软实力”。日本侵略者通过文治武攻、软硬兼施，欺骗宣传，蛊惑人心，达到其在占领区实施社会控制的目的。

为实现社会控制，日军在军事占领后即着手进行奴化教育、奴化训练及宗教控制。尤其险恶的是，日本着重针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日式改造，妄图割裂中国儿童与祖国的感情联系，为日本培养臣服天皇和日军的“归化顺民”。日本侵略者在学校推行日语教学，强迫中国人接受日本化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尽忠“天皇陛下”。通过到孔庙祭孔，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欺骗宣传，实行愚民政策，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让中国民众甘心成为统治者的“顺民”。

在进行奴化教育的同时，还广泛推行奴化训练，日本侵略者通过训练伪军、举办体育活动、举行奴化集会、策划亲日活动等办法，对中国民众进行集体奴化，企图使其成为甘愿为日本侵华服务的驯服工具。

宗教也成为日军实施社会控制的精神武器。日本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侵略者利用中日佛教的渊源关系，麻痹中国民众，宣传“中日亲善”和“东亚和平”。通过宗教控制，让中国民众“听从天命”，安于现状，甘愿充当“亡国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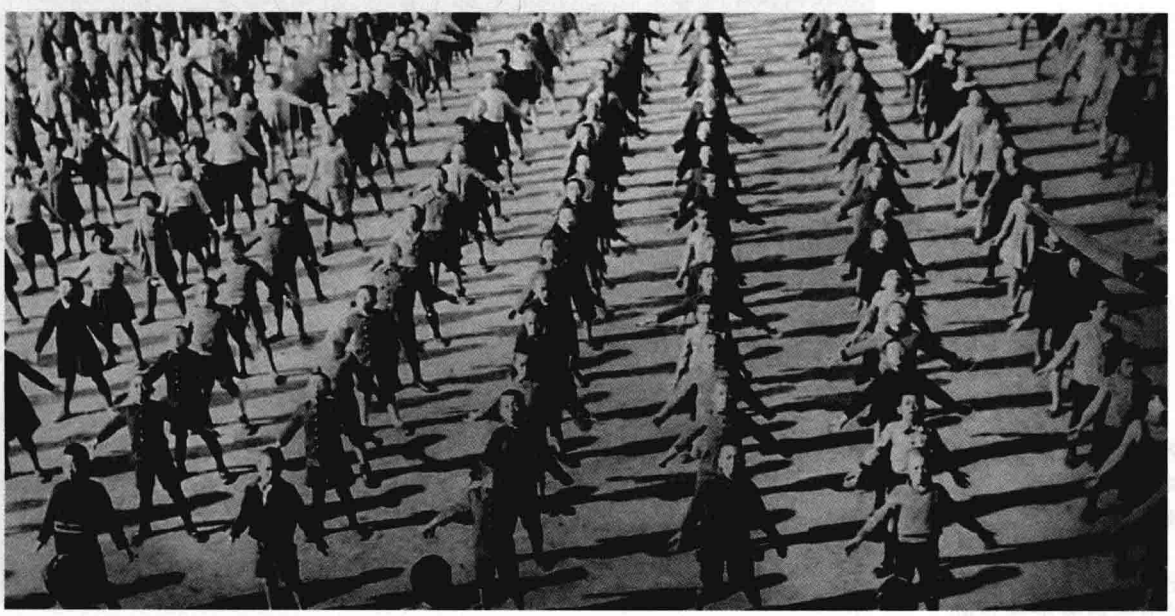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通过控制宗教，麻痹中国人的精神，泯灭民族反抗意识。日军通过控制宗教人员，召集信众，在道场和庙会烧香拜佛，念经祈祷，替日军宣传“武运长久”“实现东亚和平”，从精神上控制信众“听天命之所在”，甘心做“亡国奴”。侵华期间，日本佛教大部分宗派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忠皇爱国”思想，宣传国民“护国”精神，派遣随军僧，战地传教，为侵华战争服务。

一、奴化教育

为建立并巩固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积极推行奴化教育，妄图通过奴化教育，使中国人忘记自己的祖国，成为民族败类，向侵略者出卖灵魂，甘当外敌欺压同胞的帮凶，达到其奴役中国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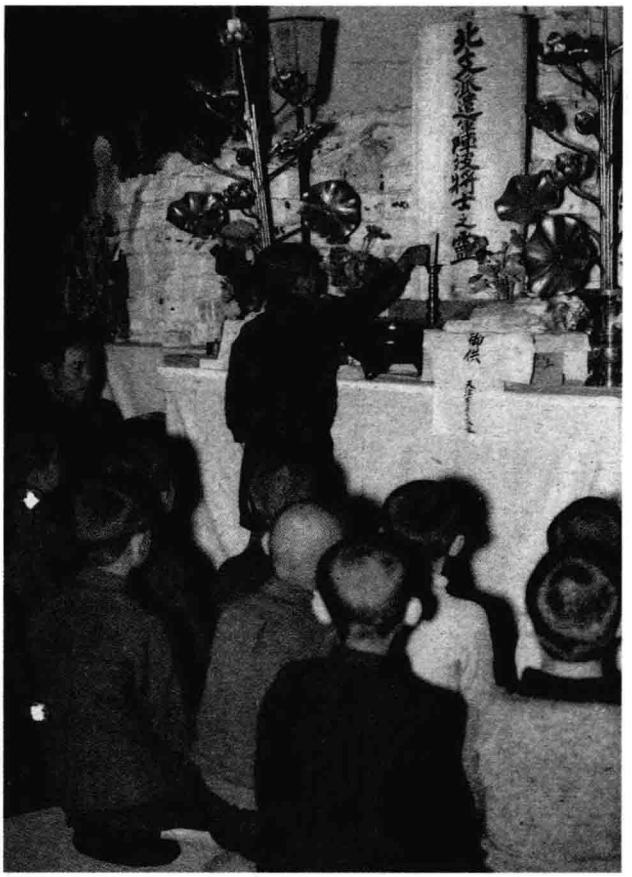
在日军铁蹄蹂躏之地，日本广泛推行奴化教育，通过宣传“传统文化”，利用社会名流，进行欺骗宣传，压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强行在学校推行日语教学，消灭进步人士，教导日本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妄图通过奴化教育，实现其征服之目的。

1942 年 9 月 10 日，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孔庙举行秋祭孔子典礼，企图以此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



小学生演练日式体操。〔《支那事变画报》第 26 辑，第 29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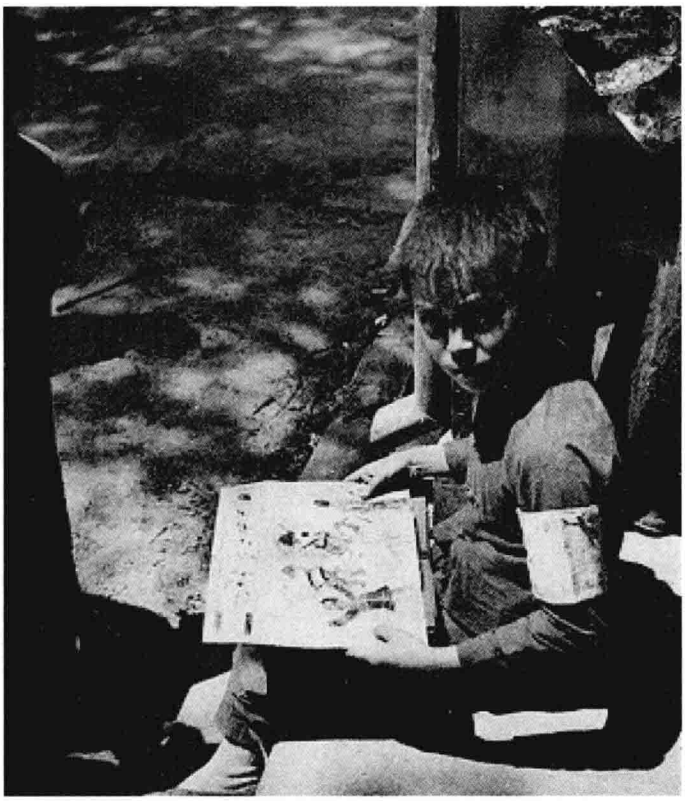
3

1 学写日文的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8页〕

2 被迫在观音寺为日军阵亡将士祭祀的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8页〕

3 学写“中日亲善”文字的三年级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8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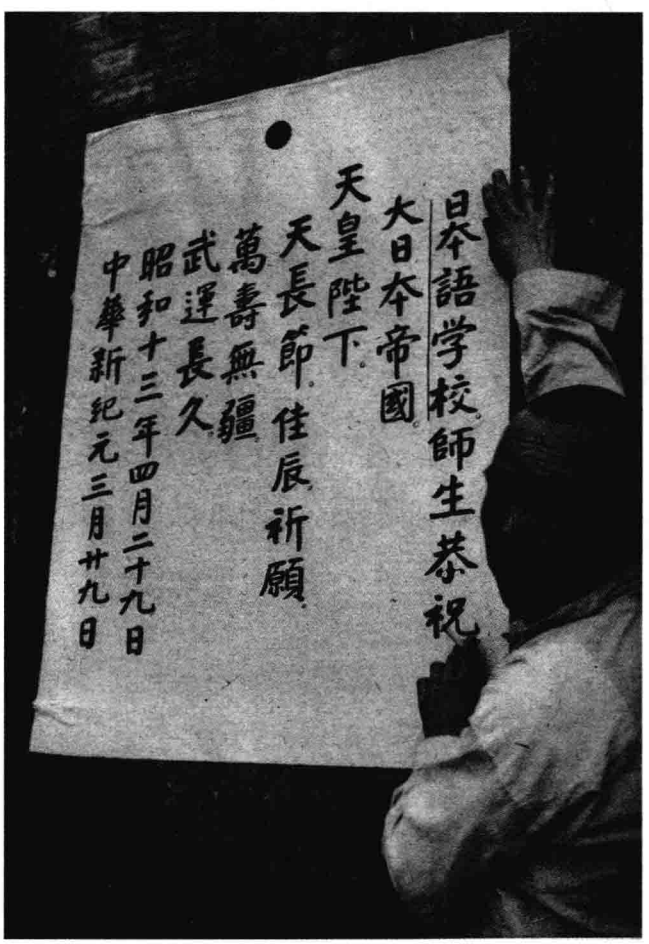
3

1 中国学生被迫列队庆祝纪念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15页〕

2 中国学生绘制“日本万岁”图画。〔《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14页〕

3 在日军威逼下的学生集结欢呼“日本万岁”。〔《支那事变画报》第28辑，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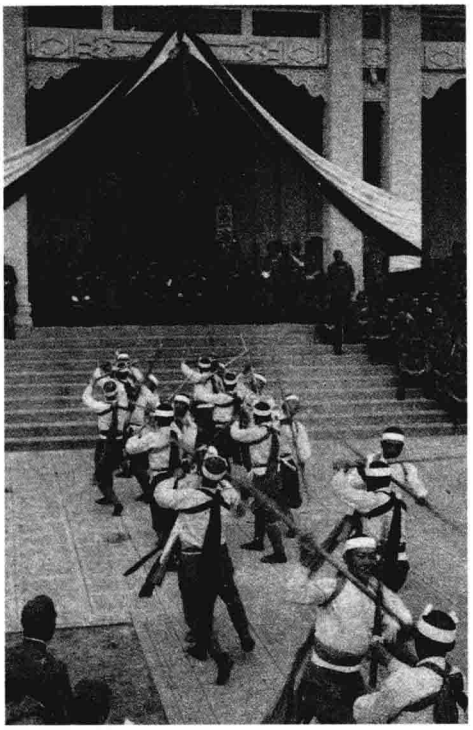
1



2

1 充满媚日和奴化气息的学校教室。〔《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第 14 页〕

2 校务人员张贴庆祝天长节之海报。〔《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第 14 页〕



1

2

1 1938年12月，伪武汉大学复课，日军表演日式舞蹈庆祝。〔《支那事变画报》第50辑，第30页〕

2 1938年4月，济南女子训练所进行日语教学。〔《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3 1938年4月，济南女子训练所学员正在上课。〔《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4 1938年4月，天津日式幼儿园。〔《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9页〕

3

4

二、奴化训练

与奴化教育相适应，日本侵略者大力开展奴化训练，试图通过对中国民众的奴化训练，使其成为甘愿为日本侵华服务的驯服工具。日本侵略者利用训练伪军、体育活动、奴化集会，以及所谓“友谊活动”等手段，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奴化训练，目的是消灭其反抗精神与民族自主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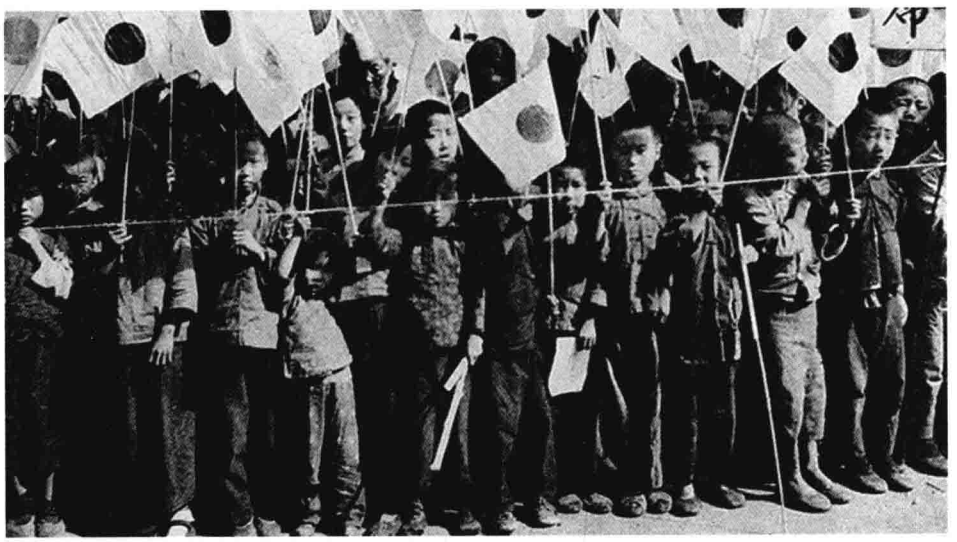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在大阪甲子园举办了旨在宣扬侵华战争的“大东亚建设博览会”，并向当时的伪维新、临时两政府及伪满洲国致函，征求地方伪政府辖区内的名贵工艺品及特色手工艺品参加会展。

1941年7月4日至6日，第一届华北都市交欢体育大会在青岛举行。参加该运动会的城市有北平、天津、保定、青岛、济南、开封、太原等。参赛选手中日混编，以体现所谓“大东亚共荣”的精神。

1937年，被迫悬挂日本旗帜的张家口街道。〔《支那事变画报》第6辑，第19页〕

（一）强迫民众参加亲日活动

日军在占领区组织各种“欢迎”集会，举行亲日游行，售制和悬挂日本国旗，迫使中国儿童及民众与日军拍摄合影，召集中国民众参加各种“联谊会”、庆祝会及维新政府成立庆典，强迫民众参加各种“中日亲善”的活动。



1

2

3

1 1937年，保定陷落后，日军强迫小学生进行“欢迎”日军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发行，第31页〕

2 1937年，保定陷落后，民众被迫高呼“欢迎”日军的口号。〔《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发行，第31页〕

3 挂满太阳旗的石家庄街头。〔《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17页〕

1 1937年天津的亲日游行。〔《支那事变画报》第7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发行，第31页〕

2 1938年，在青岛街头用缝纫机缝制五色旗的摊点。〔《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2页〕

3 1938年2月，被迫做“万岁”姿态的南京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0辑，第22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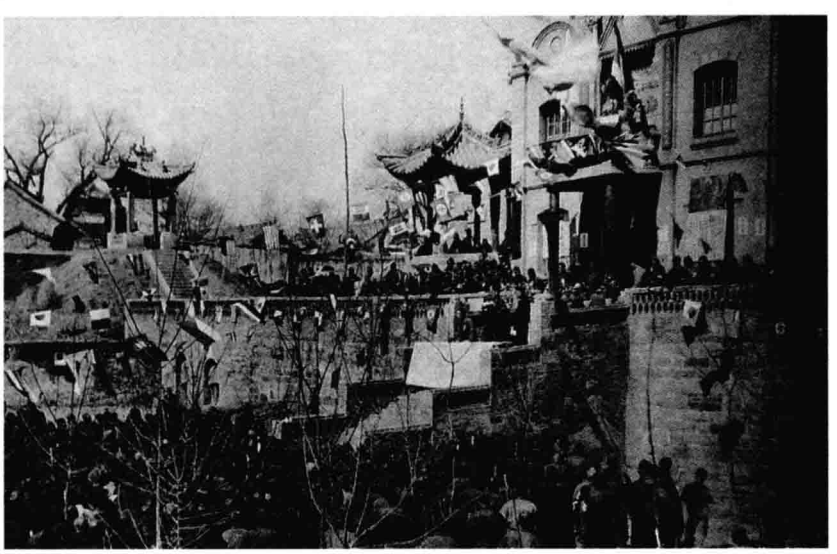
3

1

■1 被迫携带日旗的潞安市民。〔《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9页〕

2

■2 1938年日军强迫聚集并摄影的潞安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2辑，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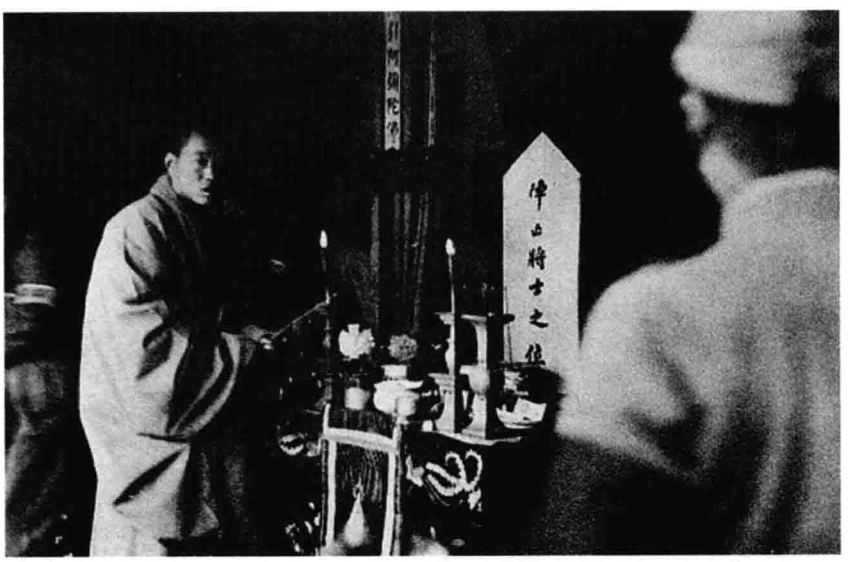


3

■3 1938年4月，日伪召开伪潞安国民大会场景。〔《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25页〕

1

2



3

4

1 1938 年 4 月，廊坊中国妇女被迫祭奠日军阵亡将士。〔《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9 页〕

2 1938 年 4 月，被迫举日本国旗聚会的潞安民众。〔《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5 页〕

3 1938 年 4 月，兖州当地僧侣被迫对日本阵亡将士进行祭祀。〔《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29 页〕

4 1938 年 4 月，日本教师指导北京儿童学习日式舞蹈。〔《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30 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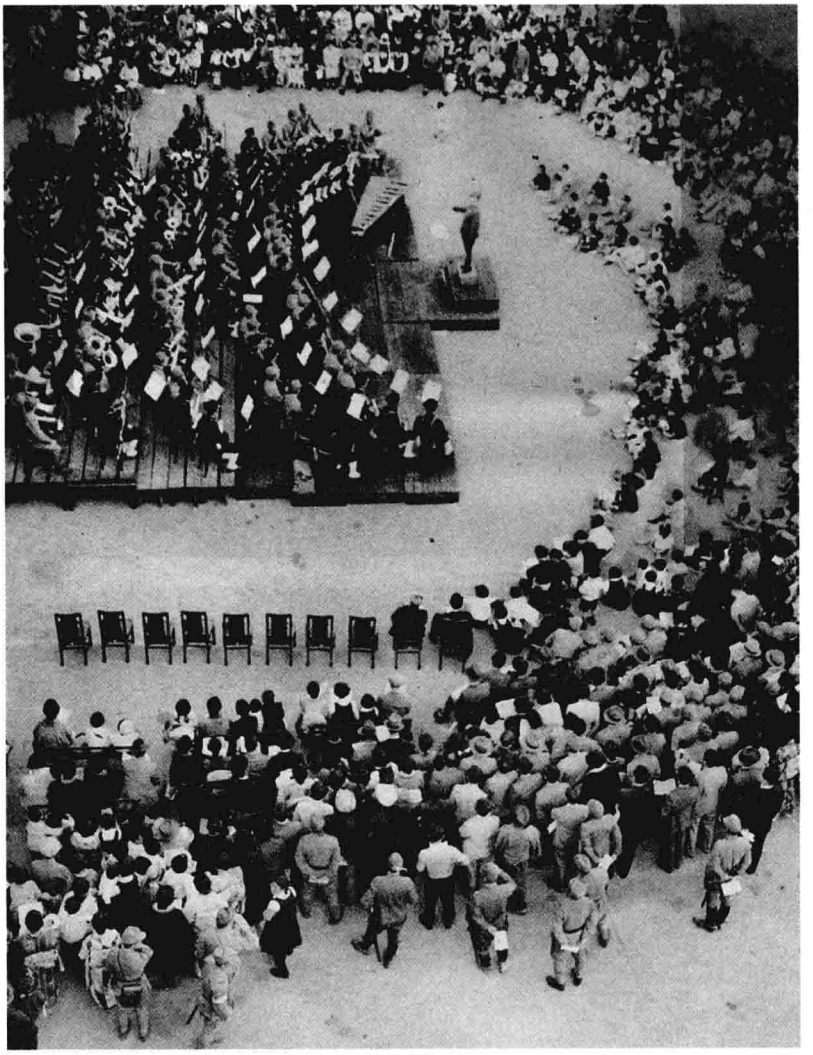
1 1938年4月，北京饭店，中国民众被迫观看日式舞蹈表演。〔《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30页〕

2 1938年4月，北京饭店，中国民众被迫学习日式交际礼仪。〔《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30页〕

3 1938年5月，上海民众被迫前往天长节庆祝会会场。〔《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2页〕

1 1938年5月，上海民众被迫参加奉迎天长节的活动，围观日本海军军乐队表演。〔《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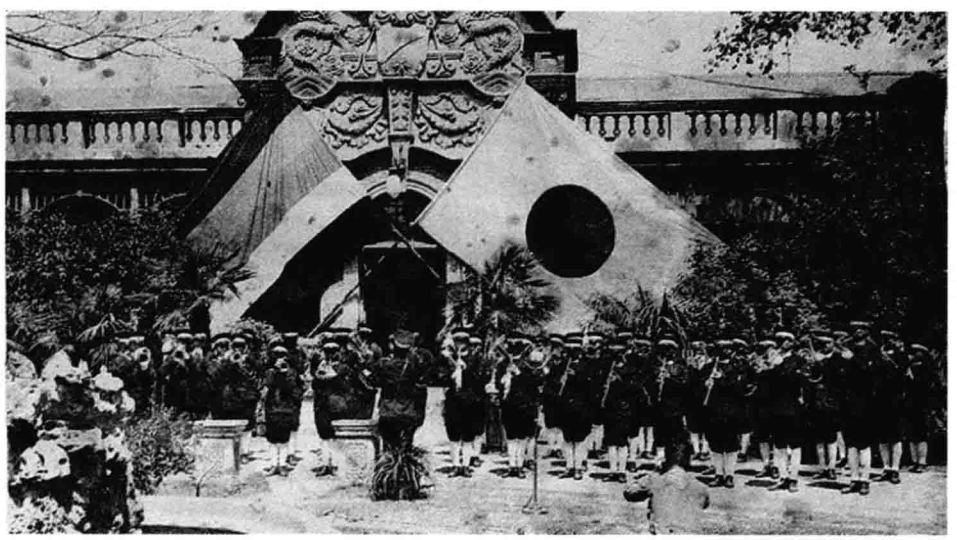
2 1938年5月，天长节上被迫进行欢呼表演的上海学生。〔《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2—23页〕



1

2

1 伪维新政府联合委员会组织的小学生集会。〔《支那事变画报》第43辑，第31页〕



2 1938年5月，伪北京警察总署举行音乐表演，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30页〕

3 1938年7月，徐州街景。徐州民众被迫接受日本化生活方式，街道装饰和服装呈现日本化色彩。〔《支那事变画报》第35辑，第27页〕

1

2

3

1　1938 年 12 月，大同的日本化街道，街道广告皆以日文标示。〔《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0 页〕

2　1938 年 12 月，张家口日本化街道，街道广告皆亦日式广告标示。〔《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1 页〕

3　1938年12月，在北京“中央公园”进行的日本儿童读物展览。〔《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6 页〕

1

2

1 1939年1月，伪武昌治安维持会成立，照片为街头“打倒蒋介石”的油画。〔《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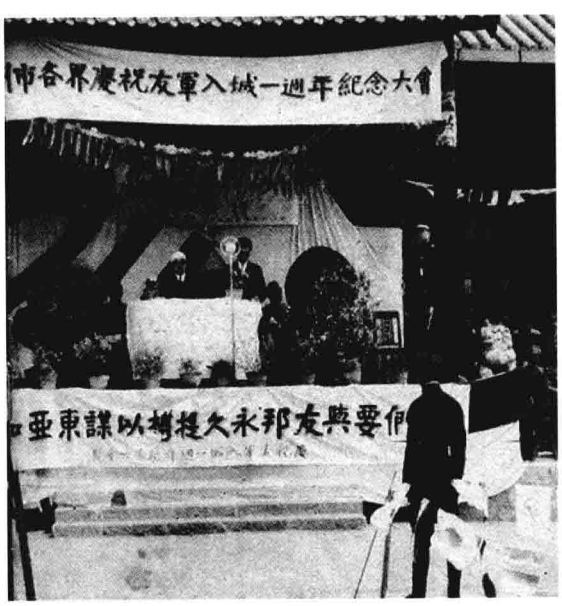
2 1939年1月，日伪政权组织武昌市民游行，庆祝伪武昌治安维持会成立。〔《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19页〕

1 南昌居民被迫游行欢迎日本官员。〔《支那事变画报》第 57 辑，第 28 页〕

2 1939 年 5 月，徐州“庆祝”日军入城一周年会场。〔《支那事变画报》第 60 辑，第 26 页〕

3 1939 年 5 月，徐州“庆祝”日军入城一周年的宴会，会场上方挂满日本国旗。〔《支那事变画报》第 60 辑，第 26 页〕

1



2

3

1

■ 1939年5月，日军强迫徐州儿童参与日军入城一周年庆祝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26—27页〕

2

■ 1938年，伪杭州维新政府成立庆典上，手举日本旗的中国儿童。〔《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0—21页〕

1　1939 年 12 月，天津中日学生“联谊”文艺表演。〔《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6—27 页〕

2　1938 年 12 月，日军在汉口对中国战俘进行奴化宣传。〔《支那事变画报》第 50 辑，第 29 页〕

3　九江市民被迫进行亲日游行，左侧是日军摄影人员。〔《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3 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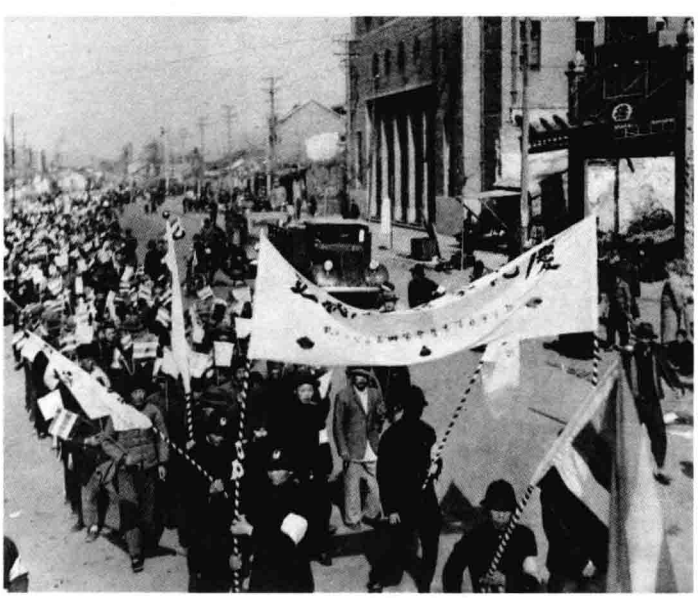
1 日伪组织的九江市民的亲日游行之一。〔《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3 页〕

2 日伪组织的九江市民的亲日游行之二。〔《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3 页〕

3 1938 年 4 月，庆祝伪维新政府成立的南京市民游行队伍。〔《支那事变画报》第 24 辑，第 14 页〕

1

2



3

1 1938年4月，原南京国民政府旧址前“庆祝”伪维新政府成立的游行队伍。〔《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15页〕

1

2 1938年4月，承德至通化铁路通车仪式上，被要挟前来欢迎日军的中国居民。〔《支那事变画报》第24辑，第22—23页〕

2

3 1938年4月，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持五色旗游行的中国妇女。〔《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25页〕

3

1

2

3

4

1 1938年4月，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举办的伪上海民众大会。〔《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24页〕

2 1938年4月，上海纺织工会“庆祝”伪维新政府成立。日本侵略者对工会组织的利用，意在奴化工人，与共产党争夺工人队伍。〔《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24页〕

3 1938年4月，日军马队在悬挂伪旗帜的芜湖街头行进。〔《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20页〕

4 1938年4月，日本西本愿寺僧人来访，日伪组织石家庄民众前来参加集会。〔《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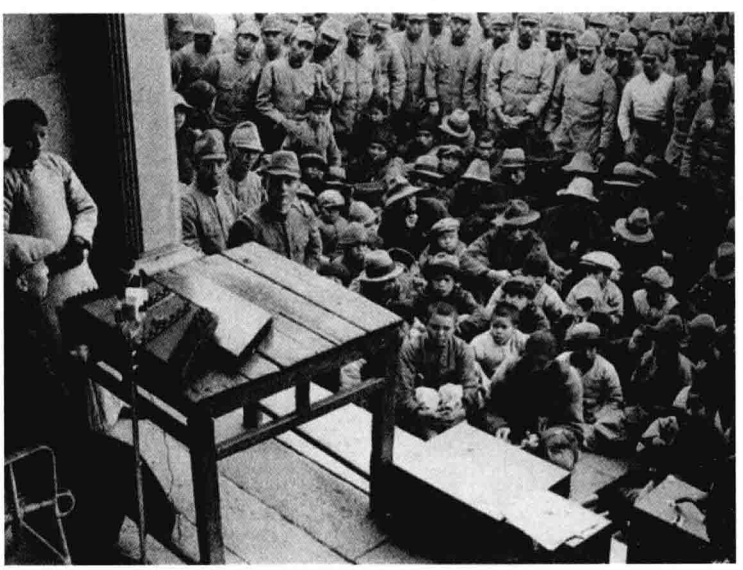
■1 1938年9月，日伪组织南京“民众代表”进行反蒋亲日演说。〔《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第23页〕

■2 1938年9月，安庆市民被迫进行反蒋游行。〔《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第22—23页〕

■3 1939年1月，日军胁迫广东百姓观看亲日艺人所做的街头演奏。〔《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31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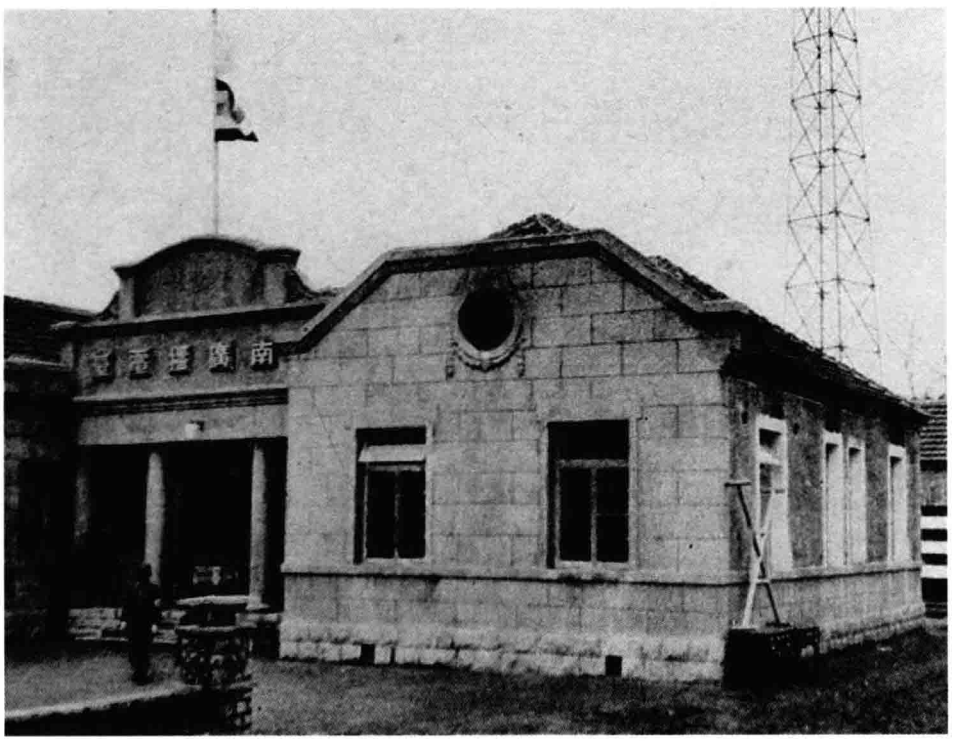
2



3

1

1 1939年1月，日伪官员出席武汉第一女子学校举行的“武汉留日同学会”成立仪式。〔《支那事变画报》第51辑，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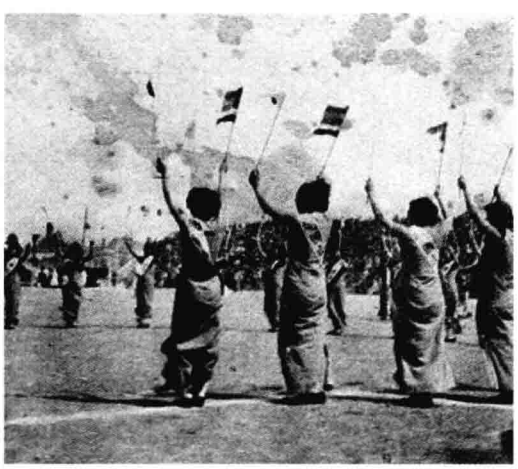
2

2 1938年3月30日，日本人操纵的济南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图为该电台台址。〔《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7页〕

（二）举办体育运动会与开展中日“联谊”活动

1941年7月4日至6日第一届华北都市“联谊”体育大会在青岛举行，参加该运动会的城市有北平、天津、保定、青岛、济南、开封、太原等，参赛选手包括中国运动员和日本运动员，以此体现所谓“大东亚共荣精神”。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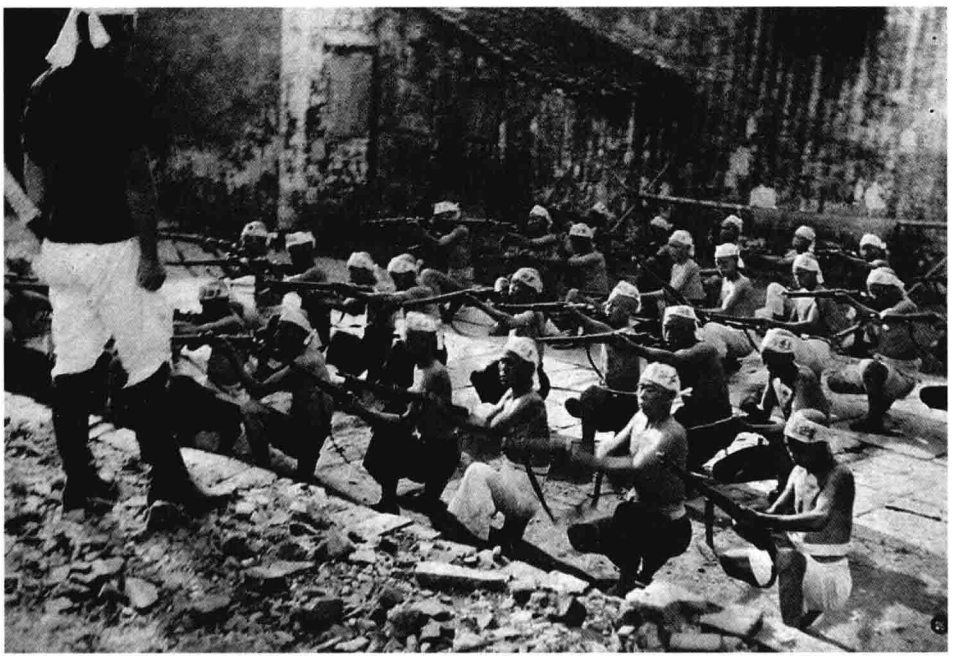
1　1938年4月，日伪组织的伪山东民众运动会上的女子运动员。〔《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7页〕

2　1938年4月，日伪组织的伪山东民众运动会上挥舞日伪旗帜的中国妇女。〔《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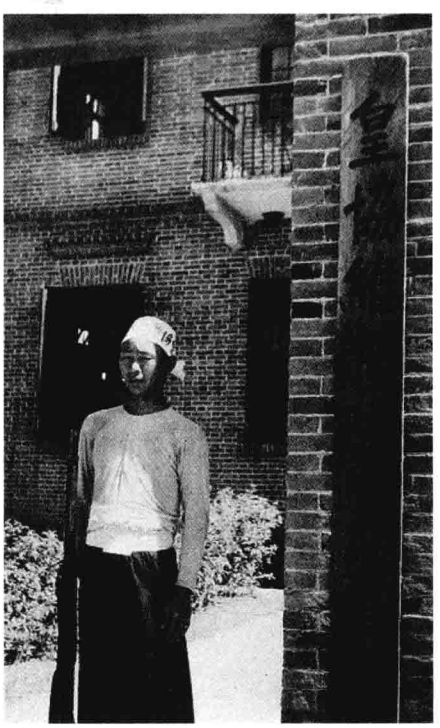
3　1938年4月，日伪举行的伪山东民众运动会上妇女队伍。〔《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7页〕

（三）组织训练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组织自卫队、民众及学生进行队列练习及射击等军事训练，组织伪皇协维新军等开展队列操练，以便培养平时能够征集物资、战时可以打仗的军事化人员，压制反日爱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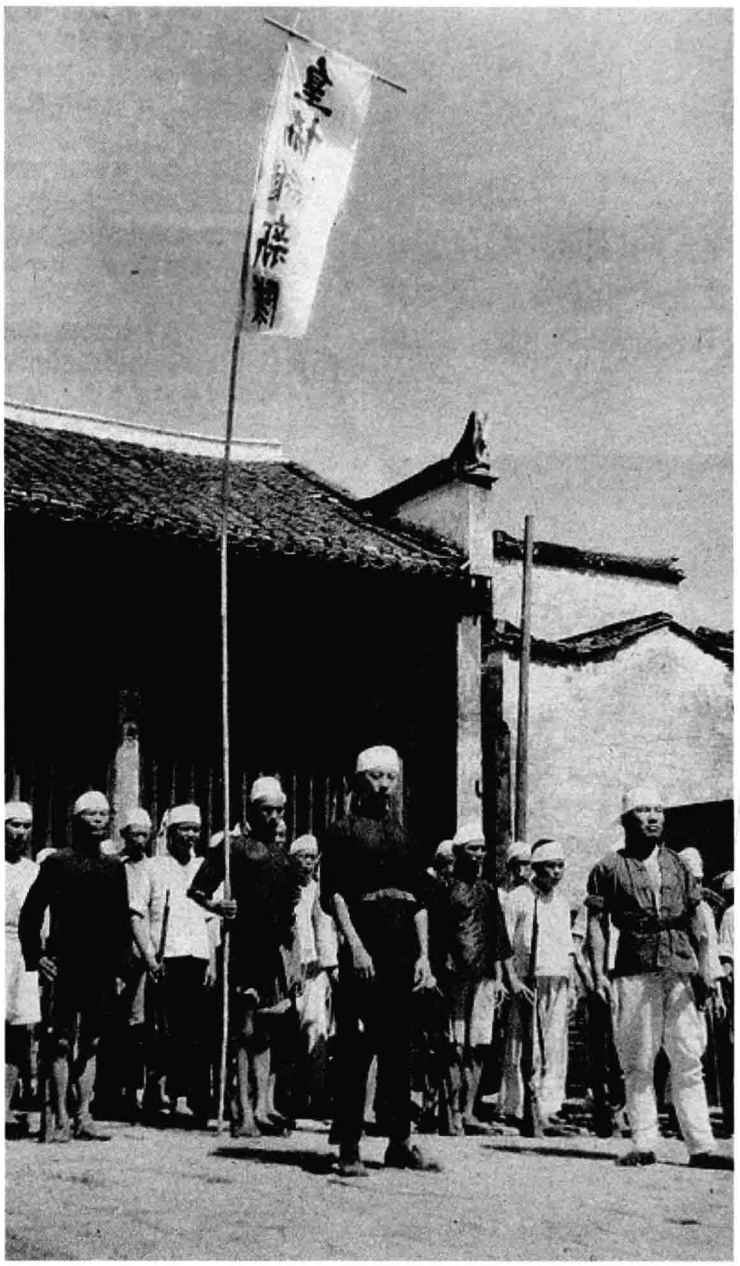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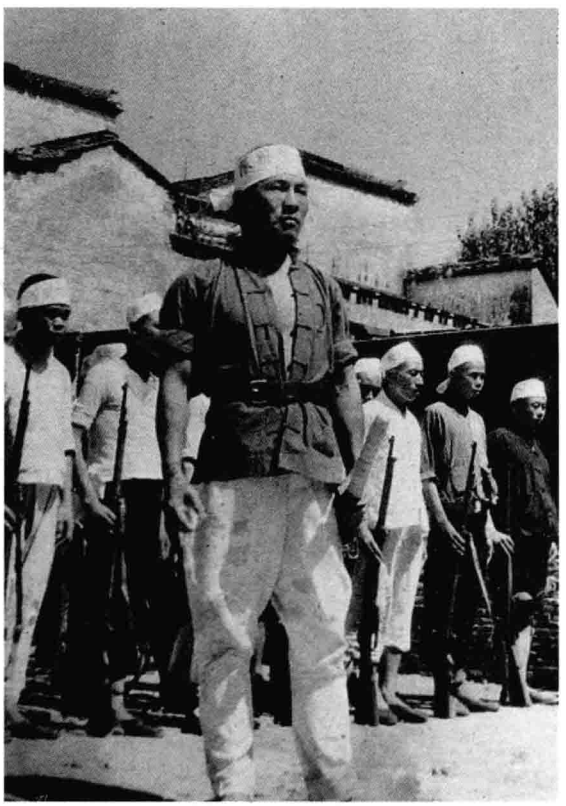
2

1 伪九江皇协维新军进行射击练习。〔《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6 页〕

2 1938 年 9 月，伪九江皇协维新军司令部大门。〔《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6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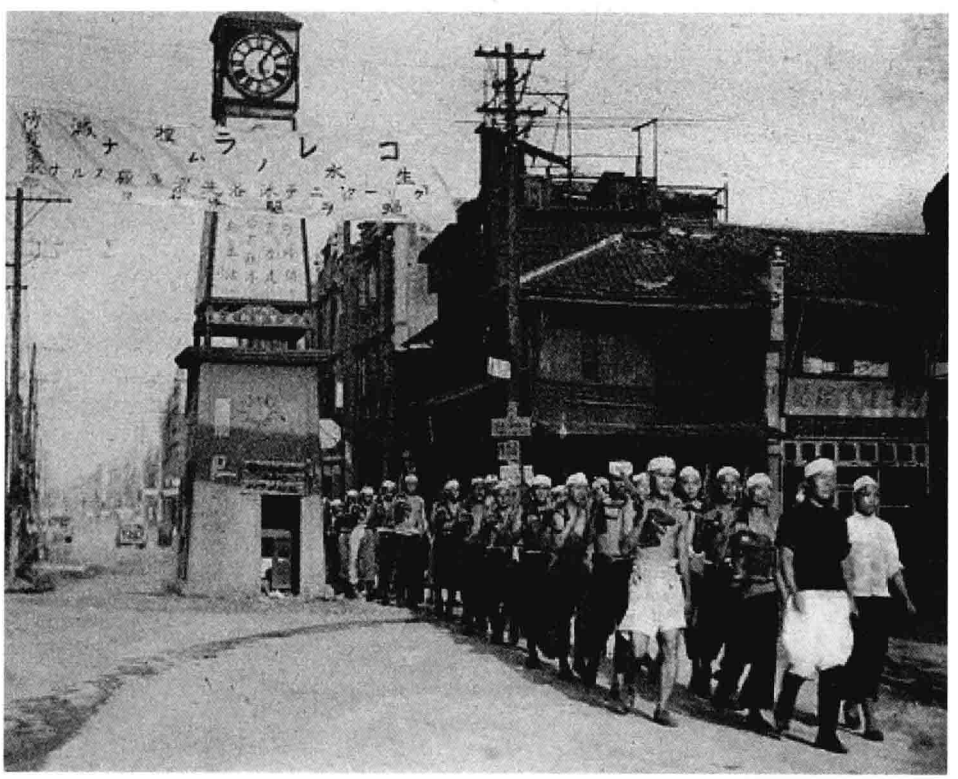
2

1 伪九江皇协维新军进行队列训练。〔《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7 页〕

2 伪九江皇协维新军队长冯江涛。〔《支那事变画报》第 39 辑，第 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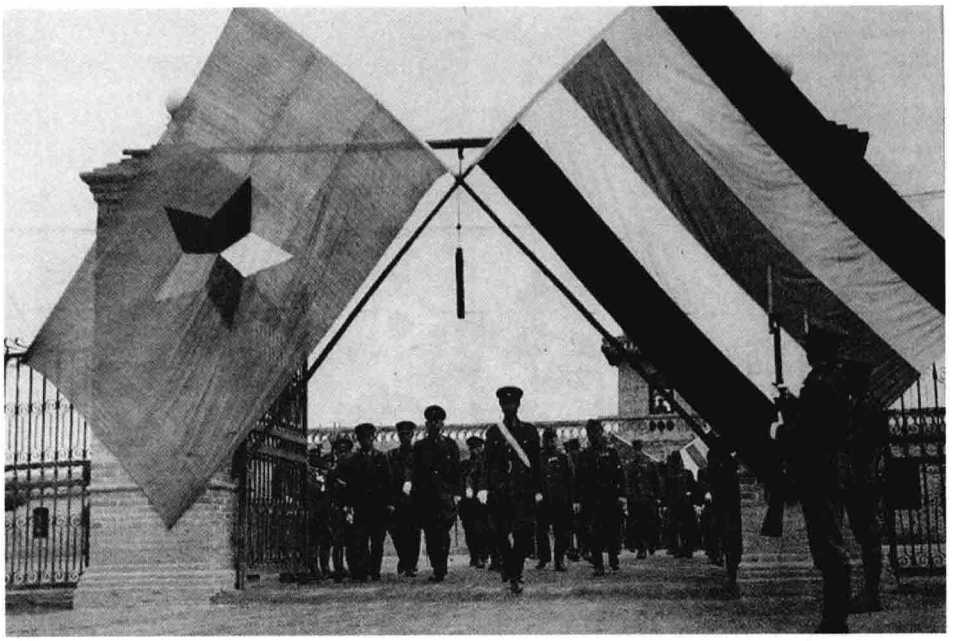
1

1 1938年，青岛“同仁会”成立。图为同仁会会员进入成立仪式会场。〔《支那事变画报》第18辑，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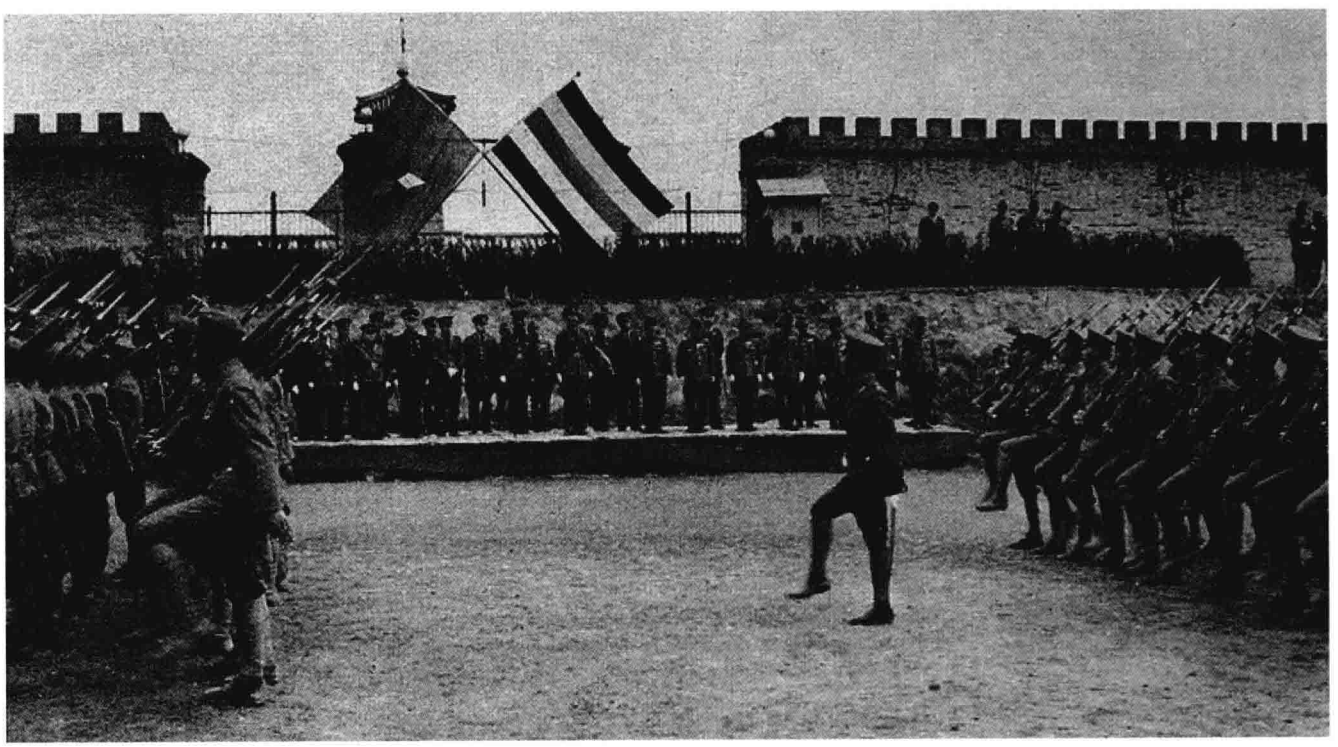


2

2 1938年9月，伪九江皇协维新军队伍在九江市内巡查。〔《支那事变画报》第39辑，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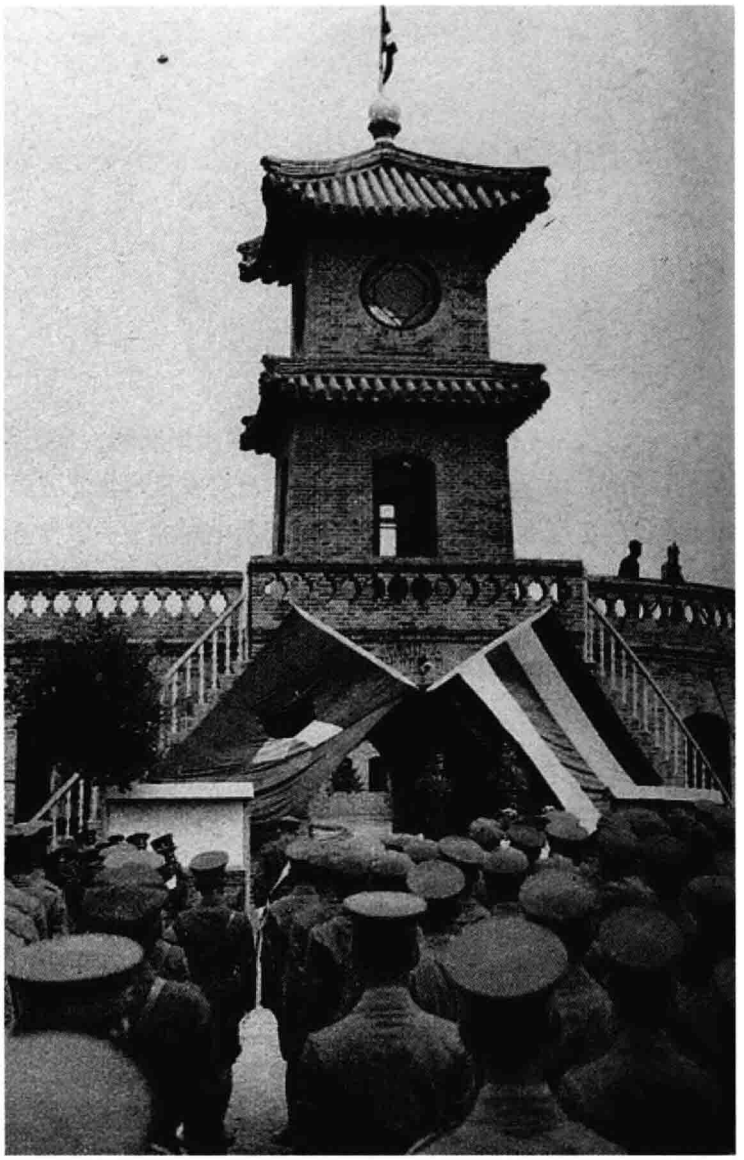
1



2

1　1939 年 5 月，伪通州陆军军事学校举办的阅兵式会场。〔《支那事变画报》第 60 辑，第 24 页〕

2　1939 年 5 月，校长齐燮元检阅伪通州陆军军官学校学员。〔《支那事变画报》第 60 辑，第 24 页〕



1

■1 1939年5月，伪通州陆军军官学校创立一周年仪式上，齐燮元进行训话。〔《支那事变画报》第60辑，第25页〕

■2 上海的伪台湾义勇队在进行劳作。〔《支那事变画报》第27辑，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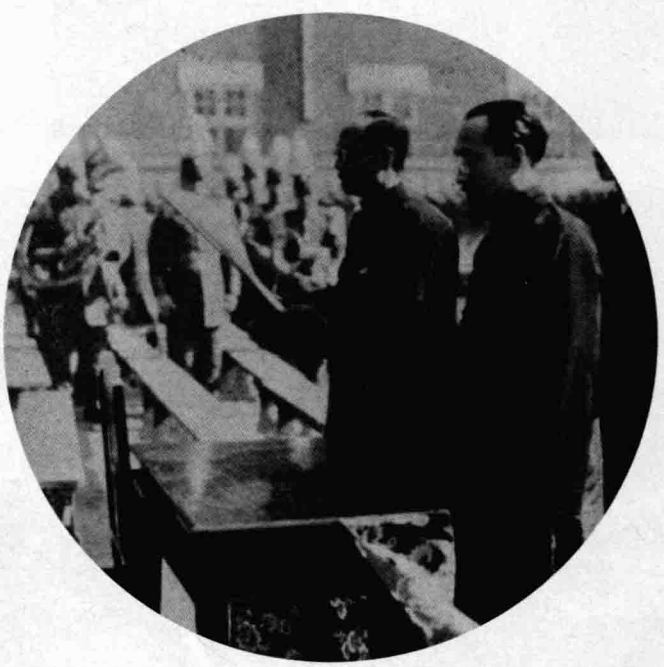
2

三、控制宗教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日本侵华期间，日伪政权在北京的孔庙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1938 年 2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授意下，恢复祭孔大典，以获得日伪政权的正统地位，为日本侵略及统治中国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

侵华日军通过控制宗教，麻痹中国人的精神，泯灭民族反抗意识。日本佛教是鉴真和尚东渡传播到日本的，日军利用中日佛教渊源关系，将佛教作为其侵华的精神武器。侵华期间，日本佛教大部分宗派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忠皇爱国”思想，宣传国民“护国”精神，派遣随军僧战地传教，为侵华战争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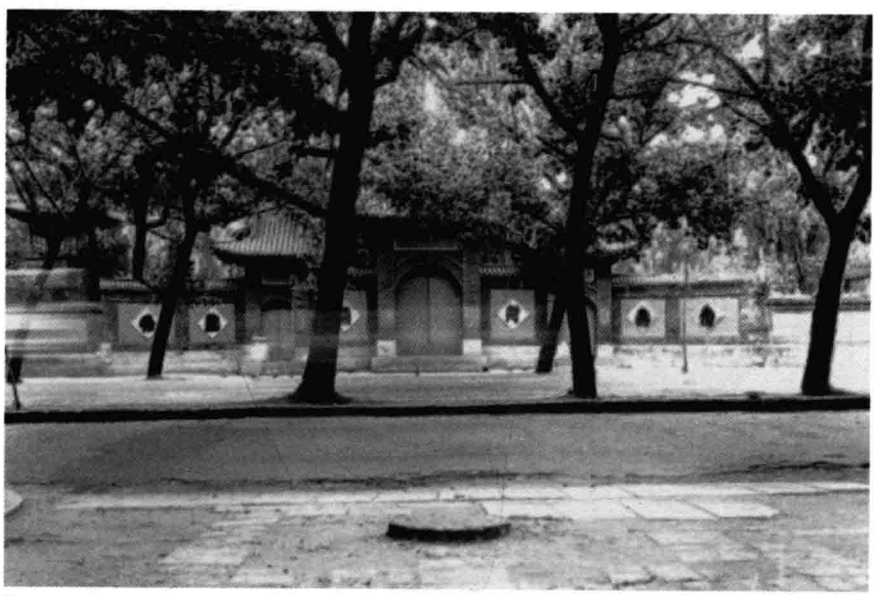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访问中国各地本愿寺净土宗寺庙，邀请中国佛教僧侣访问日本本愿寺，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为战死日军举行“慰灵祭”，让中国僧侣到场为阵亡日军念经超度；宣传中日佛教“同出一宗”，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等。通过亲日的宗教宣传和宗教活动，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



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州国成立时的祭天活动。通过祭天和“君权神授”，企图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杨莲福提供〕

1

■1 参与伪满洲国“建国运动”中的蒙古僧人代表与日满要员合影。〔杨莲福提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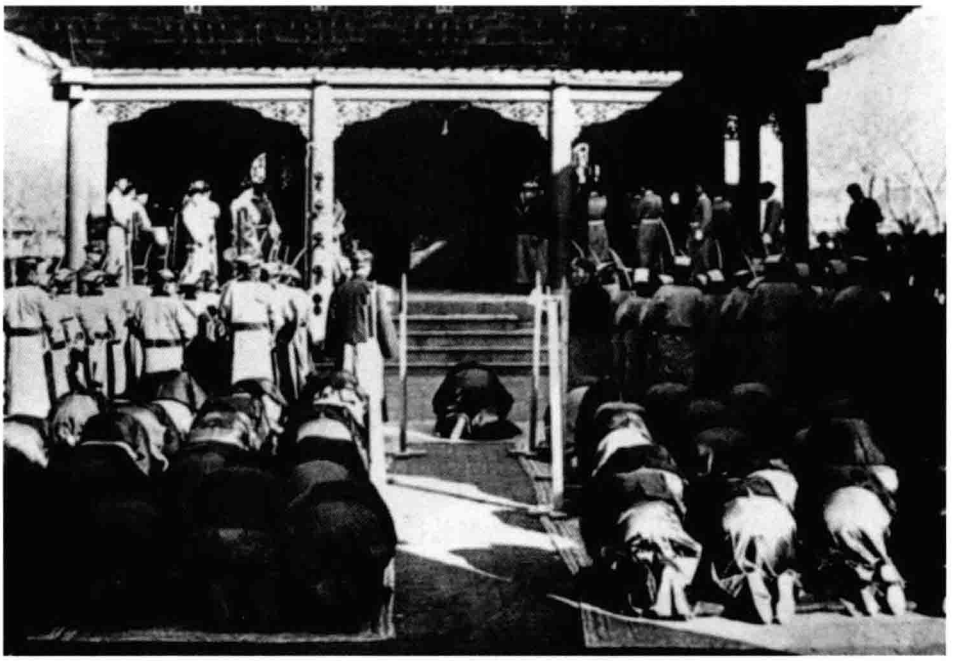
■2 日伪拉拢利用长春的护国般若寺部分僧人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图为长春护国般若寺正门。〔张立宪摄影〕

3

■3 日伪利用其他已有的宗教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就曾被拉拢利用，为其侵略服务。图为日本竹田宫恒德王到访哈尔滨极乐寺。〔杨建明提供〕

1 日伪还利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孔教巩固其殖民统治。〔张蓉提供〕

2 大连本派本愿寺关东别院，又称东本愿寺。该寺于1915年建立，1945后作为大连图书馆书库，1990年改作大连京剧团驻地，2002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哲夫、杜常军、刘俊勇：《旅大旧影》，第1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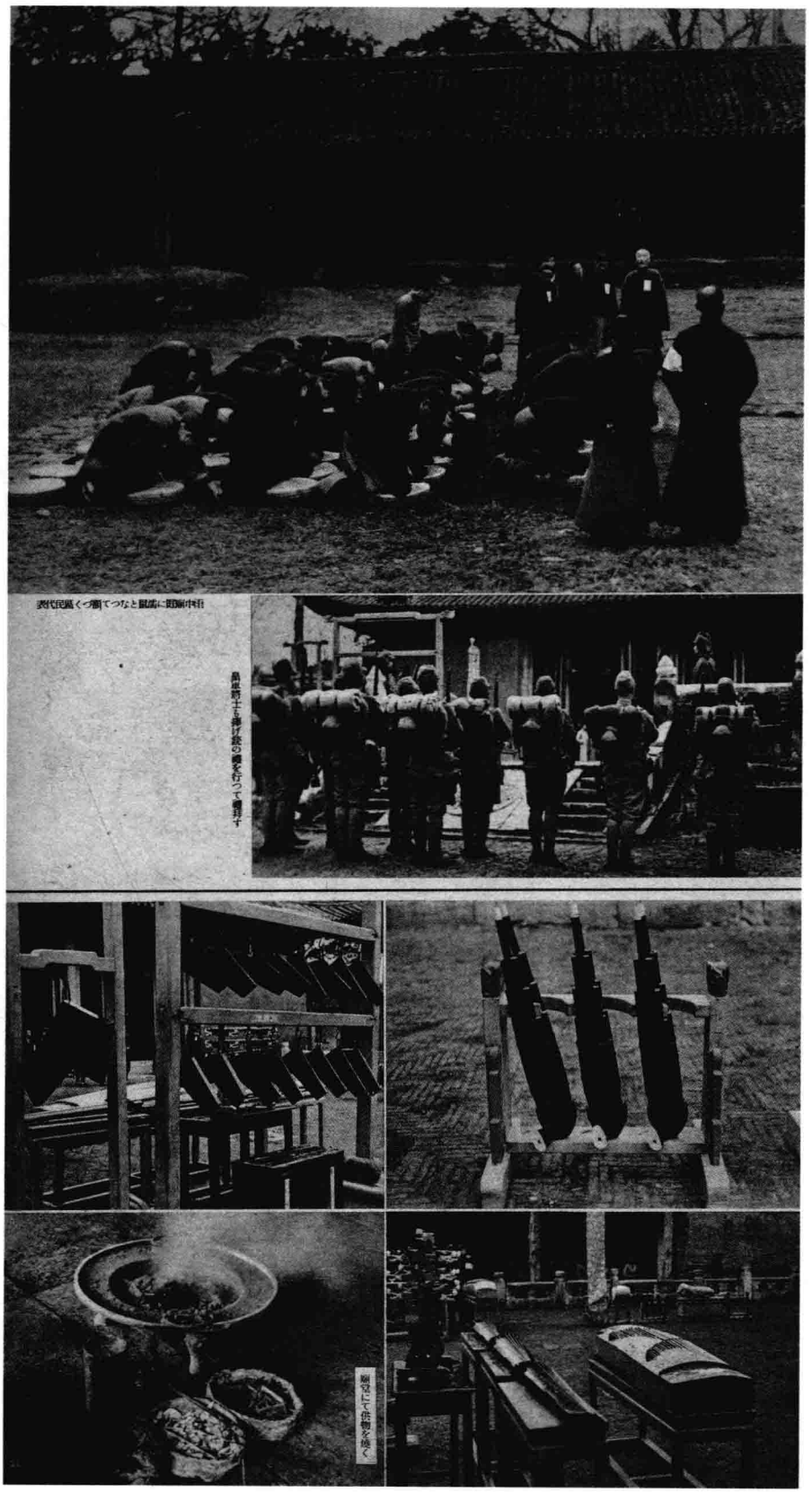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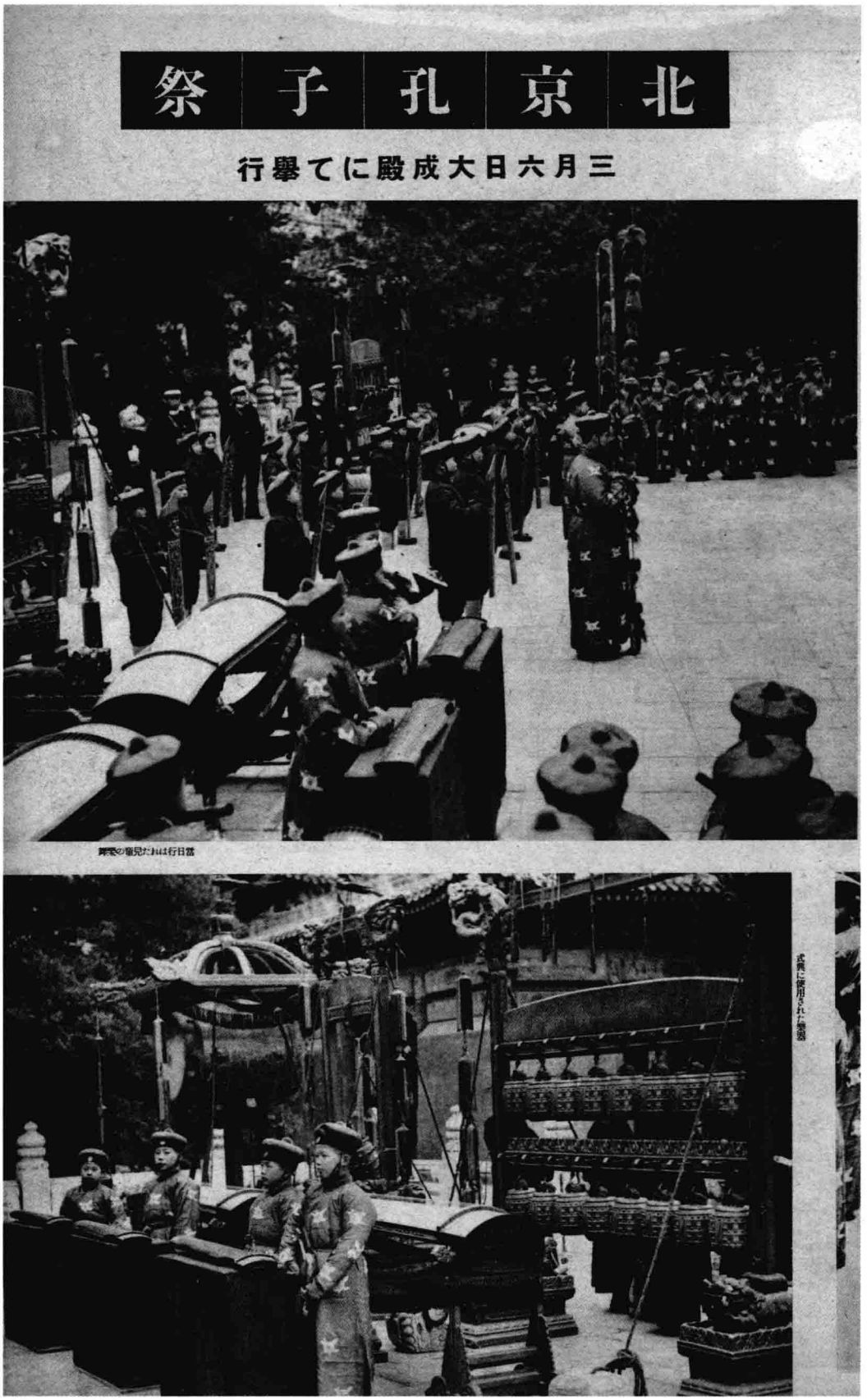
2

1938 年 2 月下旬，日本东本愿寺裹方大谷智子在东本愿寺阿部师等僧侣陪同下，访问天津和北京。这三幅照片分别是伪天津市长潘毓桂的妹妹潘月华与大谷智子握手合影（上图），大谷智子一行从天津东站下车（下左图），以及到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下右图）的新闻照片。〔《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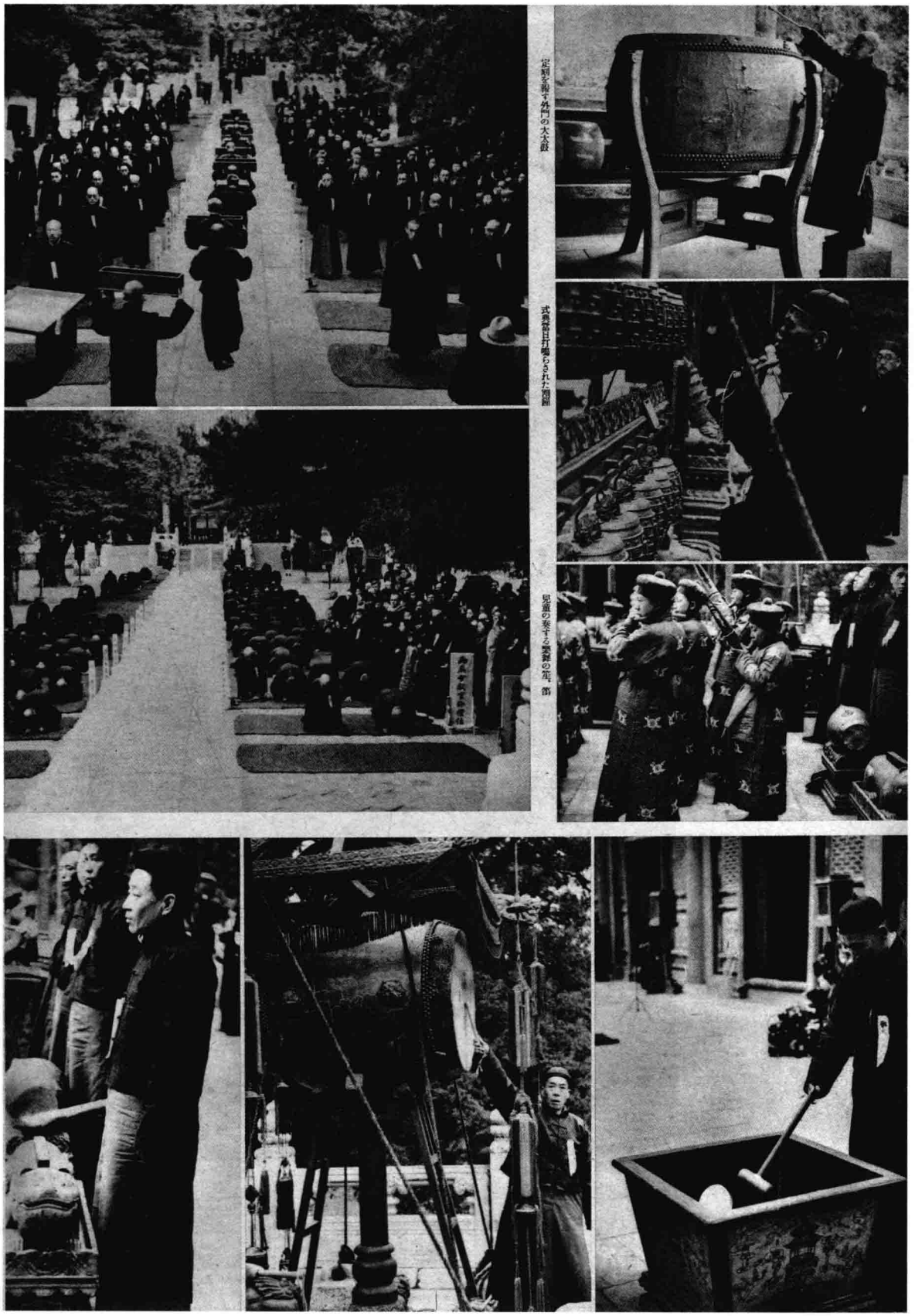
1938 年 2 月下旬，日本东本愿寺裹方大谷智子访问北京的广济寺、日本北京兵站医院、日侨北京伪国防妇人会等，受到伪北京市长江晋和夫妇宴请并合影留念。〔《支那事变画报》第 20 辑，第 15 页〕



1938 年 3 月 7 日，日伪在苏州孔庙举行的祭孔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 22 辑，第 21 页〕



1938 年 3 月 6 日，华北伪政权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祭孔活动之一。〔《支那事变画报》第 22 辑，第 14 页〕



1938 年 3 月 6 日，华北伪政权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祭孔活动之二。〔《支那事变画报》第 22 辑，第 15 页〕

1 1938年4月，在华北津浦县杨家庙附近，为日军战争服务的日莲僧。〔《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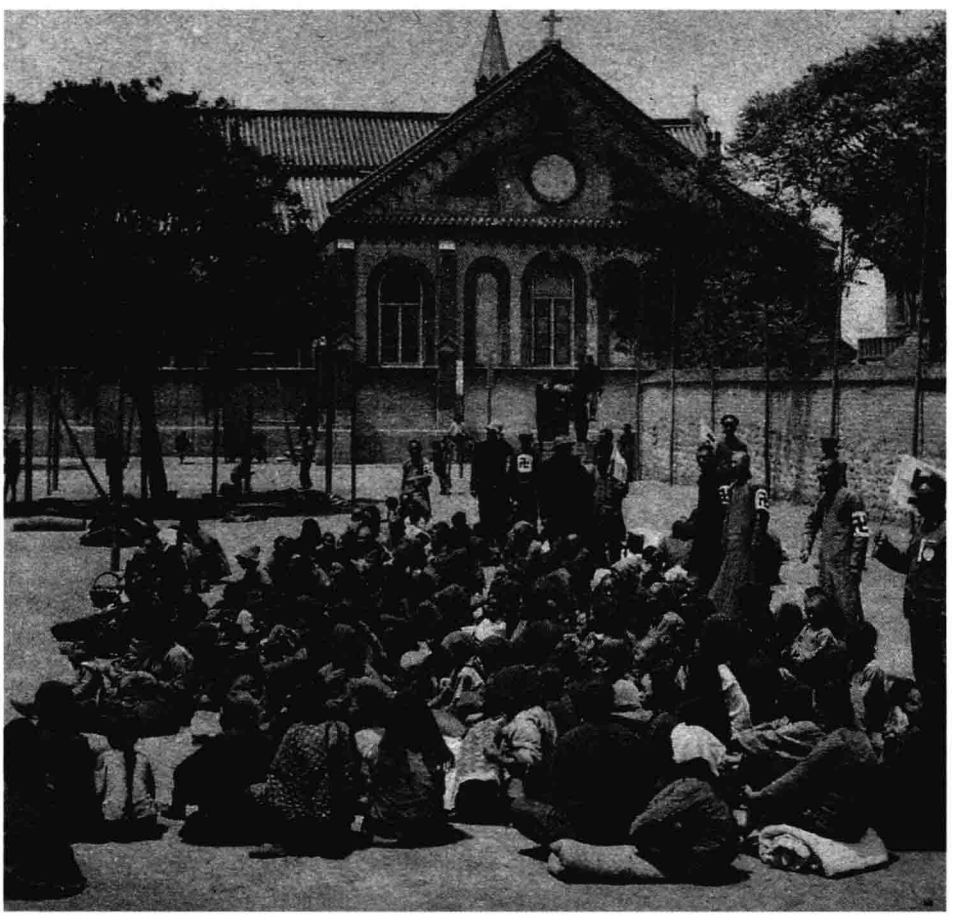
2 1938年4月，被日伪组织到本地西本愿寺做参拜活动的中国少年学生。〔《支那事变画报》第26辑，第30页〕

1

2

1

■1 1938年6月上旬，日军占领徐州后，出动“抢救”平民伤员的走在徐州街道上的红卍字会人员、外国神父以及日伪警察。〔《支那事变画报》第31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6月21日发行，第21页〕



2

■2 1938年6月上旬，日军占领徐州后，被天主教神父和红卍字会收容在徐州青年路天主教堂大院内的中国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尤其是年轻妇女后来的命运吉凶难卜。〔《支那事变画报》第31辑，第12页〕

1

2

1　1938年6月11日，日伪组织各界在南京毗卢寺举行的“觉岸同登”慰灵祭活动会场。〔《支那事变画报》第32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7月1日发行，第30页〕

2　1938年6月11日，日伪组织南京各界在南京毗卢寺举行的慰问日伪死亡官兵与死难民众亡灵的“慰灵祭”上的祷告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32辑，第30页〕

1938年7月，日军竖立的镌刻有“一文字山——支那事变发端之地”纪念碑，以及在北京近郊一文字山山麓举行的纪念事变一周年活动集会现场。〔《支那事变画报》第34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7月21日发行，第2页〕

■1 1938年7月，日军在北京太庙举行祭祀侵华日军阵亡官兵的“慰灵祭”活动。〔《支那事变画报》第34辑，第30页〕

■2 1938年12月中旬，北京本愿寺所设日语学校。〔《支那事变画报》第49辑，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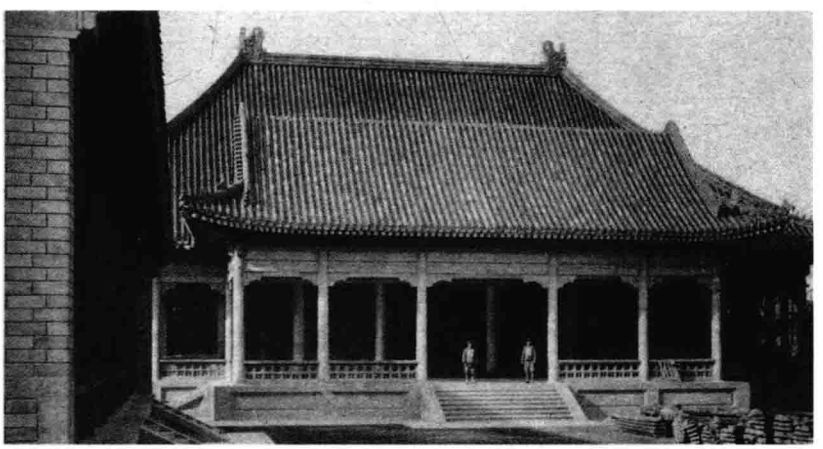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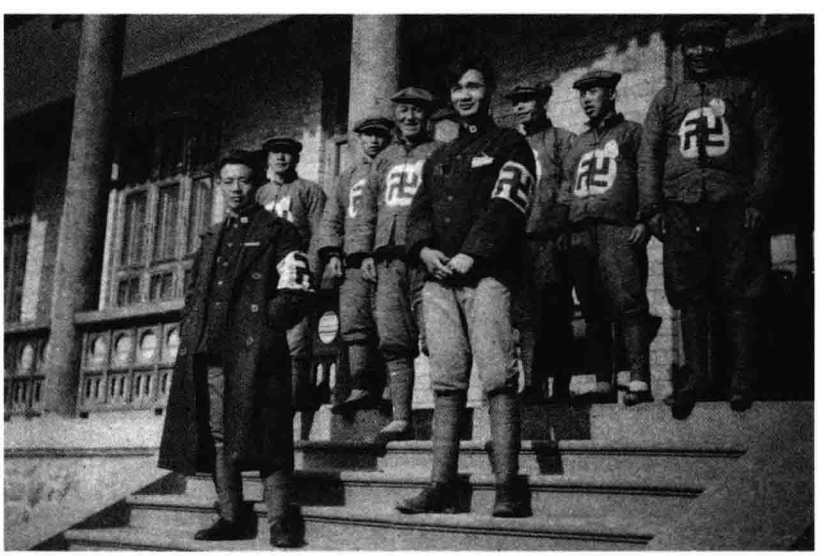
1939 年春季，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孔庙举行的祭孔典礼。〔《支那事变画报》第 56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1939 年 4 月 5 日发行，第 25 页〕

1

2



3



4

1 1938年1月5日，日军入城式之后，济南红卍字会等亲日宗教团体代表手持伪政权的五色旗日本和太阳旗上街游行，庆祝日军“解放”济南。〔《支那事变画报》第12辑，第28—29页〕

2 1938年4月，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驻济分会及济南道院大门。〔《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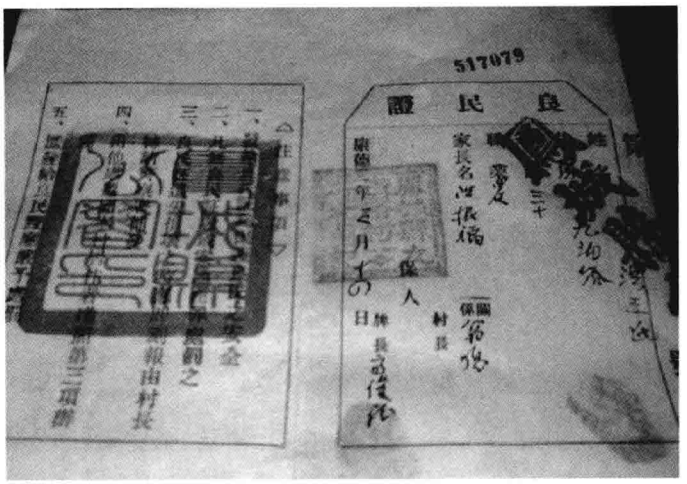
3 1938年4月，日伪时期世界红卍字会济南道院主殿玄关。〔《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4 1938年4月，济南红卍字会会员合影。〔《支那事变画报》第25辑，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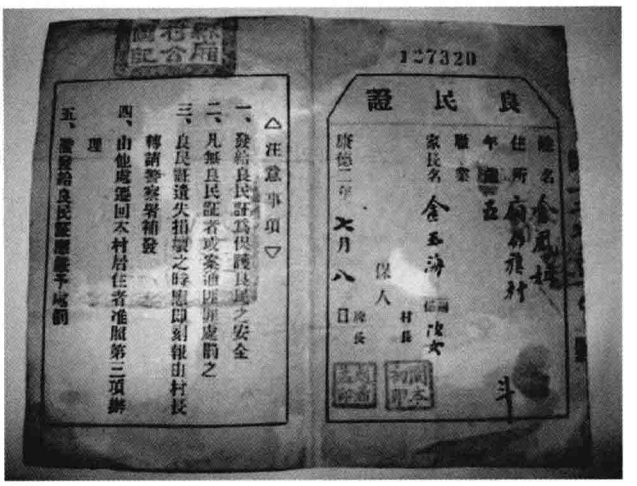
四、制颁“良民证”

“良民证”是日军侵华期间，为避免社会流民、所谓匪盗及抗战人士等对日军活动的破坏、干扰，确保占领区的安全，并用于表示占领区人民对“大日本帝国”效忠的一种身份证明证件，也称“身分（份）证明书”，15岁以上的人均需领取。良民证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百姓的一种居民身份管理。

1939年10月山西省曲沃县的良民证，持证人为当地农民宋东元。〔武菁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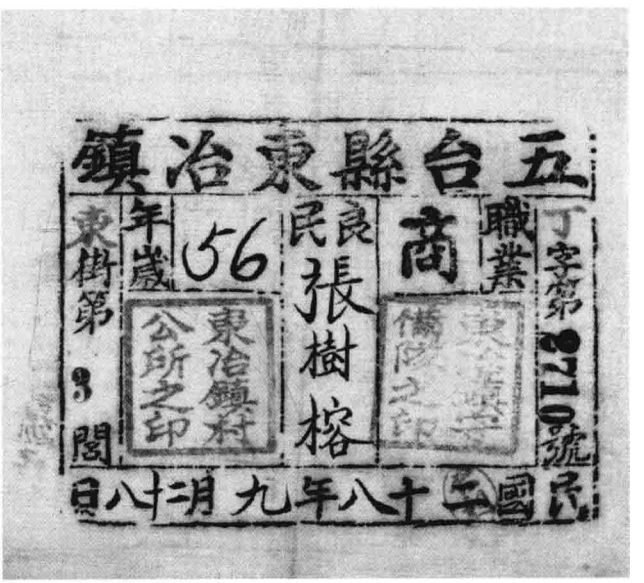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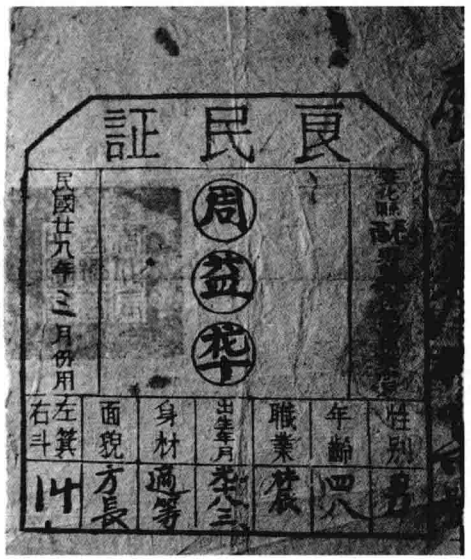
4

1　1935 年伪满洲国政府制发的第 517079 号“良民证”。持证人为九沟谷村民洪王氏。〔黄季左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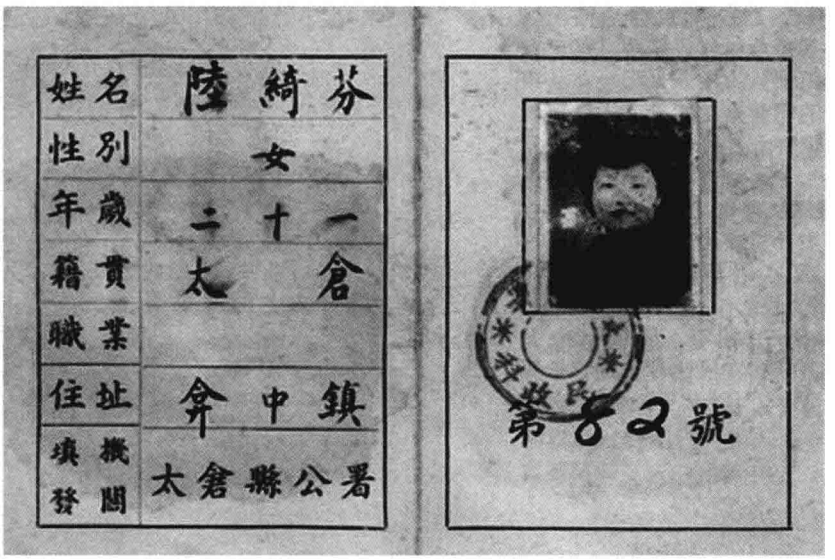
2　1935 年 7 月伪满洲国政府发给的第 127320 号“良民证”。持证人为金凤姐，年龄只有 5 岁。〔黄季左提供〕

3　1938 年 11 月，伪山东省禹城县公署制发的良民居住证明书。在证明书上有日军负责人、禹城县知事以及宣抚班长的盖章。〔黄季左提供〕

3　1939 年 9 月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商人张树榕的“良民证”。〔黄季左提供〕



1



2

3

1 1939 年 3 月湖南省安化县长西乡村民周益华的“良民证”。“左箕”及其下方对应的“4”，是指左手指纹 4 个箕，“右斗”及其下方对应的“1”，是指右手指纹 1 个箩。〔杨建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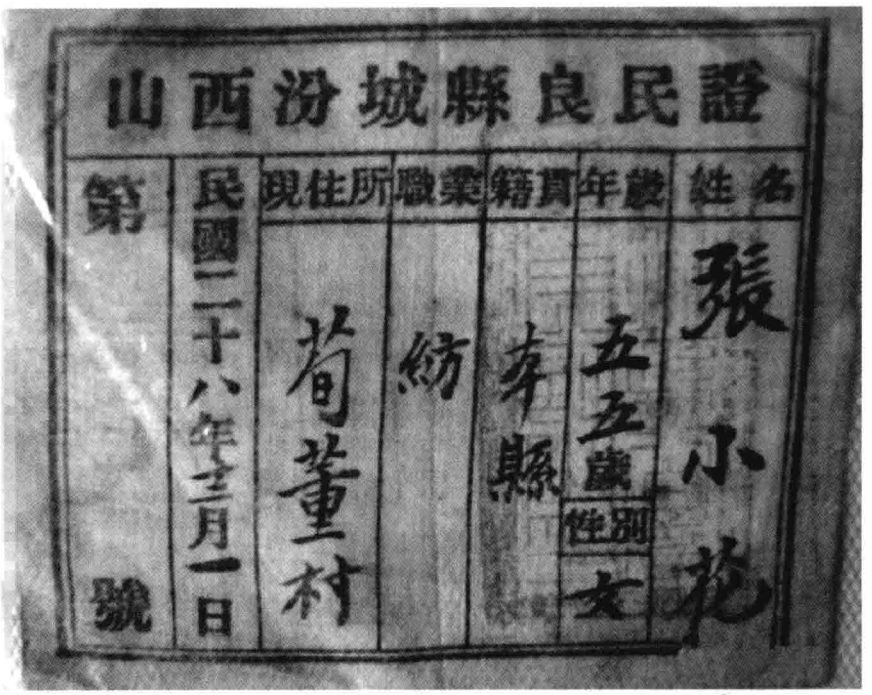
2 1939 年 4 月 22 日，伪江苏省太仓县公署补发给中镇居民陆绮芳的“良民证”。〔杨建明提供〕

3 1939 年山西省猗氏县东里村商人杨立创的昃字第二四号“良民证”。该证上有“中日提携，和平救国”的字样。〔王延友提供〕

1　1939年11月山西汾城县荀董村村民张小花的“良民证”。持证人张小花从事的职业是纺织业。〔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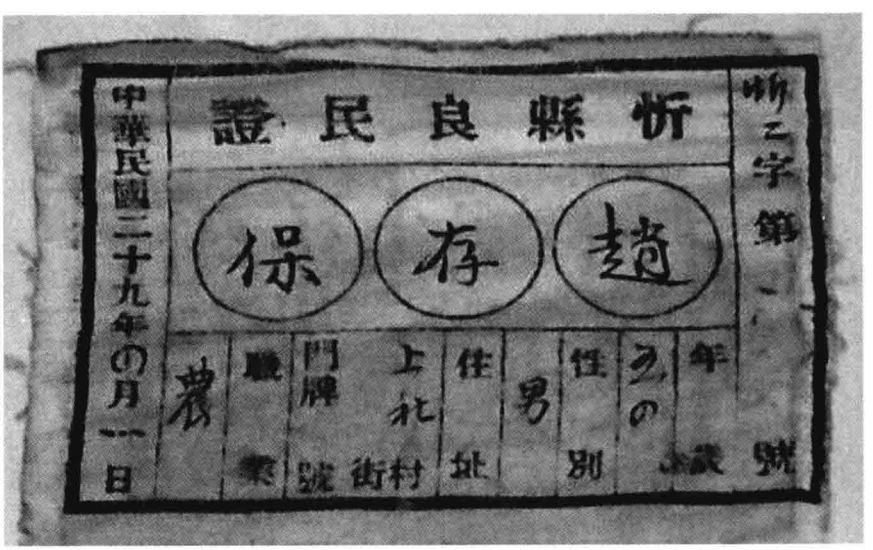
2　1940年4月山西省忻县上社村农民赵黄顺的“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3　1940年4月山西省忻县上社村农民赵存保的“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1

2



3

1

2

3

1 1940年4月忻县上社村村民赵郭氏的“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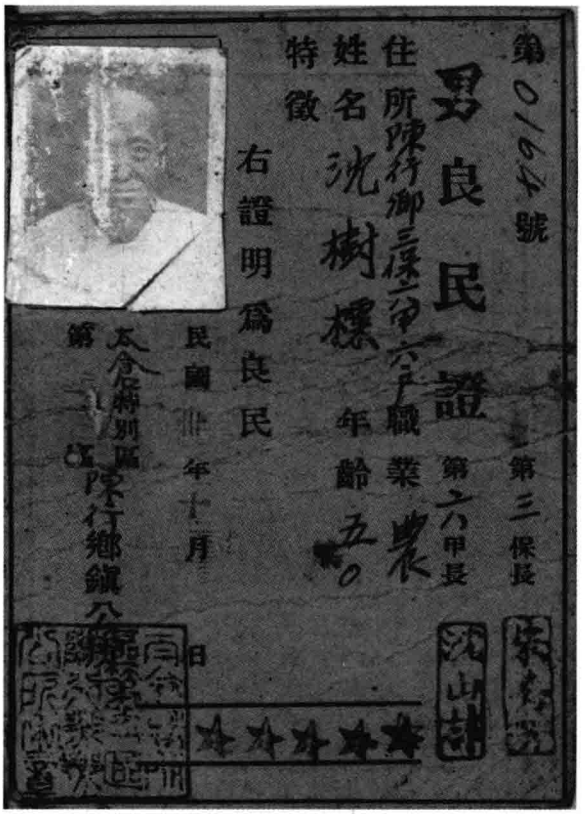
2 1940年6月伪山西汾城县政府制发的“良民证”。持证人为荀董村商人贾俊明。〔李园园提供〕

3 1940年8月日军警备队制发的山西省安邑县第三六号“良民证”原书（左）和存根（右）。持证人为该县西姚村村民杜宜氏。〔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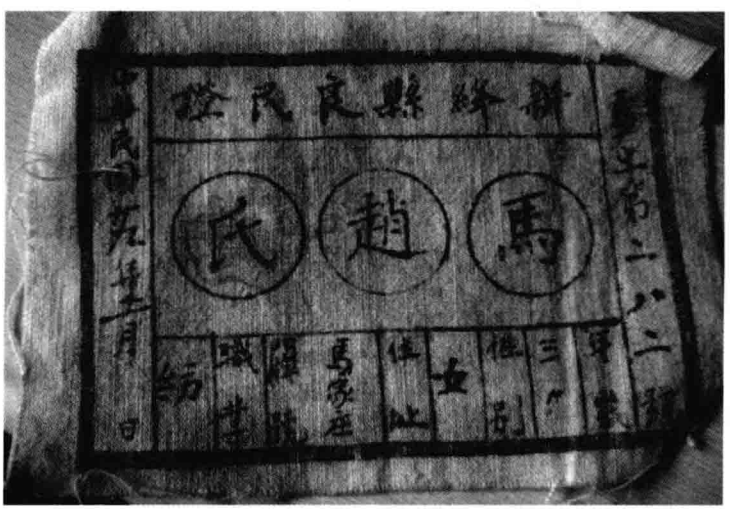
1　1941年10月江苏省太仓县陈行镇居民沈树标的“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2　1940年11月，山西新绛县伪政府制发的马字第二八二号“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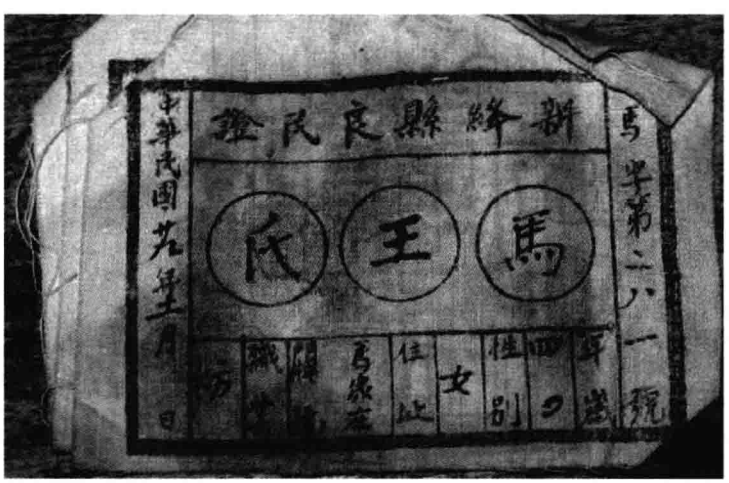
3　1940年11月山西新绛县伪县政府制发的马字第二八一号“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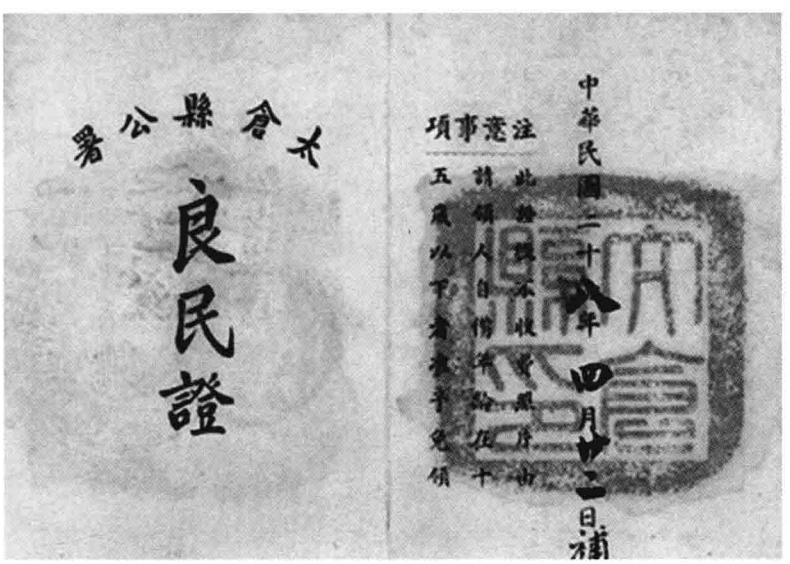
2



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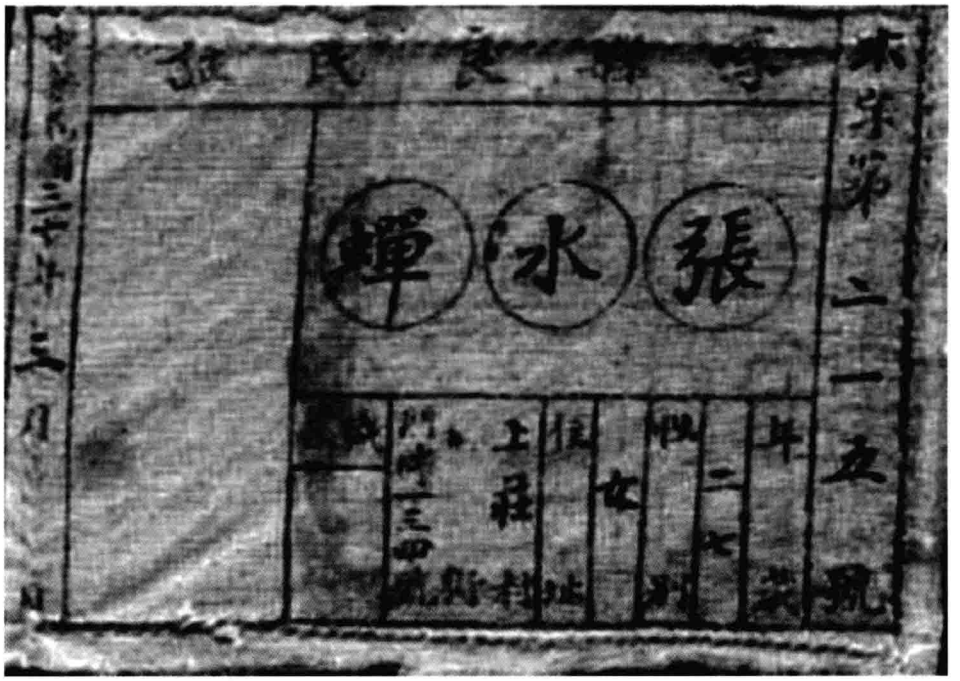
■1 1941 年 2 月，山西省太谷县伪政府制发的谷字第 31123 号的“良民证”。〔李园园提供〕

■2 1941 年 1 月山西省昔阳县伪政府制发的昔字第七七五号“良民证”。持证人为该县居民乔丑尾。〔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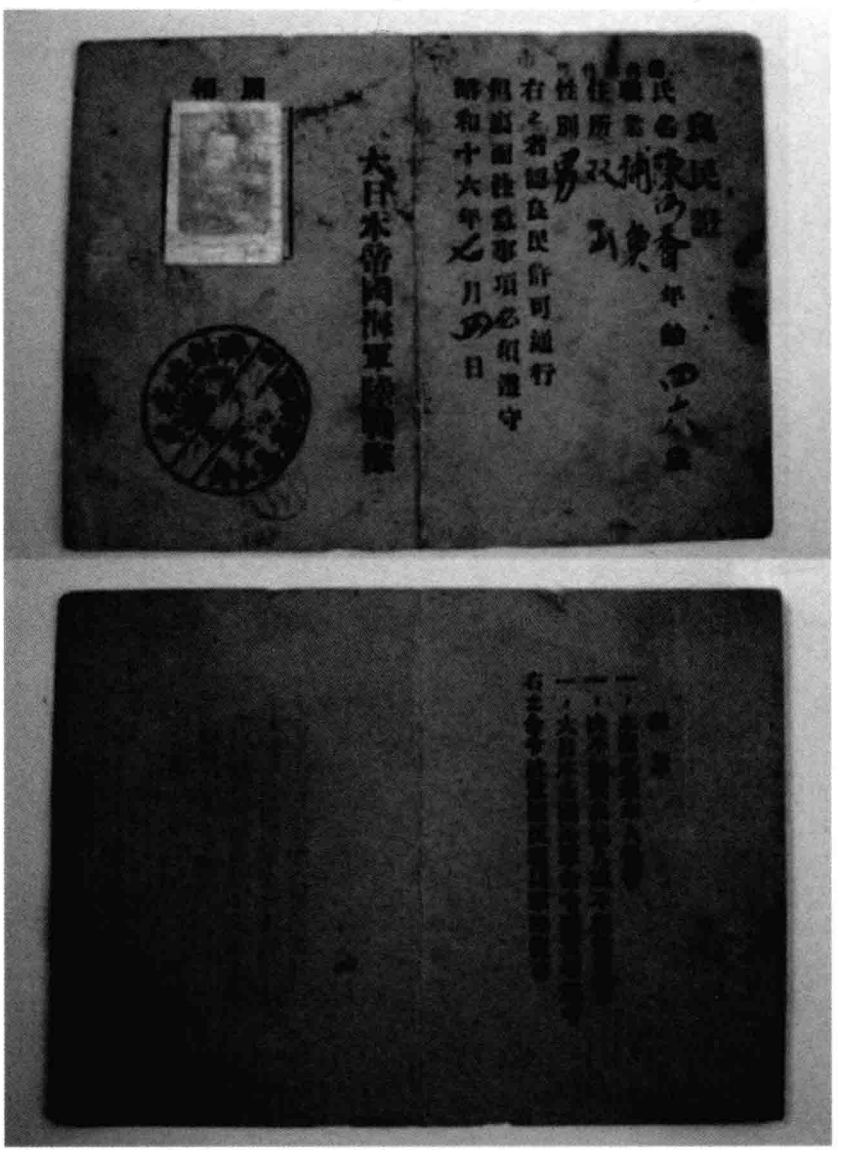
■3 陆绮芳的“良民证”的封皮。〔李园园提供〕

1　1941年3月，山西崞县伪县政府制发的木字第二一五号“良民证”。持证人为上庄村村民张水蝉。〔傅光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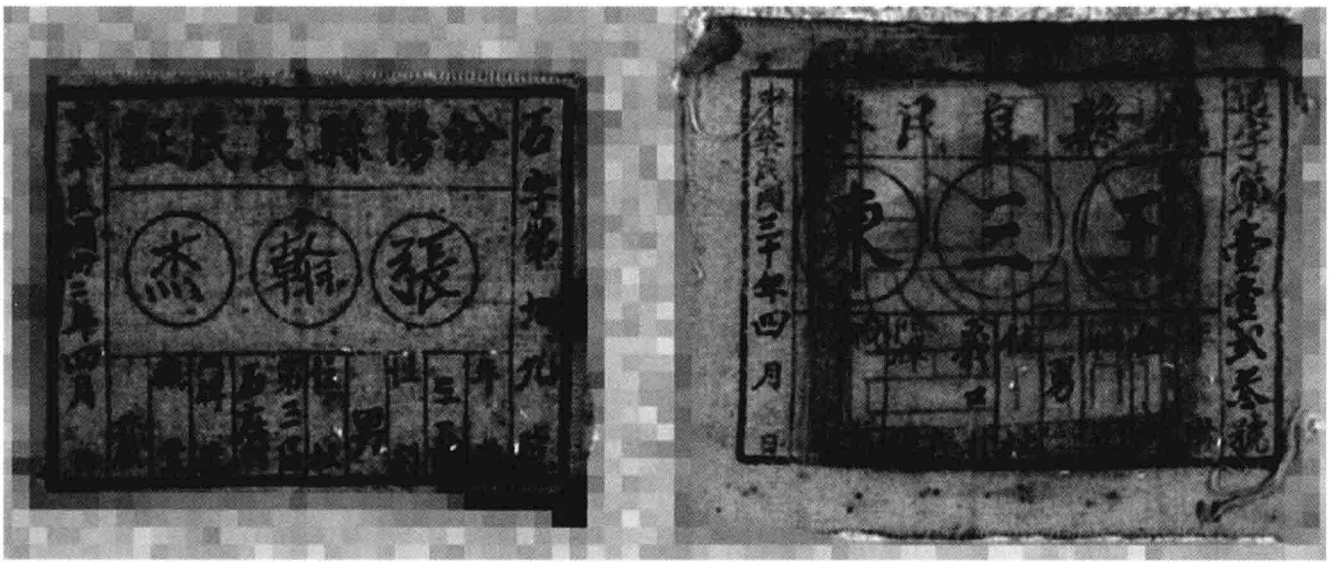
2　1941年7月日海军陆战队制发的舟山市双山村渔民陈某的良民证。证上的蓝色圆章的印文是“虎疫注射剂，舟山岛基地队”。日本人把鼠疫称为虎疫。由于之前日军在浙东一带实行细菌战，当地许多人都被感染。1941年7月，太平洋战争前夕，日军部队聚集舟山。为避免外出渔民把细菌带给岛上的日军，日军给当地渔民注射针剂，以免鼠疫感染其官兵。〔四明泉钞提供〕



1



2



1

2

1 1943 年 4 月伪汾阳县县政府制发的石字第九九号“良民证”。持证人为石庄村农民张翰杰（左）。1941 年 4 月伪代县县政府制发的通字第一一二三号“良民证”，持证人为村民王三东（右）。〔黄季左提供〕

2 1942 年 10 月浙江省嘉善善兴特别区第三区杨庙乡镇公所发给当地农民沈天生的第 9520 号“良民证”。〔黄季左提供〕

五、制颁身份证、通行证

（一）制颁身份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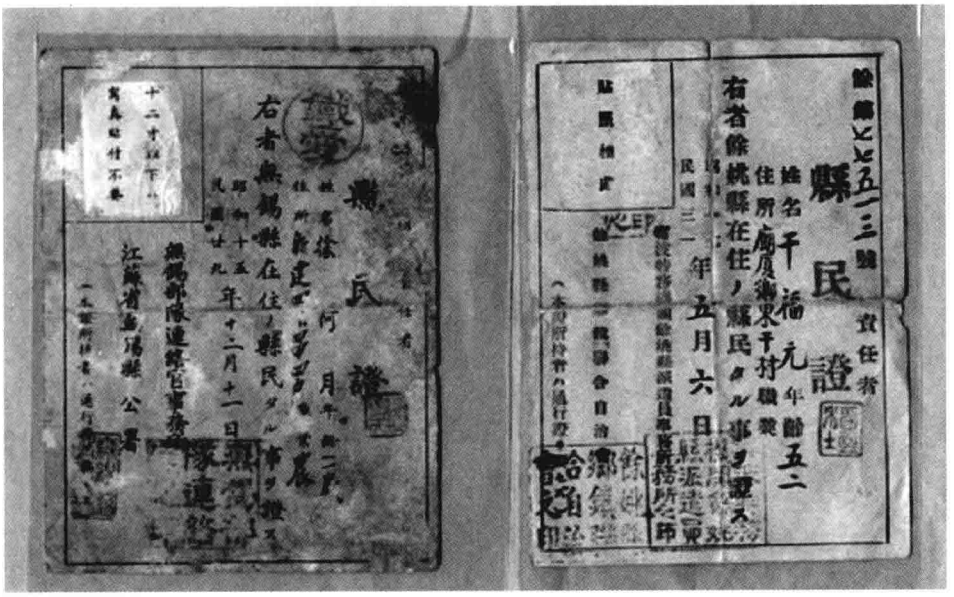
1939年7月26日，日伪行政委员会公布《户口调查规则》，规定了全省统一发放的“居住证”样式，长4寸宽3寸，白布制作，要求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必须核发“居住证”。

1941年初，日伪山东各县级警察所普遍发放纸质“身分（份）证明书”，标注持有人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职业，贴本人正面像片并捺左、右食指指印各一枚，限在华北地区使用，有效期3年。下半年，又收缴已发放的“身分（份）证明书”，全面换发纸质“居住证”，填写项目与“身分（份）证明书”相似，封面增加“山东省公署”字样，使用时期直至日寇投降。

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设立了伪蒙古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察南自治政府，1939年9月又将其合并改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伪统治时期，晋、察、冀、热、北平等大部分地区老百姓必须持有伪蒙疆自治政府制作的身份证方可进城进行买卖交易，否则就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而一旦丢掉身份证，还将被罚款。“身分（份）证”背面还列出了十条注意事项。第1条，本身份证须随时携带，不随时携带者，处拘留或50元以下罚金；第9条，贷予本身份证书与他人者处三个月以下之徒刑，或拘留、或二百元以下之罚金。这些规定，正是当时伪蒙疆政府限制人民群众人身自由的证据。

1939年7月26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制发的白布制作的“居住证”，持证人为山东宁阳大伯镇村民戴师盛，编号4857。〔杨建明提供〕



1

2

3

1 左图为 1940 年 12 月 11 日江苏省无锡部队联络官事务所和无锡县公署联合签发给当地农民徐某的县民证。右图为 1942 年 5 月 6 日宁波特务机关和余姚县联合自治会制发的余字第七七五一三号县民证，持证人为庙厦乡东干村村民干福元。该县民证具有通行证功能。〔李园园提供〕

2 1941 年 11 月，带有山西省安邑县警察所长印章的王丙午的身份证。〔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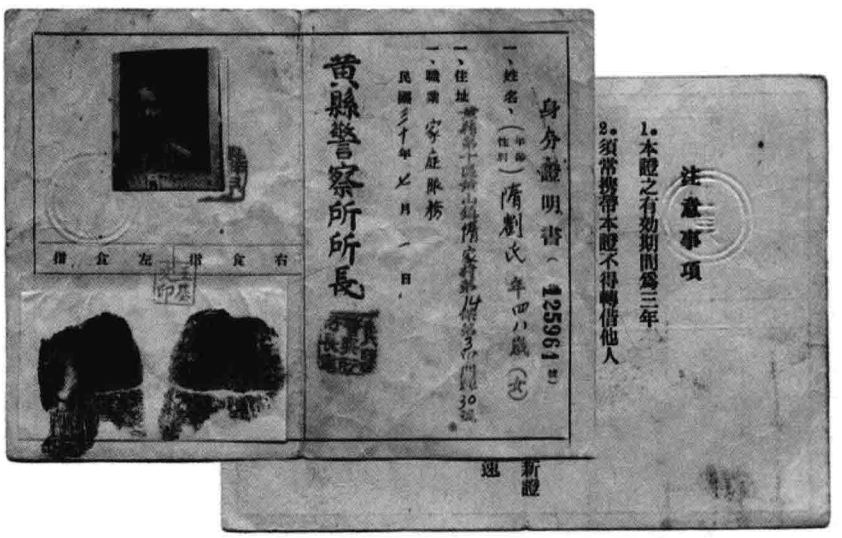
3 1941 年 11 月山西省安邑县警察所颁发的第 7308 号身份证。持证人是王丙午的妻子王杨氏。〔李园园提供〕

1　1941 年 6 月唐山警务段发给河北农民刘贾氏的编号为 17418 号的身份证明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唐山警务段的负责人是日本人，名字叫角川目兼藏。〔黄季左提供〕

2　1941 年 7 月 1 日伪黄县警察所制发的山东省黄县黄山镇隋家村村民隋刘氏的身份证。〔黄季左提供〕

3　1941 年 8 月 7 日，由伪昌乐警察所长发给昌乐县扶安乡村民贾玉山的身份证。〔黄季左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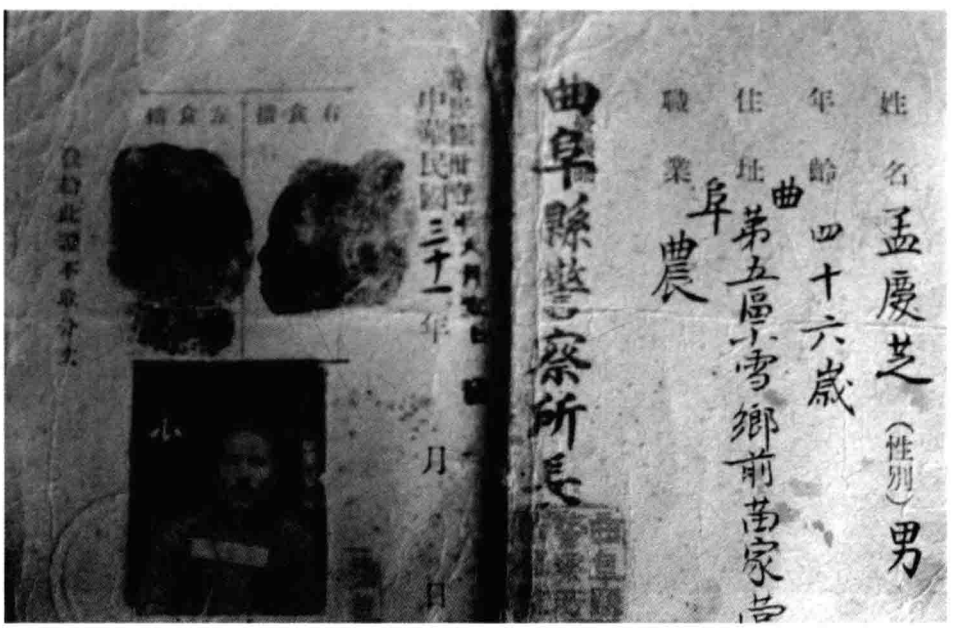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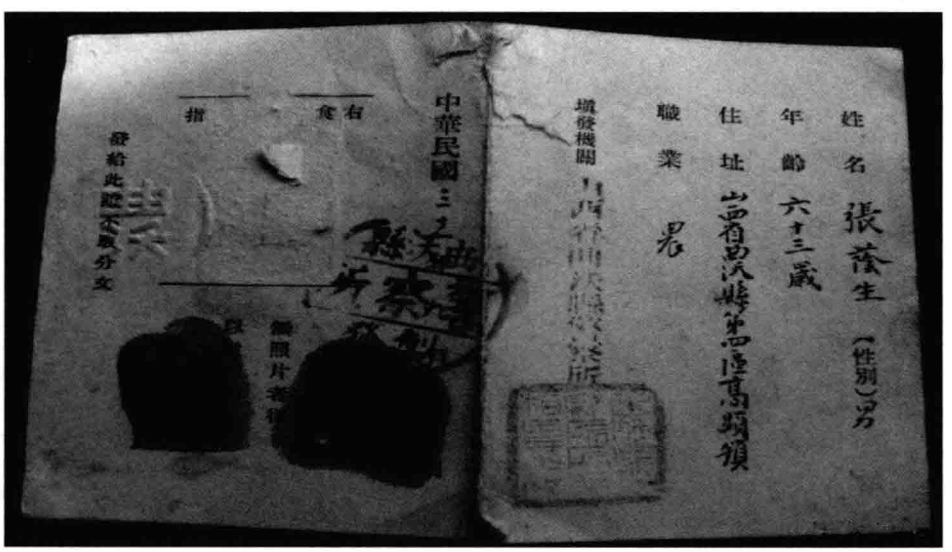
2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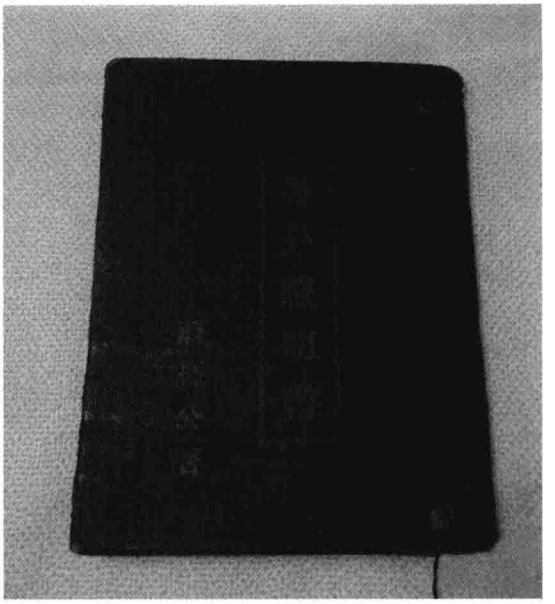
3

1 1942年5月15日，伪山东省公署制发的山东省潍县高庄乡农民居住证。持证人为潍县高庄乡农民刘佩烈。〔李园园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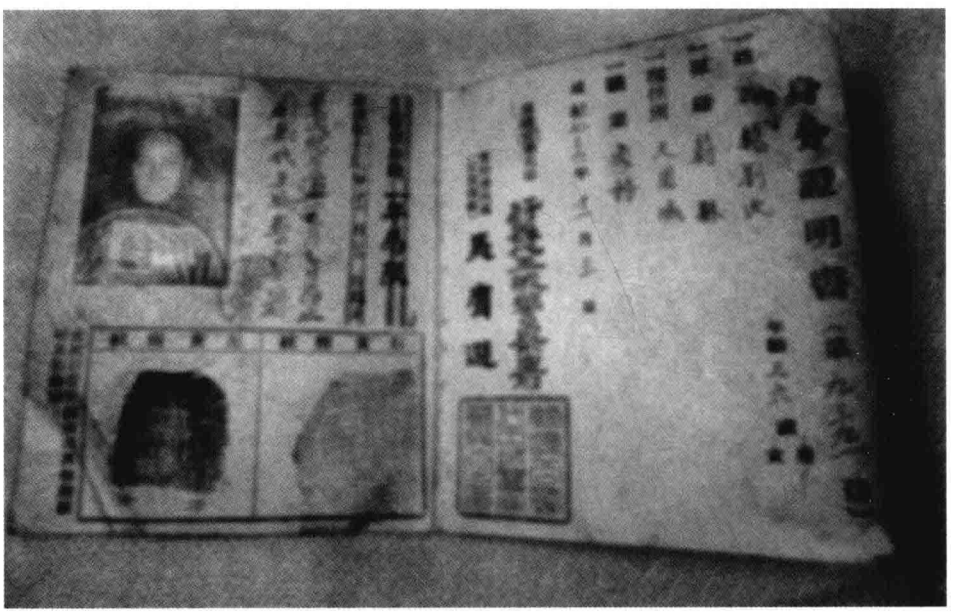
2 1942年6月1日，伪曲阜县警察所长发给曲阜县小雪乡前苗家营村村民孟庆芝的身份证。〔李园园提供〕

3 1942年9月山西省曲沃县伪警察所发给当地农民张荫生的身份证。〔李园园提供〕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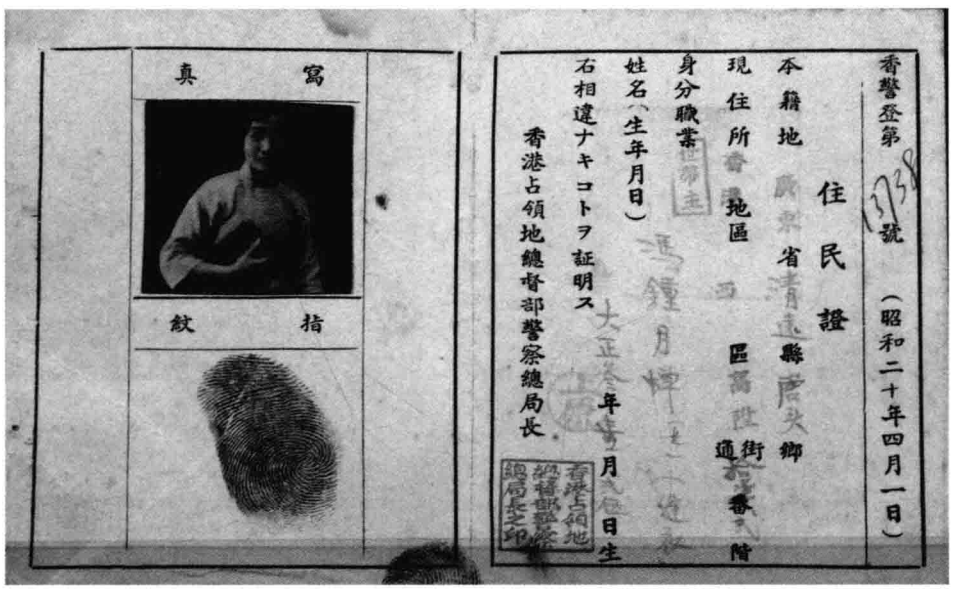
■1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制发的封底印有《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的身份证封底。〔李园园提供〕

■2 1942 年 11 月 3 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制发的身份证封面。〔李园园提供〕

■3 1942 年 11 月 3 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发给尉县大固城家庭妇女杨刘氏身份证。上边有相片、手印、钢印，但妇女只有随夫姓氏，没有名字，这显示当时普通妇女无社会地位。〔李园园提供〕

■4 1941 年 12 月 30 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制发的同时附有夫妻照片的吴会廷的身份证。这张“身分（份）证明书”上贴有吴会廷本人和妻子吴梁氏的照片，人像胸前白布上写着本人的名字；还有吴会廷按下的左右手食指指纹。照片上盖有当时蔚县县政府的钢印，以及蔚县县长和代王城署署长的印章。〔李园园提供〕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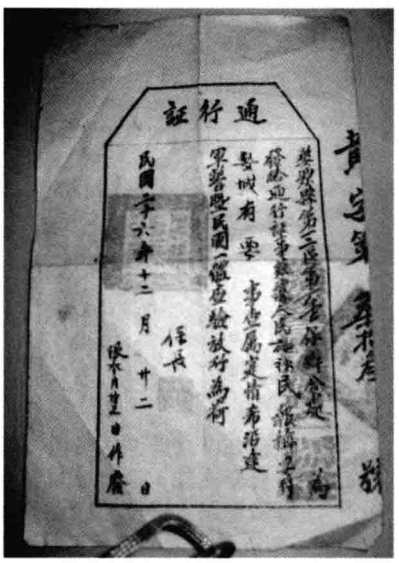
1 1943 年 7 月 25 日，浙江宁波象山地区日军警备队发给溪口乡居民韩仁魁的作为身份证明的第 001534 号住民证。〔杨建明提供〕

2 1945 年 4 月 1 日，日本香港总督部警察总局发给香港居民冯钟月婵的作为省份证明的住民证（居民身份证）。〔香港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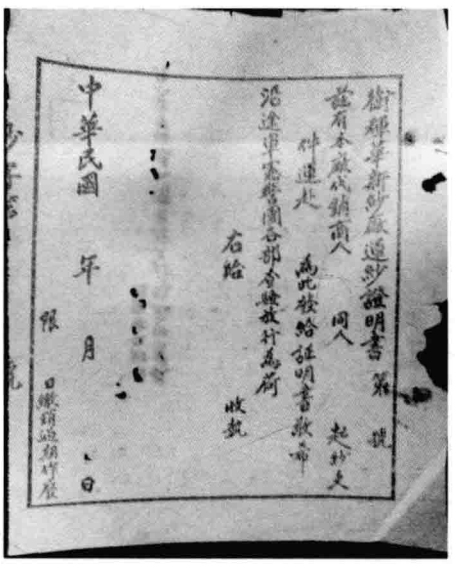
3 1945 年 4 月 1 日，日港总督部警察总局发给香港居民余柳颜作为身份证明文件的住民证。〔香港历史博物馆藏〕

（二）制颁通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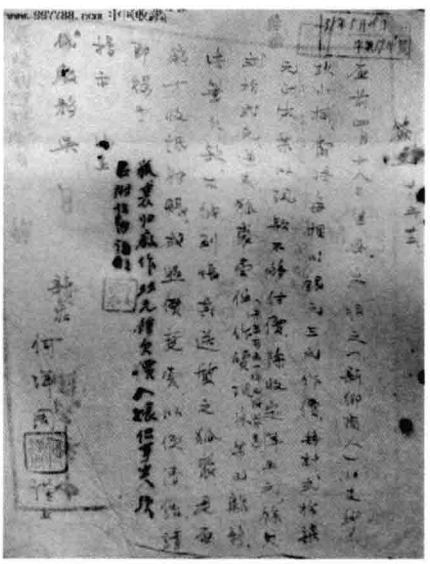
通行许可证，是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占领区人民的出行许可证明。持有此证人们才可以安全出行。该证有有效期，过期作废，且需退还。通过发给通行许可证这种方式，日军加强了对占领区人民的监视与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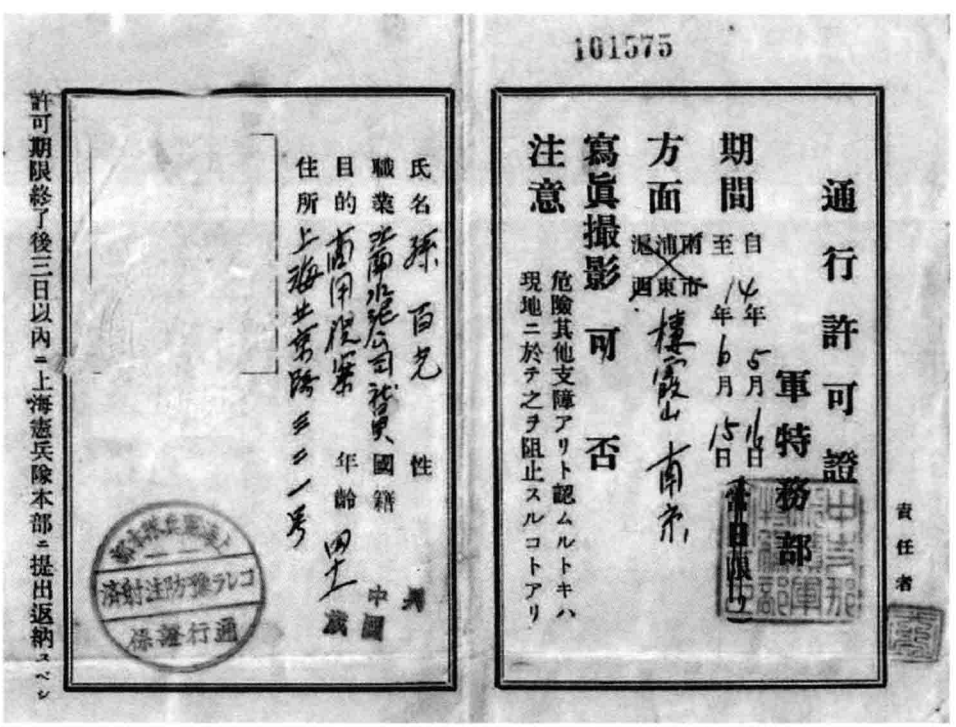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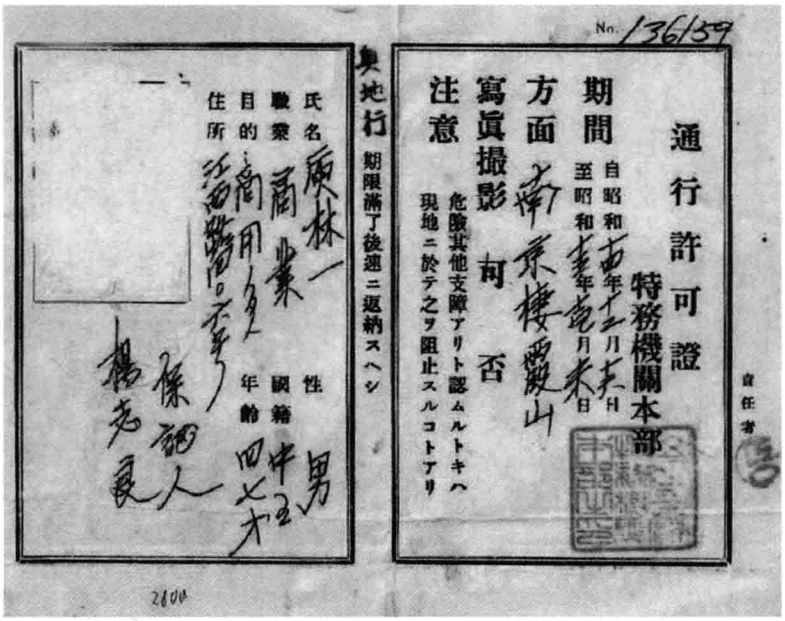
4

1 1937 年 12 月 22 日，江西省婺源县伪保长盖章的通行证。〔傅光中提供〕

2 1938 年 5 月，河南省卫辉县华新纱厂运纱证明书。〔《抗日时期日伪路条》，www.997788.com，2015 年 3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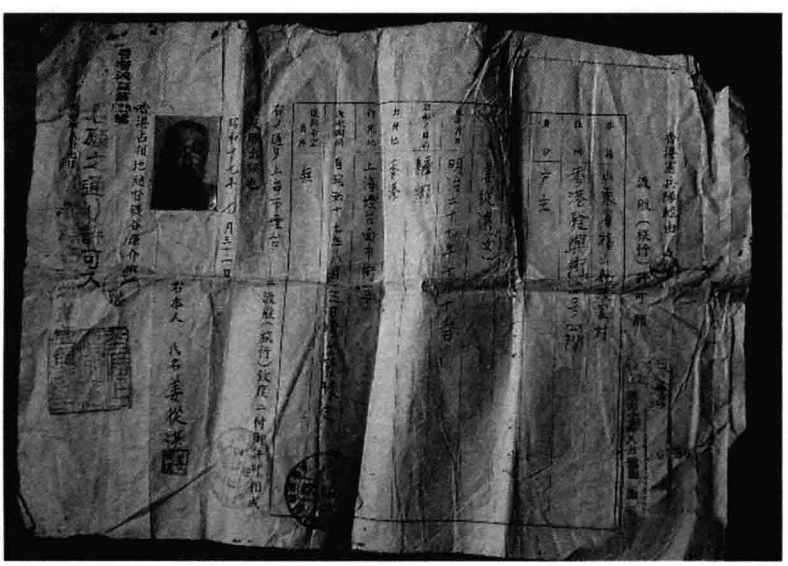
3 1938 年 5 月 25 日，作为卫辉华新纱厂运纱证明书附件的说明函。〔《抗日时期日伪路条》，www.997788.com，2015 年 3 月 6 日〕

4 1939 年 5 月，日军特务部发放上海市民孙百克的第 101575 号的通行许可证，持证人为江南水泥公司社员孙百克。通行证的左下方有日军上海宪兵队本部的盖章。该证有效期为一个月。〔杨建明提供〕



1

2



3

1 1939 年 12 月，日军特务机关本部发出的第 136159 号的通行许可证，持证人前往目的地是南京栖霞山，持证人叫庾林一。该证有效期一个半月，办理证件时还需保证人。〔杨建明提供〕

2 日本人发给魏特琳的通行证，本证有效期限是 1940 年 5 月 8 日至 1940 年 6 月 18 日。〔《哈金："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南京安魂曲〉的逻辑》，http://www.infzm.com/content/65110，2015 年 2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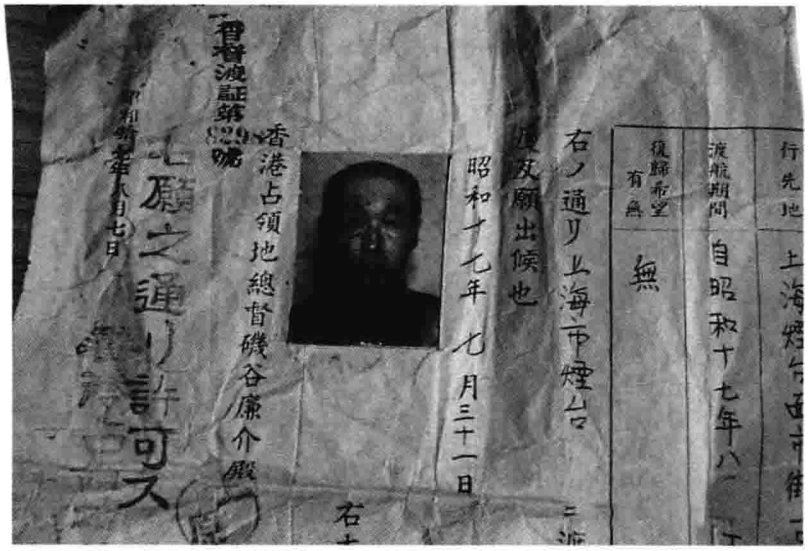
3 1942 年 8 月 7 日，日本香港当局发给原籍山东福山的姜从湛的归乡通行证。本证盖有日本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个人印鉴。〔http://imgditan.mycollect.net/201211/16/20121116204440955727 71.JPG，2015 年 2 月 2 日〕

1　1942年8月7日，日本香港当局发给原籍山东福山的姜从湛的归乡通行证的局部。〔http://imgditan.mycollect.net/201211/16/20121116204440 95572771.JPG，2015年2月2日〕

2　日本侵占上海时期家住上海齐齐哈尔路254弄7号的黄张坤持有的《复归者家族通行许可证》。本证由海军特务部上海复兴班制发。〔王廷友提供〕

3　这是从德国来上海的犹太难民罗伯特的隔离区通行证。日本上海无国籍难民事务所1944年2月3日制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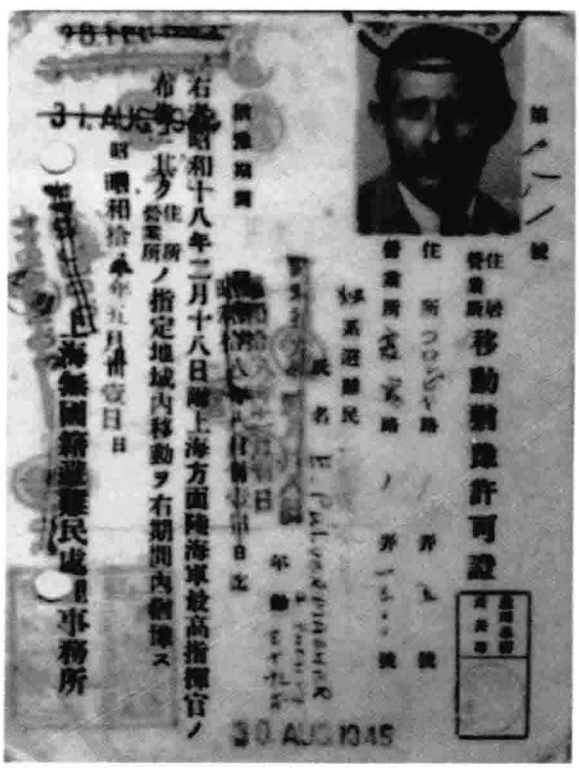
4　犹太难民进入日军设立的虹口隔离区后，须得到通行证才能外出。1943年11月，由日本上海无国籍难民事务所发给侨居上海的德国系犹太难民的移动许可证。〔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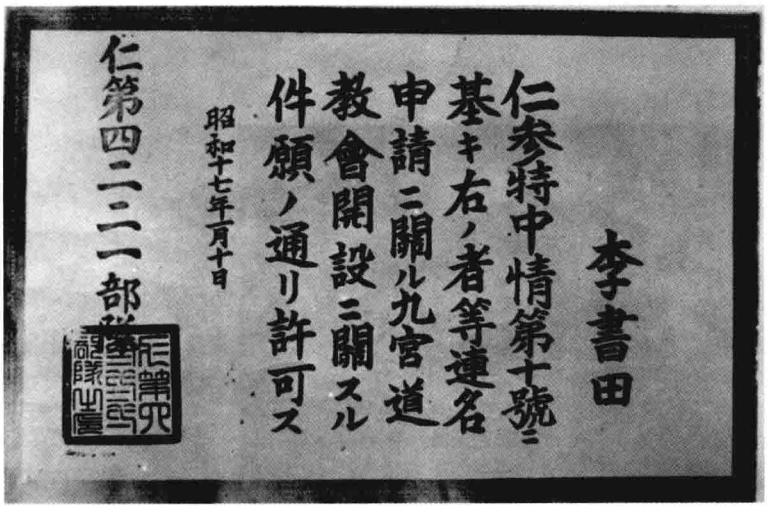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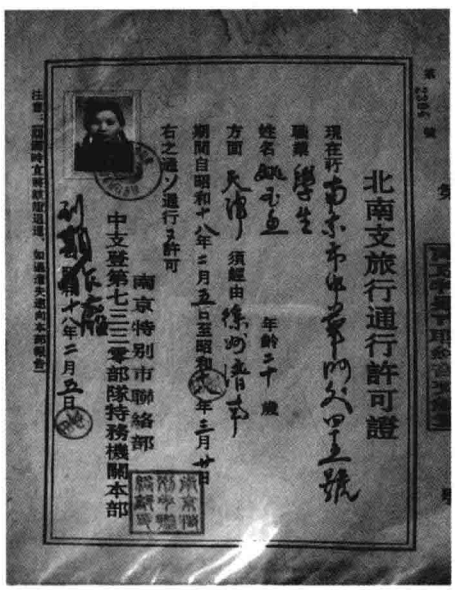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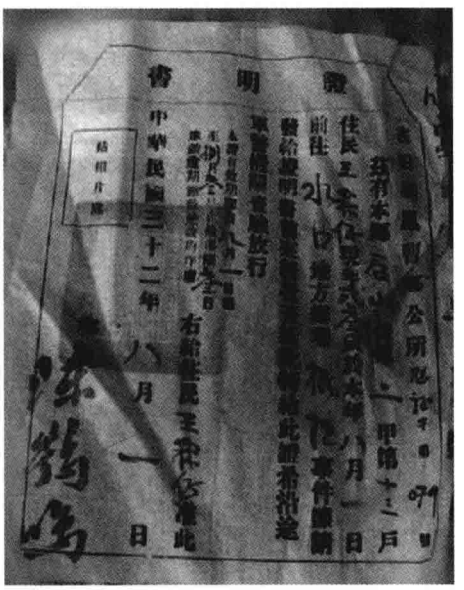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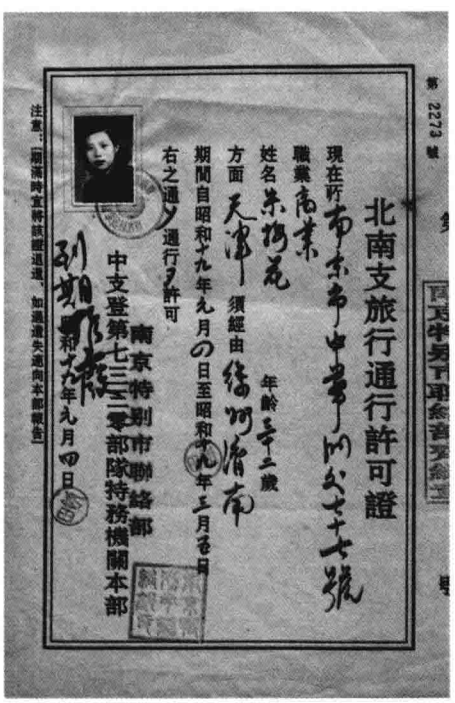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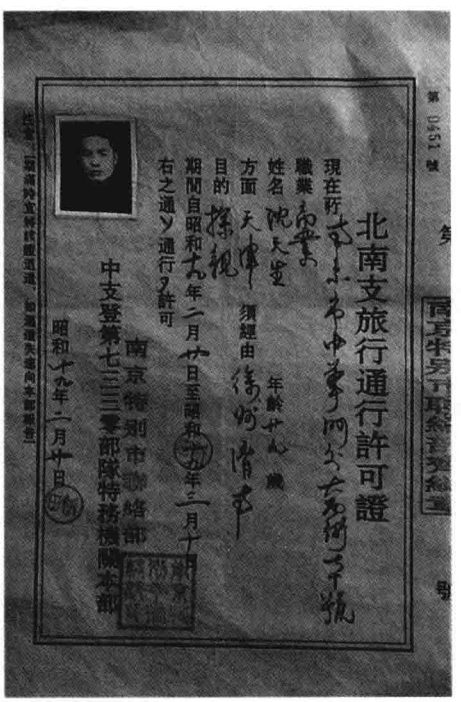
2



3



4



5

1 昭和十七年（1942）1月10日，第四二二一部队（驻宽甸）颁发的通行许可证。伪满时期的宽甸，百姓的通行证都是由日本军方颁发，伪满地方政府没有资格。〔《伪满老照片见证日本对东北的奴役统治》，http://yandh8515.blog.163.com/blog/static/169542307201267848 18922/，2015年3月16日〕

2 1943年2月5日，南京特别市联络部和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家住南京中华门外45号女学生姚玉香的第2304号“北南支旅行通行许可证”。〔王延友提供〕

3 1943年8月1日古田县伪乡长签发的第079号（通行）证明书。持证人为古田县凤曹乡居民王某。〔王延友提供〕

4 1944年元月4日南京特别市联络部和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南京商人朱梅花的第2273号“北南支旅行通行许可证”。〔王延友提供〕

5 1944年2月22日，日本南京特别市联络部和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南京市民沈天生的探亲通行证，证件有效期2月20日到3月10日。〔《日伪时期的通行证》，http://jd.cang.com/567009.html，2015年3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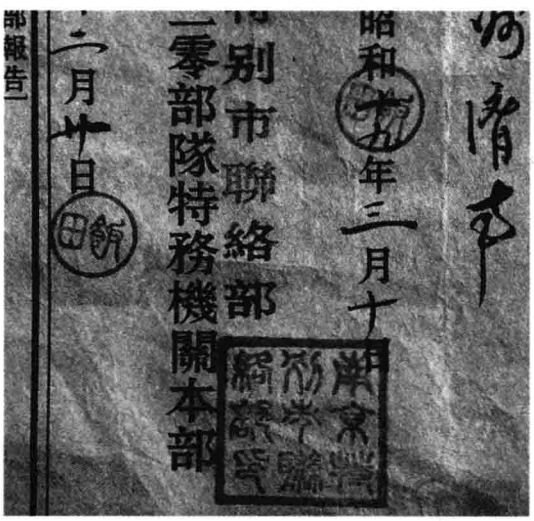
1　1944 年 2 月 22 日，日本南京特别市联络部和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南京商人沈天生的通行证的局部——个人信息部分。〔《日伪时期的通行证》，http://jd.cang.com/567009.html，2015 年 3 月 22 日〕

2　1944 年 2 月 22 日，日本南京特别市联络部特务机关发给南京商人沈天生的通行证的局部——印鉴部分。〔《日伪时期的通行证》，http://jd.cang.com/567009.html，2015 年 3 月 22 日〕

3　1945 年 5 月 3 日，福建省伪屏南县忠熙乡公所制发的（通行）证明书，持证人为该乡居民吴忠先。〔王延友提供〕

4　1944 年，大连日伪警察部门发给原籍山东牟平的胡某回牟平探望父亲的通行证。其行程的路线是从大连经海路到芝罘（烟台）再到牟平。其往返时间也有明确严格的限定。〔王延友提供〕

1



2

3

4

大事记

1931 年

10 月 27 日，日本大佐土肥原贤二秘密赴天津，图谋劫持溥仪赴沈阳，制造伪满洲国。

10 月，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开始设立特高课，其成员多数是日本内务省特高课以驻华武官名义，派出收集共产国际和中国抗日活动信息的情报者。同时，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内还建立了归各野战司令部管辖的宪兵队。

11 月 8 日，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策动失意军人组织游民武装暴动，与保安队激战一夜，随后退回日租界。

11 月 26 日，土肥原贤二制造第二次天津暴乱事件。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于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9 日，日机轰炸上海闸北、南市，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

3 月 20 日，国民政府统计处发布消息，淞沪战役损失达 15.64 亿元以上，81 万平民受直接损害，其中死亡 6080 人，伤 2000 人，失踪 10.4 万人。

12 月 6 日，日本制造“平顶山惨案”，屠杀中国村民 2700 余人。

1934 年

4 月 1 日，日本设置奉天、新京（长春）、哈尔滨、洮南四铁路管理局，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

6 月 17 日，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在热河开鲁、科尔沁旗一带开始实行武装移民。

8 月 7 日，伪满在东北设立森林事务所，准备替日本抢占东北森林资源。

12 月 3 日，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开始大规模推行归田并户工作，实施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的既定方策。“集团部落”类似“集

中营”，四周筑有3米左右的高墙，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墙上每隔100米设置一个炮台。居民被严格管制，由于部落内粮食奇缺，大批老人和小孩病死、饿死或冻死。至1939年，“集团部落”增至1.34万个。

1935年

1月22日，苏联与日本、伪满洲国就出售中东铁路达成协议，苏联将中东路权卖给日本。苏、日、满之间前后谈判40次，历时一年半。3月11日，中东铁路出卖草约由苏、日、伪满三方代表在东京签字，23日正式签署协定。

6月，日本在多伦一带征地24万多亩，进行大规模垦牧，并定名为“安全农村”。

7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协定，设立经济共同委员会。

10月3日，日本为开发华北及内蒙产业，在天津设立事务所。

10月20日，受日本指使，天津组织“东亚经济协会”。

1936年

7月1日，伪满教育部制定奴化教育措施。

10月1日，宋哲元与日本订立《华北经济开放协定》。

11月21日，日本开设满洲兴业银行，统制伪满洲国金融业。

1937年

1月15日，日本命令台湾境内各学校废止汉文科。

2月5日，日本宪兵逮捕唐山中国银行行长并对其严刑拷打。

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制定《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4月15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制造了“四一五事件”。对北满哈尔滨、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地县委、特支遭到严重破坏。

5月2日，伪满政权公布“新学制”，建立系统的奴化教育。

6月1日，台湾日本当局下令各报停止发行汉文版。

6月15日，日本内阁通过《日满一体经济方案》。

8月1日，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该组织协助日军维持社会治安、镇压抗日活动，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最早扶植建立的傀儡组织之一。

10月9日，日军侵占大同煤矿。

10月11日，日军制定《华北各铁路联营纲要》。

10月中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及第一〇八、一〇九师团沿正太铁路线向太原进攻。中国守军沿正太路至娘子关一带布防，开展正太防御战。

11月7日，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在北平成立。

12月，日本产业会社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为攻陷南京，多次投放毒气弹，使用生化武器，

对中方造成了极大损失。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推动下，新民会成立。

12月26日，日军攻占济南。

1938年

1月3日，上海中国国际无线电台被日方接受。5日，电台中国籍职工全部撤退。日本组织华中电气公司接收上海电力公司，统制华中电力。

1月30日，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

1月，上海小野崎部队在江湾附近建设日本兵舍。

2月，松井石根拜祭上海神社。

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

3月6日，日伪政府在北京大成殿举行孔子祭之送神仪式，并于当月访问苏州孔庙。

4月，日伪在济南开办之宣抚班女子训练所。

4月，日伪召开伪国民大会。

4月，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宫拜祭天津神社。

6月27日，日本成立华北开发股份公司。

6月28日，日本在苏北炸毁运河大堤。

7月，日军举行湖口入城仪式。

7月28日，日商上海内河轮船公司成立，垄断黄浦江及苏州河等内地航业。

7月31日，伪华北电报电话会社、伪华中电气交通公司成立。

8月10日，日本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统制沦陷区蚕业。

8月，徐州治安维持会成立。

12月16日，日本对华中央机构“兴亚院”成立。兴亚院执行对华政策时，外交除外，办理有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事务，并监督在华特殊公司营业情况。于北平、张家口、上海及厦门等地，设置联络部，担当指挥现地工作。

12月，新民会在紫禁城午门举行亲日集会。

12月，伪武汉大学复课，日军表演日式舞蹈庆祝。

12月，日军于上海大场镇设立“表忠塔”。

1939年

1月，武昌治安维持会成立。

1月3日，日本组建扬子江轮船公司，统制沦陷区长江航运业。

3月，在南昌作战中，日军在修水河附近进行防毒演习。

3月，南昌陷落，南昌港口与南昌机场被日军占领。

4月，日军在太原神社举行神武天皇祭奠仪式。

4月8日，伪满制定并实施“北边振兴计划”，成立以日本岸信介为首的北边

振兴计划委员会。

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治安肃正要纲》，在各地相继成立警备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4月27日，日军大批飞机轰炸南昌，并滥放毒气、毒弹。

8月，驻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失败后，先后掘开安国以南的潴龙河、河北中部的永定河、南部的安阳河河堤，造成华北多地被淹，民众无家可归。

8月和10月，日军治安部分别公布《县警备队编成暂行规定》和《县警备队编成暂行规定》补充附件，规定“县警备队专任讨伐与警备，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司法警察业务”。

1940年

1月1日，上海难民饥寒交迫，仅普善山庄所收尸体已超过2500具。

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正式成立，齐燮元任司令。

2月，日本与伪满签订《日本中小企业向满洲移植对策纲要》。

3月，汪伪政权宣布恢复战前国民党政权的“法统”，遂将县公署改名为县政府。

6月，汪伪政权改省长制为省主席制。

8月1日，日本首相近卫提出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

8月8日，豫北沁阳日军掘溃沁河堤，沁阳一带成为泽国。许多民众流离失所。

8月31日，汪精卫与日方签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满足日本军事、经济需要，任其榨取勒索的殖民地。

9月—12月间，日军“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向浙江的宁波、金华等地发动细菌攻击，致使宁波一带鼠疫突然流行，上千人死亡。

10月8日，日军在宜昌争夺战中使用毒气。

11月30日，日本承认南京汪伪政权，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

1941年

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既扶轮社委托救世军主办的乞丐收容所开始收容街头乞丐。据统计，该所收容乞丐总数为1429人，其中男乞丐905人，女乞丐273人，男童197人，女童54人。

1月25日，日军在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残酷屠杀无辜村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3月30日，日伪在华北展开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5月22日，南京伪政权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

7月4日至6日，第一届华北都市交欢体育大会在青岛举行。

7月7日，日伪在华北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11月1日，日伪在华北展开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1月4日，日军出动军用飞机向湖南常德及洞庭湖一带的居民点投散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1942 年

1 月 4 日，日军再次占领长沙。

2 月 4 日，香港四十六万难民因严重粮荒陆续反粤。

2 月 14 日，日军在河北定县油坊镇施放鼠疫菌。

3 月，伪满洲国纪念“建国”十周年举行庆典活动。

9 月 10 日，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孔庙举行秋祭孔子演礼。

1943 年

1 月 8 日，日伪开始在华北积极推行“新国民运动”。

1 月 9 日，日汪发表《共同作战联合宣言》，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

3 月 13 日，日本首相东条访问南京，15 日，汪精卫就中日和平前途发表谈话。

5 月底，华北伪政权制定《保安队暂行编制规则》，警备队改称保安队。

9 月 23 日，同仁医院确认正在北平流行的霍乱为真性霍乱。本年 7 月，日军“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为检验一批候补下士官预防霍乱能力和伤寒能力，在北平施放霍乱菌，致使平民惨受细菌试验的毒害。

9 月 27 日，日军在冀南掘运河、滏阳河、漳河堤，致 30 余县受淹。

10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率两万余日伪军，对太岳区实行“多路三梯队铁滚式”新战法，即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牲畜，毁灭财物。前后持续一个多月。

1944 年

2 月 2 日，日军在绥西抢粮，仅归绥县即被抢 30 余万石。

2 月间，东北出现空前粮荒。随着战争扩大，日本为了搜集更多粮食，把统制购销改为强集购销，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强制农民将绝大部分自产粮食按规定收购数量和最低价格交售，造成粮荒。

2 月 8 日，《解放日报》消息，广东饥荒严重，数十万人濒于饿死。

3 月，苏嘉铁路被日军拆毁。1935 年 2 月开工，1936 年 7 月正式通车，全线以平望为界，分南北两段进行，至五六月间，钢轨悉数被拆，仅剩道砟和枕木。不久，枕木也被掠夺。沿线桥梁至 1945 年 1 月 12 日拆除完毕。苏嘉铁路投入使用前后不足八年。

4 月 17 日至 12 月 10 日，豫湘桂战役。8 个月中，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 50 至 60 余万，丧失 4 个省会和 146 座城市（豫中会战 37 天失 38 城）、7 个空军基地和 36 个飞机场，丧失国土 20 多万平方公里，6000 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4 月 30 日，日军设米粮统制会，强夺华中粮食。

5 月 13 日，日本社上海“经济保安处”，直接掠夺上海物资。

5 月底至 9 月初，长衡会战。是“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中国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长衡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长衡会战第二部分。这是中国抗战

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1945年

6月21日，芜湖市十万饥民爆发抢米风潮。

7月，日本军警血腥屠杀日本花冈矿山中的中国劳工，4天内活活打死97人。

主要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汇编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第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 1 月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二、报刊

《支那事变画报》第 1 辑——第 101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发行。

《特刊北支战线写真》第 6 报，东京朝日新闻发行所 1937 年 9 月 1 日发行。

三、历史文献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7月版。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内部发行）。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张玉祥、赵宝库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版。

〔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周晓萌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合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本书翻译组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版。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版。

四、论著

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战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2月版。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刘家国：《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孙宅巍、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实及记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

索 引

B

保安局 189
保甲制度 3, 56
“表忠塔” 87, 94, 295
兵站基地 158

F

佛教会 75

H

何梅协定 194
华北都市交欢体育大会 234, 296
华北治安军 113, 181, 296

J

津浦线 28, 38, 39, 41, 42
警备队 4, 112, 113, 114, 116, 117, 122, 123, 126, 128, 130, 132, 141, 142, 143, 144, 145, 152, 154, 156, 158, 176, 277, 287, 296, 297
靖国神社 85
居住许可证 65
军事占领 1, 4, 6, 112, 228

K

孔子祭 295

L

良民证 1, 2, 4, 21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流民 4, 56, 84, 273, 301

M

蒙疆伪政权 216

N

南京“民众代表” 250
南京神社 108
难民 4, 57, 64, 68, 70, 79, 81, 116, 176, 290
奴化教育 1, 6, 224, 228, 229, 234, 294
奴化训练 1, 6, 228, 234
女子训练所 219, 233, 295

Q

亲日游行 235, 236, 246, 247
亲日集会 226, 295

R

日本化街道 242
日本陆军纪念日 209
日本神社 4, 96, 98, 100, 103, 108

S

“三光政策” 2
上海神社 104, 105, 106, 107, 295
顺民 6, 228, 229
松江神社 109
绥远战线 33

T

太原神社 295
特务机关 1, 4, 112, 189, 192, 193, 194, 195, 196, 199, 200, 217, 224, 283, 288, 289, 291, 292, 295, 296
天津神社 108, 109, 295
通行证 1, 4, 282, 283, 288, 289, 290, 291, 292

W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14
伪江北自治委员会 216
伪北京警察总署 241
伪北京自卫团 120, 121
伪国防妇人会 262
伪九江皇协维新军 253, 254
伪蒙古自治政府 282
伪山东民众运动会 252
伪上海民众大会 249
伪绥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213
伪通州陆军军官学校 256, 257
《汪日基本关系条约》 189, 296
维持会 1, 5, 205,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7, 243, 294, 295
五色旗 236, 248, 272
武汉留日同学会 251

X

宪兵队 4, 112,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75, 188, 189, 217, 288, 293, 294, 296
香港神社 109
新京神社 104
新民主义 224
兴亚院 192, 198, 295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198
宣抚班 1, 5, 200, 205,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74, 295
训练所 219, 222, 223, 233, 295

Y

扬子江北岸战线 45
以华治华 4, 112, 204

Z

治安强化运动 2, 186, 224, 296
“忠魂碑” 91

后 记

本书的编撰，得到了诸多单位、学者和朋友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张宪文先生的鼓励和鞭策，廖大伟教授的细心指导，山东画报出版社傅光中总编、王一诺责编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著名旅日画家庄羽伉俪在日文资料及日文翻译方面给予热情相助。南京民间博物馆吴先斌馆长慷慨提供大量照片和资料。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王卫星所长、南京市档案馆夏蓓处长、南京大学民国研究中心姜良芹副主任、吕晶博士等，给予了诸多有价值的写作建议，并为资料收集提供各种方便。南京大学研究生王萌，安徽大学研究生程诚、任翔、王佳佳、王彬竹、王潇洋、许伟伟等，在照片、资料的收集整理、文字校对等方面，均助我一臂之力，在此一并感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部分已有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能力所限，书中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武 菁

2015 年 3 月 15 日

本书主要介绍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生态造成的破坏以及通过社会控制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日本的侵略活动，除了军事占领、残酷镇压、资源掠夺之外，还利用守备队、宪兵、特务以及宣抚班、基层汉奸组织等，进行欺骗宣传、奴化训练，并通过发放“良民证”“通行证”等手段，对中国民众进行人身与精神控制，实现其侵略与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日本的侵略活动，破坏了中国固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其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ISBN 978-7-5474-1479-8
定价：350.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日本侵华图志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作者=张宪文主编
页数=304
SS号=13877646
DX号=
出版日期=2015.05
出版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综述
第一章　破坏自然生态
一、破坏林业资源
二、破坏交通设施
三、破坏乡村面貌
第二章　破坏社会文化生态
一、打破平民生活常态
二、广立碑塔
三、广建神社
第三章　强化社会统治机构
一、设立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和伪军警武装
二、组建宪兵部队
三、广设特务机关
第四章　基层渗透
一、组织“维持会”
二、成立“自治会”
三、举办“宣抚班”
四、成立“新民会”
第五章　社会控制
一、奴化教育
二、奴化训练
三、控制宗教
四、制颁“良民证”
五、制颁身份证、通行证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